帝国

俄罗斯五十年

[波]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 著

乌兰 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前言

初遇（1939—1967）

平斯克1939

西伯利亚铁路1958

南方1967

鸟瞰（1989—1990）

第三罗马

大教堂与宫殿

亲眼所见，泪流满面

沥青山上的人

逃离自我

沃尔库塔，冻僵在火中

明日，巴什基尔人的反抗

俄罗斯的神秘

跳水洼

浓雾笼罩科雷马

克里姆林宫：魔法山

困境

中亚，海的泯灭

波莫纳小城德罗霍贝奇

归故里

余波荡漾（1992—1993）

余波荡漾

前言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初遇（1939—1967）”，这是我很久以前在帝国居留时的报告。我谈及苏联军队侵占我家乡波兰的波列奇耶（Polesie，今天那里已经属于白俄罗斯）小城。这部分包括大雪覆盖、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的旅行、远征至外高加索、抵达中亚共和国，也就是抵达苏联的边境地区，那里充满了异国风情、冲突和伤感的氛围。

第二部分叫“鸟瞰（1989—1990）”，是我在这个帝国衰败及最后的瓦解时期，在它广袤的大地（至少在1991年还存在的形式范围内）上漫游所经历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一次避开官方机构和线路的单独旅行，此次我走的线路是从苏波边境的布热什切（Brzeszcze）到太平洋的马加丹（Magadan），以及从北极圈附近的沃尔库塔（Vorkuta）经北极圈到苏阿边境的铁尔米兹（Termez），大约6万公里的路程。

第三部分叫“余波荡漾（1992—1993）”，是我在旅途、谈话和阅读空闲间的思考、观察和笔记的结集。

本书以复调的形式写就，也就是说，贯穿在书中的人物、地点和线索可能会在不同的年代和章节中重复多次出现。与复调原则相应的是，没能对整体做出更有高度的和最终的总结，相反有些琐碎和散乱。这是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伟大的苏维埃超级大国在这里一直是衰变的主题和对象。在它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些新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一个庞大的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帝国野心令在那里居住的人民保持振奋并团结一致。

本书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苏联的历史；既不是苏联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产生和衰败的历史，当然也不是帝制知识的简要概括。

这本书是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或者说世界的这一部分——的旅行报告，我试图到达那些时间、体力和机会所能允许我到达的地方。

初遇（1939—1967）

平斯克[1]1939

我和帝国的初次相遇是在连接小城平斯克和南部地区的一座小桥附近。那时正是1939年9月底，战火连天，村庄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森林里躲着空袭，寻求一切可能的救助。死马横尸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你们想走过去吗？那你们就把马拖到一边去吧，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流了很多汗，要知道死马是很重的哟。

一群群人在尘埃、泥土和恐慌中逃难。他们为何要带那么多包裹、那么多的箱子呀？带那么多茶壶和锅干什么呀？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诅咒？为什么要不停地追问？所有人都在行进着，有的坐车，有的跑着——不知道去向何方。但是我的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妈妈牵着我妹妹和我的手，我们娘儿仨正在往平斯克走，去我们位于韦索瓦（Wesoła）大街的家。我们正在舅舅家度暑假，战争把我们困在了雷约维茨（Rejowiec），现在我们必须回家。人人都得回家去！

行走了数日后，我们快到平斯克的时候，从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城市的房舍、美丽的公园树木和教堂的塔尖，忽然间，海军士兵们出现在桥旁边的路上。这些海军士兵手里都拿着长长的冲锋枪和带着尖尖刺刀的步枪，而在他们圆形的帽子上别着红五角星。他们几天前从黑海刚刚航行到这里，击沉了我们的炮舰，杀死了我们的海军，现在又要阻止我们进城。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许动！”他们一边大声喊，一边举起枪瞄准我们。妈妈和其他妇孺们——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哭着求饶。快向他们求饶吧，被吓坏了的母亲们茫然地恳求我们，而我们这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早已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大声

哭喊着。

喊声、哭声、冲锋枪和步枪、海军士兵愤怒丑陋的脸庞、某种怒气、某种面临险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情绪，全部集结在皮纳河桥旁，集结在这个世界里，那时我刚满七岁。

在学校，从第一节课开始我们学习的是俄语字母。我们先从字母“S”开始学起。为什么要从S开始学起？有位坐在后排的同学问道。不是应该从A开始学习吗？

孩子们，老师（波兰人）压低声音说，你们先看一下我们课本的封皮，那上面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是S！

帕特鲁斯是白俄罗斯人，请你完整读一下上面写的这个：斯大林著《研读列宁主义》。这是我们学习俄语的唯一一本书。这是一本用亚麻布包的精装本书，上面还烫着大大的金字。

“离开我们之前，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坐在第一排的听话而又少言寡语的伏瓦焦结巴地念着。最好不要问谁是列宁。所有孩子的母亲早就告诫我们，不要提任何问题。其实这些提醒毫无必要。我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解释，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总之就是觉出在空气里有某种可怕、紧张和沉重的气氛，即我们以往以最狂野、最欢愉的方式玩耍的城市，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暗藏阴谋和危险的雷区。甚至我们连深呼一口气都害怕，唯恐引爆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将会成为少年先锋队队员！有一天，一辆轿车开到学校院中，从车里走出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有人说，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2]的人。

什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大人们说到这个机构名称时都会压低声音小声嘟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制服优雅、崭新，仿佛刚缝制好一样。军队的制服大都破烂不堪，麻布包代替了背包，而且常常是空瘪瘪的，随便用什么破绳子扎着，皮靴好像从来就没有擦拭过似的，而如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什么人走过来的话，那从一公里之内就会闪出蓝色的光[3]。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给我们拿来了白衬衫和红领巾。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师就用惊恐与悲伤的声调对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得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来上学。他们还给我们分发了一盒像章。每个像章上面都是不同人的头像。有的头像上的人留着唇上的胡子，有的没有胡子；有位先生下巴蓄着胡子；两个人是秃头；还有两三个人戴着眼镜。其中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挨排走过我们的书桌，给我们分发了像章。我们的老师对我们说，孩子们，这是你们的领袖。他说话的声音让人感到仿佛是从空木中发出的声音。这些领袖共有九位，他们叫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第九位领袖是斯大林。带他头像的像章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位写了一本厚厚的题为《研读列宁主义》一书的人（我们曾用这本书学会了阅读）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大的像章。

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自己的左胸前。可是问题来了，像章没那么多。最理想的办法是，甚至几乎是义务，要佩戴所有的像章，佩戴方式的排序是以个头较大的斯大林的像章为开头。这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要求，他们要求我们佩戴所有的像章。可问题是，有的人有日丹诺夫的像章，没有米高扬的，或者有的人有两枚卡冈诺维奇的，而没有莫洛托夫的。有一天，有人带来四枚赫鲁晓夫的像章，用这四枚像章换了一枚斯大林的像章（别人偷走了他的斯大林像章）。我们当中最牛的是彼得鲁希，他一人竟拥有三枚斯大林的像章，他炫耀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给大家看。

有一回，我的邻座查伊姆把我叫到一边，想用两枚安德烈耶夫的像章换我的一枚米高扬像章，我对他说，安德烈耶夫的像章价值很低（这是真的，没有人能搞清楚安德烈耶夫到底是什么人），为此我没跟他换。隔一天，查伊姆又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伏罗希洛夫的像章，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做梦都想得到伏罗希洛夫的像章。他身穿制服，带着战争的气息，而我经历过战争，为此跟他有某种亲近感。我用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像章跟他换了伏罗希洛夫的像章，还另外饶了他一枚米高扬的像章。总的来说，伏罗希洛夫跟莫洛托夫的像章一样，比较受欢迎，一个莫洛托夫的像章可以换三枚别的像章，大人们都说，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宁的像章也比较值钱，因为令人联想到波列奇耶的老爷爷。他蓄着白胡子，唯独不同的是，他面带微笑。

有时，我们上课会被枪炮声打断，枪炮声从我们附近穿过，声响急速、剧烈，震得窗玻璃发颤，墙壁抖动，老师带着满脸恐惧和绝望看着窗外。如果爆炸声后能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去念那本厚厚的书，如果听到铁板爆裂声、墙壁倒塌声和石头崩落声，整个教室就变得很活跃，就能听到大声呼喊，他们击中了！打中了！下课铃刚响，我们就冲向操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所小小的平房学校正好就位于这个“五月三日广场”[4]旁边。就在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一个很大的、真的非常大的教堂，这是城里最大的教堂。你必须把头高高扬起，才能看到哪里是教堂的顶尖、哪里是天空。而正在此时炮弹轰向那里，朝着教堂塔尖轰炸，要炸掉塔尖。

那时，在教室里我们会这样理解，当布尔什维克走向我们时，在他们还没看到波兰时，还没看到我们的城市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平斯克教堂的塔尖。这塔尖如此高，肯定让他们感到气急败坏。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仅从他们气急败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俄罗斯人进到城市，顾不上喘口气，顾不上搞清四周情况和街巷里弄，顾不上饱餐一顿，顾不上吸口廉价烟，就急于在广场

上架大炮，用带来的武器装备，向教堂开火。

因为，所有的炮兵都开往前线了，只给他们留下了一门大炮。他们一阵乱轰，如果命中了目标，就会有黑色灰尘飘向教堂塔尖，有时还会冒出火焰。人们躲藏在广场周围幽深的大门内，怀着沉重而又好奇的心情看着他们的轰炸，女人们跪着手里拿着念珠。一个酩酊大醉的炮手在空旷的广场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大声喊叫着："看见了吧，我们向你们的上帝开炮了！而他跟没事人似的，静静地坐在那里！害怕了还是怎么了？"然后狂笑，大声打着嗝。邻居对我妈妈说，有一天尘埃落下来，她看见在被炮轰的教堂塔尖上的圣安哲伊·薄波拉[5]，她说，感觉他表情特别痛苦，像被活活烧死。

上学的路上，我必须穿过火车站附近的铁道。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看火车到站离站。尤其喜欢看火车头：特别想当火车司机。有天清晨，在穿越铁道时，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把货车箱都聚集到一起。那里聚集了数十节车厢。铁路上一片繁忙：火车头穿梭着，刹车声吱吱响，避让铃叮当响。到处都是红军士兵，到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最后所有的活动都停了下来，安静了几天。但是过了几天，我又看到，挤满了人和行李的木制小货车停在货车厢附近，在每个木制小货车前站着几个手持卡宾枪的战士，仿佛马上就会开枪。向谁开枪？那些挤在小货车里的人由于劳累和恐惧几乎奄奄一息。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人。她非常焦躁地说，大流放开始了。流放？好奇怪的字眼。这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妈妈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不想和我说话，妈妈哭了起来。

夜里。敲窗声（我们住在半地下室的小房里）。父亲的脸在夜幕中紧贴着玻璃，显得扁扁的。我看见父亲走进屋子，但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们在夏天告别时，他身穿军装，蹬高筒皮靴，腰间系着一条崭新的黄色皮带，还戴着皮手套。那时我陪他走在大街上，骄傲地听着他身

上“扑啦扑啦”的响声。而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身穿波奇耶夫地区农民的服装，身材瘦削，胡须满腮。身上的麻布衬衫长至膝盖，用条粗麻绳绑着，脚上穿的是草鞋。从他对妈妈说的话中，我知道他被苏维埃当局关押，被他们赶去东边。他说，当他们成队人穿过森林，后来又走到一个小村庄时，他跟一个农民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来。

孩子们，妈妈对我和妹妹说，赶紧闭上眼睛睡觉。从隔壁父母所在的房间，可以听到轻声说话声和剧烈的骚动声。清晨当我起床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了。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四处张望，也许我还能看见他？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学校和关于大炮的事情。还想告诉他，我已经学会俄文字母了，还目睹了人们的大流放。甚至在沃齐申斯卡大街的最远处也无法看到父亲的身影，这条街如此之长，可能是要把世界引向末日。秋日之风冷飕飕的。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痛。

第二天夜里，窗上传来一阵敲打声，敲门的声音是那么急促、令人心惊肉跳、那么粗鲁，仿佛天花板马上就会掉下来。进来了几个红军和穿便服的人，神情紧张，闪电般地搜索，好像有恶狼在追赶他们。他们用枪对准我们。恐怖极了，他们会开枪吗？会杀人吗？眼睁睁地看着人被打死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同样即使看到马被打死，都会令人感到战栗。

那些手持卡宾枪的人犹如雕像般挺立，一动不动，另外一些人翻箱倒柜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扔在地上。满地都是裙子、帽子、我们的玩具、草垫、鞋子、父亲的衣服。然后问我妈妈：“你丈夫去哪儿啦？”而妈妈的脸苍白如纸，摊开颤抖的双手说，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父亲曾来过这里，因此又问：“你丈夫在哪儿？”而妈妈什么也没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啊，你，一个人，挥舞着拳头，吓唬着要打她，而妈妈只好用手臂挡住头，以免被他打着。另一些人还在不停地翻找，搜查。他们一会儿翻床底下，一会儿翻完梳妆台翻衣柜。他们究

竟想找什么？他们说，找武器。但是我们哪儿有武器呀？我只有用来跟印第安人打仗的玩具枪。当然，当那支枪还没坏的时候，我们常常能把印第安人赶出院子，但现在我的那支左轮手枪的弹簧坏了，毫无用处了。

他们想把妈妈带走。干什么，是为了惩罚她吗？他们挥舞着拳头吓唬她，并恶毒地谩骂她。过来！一个士兵对妈妈大喊着，他企图用枪托将妈妈赶到黑暗的院子里去。那时我妹妹突然冲向那个士兵，像疯了似的，手忙脚乱地愤怒地对他拳脚相加并咬他。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妹妹的勇敢、坚韧强悍、不顾一切的精神让他们感到震惊，红军中的一个人，也许他最大，也许是长官，犹豫片刻后，扣上帽子，合上手枪套，然后对他的人说，走吧！

在学校课间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结伴回家的路上，谈的都是大流放的事情。现在没有比这更有趣的话题了。我们的小城市充满绿意，房子周围都是花园，到处长满高高的茂密的花卉、野草、灌木和树木，很容易藏起来眼观四方，让别人看不到自己。那些成功地从家里逃出的高年级同学们，他们藏在杂草丛中，从头至尾看着大流放的全过程，我们已经成了谈论大流放的真正专家。他们对这一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

大抓捕都是在夜间进行。总是让人出乎意料。人在睡觉，突然被叫声惊醒，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生气的嘴脸，他们用力把人从床上拖走，用枪托推，命令他离开住处，还下令交出武器，其实人们根本没有任何武器，他们恶言恶语不断，最坏的是，如果他们管什么人叫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对人最可怕的侮辱），他们能把整个房子搞得天翻地覆，而且乐在其中。他们搜查房子时，弄得一切混乱不堪，这难以用语言形容，然后就会来一辆马车，这是一辆农用货车，让一匹瘦弱不堪的马拉着，因为波奇耶夫那里的人很穷，因此马也瘦得可怜。当指挥官看见马车到了之后，就大声对那些他们要带走的人

喊，给你们15分钟，赶快整理行李，然后坐到马车上。碰上能发点善心的指挥官，那就能给他们30分钟的时间。那时人们就顺手把能拿的东西都赶紧扔在箱子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选择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带什么不带什么的余地。只有快点、马上、立即、动作快、再快一点儿！然后奔向马车，准确地说，就是飞奔而上。马车上坐着车夫，但他什么忙也不帮，是不允许他帮忙，甚至也不允许他回头看是什么人上了马车。人们留下空空如也的房子，因为他们全家都被带走，包括老人、小孩，所有的人，一个不留。他们关掉了灯。

现在马车在黑暗中、在死气沉沉的街道上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行驶。车身像散了架一样颤动摇摆，因为大部分马路都不是柏油马路，甚至根本没有正经的路面。车轮掉进深坑或者陷在泥泞之中。但这里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这种不便，包括波奇耶夫的马车夫和他的马，甚至坐在自己包裹上那些不幸的颠簸的人，个个都郁郁寡欢、恐惧不安。

那些能看到大流放过程的男孩儿们说，他们步行尾随这些马车一直走到铁道旁，那里停着准备长途运输的货运车厢，每晚都有十几辆、几十辆或者更多的马车来到这里，马车都停在火车站旁边的小广场上，然后这些人步行进入货车厢，上到这样的货车厢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车厢很高，押送的人驱赶着这些流放的人，挥舞着卡宾枪，大声叫喊着，谩骂着。当一个车厢满了之后，人们又走到下一个车厢。塞满车厢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用枪托推着让这些人跪着进去，强行用枪托把这些人塞到车厢里，车厢里满得甚至连针都插不进去。

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天晚上还会来抓人，男孩子们知道太多关于抓人的事情，试图从中找出些规律来，总结一下他们先抓什么人、从哪儿开始、采取哪些手段。遗憾的是，白费劲，无规律可循。譬如，他们开始从贝德纳尔斯大街抓人，可突然又停止了行动。然后又从基辅大街抓人，但只抓走那些门牌号是偶数的居民。忽然有住在滨海街的居民失踪

了，当天夜里他们还带走了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啤酒街的居民。从大搜捕那一天开始，妈妈就不允许我们脱衣睡觉，只允许我们脱鞋上床，而且鞋子一定要放在身边，外套要放在椅子上，以便能在眨眼间穿上，实际上是不允许我们真的睡着的。我和妹妹那时并肩躺着，时不时要互相捅捅，晃晃对方或者揪对方的头发，以防睡着。哎，别睡啊！你也别睡着了啊！当然尽管我们这样互相推搡，互相捅戳，但还是会忍不住进入梦乡。妈妈真的不会睡下，她一直坐在小桌旁，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我们住的这条街安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如果在这种寂静中听到脚步声，妈妈的脸会在刹那间变得煞白，此时出现的人一定是敌人。我们上课时曾学过斯大林论敌人的课文。敌人是可怕的人物。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好人会害怕在这个时辰出来，他们此时都会躲在家里。

有时就算我们睡着了，其实也睡得很轻，似睡非睡，什么都能听到。还有的时候，在天快亮前就能听到马车木轮的隆隆声。这种隆隆声由远到近，渐渐变大，当马车经过我家门前时，这种噪声仿佛某种可怕的庞然大物在振动，那时，妈妈就会踮着脚尖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拨开窗帘。住在欢快大街上的其他孩子的母亲此时也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观察着外面。她们注视着外面缓慢走过去的马车，马车上坐着挤作一团的人们，押解马车的红军士兵跟在马车后面走。他们过去之后，黑暗重又回到这里。曾亲眼见过“活活烧死”圣安哲伊·薄波拉的那位女邻居对我妈妈说，她觉得这些马车都是冲着她来的，一天过后她还觉得浑身痛。

我们班上最先消失的是帕维乌，老师说，冬天临近了，他肯定是感冒了，在家卧床休息呢。可是过了一天，帕维乌没来，又过了几周还是不见他的身影，那时我们都猜，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来了。几天后坐在第一排的雅奈克和兹比舍克也消失了，大家都很难过，因为他们两个人最会说笑话，所以老师为方便管教他们，就让他们坐在离自己最近的前排。其他班的孩子也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大家已经不再提他们为什么不

来上课、他们在哪儿这样的问题了。学校变得空空荡荡。放学后我们依旧踢球，玩儿捉迷藏和踢沙包的游戏，可是大家时常会觉得无聊，球在手中也会变得十分沉重，捉迷藏时谁都不想跑得太快藏起来，踢沙包时也心不在焉，结果大家就很容易莫名其妙地争吵和打架，最终弄得大家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个个气鼓鼓地不欢而散。

有一天，老师也消失了。那天我们跟往常一样8点正常到校，上课铃声响后，我们坐在长凳上等候老师的到来，结果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对我们说：孩子们，现在大家先回家去吧，明天再来，明天有一位新来的女老师来教你们。自从父亲离家后，我第一次感到心口一阵紧缩。他们为什么把老师带走？其实我们的老师一直都很紧张，他时常会往窗外张望。他有时会这样说，孩子们，孩子们，然后就不住地摇头。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很严肃的样子。但他对我们很好，如果哪位学生读斯大林的名字时有点结巴，他不但不会呵斥学生，甚至有时会轻微地笑一下。

我郁郁寡欢地往家走。当我穿过火车铁道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列车在铁轨上停着，车厢里挤满了要被拉走的人们，声音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我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在一个车厢门口我看到了老师的脸，他正在向我招手。天啊！我迅速朝那边跑去。忽然我被一个士兵抓住，头被他重重击了一下，摔倒在地。我昏头昏脑地爬了起来，头痛欲裂，此时这个士兵又向我挥了挥拳头，不过没有打我，只是冲我大声叫着：“狗娘养的，给我马上滚开！”

不久后，大饥荒开始了。尽管严冬尚未到来，但刚一放学我们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地形，因为我们常在那片小树林里玩耍，玩打仗和捉迷藏的游戏，有时还玩佯装印第安人的游戏。所以每个人都清楚，谁家的苹果长得大、谁家的梨甜、谁家的李子又紫又大又好吃、谁家的甜菜已经熟透了。当然进到这个果蔬园里是要冒一定的

风险的，因为果蔬园主人会狠狠地驱赶我们，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很饥饿，只要有一线希望，大家都会拼命地想办法囤积一点吃的，每一个杏子、桃子和无花果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最安全的办法是去被抓走的那些人的果蔬园里摘果子，因为那里无人看守。

在品纳河上曾有一个农贸集市，农民们曾用船把自家打捞的鱼和自家做的蜂蜜和米运到这里来销售，但现在这里一片萧条。大多数商店和摊位不是早已经关门，就是被抢劫一空。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乡下去还能弄到点吃的。于是，我们的女邻居们时常会带着自己的首饰和皮大衣到附近的乡下去换些面粉、猪油和家禽肉来。但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那些妇人们离开家去乡下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会到她们家抓走她们的孩子。女邻居们提起这些事就咬牙切齿，同时还提醒我妈妈，其实就算她们不说，我妈妈早已决定一步都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住的这座小城夏天一片郁郁葱葱，秋天树叶变成金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树叶闪着琥珀般的光，而到了11月底12月初，一夜之间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是1939年底1940年初，严冬来得特别早，我和妹妹躲在宁静大街上我奶奶长眠的墓地的树丛里，那里简直就是冰天雪地的炼狱。我们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停在铁道上的一列列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就要在近日被带走的人们。他们将被带去哪里？听老人们说，他们要被拉到西伯利亚去。我不知道西伯利亚在哪里，但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可以猜出来，那是一个连想一下都会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的地方。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老师，他肯定被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每天都有一列列的火车从这里开走。我们躲在树丛中，因为恐惧和好奇心，心都提到嗓子眼。铁道那边传来了呻吟声和哭泣声。不一会儿，这种声音变得很大很刺耳。马车沿着一节节车厢走，人们从车厢里抬出那些昨夜因抵不过严寒和饥饿而死去的人们的尸体，把这些尸体放在马车上，由四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清点，他们一边数一边记录，一边记录

一边清点。清点完之后，他们关上车厢门，这些车厢门一定很重，因为看上去他们很费力才能把车门关上。门被关上后还会发出刺耳的吱吱扭扭的响声，然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会把铁丝缠在门上，还用钳子把铁丝一一拧紧，然后再挨个检查，确认铁丝拧得很牢固，很紧，无法打开。我们蹲在树丛后面，又冷又恐惧，感到浑身发僵。火车鸣了几下笛，缓缓地开走了。待火车走远后，那四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才掉转头，往火车站方向走去。

回到家后，为了不惹妈妈生气，我们什么也没说。妈妈整日整日地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那时家里还有一点荞麦米和面粉。有时候，妈妈给我们煮荞麦粥，有时给我们烙煎饼。我发现，她什么也不吃，每当我们吃饭时，她或者转过身去，或者干脆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们出门时，她就会嘱咐我们带点干树枝或秸秆回来。于是我们就会在家四周的雪地里刨些木棍和秸秆回来。也许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力气走出家门了，而我们还得取暖，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供取暖的东西了，人人都快被冻成冰棍了。晚上我们坐在黑暗的家中，由于寒冷和恐惧不停打冷战，随时等待着被抓走。

有时，我会跟同学们在阳光明媚的冬日小城里到处转悠，偷偷摸摸地到处去找些可吃的东西，当然也知道找不到什么能吃的东西。有时会往嘴里塞点儿雪块儿或者冰块，结果反倒加剧了饥饿感。最令人难以忍受，但有时又最令人感到稀罕并高兴的是，能闻到别人家做饭的香味儿。同伴们！我们当中有人会一边大叫一边挥手招呼大家，然后我们就会冲到他身边，看见他那时已经把鼻子伸到别人家的篱笆缝隙里，盯着那家看。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贪婪地闻吸着朝我们这边飘来的烤鸡或者酸菜炖肉的香味儿。要想离开那个地方，大家不得不互相拉扯着才能走开。

有一回，我们实在饿得难受，就跑到守卫军营的岗哨旁。胡伯特用

俄语说：同志，给我们点吃的吧，他一边说，还一边打着吃东西的手势。但他们只对我们耸了耸肩。过一会儿，有个哨兵把手伸进口袋里，不过他掏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个脏兮兮的、暗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小麻布袋，默默地递给了我们，那里装的是切碎的烟草秆，同时还递给了我们一小块报纸，教我们把它卷成小圆筒状，然后告诉我们把那些潮湿、臭烘烘的碎烟草秆塞进去。香烟本应用上好的烟草和专门的卷烟纸做成，但在那个时候，要想弄到正常的香烟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开始吸刚卷好的那支烟。烟不仅呛进喉咙，还弄得眼睛生疼，人忽然感到头晕目眩，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身体站不稳，摇摇晃晃。我开始呕吐，头痛欲裂。但那种枯肠辘辘、饥不可耐的感觉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尽管口中还残留着令人恶心的烟臭味儿，尽管还有翻肠倒肚的恶心感，可比起因为饿，胃里急需填充东西而导致胃痉挛的感觉要好忍受一些。

我们班现在只剩下半数同学了。新来的女老师安排我和一个叫奥良的男生同桌。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在扎瓦儿大街那边有一个糖果店，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去那儿排队买糖果。我听了这个建议很高兴，因为在他提起糖果店之前，我早已不敢去妄想糖果的甜味儿了。那天，天色灰暗，下着雪。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孩子们早已在糖果店前排成了长队，这个队在几栋房前弯弯曲曲延伸着。可糖果店的木板窗却紧紧地关着。早来的孩子们说，糖果店明天才开门，我们得在这里排一夜，我们只好闷闷不乐地站在队尾。尽管这样，还有很多孩子陆陆续续来这里排队，后来队伍长得根本看不到队尾。

夜晚的温度比白天低了很多，寒风刺骨令人感到透心凉，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几个小时之后，站在这里越来越难受。我手脚上长的脓疮现在变得疼痛难忍，此时的寒霜打在身上，更令我觉得这些伤口钻心地

疼，稍动一下，我就忍不住哼出声来。

队伍中开始有点儿骚动，人们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上纷乱地站着，为了暖身，孩子们索性开始玩捉人游戏。在绒毛般的雪地上乱跑，互相追逐打闹，一拨人跑热了就回到队伍中，然后另一拨人一边喊叫一边追逐玩耍。有人在半夜里燃起了一堆火，火焰燃烧，心里感到暖暖的。我们分头走到火旁，让我们冻僵的手哪怕能享受瞬间的温暖。金黄色的火光映红了站在火旁孩子们的脸蛋儿，孩子们的脸蛋儿因为变得红润而感到些许温暖。之后，暖身后的孩子们回到原来站着的位置，他们把身上的热气又传给了站在队伍中的我们。

清晨瞌睡虫征服了所有人，没人再愿意听从别人提示不要睡觉、在严寒中打盹儿等于自杀的警告。困意袭来，没有人能坚持住，也没有人再有力气去捡树叶和枝条给火添柴，当然也不可能再有力气来回跑动玩捉人游戏。逼人的寒气刺入骨头缝里，冻得我们个个手脚发麻，身体发木，肢体完全不听使唤。为了自救，为了熬过这漫漫长夜，我们紧缩着身体，一个紧贴着一个地站着，形成了一道非常强的、令人感到悲怜的人墙，可尽管这样，依然难留住人们身上残留的热气。雪花飘落在我们身上，用它雪白的、毛茸茸的白色大衣紧紧罩住了我们。

在黑暗笼罩的清晨中，来了两位用厚厚的围巾裹着头的妇女，她们打开了店门，队伍顿时活跃了起来。我们幻想着那里糖果堆积如山，有用巧克力摆成的宫殿；幻想着那里有用花生酥糖雕塑的白雪公主和五角星形的肉桂点心。我们的想象力在蒸腾，在闪闪发光，在燃烧。所有人都尽量往前凑，不仅可以暖身，还能买到点儿什么。然而，店里不仅没有想象中堆积如山的糖果，更没有用巧克力摆成的宫殿，那几个女人向我们出售的是空糖果罐，而且还限量，每人只许买一罐。那个糖罐又圆又大，罐身上印着长着五彩斑斓羽毛、昂头挺胸的公鸡，上面标的是波兰文——E. WEDEL[6]。

一开始我们感到十分懊丧、失望，奥良哭了起来。后来当我们仔细观察了自己的战利品后，慢慢高兴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在糖罐的内壁上还粘着一层厚厚的、五颜六色的、散发着甜甜气味的糖果残渣。妈妈可以用这个糖罐煮水，那么我们不就可以喝到甜甜香香的饮料了吗？为此，我们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甚至感到心满意足。本来应该直接回家，结果高兴地跑到公园里去玩。夏天，在那个公园里曾有马戏团演出，现在马戏团早已经拆了篷子走了，可他们走得匆忙，把旋转木马留在了这里，不过旋转木马的椅子几乎都被人偷走了，只有一个木马椅子还在。我们找来几个男孩，一起用木棍推着木马旋转，我们想疯玩一把。

公园里空空荡荡，十分清静，我们跑到木马旁，转动木马，木马吱吱作响转动了起来。我立刻跳到木马座椅上，扣上安全链。奥良开始发令，高声大喊，驱使那些男孩加油快转，催他们快点儿！再快点儿！那些男孩像船夫似的，使出全身的力气，发疯地推着木棍，木马飞快地旋转，旋转。刺骨的寒风打在我的脸上，冷风飕飕，风力越来越大，但此时我好像插上了翅膀，像个飞行员，像只小鸟，像一片白云在飞翔。

西伯利亚铁路1958

我与帝国第二次相遇的地方是在那遥远的亚洲、白雪皑皑的大草原的深处。那里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广袤大地，整个地貌都令人感到十分生疏。那个地方的山川、河流和城市的名字也很奇特，河流叫——额尔古纳（Argun）、乌恩达（Unda）、查伊哈尔（Chajchar），大山叫——青甘（Czingan）、伊勒楚里（Ilczuri）、贾格迪（Dżgdy），城市叫——奇尔柯克（Kilkok）、屯吉尔（Tungir）、布卡查察（Bukaczacza）。仅是这些名字就可以构成一首慷慨激昂、具有异国情调的诗了。

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一天前从北京发车，到达莫斯科全程要九天，火车途经哈尔滨进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边境车站外贝加尔（Zabajkalsk）。在旅途中，每次火车临近边境站时，旅客们就变得神情紧张，情绪波动。人本来就不该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本应尽量避免或者尽快摆脱紧张情绪。但人们总是会随处遇到诸如边境这类地方，随处可见到和感触到边界的存在。现在权且让我们展开一幅世界地图来看看：上面到处标着分界线。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沙漠与森林的分界线，降水、雨季、台风、耕地和休耕地的分界线，冻土和沼泽、岩石和黏土的分界线。外加第四世纪和火山熔岩、玄武岩和粗面岩的分界线。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前寒武纪时期的平原和加拿大平原、热带气候和北极圈气候的分界线，拉德加河（Ladyga）与查德湖（Czad）的分水岭的分界线。上面还明显划分着不同种类哺乳动物栖息地的分界线。各种昆虫、爬虫和两栖类爬虫的地界，包括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黑色响尾蛇和表面看上去令人畏惧但又令人庆幸、对人不构成威胁的、懒懒的、无毒的蟒蛇的地界。

那么如何划分君主国与共和国的界线？哪里又是古老王国和没落的

文明之间的界线？和约、条约与盟国之间的界线又是什么？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怎么划界？哪里是人类迁移的路线？蒙古人究竟扩张到了哪里？哈札尔人到底到达了什么地方？匈奴人打到了什么地方？

有多少人曾为保卫边疆流血牺牲并为之受尽苦难！为捍卫疆界而捐躯者的墓园之大是望不到边的。当然那些为扩展国界的敢死者的墓地之广也是望不到边的。可以断定，有一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为保卫自己的边疆而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死在由边界问题引发的种种战役中。

为划清边界、扩大边界或捍卫边界而对边界问题产生的这种敏感和坚持不懈的热情，不仅是人类的特点，也是所有生物，包括在天、地以及水和空气中进行活动的所有生物的特性。各类哺乳动物为捍卫养育自己的土地任自己粉身碎骨也不会屈服。各类猛兽会为攫取新的捕猎地盘而将自己的对手撕咬致死而寸步不让。就连我们认为安静温顺的家猫，也会奋不顾身、竭尽全力、不畏艰难地奋力标出自己的领地来，在这里或那里挤出几滴尿液。

而我们的大脑呢？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边际的边界密码。人脑可划分为左右脑、额骨与颞骨、胼胝体和小脑。而在脑室、脑膜、颢和脑回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腰椎和脊椎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譬如，我们会允许思维到这个界限则可以，反之则不行。或者我们会说，小心，不要走得太远，否则会逾越雷池！所有这些思维、感觉、告诫和禁令的界限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彼此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和重叠。我们大脑边界的运动一刻都不会停歇。太阳穴疼痛和偏头痛都来源于此、头昏脑涨亦来源于此，当然也会有耳聪目明的特殊现象，即视野宽广、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但遗憾的是，天才是少有的。

界限实际上就是压力，甚至可以说就是恐惧（很少条件下是解

脱）。界限的概念可能蕴含着某种终结，即永远关上身后的门：生死之间隔。众神知晓这些人类的焦虑不安，为此他们才会竭尽全力去赢得信徒，并给予他们承诺，给予他们的奖赏则是进入毫无界限的神圣王国。基督教上帝的天堂、耶和华的天堂以及安拉的天堂是无界限。佛教徒们知道，涅槃是一种没有界限的、能获得幸福愉悦感的状态。简而言之，人们最渴求、最渴望和最期待的正是无条件的、完全的、绝对的、无限的幸福感。

外贝加尔——赤塔（**Czita**）

啊，铁丝网！铁丝网是最先进入你视线的东西。它矗立于雪地之上，仿佛高高地凌驾于雪地之上，仿佛一条长在地上的用铁丝编织起来的围栏网。这简直就是一种奇妙的组合，根根铁丝盘绕交错，盘踞在天地之间，深深扎根于冰封大地的原野之中，嵌入白色的、天寒地冻的地平线上。望着这些刺芒芒的东西安营扎寨于广袤的边界线上，此时的铁丝网给人一种荒谬的超现实主义的感触，有谁会心生欲望跨越这片白雪皑皑、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呢？那里没有道路，荒无人烟，雪有两米多厚，一脚踏进去就会深陷其中，连一步都别想迈开。可这些铁丝网却想告诉你什么，想跟你进行沟通。它们在对你说：注意，不要想跨越边界去另一边。你无法逃离这里，也不可能离开这里。这里是一个绝对服从命令和完全顺从指令的世界。你要学会倾听，学会谦恭，学会少管闲事，不要引人注目，最好保持沉默，最好不要提问题。

一句话，列车在驶向火车站的途中，铁丝网无时无刻不在警示你，你一定要在头脑中牢牢记住，丝毫都不要有片刻的犹豫，要接受长长的铁丝网线向你发出的限制、禁令和指令，仿佛这条长线已深深扎根于你体内一样，这都是为了你好。

其次进入你视线的就是狗，虎视眈眈、残暴凶猛的狼狗。当火车缓缓停下时，这些狗会冲到车厢的下面不停地吠叫，急切地搜寻着什么。

不过在这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有谁能藏在车厢下面与火车同行呢？就算穿着数件厚厚的皮大衣，也会在几小时之内被冻僵，何况我们的列车已经行驶了整整一天。这些凶犬在车下搜寻的场景构成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以至于后来才注意到另一个画面的出现。似乎一群士兵突然从天而降，眨眼的工夫他们在列车两边排列成队，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用余光交流着信息，他们紧盯着车厢的眼睛构成了一道视觉的监视线，假如此刻有哪位发疯的乘客（或许是间谍、特务、谍报人员）决定在此时跳出车厢，奔向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之中，那么他肯定逃不脱立即中枪被杀死的命运。

真会有谁能一枪就让他一命呜呼吗？那些站在哨塔上的、一直端着步枪目不转睛瞄准着车厢和车窗的士兵能立即做到这一点（此时，我看见窗外有一支卡宾枪正瞄准我，真的，绝对是正在瞄准我！）。换句话说，即使乘客是疯子（或者说是间谍、特务或者是什么谍报人员），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跳出车厢，奔向一望无际的雪地，因为所有车厢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换言之，其实这道士兵监视线起到的作用与密密麻麻、交错盘绕的、一层楼高的铁丝网的作用毫无二致，即警示所有人：闭嘴，别惹事，切记要小心，不要头脑发热干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来。

不过，故事还没就此完结。在那些士兵或许饿着肚子在车厢下的铁轨间紧张搜寻的同时，在那些警惕的士兵刚刚在车厢两边排好队列的同时，在那些哨塔上的士兵用机关枪瞄准我们的同时，一群巡逻兵（一手拿电筒，一手拿匕首）已经把所有乘客轰到车厢的走廊里，开始仔细搜查各个包厢、行李架、座位底下以及各个角落、缝隙、烟灰缸，同时开始搜查墙壁、天花板、地板。他们检查、查看、触摸并嗅闻这些地方。

现在所有乘客都要带上自己所有的随身行李——包括箱子、包裹、袋子等，下车去到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那里摆放着一排排的长长的铁皮

桌。随处可见欢迎我们来到苏联的红色横幅。在红色横幅下面站着一排排海关官员，他们个个表情凶狠、严肃，甚至流露出某种怨恨，是非常明显的怨恨。我试图从他们的面部找到些许温柔、轻松和坦率的表情，因为我也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暂时忘掉周围的铁丝网、岗哨、恶狗和面无表情的士兵，我想与人有些接触，寒暄闲聊一下，我极渴盼自己的此种需求能得以满足。

——你笑什么？一个海关官员满脸狐疑并严厉地问我。

我的心里一阵紧张。权力可不是闹着玩的：与掌权人打交道时微笑是不明智的，表示缺乏尊敬。同时也不能盯着有权力的人多看上几眼。关于这个我在军训时就已经知晓。那时我们的下士扬·波可雷夫卡就因为有人多看了他几眼而惩罚了那个人。

——你给我过来！他大叫，你干吗这样盯着我？然后他就罚此人去打扫厕所。

海关官员现在开始检查了。他们打开箱子，解开包裹，把箱子翻个底朝天，拿出这个看看，拧开那个放在一边。摇摇这个，晃晃那个，抖抖这个又甩甩那个。这是什么？那又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做什么的？那是干什么使的？还有这个？那又是什么？带这个干什么？带那个作何用？去哪儿？为什么？最倒霉的要算带书！旅行还他妈的带书干什么！你可以在箱子里带可卡因，然后在上面覆盖上一些书。海关官员此时对可卡因没任何兴趣，注意力都会放在你带的书上。要是让他们看见你带了英文书，就别想让他们对你客气了。他们会拿起这些书仔细翻看，一页一页地翻，认真检查里面夹有什么东西，阅读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尽管我也带了几本英文书（其实都是些汉语和日语教科书），不过我的遭遇还不算最差的。最倒霉的是邻桌接受检查的那些人，他们似乎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是本地人，苏联公民。他们都是来自布里亚特

（Buriat）、堪察加（Kamczadał）、通古斯（Tunguz）、艾诺（Aino）、奥罗奇（Orocz）和科里亚克（Korijan）的人，他们个个瘦骨嶙峋、个头矮小，身穿带洞的破衣烂衫，脚踏千疮百孔的毡靴，他们的皮肤黝黑、眼睛细长。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中国的。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回来了，随身带了很多食物。我用余光扫了一下，他们还带着整袋的米。

现在这些米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书籍外，带米这类产品就更加令人起疑心，可见米有两面性、可欺骗性，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邪恶狡猾的特性，米里可能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玄机。当然，米就是米，但也有可能不完全是米；是米，但又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这就是米。

为此，海关官员把整袋米都倒在桌子上，桌面上呈现出一片金黄或者褐色的东西，看上去好像眼前是个撒哈拉沙漠的沙盘模型。海关官员开始用手仔细过滤米粒，小心翼翼地用手筛滤，米粒细流般地从检查员的指缝流过，一点点、一粒粒地过滤，突然停止了！再过滤！手指突然停下不动了！手指感到有一颗奇异的米粒，这个感觉给海关官员的大脑一个警示，大脑的反应迅速反映到手上——让手指即刻停止运动！手指头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大脑指示手，再试一次，要小心留意。于是手指小心而仔细地、精巧而细致地，同时又十分小心翼翼地、非常注意用手指来转动米粒，认真检查。苏联海关官员的手可真是有经验，那手指随时准备截住每颗异常米粒，然后放在手中推敲。但米粒毕竟只是米粒，只不过就是一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米粒，它与外贝加尔边境火车站桌子上撒着的数百万米粒没有任何区别，但这颗米粒有着某种不常见的奇怪的形状，它可能是由粗磨碾出的凹凸不平的粗糙米粒，这并非违禁品，里面没有藏着任何阴谋诡计，可此时的海关官员却在提醒自己，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为此海关检查员再次仔细用手指过滤、品味、琢磨、检查，用心去感觉，继续用心体验、检验，哪怕心存一丝疑虑都不能放过，继续停下手指的运动，仔细检查。

其实，我们想一下就知道，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磨米的碾子早已老化，不那么精细了。我们再来想一下，这些外贝加尔的海关官员们又能把这些外形不规整的米粒怎样呢？外形不规整的、可供怀疑的米粒是数不胜数的。几乎每秒钟都会从指缝向大脑传送同样的信息。大脑每时每刻都会向手指发出停的信号。一颗接一颗的米粒，一把接一把的米粒，一袋接一袋的米粒，一个接一个的布里亚特人。

我的眼光无法从这个画面移开。我着迷地看着这一切，忘却了铁丝网和岗哨，忘却了那些狗。这些手指本应去雕刻黄金，雕磨钻石！他们细微的动作、敏感的轻抖和灵敏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些海关官员具有专业的精湛技艺！

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回到了车厢。雪还在下，靴子踩得冰嘎嘎作响。在外贝加尔又上了一节课，即边界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所学校。学生们走出这所学校，将会被分成三组不同的人。第一组人——只会盲目地抱怨发泄！他们最不幸，因为他们对周遭发生的一切，只会盲目地表示愤怒和恼火。烦躁、愤怒、恼火、焦灼。事实上，在他们没搞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在他们周围的现实未发生任何变化和毫无改善之前，他们对积极的因素视而不见而患心梗和脑中风而死！

第二组人，他们会观察苏联人，并会效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质就是面对现状，甚至从中学到某种技巧，并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在这种情况下，最有说服力的说法，即每晚必对自己和别人说，无论过去的一天过得如何不开心，都要学会享受这一天，因为时过境迁，美好的一天不会同样重现。

最终要说的是第三组人，首先他们会对一切事情都心存好奇，觉得有特别之处，很有趣，值得探索，他们愿意去认知，对他们来说那个尚不了解和尚未认知的另一个世界，去认识它、深入它、观察它。他们会耐心地武装自己，保持距离（但不会妄自尊大），他们的视觉是平静

的、专注的、清醒的。

这就是那些处于帝国中的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三种态度。

赤塔——乌兰乌德（**Ułan-Ude**）

从疾驰的火车车窗往外看，我在想：西伯利亚，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是在7岁时第一次听到过这个地名。我们街坊里那些严厉的母亲们曾这样告诫我们，孩子们，要听话啊，不然他们会把你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她们会直接用俄语的发音说出“西伯利亚”这个词，这样听起来更具威胁性）。那些温柔的母亲则会反驳说：你们怎能这样吓唬孩子呢？

实际上，西伯利亚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很难想象出的。当有一位同学拿出一本书的插图指给我看时，我对这个地方才有所感触。画面上是一群衣衫褴褛、弓背驼腰的人在暴风雪中行走，他们的手脚被铁链锁着，铁链的另一头是沉重而又硕大的铁球，他们就拖着这些铁球在大地上行走着。

于是西伯利亚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残忍、残酷，那里不但天寒地冻，而且外加独裁。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常年冰封雪冻的地方，在那里大半年的时光是冰封天地、白雪皑皑。譬如加拿大那片广阔的土地就是如此。我们再去丹麦的格陵兰岛或者美国的阿拉斯加看看。但绝不会有人会用这些地名吓唬小孩子，比如说：快去洗手，否则把你送到加拿大去！也不会有人说：你要是不好好跟女孩儿玩，就把你送到美国去！因为在那些国家没有独裁，不会给你套上枷锁，没有人会把你送到集中营去，没有人会逼你在严寒中劳动，置人于死地。在那里人们唯一的对手是寒冷。可在西伯利亚你却有三个对手——寒冷、饥饿和武力。1842年，波兰浪漫主义诗人米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法国一所高等学院讲了两堂课，以

纪念波兰的将军科佩奇[7]。科佩奇将军在马切尤维采（Maciejowice）与科希丘什科[8]将军并肩战斗，后来被沙俄军队抓获，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押解着科佩奇将军行进上万公里，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直到堪察加。

那简直就是一次地狱之旅。

科佩奇将军写道：他们把我关在一辆小马车里，那辆小车“外形看上去是个小货车，车身的四面钉上皮革，里面是铁板，侧面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用于递水和食物”。

“这辆货车，”科佩奇将军继续写道，“车里面没有座位，因为伤口未愈，他们给了我一把稻草，他们给我了一个秘密囚犯的囚号，没有名字。对他们来说，对像我这样的要犯，他们无论会受到怎样的重罚，都不得暴露关于我的任何事，既不许打听要犯的姓名，也不得获知要犯被关押的理由。”

坐在这种封闭的货车里，就好像被关在了一个密闭的大棺材里，仅靠声音能判断走到了什么地方。听到车下石头发出的隆隆声，他猜想，他们可能到了某个城市：“第六天，当我听到车下石头发出的隆隆声时，我们到了斯摩棱斯克。”他们把将军从黑暗的货车里拉出来，直接关进了幽暗的牢房，这样让科佩奇永远无法分辨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那里有两扇上了铁棍的窗户，窗户上钉着黑木板，日光永远照不进来，得自己猜是白天还是黑夜，看守从未跟我讲过一句话。”尽管在旅途中科佩奇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无法入眠，这些设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歇息点便成了他饱受折磨的地方：“我无法入睡，时常听到从隔壁传出的各种毒打声、酷刑声和枷锁声。”

他们提审科佩奇问道：“说说米茨凯维奇反叛的原因。”他答道：“是对祖国的爱。”提审委员会的人们被他的回答激怒了，为此中止

了审判，他们无法忍受阶下囚的这种傲慢态度。

他们继续押解着科佩奇往东走。“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将军回忆道，“押送我的三个士兵已经死去，其余的人从押送我的货车上摔了下去，有的摔断了脚骨，有的摔伤了手，这经常是因为他们喝醉了酒，在驱赶马车下山时，马匹狂奔，货车斗翻倒，马匹拖着翻倒的车斗狂奔了四分之一里，我像被闷在木桶里的鲱鱼一样，东撞西碰，幸好我被装有粗糠和稻草的麻袋裹着，才得以活下来。”

尽管这类货车时常是用来拉尸体的，但将军明白，自己还是享有某些特权，因为他是在车里，其他人则是步行跟着车走了好几年：“路上我曾遇到过好几百人，男女皆有，他们都是些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去的人，但只有一小队人马押解他们。这些人被从一个流放据点押到另一个流放据点，结果在第三个年头，才把他们从欧洲押解到了伊尔库茨克。有谁要想在半路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路上荒无人烟，假如有谁想跑到附近的森林里躲藏的话，那只能很快就被野兽吞噬了……”

这种流浪之旅不仅是时空的错置，同时还是一个消泯人性的过程：如果某人终于抵达边陲（如果幸免死于路上），他早已被剥夺了人应有的一切，没有姓氏，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将会得到怎样的处置，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因为不会有任何人跟你说话，人此时就是一件货物、一件物品、一个微不足道之物。

后来他们把将军赶下车，逼他步行。“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地走。”

他补充写道：“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乌兰乌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jarsk）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我期盼见到贝加尔湖，但火车是在夜间行驶过贝加尔湖的，湖面仿佛是被冰霜弥漫在车窗上的一块黑斑。直到清晨我才看到高山与峡谷，一切都被冰雪覆盖。

除了雪还是雪。

那是1月份，正值西伯利亚的冬天。

给人的感觉是，由于寒冷，窗外的一切都变得僵硬了，甚至枞树、松树和云杉树看上去都像是巨大而又坚硬的冰柱，仿佛它们是耸立于雪地之上的墨绿色的石笋。

这种景致静止不动，好像火车也停在原地不动一样，似乎火车也变成了这种静止不动的景致的一部分。

白色，到处都是令人目眩、神秘莫测和无边无际的白色。如果有人愿意被这种诱人的白色迷惑，那就会深陷这白色的陷阱，只有死路一条。白色能毁灭试图接近它并企图深入探寻其奥秘的一切人。白色会将他们推下山顶，抛进白雪皑皑的荒原，将其冻死。布里亚特人崇尚一切白色的动物，把它们奉为神灵。他们相信，宰杀白色的动物会犯弥天大罪，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将白色的西伯利亚视为神庙。他们向白茫茫的荒原躬身致敬，向白茫茫的景物表达极尽诚敬之心，他们坚信，死亡即来自那白茫茫的深处。

白色时常令人联想到终结、极限和死亡。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对死亡心存恐惧，因此他们在葬礼时穿黑色丧服，为的是吓跑身边的死神，将自己与死神隔绝，让死亡只局限于逝者。在那些视死亡为另一种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地方，人们在葬礼时穿白色的丧服，给逝者穿的寿衣也是白色的。白色在这里意味着接受、赞同和听天由命。

在这一月份的西伯利亚的景物中似乎含有某种降伏、颠覆和穿透一

切的含义。大地一望无际，世界一望无际。其实人并不是为这种一望无际而生的。对人来说，那种适度的、触手可及的生活便利的地方是他们所拥有的村庄、田野、街道和房屋。在海上，大船的甲板的尺度则是人所能接受的限度。人是为了这种空间而生的，即一用力就可一次性地把生存空间移到别处。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

过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旅程已到了第四天？），天才刚刚微亮（每年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地区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是一片黑暗）。我喝着茶望着窗外。与昨天完全相同的白茫茫的景致。与前天（我忍不住要特别补充一下，与去年、与几个世纪前）一样的景致。与以前毫无二致的茂密的森林，一模一样的道路和荒原，而在空旷的原野上到处是被风吹得奇形怪状的高高的雪堆。

我突然想起了桑德拉尔[9]和他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法国的小让娜的散文》中的诗句。他的这部作品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桑德拉尔在书中描述了与我今天相同的旅途经历，只不过与我旅途的路线相反，他是从莫斯科到哈尔滨。他书中的诗句是他心怀恐惧的女友让娜反复提问的问题：

“布莱斯，告诉我，我们离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很远了吗？”

让娜也曾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所有人经过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时都有的感觉，即有某种陷入了空虚和幻灭的感觉。

作者的回答无法安慰她：“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让娜，你已经走了七天了，离蒙马特很远了。”

相比之下，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怎样衡量人们远离家乡而产生的那种孤独感呢？哪里是人们因为远离家乡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接近世界尽头

的某一个点呢？这难道是情感意义上的一个点吗（我的家就是我的世界）？或许是文化意义上的某个点（比如希腊文明）？或许是宗教意义的某个点（比如麦加）？大多数人被问到世界的中心是巴黎还是墨西哥城时，回答是巴黎。为什么？其实墨西哥城比巴黎大，有地铁也有名胜古迹，有伟大的画家也有著名的作家。但他们仍然回答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或许有人会宣称，对他来说世界的中心是开罗，毕竟它比巴黎大，比巴黎的名胜古迹多，有大学也有艺术。可又有多少人会支持这种说法呢？为此巴黎还是世界的中心（不管怎么说在让娜经过西伯利亚时她最牵挂的还是巴黎）。那是欧洲。欧洲是唯一有过并且（几乎）实现了自己世界理想的文明。其他文明或许由于技术原因没能实现这样的理想，比如玛雅文明；或许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比如中国，因为中国坚信，自己就包含了整个世界。

只有欧洲文明表现出有能力打破种族中心论的界限。在自己范围内产生出了解其他文明的意愿和（由马林诺夫斯基[10]创立的）各种平行文化的荟萃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的理论。

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

白天，黑夜和白天。

单调、沉重的火车轮的噪声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夜里这种轮声就愈发令人难以忍受：人被禁闭在这种噪声中犹如被囚禁在颤动震荡的牢笼中。我们突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突然封闭了车窗，甚至在车厢中能明显听到狂风的呼啸声。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鄂木斯克——车里雅宾斯克（**Czerbińsk**）

旅行的第六天，也许是第七天了。时间感消失在空旷单调的空间

中，时间的概念既不重要，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钟点就像萨尔瓦多·达利画作中变了形的柔软而有延展性的时钟。在火车穿过不同时区的同时，本应不断调整手表上的时针，不过那又何必，能得到什么呢？人们对变化的感觉在减弱（主要是时间感在消失），甚至人们需要某种变化，因为在这里，人好像生活在崩溃、麻木、内心的瘫痪之中。此时正好是一月份，天短夜长，甚至白天大部分时间也都被深灰色的阴暗所笼罩。当太阳偶尔露出来时，那时世界就好像用一只尖利的硬笔在碧空万里中画出了一道豁亮明朗的亮线。但在这之后天色就更加阴沉，阴暗无处不在。

沿西伯利亚铁路乘坐火车旅行真的能看到这个国家所谓的现实吗？其实不然。旅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即使在白天的路程中看到的也只是白雪皑皑的旷野，此外什么也看不到。那些小小的火车站也都隐逸在夜晚孤单、忽明忽暗的灯光中，似乎有某种幽灵看着疾驰的火车飞奔在暴风雪中，忽隐忽现，最后消失在近处的森林中。

我住的是两人包厢的卧铺，但一直是我一个人，孤独令人难熬。由于车厢不停左右摇晃，也没办法看书，因为字母在眼前乱跳，弄得人眼晕，没过一会儿眼睛就疼了。同时也没人可以交谈。当然可以到走廊里去，可又能怎样？所有包厢的门都是紧闭的，我甚至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因为没有窗户，也没办法窥视一下。

“各车厢里都有人住吗？”我问列车员。

“情况不一样。”婉转地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他就溜走了。

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谈。即使有人（甚至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人）或者从我身旁走过，或许我几乎抓住了他的袖子，但也只能听到一句咕哝声，然后就闪身走了。即便他们回答了你的问题，也都是用含糊不清的、双关语的单音节词，从这类回答中你也得不出什么结论。他们

常说的就是：看看吧。还会说：是啊！或者说：谁知道呢，或者说：绝对！但他们时常说的大实话就是：哎，生活就是如此！这种话似乎在给你指点迷津，似乎又让你明白了一切。

如果世上存在某种天才民族的话，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用这种表达方法所表示出的天才。即：

哎，生活就是如此！

如能认真思考这几个字的含义，那就能从中领悟很多。尽管我还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可惜不能。我四周空荡荡的，四周是被烧毁的土地，到处是墙壁。原因很清楚：我是外国人。外国人会引起复杂的感觉，同时也能引起好奇感（要压抑这种情感！），引起羡慕感（因为外国人富裕，看看他们的衣着就能明白），但首先引起的是恐惧感。社会制度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个制度与世界格格不入，因此外国人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撼动这个社会制度。由于与外国人有接触，斯大林就可以将这个人发配到劳动营去改造五年，甚至十年。经常是下令枪决，因此人们害怕外国人如惧怕火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坐的不也是押送车吗？不过与押送科佩奇将军的车不能同日而语，要舒服多了。当然，更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判刑，不是被流放者。但是被隔离的原则是一样的。这里强调的是：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外人，一个闯入者，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刺眼而又会带来麻烦。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不是说外国人就是最危险的东西吗——因为他潜入我们内部，是间谍。他透过这扇窗户要看到什么，想从那里看到什么？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整个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间谍的眼睛是攫取不到什么东西的。火车好像是在一个塑料的隧道中奔驰——只有赤裸的墙壁和更多的墙壁：夜幕的墙壁、冰雪的墙壁。那为什么他又要试图提问题呢？为何对此有兴趣？为何想知道这些？为什么要记录？他在记笔记，都在记些什么？怎么什么都记？他会把笔记本放在什

么地方？一直随身带着？这可不好！

他在问什么？他在记录着，难道一直要记到西玛（Sima），他要去西玛？可我们的火车在西玛不停呀！谁说不是呢！但是他问了！而您呢？我？说我吗？我什么也没说。怎么，你说你什么也没说？你刚才不是说了些什么吗！对，我是说了，可我只说了一个词，还远着呢！这可不好！你应该说，我们已经过了西玛，要把他弄糊涂才对！

谁说不是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最好回避问题。说傻话是最容易的事！最糟糕的是，一个人遇到了外国人，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就遭到怀疑，被记录在案。对人来说真的很难说找到正确的答案。就得这样生活，沿着城市、街道、火车的走廊走，为的是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避免让自己灾难临头。

车里雅宾斯克**——**喀山（**Kazań**）

尽管离古老僵化的俄罗斯越来越近，但是离莫斯科还有很长一段路途。

“没有路，只有可怕的高山与峡谷。”

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阅读过别尔嘉耶夫（Bierdayev）的老书。在书中他论及了帝国广袤的空间对俄罗斯人精神所产生的影响。谁能知道那些住在叶尼塞河（Jenisej）某处或者阿穆尔（Amur）—泰舍特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深处的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呢？西伯利亚铁路经过的每条路似乎都看不到尽头。可以走好几天，好几个月，而一直围绕着俄罗斯走。平原无尽头，森林河流亦无尽头。别尔嘉耶夫说，要想统治这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就必须创建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家。为此俄罗斯人就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为了维持广大的国土空间，俄罗斯人就得维持一个宏伟的国家，而为了维持这个宏伟的国家，耗尽了俄罗斯人的精力，然而

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别的事情，诸如国家组织结构、国家经济等。把精力耗在维持国家的国土空间上，因此俄罗斯人就要受奴役、受磨难。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帝国的庞大及其地域的广袤对其居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为此，俄罗斯不要求其居民专心、发挥什么作用，也不需要他们集中精力或者开创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里一切都被自然分解、分崩离析，被无法定形的东西所淹没。俄罗斯，一方面无边无际，广袤无穷，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轴承，令人窒息，难以喘息。

喀山——莫斯科

疲惫，一种令人越来越疲顿、心力交瘁、昏昏欲睡的疲乏，产生了一种焦灼和麻木的感觉。在极少消耗能量的情况下真想跳出这个疾驰而晃动不已的牢笼。真的很钦佩科佩奇和那些与他同命相怜的数千万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对他们那种能忍受煎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敬意。

最早映在眼前的是白雪覆盖的绿色成片的森林，然后是成片的大森林和房屋，其后房子的密度越来越大，接着就是成片的房屋和高楼，而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列车员来收走了包厢里的床单、枕头、两条毛毯和茶杯。

车厢走廊里站满了人。

莫斯科到了。

南方1967

在西伯利亚铁路旅行的九年以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帝国。这次，我走遍了苏联南部的七个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旅行节奏快得都令人觉得难以承受了——在这些共和国采访一共只有几天的时间，所以我意识到，这种节奏的采访和会见只能是非常表面和非常随机的。但是，在这样不便到达和封闭、到处充满神秘的国度里采访，必须充分利用每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利用哪怕是最不期而遇的可能性，来试图将那个紧闭而又沉重的幕布揭开一点儿缝。

第三次与帝国接触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整齐单一的产物，在那里一切都是灰暗和冷酷的，充满了单调和陈腐。在这里一切都不可能超越适用的标准，不能标新立异，不能展示自己的个性。

为此，我专门跑到了当时还属于帝国的那些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尽管那里仍然受到俄罗斯政府僵化的军营般的束缚，但还是让我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历史，保留了一些含而不露的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我还发现在那里有晒在阳光下的东方式地毯，地毯上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自己民族喜欢的古老色彩，保留着很突出的自己民族原始的设计图案。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博物馆真的值得一看。很早以前这个地方曾是一座神学院，斯大林还曾在这里念过书，入口处的牌子上这样写着。这栋楼颜色灰暗，但是很宽敞，坐落在市中心，在老城区的边上。其实展览大厅很空旷。一位叫塔米拉·特福多拉泽的女大学生给我讲解，这位姑娘很含

蓄而且非常漂亮。

格鲁吉亚古老艺术的精湛和美丽让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目不暇接。最不同寻常的是那里的圣坛画！它们比俄罗斯圣坛画要早很多年，格鲁吉亚最好的圣坛画要早于安德烈·鲁布烈夫[11]画的圣坛画。塔米拉认为，格鲁吉亚的圣坛画最初在金属上创作：那时只画圣人的面部。这类创作最辉煌的年代是在8—18世纪。镶嵌在华丽的金色木框内和贵重宝石框内的圣人的面部黝黑，但在光线的照射下闪光发亮。有些圣坛画还可以开合，类似于波兰维塔·斯特沃什的可开合的圣坛画。这些圣坛画的画幅像纪念碑一样庞大。这里的有些圣坛画甚至历经三个世纪的几代工匠才得以完成。这里还有一个镇馆之宝，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它是格鲁吉亚皇后塔玛拉唯一的遗物。

还有就是格鲁吉亚教堂壁画展。在格鲁吉亚之外，鲜有人知道格鲁吉亚的这些奇迹。遗憾的是这些壁画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最好的壁画早已遭到严重破坏。这些最好的壁画都曾画在格鲁吉亚最大的一座教堂里，这座教堂叫斯维特·特斯克维里[12]，建于1010年、坐落在第比利斯附近的姆茨赫塔，该教堂内的壁画是中世纪的杰作，堪与法国沙特尔圣母主教座堂内的彩色花玻璃媲美。后来沙俄总督下令要涂掉这些壁画，他说，要让教堂墙壁变白，“要像农妇把炉灶都刷白”了那样去做。后来人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恢复这些壁画，结果都没办法。于是这些壁画的光泽就这样永远地消逝了。

斯维特·特斯克维里大教堂是在欧洲保存最好的11世纪的建筑古迹。教堂建筑看上去好像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尽管从来没有重新修整过。这座教堂是格鲁吉亚的一位叫阿舒克斯基的建筑师建造的，后来帝王下令砍掉他的一只手，这样今后任何人都不能建造与之相媲美的建筑。后来帖木儿几次下令炸掉这座教堂，结果连墙壁都未颤动一下。这座教堂开放至今，格鲁吉亚天主教会大主教叶福来二世在这里主持弥撒

活动。

同时我还看到了瓦尔基亚[13]，但仅仅是瓦尔基亚的照片。这是格鲁吉亚难解之谜中的又一个谜，是现代人无法解释的。瓦尔基亚是建于12世纪的格鲁吉亚的一个城市，整个城市建在岩石上，看上去不是水平状的，而是像楼层般垂直状的。重要的是，首先得说清楚，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洞穴或者什么坑穴，而是有计划、有街道、有原始建筑的城市，只不过整个城市是嵌在岩石上，嵌在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山里。问题是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呢？建造这样的城市比建造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难上加难。此外瓦尔基亚曾是有人居住的城市。现如今，它跟金字塔一样失去了生命，剩下的只有石壁，成为一个苍凉的超现实主义的物群。

最后塔米拉带我来到了尼科·皮罗斯曼尼[14]展厅，让我欣赏一下不久就要去法国巴黎展出的画。塔米拉告诉我，巴黎仰慕尼科·皮罗斯曼尼。尼科逝世于1918年。人们赞誉他为格鲁吉亚的尼基福尔[15]和卢梭[16]。

伟大的自学成才的画家！

尼科曾经住在纳哈沃福卡——第比利斯的一个游民贫民窟街区。他一生都很贫穷，连画笔都得自己做。尼科的画以黑色为主调——画面中黑色占据了很大篇幅，因为他能从制棺人那里拿到颜料，同时他还搜集旧的锡做的招牌，以便能在上面作画。为此在他画面的背景上能模模糊糊看到一些没有完全用颜料盖住的如某某“杂志”或者“烟草”的字母。尼科的黑白影像印在金红色的广告牌上。格鲁吉亚的原始主义画主要是画在俄罗斯的商业建筑上。尼科都是在那些廉价酒馆或者廉价小吃店里作画。有时旁观者会送他一杯葡萄酒喝。也许他患了肺结核？也许是癫痫病？关于他人们知之甚少。尼科的很多作品都流失了，部分保留了下来。其作品的大多主题都是关于晚餐的。

尼科画的晚餐跟保罗·委罗内塞[17]一样。

不同的是尼科画的晚餐是格鲁吉亚式的，世俗式的。他的画面以格鲁吉亚的风景为背景，摆着丰盛美味佳肴的桌子，格鲁吉亚人坐在桌子后面大吃大喝。桌子占据画面的中央，桌子是最主要的。食物让尼科着迷，尼科把这些美味佳肴和人们狼吞虎咽的样子都记录在画面上。尼科把他想吃的、今天和将来以及永不想吃的东西都展示了出来。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食物，有烤羊、肥肥的乳猪、如乳牛血般鲜红的葡萄酒、水灵灵的西瓜、香气扑鼻的石榴。在他的画作中蕴含着某种受虐狂的韵味，好像刀子插进自己的腹部，尽管尼科的绘画艺术很欢快甚至有些滑稽。

尼科画面上的格鲁吉亚总是温饱的，永远在尽情吃喝，酒足饭饱。牛奶遍地流。天赐美食，所有的日子都是在享受美味。这就是格鲁吉亚纳哈沃福卡夜有所梦的情景。

尼科画出了纳哈沃福卡的梦。

绘画并没有给尼科带来幸福。他有过一位叫玛格丽特的女友。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女孩。尼科很爱她，为她画了肖像。他把玛格丽特的脸庞画得十分天真浪漫，但所有的部位都非常不对称，一切都不成比例的大。她的嘴很大，眼珠膨出，耳朵硕大无比。尼科把这幅画送给了玛格丽特。惹得女友愤怒地尖声大叫，然后气愤地心怀恨意地离他而去。他的天才注定了他的孤独。

从此尼科过着孤单的生活。

他继续用生锈了的锡板作画，制棺人继续为他提供颜料。他一直在画自己的盛宴，山景衬着桌子。有时旁观者为他买上一杯葡萄酒。他54岁就离开了人世，死于第比利斯，死于某个廉价酒馆，无从得知他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饥饿，或许他是死于癫狂。

瓦赫坦·依纳什维利带我去看了他工作的地方：一个大厅里摆满了堆到屋顶的大桶。一个个又大又重的木桶静静地立在那里。

大木桶里盛放的是酿好的白兰地酒。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如何酿制白兰地。要酿好白兰地，首先要具备四个条件：葡萄酒、阳光、橡树和时间。此外，就像做每一件艺术品那样，还得有品位。剩余的步骤就是——

秋天，摘下葡萄后，先用葡萄酿酒，然后把酒倒入大木桶。大木桶必须是用橡木做的。是否能酿造好的白兰地还取决于橡树的年轮。橡树在生长的过程中能把阳光充分储存在自己的树干里。阳光慢慢沉淀进橡树的年轮里，就像琥珀沉淀在海底那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长达数十年。用年轻的橡树做的酒桶是不可能酿出好的白兰地的。橡树在生长的过程中，树干会逐渐变成银色。橡树开始结果，木质汲取能量、颜色和芳香气味。不是每棵橡树都能酿出好的白兰地。最好的白兰地是由独自生长在安静地方的干燥土壤上的橡树制成的酒桶酿成的。因为这种橡树能充分吸收阳光，在这种橡树里储存的阳光就像蜂巢里的蜜汁一样稠。潮湿的土壤呈酸性，那时橡树的苦内酯含量高。这在酿造的白兰地中可以马上感觉到。用年轻时受过伤害的橡树做酒桶也不能酿出质地良好的白兰地。因为受伤的树干渗出的内酯发不出芳香味，因此它就失去了橡树本身具有的芳香化合物。

然后就是桶匠制作酒桶。桶匠必须知道，他制作的是何种用途的木桶。如果用错误的方法切割橡木，那么橡木就不能释放出香味。尽管木头可以释放出颜色，但不含香味。由于橡树是很挑剔的，因此在酿制白兰地时橡树必须起作用，为此桶匠也必须具有小提琴制作师的灵感。优质的酒桶可以持续用上百年，有的木桶可以连续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是每个桶都可以这样持久使用，因为有的桶不能散发香味，有的则能酿制成黄金般的白兰地。几年之后就能鉴别出桶的好坏。

之后就是往酒桶里倒入用葡萄酿制的酒。要看情况，往桶里倒500或者1000升不等。之后把酒桶放在木架上，不再动它们，也不需要再做别的事了，需要的只是等待。一切都需要时间。现在这酒被倒入了橡木桶，然后橡木需要释放出它蕴含的一切，释放出它储存的阳光，释放出它的气味，释放出它的颜色，橡树从体内挤出自己的内酯，开始工作。

因此它需要安静。

同时还需要风，因为木头需要呼吸，而且木头喜欢干燥的空气。湿气会破坏颜色，让酒的颜色变深，变得没有光泽。可葡萄酒则需要一定的湿度，白兰地则与之相反。制作白兰地要求很苛刻。酒龄为三年的白兰地定级为三年陈，标有三颗星。标上星级的白兰地属于最年轻的，不属于上乘白兰地。最好的白兰地标有公司商标，但不标星级。这类白兰地至少为十年陈酿、十二年陈酿甚至是上百年的陈酿。事实上白兰地的年份还要更久一些，因为必须加上制成酒桶的橡木的年龄。现在橡木桶开始工作，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影响久远。

可以从白兰地的口味分辨出白兰地的年份。白兰地年份短的口味有些重、带些辛辣味、不醇和，口感略酸、发涩。而年份长的白兰地口感则幽雅醇厚，浓郁香醇，色泽鲜亮。年份久远的白兰地入腹发热，晶莹光灿，韵味协调，品位温柔醇香。

而且令人回味绵延。

亚美尼亚

瓦尼克·散特瑞安带着我穿梭于首都埃里温（Erewan）的大街小巷，这完全是应我的要求，不走那些熟路和老路。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贝尼克·佩特鲁斯扬的画院。这个小院子四周用石墙围着，这是贝尼克常年画展举办地。贝尼克今年28岁，毕业于埃里温学院，是一位雕塑家。

他个头不高，很腼腆，居住在自己拥挤的画室内，这个画室的门正对着展厅的院子。他的画室里挂着一个非常精美的亚美尼亚石刻十字架，当地人叫Chaczkary，也就是亚美尼亚人在古代刻在岩石上的十字架。在亚美尼亚全境随处可见这种石刻十字架，这是亚美尼亚存在的象征或是边界的标记，有时也是路标。这些古老的石刻十字架大都是在那些人们难以到达的地方，在那些悬崖峭壁顶上的洞穴里，如今已经没有路能攀上去，很难想象那些石刻家是怎么登上那些悬崖峭壁的，当时那些雕刻家大都是僧侣。

贝尼克用葡萄酒招待我们。我们坐在木板凳上，四周是他耗费多年心血雕刻的石头，他为我们打开录音机，让我们聆听亚美尼亚语称为patarak的录音，即亚美尼亚古老的赞美诗，这个赞美诗非常优美动人。贝尼克给我们放的是亚美尼亚合唱团在法国巴黎用法文演唱的录音。在亚美尼亚如今还能听到原始版的赞美诗，在首都埃里温附近的埃奇米阿津（Echimiatsin），那里被称为亚美尼亚教会圣地梵蒂冈。

贝尼克既搞石头雕刻创作，也搞czekanka创作，就是搞金属-塑料浅浮雕创作。他在这方面极具天分。他的雕刻和金属-塑料创作大多是紧扣爱情的主题——爱情的拥抱。但是在这些姿态中很少表现出愉悦的情感：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之后就得永远分别。他有一组作品表现的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分别。

他很少能为自己找到举办展览的地方。他的雕刻大多都像现在这样立在这个院子里的树下，或者靠墙立着，或者直接躺在院子的过道上。贝尼克为自己院子周围的四邻们雕刻。为当地的主管和邮差们雕刻。为前来收拾成堆垃圾的人雕刻。为那些前来玩耍或者为得到糖果而来清洗石刻的孩子们雕刻。为电力公司的收费员雕刻。同时也为那些因公来这里的民警们雕刻。

在贝尼克居住的这条街道上，还有一个叫阿玛雅克·布德阳的艺术

家也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布德阳擅长制作高大的希腊罗马式双耳细颈瓶、花瓶和陶瓷制品，这些制品很适合在埃里温的广场上展示。这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巨大的陶瓷制品，是埃里温城市广场和林荫道旁宽广的草地上绝好的艺术装饰。布德阳喜欢明亮和欢快的颜色，但是他的作品的材质却十分粗糙，凹凸不平。布德阳在波纹起伏的突起点涂上清淡的、明亮的釉色，为此这些花瓶和陶瓷制品从远处看就闪闪发光。在该城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布德阳这些高大的希腊罗马式双耳细颈瓶作品。身为亚美尼亚艺术学院教授的布德阳开展了一场运动，其目标不仅是将整个埃里温变成一个建筑杰作，同时还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杰作。政府全力支持他的倡议，为此布德阳设计了埃里温剧院内装潢——这是现代艺术在内装潢方面最有趣的创作之一。同时在“阿拉斯”（Araks）[18]咖啡馆和“亚拉腊山”（Ararat）[19]饭馆里完美的内装潢都是出自他手。“亚拉腊山”饭馆在地下，是将品位和节制艺术集于一身的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埃里温这样的地方随处可见。亚美尼亚首都已经变成了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

当我们到达布德阳那里时，遇上了大暴雨，雨水灌入了他的工作室，因为他的工作室处于街区的低位。布德阳像是古代制陶人那样，用陶土做了一个苗条的花瓶。他还给我们看了他在加拿大、瑞士、意大利和叙利亚举办展览的照片。他今年42岁，长得人高马大，沉默寡言，非常勤奋。遗憾的是，只能在埃里温才能看到布德阳最有趣的杰作，首先是因为布德阳创建了城市。

我们还去拜访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她叫艾米娜·阿利斯塔凯斯亚娜。瓦尼克把我带到那里，是想让我聆听一下伟大的科米塔斯[20]的歌。科米塔斯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是波兰人的肖邦那样，是他们的音乐天才。他的原名叫苏莫·苏莫阳，因成为修道士而更名为科米塔斯，因此当地人都这样称呼他。1869年他出生于土耳其，那时大部分亚美尼亚人都居住在土耳其，大约有两三百万人。他在德国柏林学习了作曲，

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亚美尼亚的音乐。他下乡到亚美尼亚的农村搜集民间歌曲。他成立了数十个，也有人说是上百个亚美尼亚合唱团。他是个云游在民间的民歌手，喜欢即兴创作史诗，时常引吭高歌。为世界上著名的交响乐团创作了上百首伟大的、经典的曲目。还写了很多圣乐，至今仍在亚美尼亚的教堂中传唱。

1915年在土耳其展开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那是一场仅次于希特勒种族灭绝行动的另一场对人类的大洗劫。当时有50万人丧生。土耳其人把科米塔斯带到了悬崖峭壁，准备把他推下去，就在最后一刻，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救了他。但那时他已经看到了身后的万丈深渊，导致精神失常。

那时他45岁。有人把他带到了法国巴黎，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在巴黎，在那里又活了二十年。他彻底沉默了，在精神病院住了二十年。他很少活动，一言不发，只是看。人们认为，他能看见来看望他的那些人，因为他会紧盯着那些人的脸庞。

他从不回答人们向他提的问题。

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让他坐到管风琴旁，但是他起身离开了。给他放音乐听，但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可能失聪了。有人把民间乐器放到了他的腿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挪开了。谁也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病了。说不定他只是选择了沉默?

也许这是他的自由。

他没有死，但也没有活着。

在生与死的悬念之间他存在，又不存在，颠迷于炼狱之中。那些看望过他的人都说，看到他越来越疲惫，变得十分憔悴，消瘦，皮肤黝黑暗沉。有时他会轻轻地用手指在桌子上轻敲，但桌子没有发出任何回

应。他一直很安静，总是很严肃。

1935年他去世了，走入深渊，在距离他的学生，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将他从深渊旁救出不过仅仅二十年。

在马特纳达兰[21]可以看见亚美尼亚的古代手稿，对我来说是双倍的不可企及：首先因为那些手稿躺在玻璃展柜中，另外我不会读那些字母，当然就无法领略它的意思。我问瓦尼克，能否看懂。他说既能也不能，因为他会读那些字母，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十五个世纪以来这些字母一直没有变，但是语言变化了。亚美尼亚人走进马特纳达兰就像是穆斯林进入麦加一样。这是他朝圣的终结，他很激动，略有些焦虑。在亚美尼亚历史上这本书是他们民族的遗产。导游同志（她可真漂亮呀！）低声给我们讲解人们用生命换来的那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手稿。在有些书页上还能看到血迹。有些书籍常年被藏在地底下，藏在岩石缝中。亚美尼亚人就像败阵的战士掩埋自己的战旗那样藏匿了这些书籍。不过他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回这些书籍：因为有关藏匿这些书籍地点的信息他们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在符号中寻求救赎。保护符号，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保卫边疆那样重要。符号的狂热信仰成了热爱祖国的一种形式。这是表现爱国主义的一种实际行动。不是说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国家。他们有过，但是在古代就被摧毁了。亚美尼亚在9世纪复兴了一百六十年，之后再次以过去的形式消亡，永不复存在。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国家问题，是两千年以来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就在我们这个世纪，也就是在1920年他们仍面临过这种威胁。

亚美尼亚的历史是以千年来计算的，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个部分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我们正沿着人类最古老的生存遗迹游走，我们走入埃里温附近的拉兹丹盆地，这里曾出土过五十万年前石器时期的工具。最早出现过的关于亚美尼亚的文字记载是在四千年前，就在那时

候，根据石器上的记载，在亚美尼亚这一地区出现过“六十个帝国”和“数百个城市”，因此亚美尼亚成为世界同期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圣经》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它的边界处。

亚美尼亚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计时方式。他们被分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他们在4世纪获得复兴。比我们早七个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他们使用文字的历史也比我们早十个世纪。但是亚美尼亚和古埃及、苏美尔、拜占庭这些世界典型的悲剧地区一样，本质是缺乏历史的连贯性的，在本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会突然出现空白章节。

一次壮观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郁闷的沉落。生活在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民族，在创建了伟大的、不朽的文明的同时，好像被超人的力量摧垮，甚或是被所创造的巨大成果而压垮，再也无力继续发展，只能把引领世界的权利交给那些年轻、充满活力、充满生活激情的民族。因此欧洲上场了，紧接着是美国上场了。

亚美尼亚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它致命的地理位置。我们必须这样审视地图，不是从我们欧洲中心的角度去审视，而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从亚洲的南部，如同那些决定亚美尼亚命运的人们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历史地来看，亚美尼亚地处亚美尼亚高原。很长一段时期（持续数个世纪）亚美尼亚发展得很远，是占据了三片大海的国家——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但就让我们先停留在亚美尼亚高原的这个范围吧。这是亚美尼亚人自有历史记忆以来的地域范围。在11世纪之后，亚美尼亚人就从未成功地在这片地区重建亚美尼亚。目前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领土仅仅是过去亚美尼亚高原的十分之一。现在的伊朗占了其部分剩余的地方，而大部分地区现在归土耳其所有。

从南亚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就能对亚美尼亚的悲剧给出一个解释。命运无法把他们的祖国安放在一个更加不幸的地方了。在高原的南部亚美尼亚与当时两个最大的国家接壤，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土耳其，外加

阿拉伯人的帝国，甚至拜占庭。这四个政治巨头野心勃勃，奉行极端的扩张政策，狂热又贪婪。当四个霸权国家中的每一个政权摊开眼前的地图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如果占领亚美尼亚，那么其帝国北方边界就会形成非常理想的自然边界。因为位于北方的亚美尼亚高原是一个极好的自然屏障，有两片海洋（黑海和里海）守护着，外加高加索巨大的山障。而北方对伊朗和土耳其，对阿拉伯人和拜占庭都构成威胁，因为那时有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疯狂地咄咄逼近。

为此亚美尼亚让所有的帕夏[22]和帝王难以入眠。他们每个人都希冀让自己的帝国拥有美好而又完美的边界，这样在他的领土上，就像法王腓力一世那样拥有一个日不落王国，以便这个边界不再分散在平原上，而是依靠山障和海岸线。这一野心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侵略亚美尼亚，不断有人要征服它、摧毁它、压制它。

这是政治范畴的问题，还有宗教问题。301年，在亚美尼亚梯里达底三世[23]阿尔萨库尼王朝的国王统治时期，亚美尼亚正式接受了基督教。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把基督教作为国教的第一个国家。空气中弥漫着纷争：邻国伊朗信奉琐罗亚斯德教[24]，视基督教为敌，不久逼近的南方伊斯兰教，既与基督教为敌，也与琐罗亚斯德教为敌。于是开始了疯狂的宗教迫害，大量屠杀信徒，宗派主义盛行，各教派开始分裂，进入了中世纪的疯狂。为此亚美尼亚也跨入了这个时代。

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教会，称之为圣使徒亚美尼亚教会。在梵蒂冈与拜占庭数世纪的冲突中他们采取了中立立场，但偏向梵蒂冈。因此，尽管他们采用希腊东正教会礼拜仪式制度，但君士坦丁堡则认为他们没有遵守教会传统，甚至认为他们是异教徒。“他们的宗教仪式，”朗西曼[25]爵士说，“在很多地方与东正教仪式不太一样。他们喜欢用带着动物鲜血的祭品献祭，在七旬斋[26]时进求大斋日，平时是在周六进求斋戒，最主要的是他们在举行圣餐圣礼时用无酵饼。”因为他们以异教徒方式

坚持用这样的面包，被轻蔑地戏称为“微发酵的人”。

亚美尼亚教会的领导人被称为“牧首”，传统上都定居于靠近埃里温的艾赤米亚基那。牧首里有几位著名的诗人、哲学家、音乐家、语言学家。在亚美尼亚亡国期间，即在封建制度和几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新时期里，正是这些牧首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亚美尼亚处理问题。他们非正式地行使了消亡国家的首脑职责，获得了额外的声望。为此当前的这些牧首也十分受人们尊敬，这已经成为传统。

有一位修道士叫麦斯洛普·玛什托茨（Mesrop Mashtots），发明了亚美尼亚字母。玛什托茨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默默无闻的修道士，一生都贡献给了亚美尼亚字母的发明工作。亚美尼亚人称他为“天才的玛什托茨”，因为他发明了这些字母，教会宣布他为圣玛什托茨，为此，可以把这个视为他荣获了国家级的嘉奖。这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一个当时无名的修道士发明的字母竟然能迅速普及。但事实就是如此！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亚美尼亚人中间已经有了身份识别和辨别的强烈需求。他们十分孤立，是亚洲海洋上一座特异的基督教孤岛。山峦拯救不了他们：差不多就在玛什托茨字母公告的同一时期，亚美尼亚失去了独立。

从那时起，外国的军队——波斯军队、蒙古军队、阿拉伯军队、土耳其军队犹如邪恶的风暴那样蹂躏这个国家，像一个恶咒紧紧锁住这片土地。过去建造的一切都被摧毁，血流成河。编年史中处处是凄凉的画面。“亚美尼亚的玫瑰和紫罗兰干枯了”——亚美尼亚中世纪的历史学家雷昂悲痛地描写道：“亚美尼亚变成了痛苦的国度。亚美尼亚人要么流亡，要么漂流在异国他乡，要么在祖国横尸遍野的大地上迷失或者忍饥挨饿。”

亚美尼亚被武力征服，但它在修道院的写字室里寻找救赎。实际上人在困境之中更加有尊严，生存的意识更强。那写字室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是窄小的房间，可能是一间土屋，甚至是一个岩洞。在这样的写字

室里有一个小讲台，讲台后面站着一个抄写员[27]不停地写着。亚美尼亚人的意识里总带有一种将被斩尽杀绝的危机感，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热切的救赎需求。渴望拯救自己的世界，既然不能用刀剑拯救自己，那就让记忆永存。船沉了，那就让船长的日志保留下去吧。

于是，在世界文明史中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亚美尼亚文书籍。有了自己文字的亚美尼亚人开始撰写书籍。玛什托茨亲自做了榜样。那时他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字母，但我们发现他们就已经翻译了《圣经》。亚美尼亚文化中的第二个伟大文化力量就是圣使徒教会首领萨克·帕尔特夫（Saak Partef）和来自圣使徒教区的翻译团。玛什托茨开展了一场中世纪伟大的抄写运动，在亚美尼亚人中迅速展开，达到了迄今为止都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6世纪时他们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翻译成了亚美尼亚文。到10世纪时，他们已经把大部分希腊的哲学著作和数百本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了亚美尼亚文。亚美尼亚人具有开放和兼容并蓄的头脑。他们翻译了所有手头拥有的外来书籍。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日本人，他们也大批翻译了能搜集到的外国书籍。许多世界文化中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因为有了亚美尼亚翻译文本才得以保存至今。抄写员们竭尽全力搜集一切新书籍，然后把它们抄写下来。当阿拉伯人入侵了亚美尼亚之后，亚美尼亚人就把所有的阿拉伯书籍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当波斯人践踏了亚美尼亚后，他们就把波斯人的书籍全都翻译了。他们与拜占庭发生了矛盾，只要那时在市场上出现过的书籍，他们也全都翻译了过来。

于是他们创立了很多图书馆，藏书量肯定十分浩大：在1170年塞尔柱人烧毁了苏尼克的图书馆，那里的藏书达上万册。那些都是亚美尼亚的手稿。仍有两万五千多册亚美尼亚手稿保存至今。这些手稿中的一万多册保存在埃里温和马特纳达兰。如果有谁还想看到其余的手稿那就得去周游世界。最多的藏书是在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图书馆、威尼斯的圣拉

撒路图书馆和维也纳的毛吉诺瑞安图书馆。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的图书馆也有很多精美的藏书。波兰的利沃夫也有过大量的精美藏书，因为那时利沃夫曾有亚美尼亚最大的印刷厂。

亚美尼亚人最早是在皮革上写字，后才写在纸上。他们曾经制造过32公斤重的书籍，用了700只小羊。但是他们也有微型书，大小如蜉蝣。会读会写的人都可以复制，但是当时有职业抄写员，他们一生都致力于抄写工作。一个叫欧瓦奈斯·曼卡莎兰茨（Ovanes Mankasharence）的人在15世纪共抄写了132本书。“在七十二年中，”他的学生扎赫利亚什这样写道，“无论冬夏和日夜，欧瓦奈斯不停地抄写。到了晚年，他的眼力已不济从前，手也开始发抖，写起字来非常痛苦。他在帕努与世长辞，享年86岁，而现在，我，扎赫利亚什，欧瓦奈斯的学生，将继续完成他未竟的手稿。”这些人做的工作就像是蚂蚁搬家，是自己工作激情的殉难者。另一些抄写员写道，在他们忍受着饥饿，把最后一分钱用于买树脂块，为的是照亮他们抄写的纸页。这些书籍大部分都是书法艺术的杰作。亚美尼亚字母的金色大军爬过数百张页码。那时的抄写员同时也都是杰出的画家。在亚美尼亚的书籍中，微型画的艺术达到了世界艺术的高度。特别是两位微型画家的名字至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是托罗斯·罗斯林（Toros Roslin）和萨尔基思·皮卡克（Sarkis Picak）。罗斯林13世纪的书中微型画至今保持着原始的鲜亮色，直至今日仍能从马特纳达兰的藏书中发出光芒。

这些书籍的命运就是一部亚美尼亚的历史。受到迫害和蹂躏的亚美尼亚人以两种方式保存自己的实力：部分人上了山，躲藏在山洞里，部分人移民到了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带着自己的书籍随行。因为流浪者是徒步离开亚美尼亚的，但因有些手稿过于沉重，就被分成了两半，于是这些被分成两半的书籍就流落到了地球的不同地方。

阿塞拜疆

住在石油工人大道上的古尔纳拉·古赛因诺娃开办了一个芳香疗法诊所，给那些记忆力下降的人闻月桂叶，给那些患有高血压病的人闻天竺葵，给那些患有哮喘病的人闻迷迭香。人们带着盖沙诺夫教授开的处方来找古尔纳拉，在处方上写着花名，同时也写着闻花香时间的长短。人们坐着闻花香，通常持续10分钟。古尔纳拉注意观察着每个人，以便让那些人闻他们该闻的花香，也就是说，不要让记忆力下降的人去闻迷迭香。他们把摆放着一排排花卉的玻璃房称为植物疗法治疗室，治疗室类似温室。古尔纳拉也让我坐下，闻一下某种花香。我闻到花香了吗？我觉得什么也没闻到。其实，花朵是不会为自己释放出香味的，得动动它的花茎，那时，花就会感觉到，人们对它感兴趣，然后就开始释放自己的香味。花朵不会为自己释放香味，总是为别人释放。希望每次轻动花茎，花就能释放香味，那就太天真了，这不免过于冒失，以为花会取悦每个人。同志们，你们要轻轻动一下花茎！古尔纳拉提醒着那些坐在治疗室里的老年人，于是人们就开始像要抖掉身上的蚂蚁那样晃动花茎。

我问古尔纳拉——这位医学院的毕业生，她是否相信花香能治好人们的病，我说的不是治疗心理疾病，因为那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的，而是治好身体疾病，譬如让已经钙化了的细胞恢复弹性。古尔纳拉只是笑了笑说，她的患者来自全世界，她还强调说，还有从美国来治疗的人。盖沙诺夫教授的方法，即花香疗法，早已经很闻名了。

我想，古尔纳拉跟我一样，她喜欢的是这种优雅的治疗方法和令人欢喜、慈悲的智慧。因为教授能为这些年过七旬、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的老人们做些什么呢？当然，教授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医院拥挤的病房里，那里到处充满了氯仿和碘化物的气味。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花香对那些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来说不比氯仿更好闻些吗？因此，当

这样的人来找教授时，他为了说出自己的生日，还得掏出身份证看看，以便告诉教授自己的出生日期，同时还会抱怨自己脑袋糊涂，此时，教授会认真听他的诉说，然后给他开一个处方，上面写着：“处方：月桂叶，每天闻10分钟，连续三周。”您看，古尔纳拉说，来找教授的患者络绎不绝。为了预约到教授，要等数个月。

我们坐在古尔纳拉位于石油工人大道上面朝大海的诊室里，巴库（Baku）这座城市坐落在海湾里，缓缓地隆起层层岩石平台，形状像一座露天剧场，全城景致一览无余。古尔纳拉问我是否喜欢巴库，我回答说，喜欢，非常喜欢。这里的建筑物风格别异，交相辉映，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滑稽剧场，展现着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这里的建筑风格无奇不有！有仿哥特式建筑和仿巴洛克式建筑，有后摩尔风格建筑，还有勒·柯布西耶[28]风格的建筑，有20世纪20年代建构主义建筑，还有夸张时期的巨型建筑，同时也有非常漂亮的现代建筑，简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建筑展。因为一切都有自己的位置，各种风格的建筑并排矗立，就像地产经纪人寇克思先生在伦敦办公室里的售楼沙盘上的楼群，能为每个买房的人提供合适的居所。

其实巴库分几部分。

最老的巴库城区占地最少。不仅占地少，而且拥挤狭窄，拥挤狭窄的程度令人窒息，当我走进窄小的街道时，我深吸了一口气，想测试一下，是否能自由地喘息。如果站在这里的街中心，伸展开双臂，那么你的一只手就可能摸到左边住房里睡在摇篮里的孩子，另一只手就可以拿到对面房子里桌子上摆放的梨子。在这里，两个人只能前后错开行走，不能并肩行走，否则会造成堵塞。同时，在巴库的老城没有任何城市规划，或许有过规划，可这里的建筑具有如此超现实主义的特点，是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没人能知道，怎么从这里走出去。我跟着瓦莱仁走，他生在巴库，长在巴库，我们试了很多次，这么走，那么走，全都白

费，走得我们筋疲力尽，直到后来来了几个孩子，我们才得以解救。

这部分巴库被称为Iczeri-Szereh，意思是内城。这里的街道充满了传奇故事，人们用民谣的方式传唱着这些故事。对于范围较大的巴库的居民来说，内城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说着自己的语言，好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任何秘密。如今的内城已经逐渐被拆完，在这里将建设一个新区。

在内城外围的巴库城建设得很有规模，很大，但有点附庸风雅。因为这个大巴库是专为那些私人企业家、暴发户、巴库的石油大王建设的。巴库一直就是靠石油发财的。早在10世纪的时候，阿拉伯的文学家们就描述巴库是个典型的盛产石油的地方，他们就此问题用了一些很奇怪的形容方式。13世纪的一篇题为“Adżaib ad-Dunia”的波斯短文这样写道：“巴库昼夜就像燃烧的火焰。他们在地上架起一口大锅，并在那里煮水。关于煮水一事，有一位名叫艾弗里·切列比（Eveil Chelebi）的土耳其旅行家在1666年时这样描述道：“巴库有很多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或者马匹脚踩土地一会儿，那他的脚就开始发热，然后，贸易马车商队的领头就开始在这些地方挖地，之后在上面架起大锅，粮食很快就会煮熟。神的智慧真神奇！”

这些贸易马车商队把巴库的石油运往整个亚洲。马可·波罗写道：这首先是治疗骆驼皮肤病的无价之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亚洲运输曾经很依赖巴库的石油。由于巴库燃烧的大地，巴库也成为印度火信徒的麦加，他们从印度来到这里，以便在自己燃烧的火神旁取暖。拜火神庙的四只烟囱虽已熄灭，但依旧保留了下来。

一百年前，巴库架起了第一座钻油塔，钻油塔成为这座城市快速发财的开端。有一位波兰人来到了这里——人们告诉我说——他风度翩翩，举止高贵，一辆出租的马车带着他四处逛逛。在某一时刻，他摘掉了高筒礼帽，扔到了地上，对目瞪口呆的赶车人说，我们要在礼帽落下

的地方钻油。后来，这个人发了大财。那时有二百多家外国公司在巴库钻油。哈维·欧康纳写道：

1873年，在巴库第一次喷出石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巴库成了世界级的首富城市，而亚美尼亚和鞑靼的百万富翁开始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角逐。这个城市成为世界最大的炼油中心。俄罗斯成为最大的石油开发商，不过几年就可以超过美国。1875年，诺贝尔兄弟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这里，一年后，他们建起了自己的第一个炼油厂，而在1878年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在1883年时就控制了51％的石油产量。他们在巴库地区建造了第一条输油管道，工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并把最新的科学用于这混乱发展的工业组织。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诺贝尔兄弟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远航蒸汽游轮船队，以及较小的油轮船队，以便将油料运送至伏尔加河。这一切都发生在从美国用船只运送原油桶罐的时代。诺贝尔兄弟打破这一规则，即不管任何石油巨头，只要他们在巴库生活一年以上，就不可能重回文明之人的行列。“黑色城市”巴库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发指、最动荡、最令人不安的角落之一。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一起创建了一种民族马赛克现象，因为在那里时不时地会发生民族间的互相残杀。大量能开发石油的土地被沙皇赠送给自己的盟友。投机倒把盛行，一夜之间使他们暴富。这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现象，就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控制如溪流般喷出的石油，只能采用筑堤坝的方式把流出的原油围成一个油湖。就这样如河流般涌出的原油还是从堤坝中溢出流进大海里。

“对不起，请原谅，我要说点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这位激进的阿塞拜疆女孩儿很有趣，她知道，一方面民族主义是个禁忌之果，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我们站在一幅中亚和阿塞拜疆的塑料地图前，她想告诉我，阿塞拜疆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就是她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我告诉这位阿塞拜疆姑娘，她所展现的对自己

昔日伟大国家的荣耀感在当今世界上是人们普遍拥有的态度，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每个国家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祖先曾远征到哪些地方。很显然，人民需要这种意识，甚至可能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对她说，在这里可能有某种补偿性规则在起作用。过去的世界是较松散的，如果某个民族突然要扩张，那就在这种扩张中走得更远。让我们来看看令人触目惊心的罗马人的扩张，再看看蒙古人是如何成功地实行了对外扩张。土耳其人是如何扩张的，难道我们不应惊叹西班牙人的大扩张吗？甚至连小小的威尼斯也曾经有过成功的扩张经历。

如今，搞扩张既困难也很危险，总的来说，这种行为在日益减少，因此各国人民需要以深刻的反思来弥补这种本能的思考，就是要深入到历史中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与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看弱小民族是怎样找到了寻求和平的道路。幸运的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民族在这个或者另一个时代，都经历过自己扩张和膨胀的一个时期，至少经历过某种释放爱国主义情感的阶段，致使如今能保持一种——可以说是相对的——人类的某种心理平衡。换句话说，这种深刻的反思让各国人民在不触犯禁忌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甚至不知道，这位阿塞拜疆姑娘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女孩儿的名字常常有自己的意思，所以父母很重视为女孩儿取名。Gulnara的意思是“花朵”，Nargis的意思是“水仙花”，Bahar的意思是“春天”，Ajdyn的意思是“明亮”，Sewil是女孩儿的名字，意思是“爱中之人”。瓦莱仁对我说，革命以后，开始为女孩儿取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名字，甚至波及农村。因此有些女孩儿就叫“拖拉机”“柠檬汁”“司机”，某位父亲，很显然想避税，所以就给女儿取名为Finotdiet，这几个字母是金融部（Finaan Sovyj Otdiey）全称的缩写。

因此我跟这位不知其名的阿塞拜疆姑娘站在亚洲地图前看着曾经幅

员辽阔的阿塞拜疆，从高加索延伸到德黑兰，从里海延伸到土耳其。

过去的阿塞拜疆，其实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非法律国家的概念。事实上，历史地来看从未有过阿塞拜疆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此阿塞拜疆的历史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历史有所不同，当然，在别的一些方面也有区别。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通过黑海和安那托利亚与古老的欧洲保持交往，后来与拜占庭保持接触。他们从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并在他们的领土上抵制伊斯兰教的扩张。那时，欧洲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降到了次要位置。高加索和亚美尼亚高原在欧洲和阿塞拜疆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而在阿塞拜疆东边是平原，因此相对容易进入，也相对开放。

阿塞拜疆是中亚的前沿。

阿塞拜疆的主导宗教是拜火教，其次是伊斯兰教，但当我阅读了由八位作家合著的《阿塞拜疆历史与哲学概述》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竟然有那么多异教徒、变节者、无神论、教派分裂、邪教、神秘派、洞穴派、隐士派等，各种异教都能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和归宿，因为这里有马塔兹里克派（Matazylik）、巴颓尼叶派（Batynik）、依兹玛伊派（Izmailik）、玛兹达派（Mazdak）、摩尼教，还有基督一性说派、拜火教、白克塔西教团（Bektaszyci）、努克达维基派（Nukdawidzi）和苏菲派、胡兰派、纯教友派，此外还有胡鲁派（也叫数字神秘主义派）、萨尔拜达日派、卡迪里派和逊尼派。与亚洲许多重要国家相比，阿塞拜疆被认为是一个边缘国家，只是一个能收留和收容某国家失意领导人的地方，尽管这并不一定全对。1417年，异教哲学家伊玛戴迪·纳吉姆（Imadeddin Nezimi）被活活扒了皮，而就在这几年之前胡鲁派的首领法扎拉赫·阿斯特拉巴底（Szichabedin Fuzlullach）死于穆斯林教派的严刑逼供中。

这位殉道者的门徒，胡鲁派教徒——数字神秘主义者、秘术师和占

卜师——相信，数字28和32将能解释世界的起源，运用这些数字将可以解开每件事之谜。在他们的概念里，上帝通过美来表现自己。越是漂亮的杰作，越能彰显上帝之美。这就是他们评价现象的标准。

他们在人类的脸上寻找上帝。

然而一些穆斯林是在美女的脸上看到了真主。

12世纪在阿塞拜疆出现了一位闻名于世的大诗人尼扎米·甘哲维[29]。似乎与康德一样，尼扎米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城市甘扎，即今日的基洛瓦巴德（Kirovabad）。黑格曾评论尼扎米的诗歌说：他的诗“温柔而又甜蜜”。尼扎米写道：“在夜晚，我提炼诗歌闪亮的明珠，我的大脑在火焰中千百次地燃烧。”他有一句至理名言：“语言必须具有广阔的空间。”尼扎米既是史诗诗人，也是哲学家，他不仅精通逻辑学，同时也精通文法，甚至宇宙哲学。

阿塞拜疆一边遭受土耳其的蹂躏，一边遭受伊朗的践踏，根本无力为自己的自治而奋斗。其实它被分割成很多小公国，但是都各自为战。因为好几个世纪以来，阿塞拜疆仅仅是伊朗的一个省份。1502—1736年是伊朗的萨菲王朝统治时期，萨菲正好出生于阿塞拜疆。在他的统治时期，伊朗处于鼎盛阶段。阿塞拜疆语并非属于波斯语，而是属于突厥语。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土耳其语属于在苏联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哥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楚瓦什人、土库曼斯坦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多尔根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库梅克人、哈固族人、图瓦人、维维尔人、卡拉恰耶夫斯克人、哈卡斯人、丘雷姆人、阿尔泰人、巴尔卡尔人、诺加人、土耳其人、舒尔其人、卡拉伊莫人、克里米亚犹太人和托法尔人，这些民族全都说土耳其语。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等民族均可以用各自的语言与对方交流，而且互相都能听懂。

一天晚上，尼克-尼克让我爬上高塔。我将会从上面看到石油岩是怎样发光的，而尼克-尼克说，在没看到石油岩闪光前，他就不让我从上面下来。这个高塔挺立在海里，海水是黑色的，尽管叫里海，我顺着晃晃悠悠的通天梯往上爬，因为这通天梯是木头的，整个塔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塔高得能够得着星星，尽管风吹着这个像细麻秆一样的高塔，但它依然坚挺，虽会弯曲但不会折断，顺着高塔我爬上了天空，这里的天空幽暗，就像海水那样黑，我们进入一个像木球的地方，我不想看了，只想站在这个地方，但听见尼克-尼克还在往前走，所以我就只能跟着他进入黑暗、深渊，进入断层之中。一切都变得十分虚幻，因为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换句话说，就是只能看见周围表面粗糙没有刨过的木头，好像一块毛刺刺的嵌入天空的木块，像是完全很随意地从黑暗中冒出来的地方，令人难以置信，十分抽象。

“尼克-尼克！”我叫道。

因为我意识到是我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处于一个很奇怪的意境中，好像处于失重状态，悬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因为这块木头之外只有黑暗，没有任何参照点，也无法协调自己的动作，没有任何可能挪动几步，连点根香烟都不可能，只能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总之不知在这上面该做什么，于是就傻呆呆地、木讷地在黑暗中原地不动，直至听到尼克-尼克的声音，他好像在我的下面，在一个低回的星系上。

“你看见了吗？”尼克-尼克喘息着问，其实他早已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了。只是在此时我才往下看了看，带着一种巨大的恐慌感，因为我有恐高症。

我看到城市了。

其实，看到城市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便是今天的农民对城市的景象

也不会感到陌生，而我看到了在宽广的、海浪波动的、波涛汹涌的海上之城，从这个城市到最近的一片陆地还有一百公里。

我看到了城市之光、它的街道，这些街道消失在海平面上，看到了市中心人群涌动，很显然人们是刚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我自己前一天也去看了一场波兰电影《回力棒》，市中心霓虹灯闪烁，公共汽车穿梭往来，咖啡厅明亮放光，商店的橱窗和家家的窗户灯火辉煌。有一艘油轮停泊在港口，因为这里不但有港口，甚至有两个港口码头，当然也有飞机场。能看见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钻井塔，尽管很远也还能隐隐听见它发出的蜂鸣，此时，夜班工人正在钻井塔上作业。其实这是一座不夜之城，凌晨也是如此。

在下面，在地底下，海在起浮。

海浪拍打着一排排支撑城市的钢柱，涌入支撑着水面上的街道、广场和房屋的钢架迷宫之中。而城市则岿然不动，挺立在牢牢插在海床之中的巨大钢柱上。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思维来看：这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城市，只不过高山是躺在水平面之下。

水下的山脉连接着里海的东西两岸，从巴库延伸到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大山的整个脉络，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层和煤气层。当大海风平浪静时，你能看到海水下山脉之巅处，石油从缝隙中、从岩石下、从这里或者那里涓涓流出。所以，这里的岩石被称为石油岩，为此建造在海中央的这座城市也因此而得名。

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Aszchabad）是一座安静的城市，不时有伏尔加牌小轿车穿行而过。时不时还有毛驴用驴蹄踢打沥青路。在俄罗斯市场里，人们叫卖着热茶，一壶20戈比（即0.2卢布）。难道茶的价值能这样算

吗？在这里，茶就是生命。土库曼的老人拿起茶壶，往两个杯子倒茶，一杯给自己，一杯递给一个金发男孩儿："那曲！"他对小男孩儿说。"哎呀，大叔，"小家伙对他说，"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不能说'那曲'，应该说'拿去'。"大叔笑了笑，也许跟我的想法一样：谁也别想再教他什么了。这样的土库曼人，只要活到长出了白胡子的年龄，就什么也不想再做了。他的脑袋里充满了智慧，他的眼睛看过生命之书。当他第一次得到骆驼时，他就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当他的羊群死掉时，他就体会到了不幸和贫穷。他见过干枯的水井，因此他晓得，什么是悲伤，当他看到水井里的水，他就知道什么是欢愉。他知道，阳光给人以生命，但同时他也知道，阳光亦可以给人带来死亡，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无法理解这一切。

他知道何为饥渴，何为饱腹。

他知道，即使是酷暑，也得穿暖和，带上罩衫和羊皮帽，而不能像那些白人一样脱得精光。穿着衣服的人会思考，反之则不然。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可能干出任何蠢事。那些做出伟大事业的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的人。在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在撒马尔罕（Samarkanda）和巴格达，无论怎样酷热难耐，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的。伟大的文明起源于那里，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赤道非洲，他们在阳光下赤身裸体走路，他们不懂这样的文明。看了世界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

也许这位老人能回答莎士比亚提出的伟大问题。

他见过沙漠，也见过绿洲，这就意味着，他见过整个世界，这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对世界的最简单的划分。世界上出生的人愈来愈多，绿洲变得人满为患，甚至在最大的绿洲欧洲也是如此，更别提恒河和尼罗河绿洲了。难道生于沙漠的人类，如同所有的文件述说的那样，将不会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吗？而大汗淋漓的城市居民开着烧热的菲亚特汽车，带着无处找到插头的电冰箱，那时他们能找到什么人去咨询吗？难道不

会开始寻找长着白胡子的土库曼人吗？寻找裹着头巾的图阿雷格人呢？他们知道，哪里有水井，这意味着他们知道生存和救助的奥秘。他们或许缺乏烦琐哲学和书本知识，但他们具有独特伟大的知识，因为生活的需要。欧洲人习惯描写居住在沙漠的人落后，甚至认为他们极端的落后。没人会考虑一下，绝不可能这样评价一个生活在令人恐惧的条件下，而能生存数千年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最有价值的实用文化类型，使整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而就在同一时代，很多已有的文明已经衰落，并且永远消逝。

有些人认为，因为贫穷，人才会走进沙漠，因为他已经毫无选择。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生活在土库曼沙漠的人们，他们拥有自己的羊群，因而很富有，游牧曾是富有的特权。“旅居沙漠，”加百列教授说，“是一种荣耀，因为是上帝所选之地。”对游牧民族而言，选择定居生活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失败落魄。靠经济或政治的高压手段强迫游牧民族定居，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会失去沙漠给予他们的自由。

谁能想象没有游牧民族贡献的人类文明是什么样？让我们来看看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它们都是中世纪最大的帝国。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玛纳斯》（Manas）共有40卷，吉尔吉斯人的一部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让我们再看看在莫卧儿游牧朝代统治下的印度艺术的繁荣发展。特别值得提一下这些现象，譬如伊斯兰，它们在世界史上影响了十三个世纪，而且是一个一直在扩张的宗教，有遍布全球的信徒，从塞内加尔到印度尼西亚，从蒙古国到桑给巴尔。

但是，首先在人们尚不知飞机为何物，在这之前也不知轮船为何物的数千年中，只有这个游牧民族早已掌握了征服死亡空间的精湛及危险的艺术，经过自己不断远足的经历创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大众传播系统，通过从城市到城市，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世界

的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不仅仅运输黄金、香料和大枣，还运送书籍、信件、政治信息和旅途新发现的报告、杰出思想家的著作的原文或副本，为当时交通不便、消息分散的年代提供了交流文化成果和发展的可能性。

在我和土库曼老人和小男孩儿喝茶的隔壁，有一个卖花的女摊主叫道："乡亲们！别忘了买玫瑰！"阿什哈巴德的玫瑰已经变得沉重而枯萎。没有人买花。这个时辰，市场上的人寥寥无几，此时也正处沙漠的正午。酷热难耐的阿什哈巴德横在骄阳下无精打采、一片沉寂。从这个地方到我住的饭店有一百米。从此地到与伊朗交界的地方需要一小时的路程。而与莫斯科相距很远，有4300公里，距华沙有5000多公里。1935年，一群土库曼人骑着马来到莫斯科，他们日夜兼程近三个月，八十三天，这个纪录已经被载入《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在市场上有来自集体农庄卖蔬菜的小贩，他们出售的都是摘自自家菜园子和宅边地的菜；还有卖药的小贩，在小摊上、在国营书店和理发店里也都可以买到这些药。这里理发店不少，但只给男士理发。土库曼妇女都扎着大辫子，不需要去理发店。还有卖笔记本和纸张的小贩，他汗流如雨，一颗又一颗的汗珠不停往下滴，好像站在淋浴的喷头下面。"乌兹别克人！"他朝卖茶的人喊道，"来壶茶！"然后就一碗接一碗地大口喝着热茶。"乡亲们！"——过了一会儿他又大喊："显示一下你们是有文化人的吧！快来买本子吧！来买本子吧！"

整个市场都铺的沥青路，街道也如此。大街上跑着无轨电车，车里热得像火炉。马路两旁种着绿树，有很多绿地和鲜花，看得出来他们很重视绿化，城市很整洁，绿化也很好。绿树不仅提供了树荫，同时起了一个心理安慰的功能。这些绿荫缓解了因为酷热造成的幽闭恐惧症给人带来的疲惫感，减缓了待在密闭空间的恐惧感，生活在绿洲的人们有此同感。习惯定居的人害怕沙漠，沙漠让他感到恐惧。对他来说只需要走

到城市的边缘，时常是走到沙漠附近自己院子的尽头就足矣。沙漠侵犯城市，覆盖了广场和街道。我去过位于撒哈拉的努瓦克肖特（Nuakshott），在那里，人们需要常年清扫覆盖在沥青马路上厚厚的沙粒，就像我们清扫马路上的积雪那样。我看见了在阿塔尔（Attar）绿洲勤劳工作的农民，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把被沙子覆盖的海枣树挖出来。沙漠侵犯房屋，因此那些房屋没有窗户，如果有窗户的话，那些窗户也是永久关闭的。嗨，这样的气候！但也有人以此方法保护自己的住房、储备和财产不受沙尘侵犯。

树木给人一种轻快的印象，因为绿洲不是不断受到沙漠元素侵犯的孤岛，而是一片较大的适合人和植物生长的土地。

阿什哈巴德从两方面来说都算是年轻的城市，因为建城的时间在1881年，那年俄罗斯军队攻破了土库曼人的抵抗，在这里建筑了军事堡垒。在堡垒周围开始修建了道路，变成了一座小城。1948年，这里发生了当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15秒的瞬间，城市就被夷为平地。那里曾是一片墓地，米莎回忆说，而在地震后变成了16片墓地。全市唯一没有移位的是列宁纪念碑。

今天的阿什哈巴德是震后完全重建的城市。那些喜好古迹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可参观的地方。

拉什德在地图上指给我看乌兹博伊河（Uzboy）曾经流经的地方。乌兹博伊河水来自阿姆河（Amu-daria）横穿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然后进入里海。曾经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拉什德对我说，曾经跟塞纳河一样长。他还说，这条河死了，是在战争开始时死亡的。随即又告诉我，考古学家尤瑟波夫考察了乌兹博伊河消亡的历史。他认为，这条河是在相对不长时间以前才突然出现在沙漠上的，或许是在五千年以前。随着水流，鱼和小鸟也都来到了沙漠，之后人也来到了这里。这些人属于阿里-伊利（Ali-ili）、赫兹尔（Chyzr）和提维基（Tiwedżi）部

落。那时土库曼人属于110个不同的部落，甚至可能更多。那些属于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的人把乌兹博伊河分成了三段，每个部落的人享有三分之一的河段。乌兹博伊河岸流域变成了鲜花盛开的人口稠密的绿洲。人们建造了村落和贸易区、花园和种植园。沙漠中心变得拥挤和嘈杂。这也是水带来的结果。水是一切的起源，是生活第一之需要，是大地的血脉。人们用三条波浪曲线画出他们头脑中的水的形态。在曲线上面画了一条鱼，鱼是幸福的象征，三条曲线加一条鱼就意味着生命。

商船在河上穿梭。从印度来的货物经过这里被运到安那托利亚，从花剌子模运到波斯。乌兹博伊河曾是举世闻名的河流。在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的人中，与其相关的问题有各种文字记录。希腊人和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对这些也有文字记录流传至今。在乌兹博伊河沿岸有一个好客的客栈，那些划桨水手可以在那里歇歇脚，留宿和吃饭。在多福-卡瓦、奥尔塔-库伊和塔拉伊哈都有集市，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买到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高品质的货物。

乌兹博伊河流域的人们崇拜圣石，这是沙漠居民的典型特点，他们崇拜现有的一切——石头、峡谷、水井和树木。

在圣石矗立的地方禁止战斗。石头会保佑人不死。那里从远古以来就蕴藏着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能量。亲吻石头几乎给人们带来一种感性的喜悦。拉什德对我说，让我关注一下《游记》里的一个片段，在那里有一个叫Abu Abd Allah Mohammed ibn Abd Allah ibn Mohamm ibn Ibrahim al-Lawati at-Tandżi的人，以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为大家所知，而在东方国家他的名字是Szams ad-Dina，他写道：“在亲吻石头时，双唇会有一种无限甜蜜的感觉，为此我就想一直亲吻下去。”对乌兹博伊河畔的人们来说石头就是圣物。

那时，人的思维都是围绕着水的分配在转，我们可以运用推论法来

证明这一点。革命之后，改革尚未进行，对土库曼来说，水的分配的重要性堪与爆发战争或者签署和平协议这样的事件相比。一切都取决于它。水通过渠道流到田野里，当地人称之为：中元（aryki，河渠之意）。水的分配都是通过“主中元”来分配的。如果春天雨水丰沛，水的分配就不成问题，但是很少能遇上这样的春天，在这里全年降雨量只相当于欧洲一次的降雨量，可能全年从天而降的雨水只集中在两天内就降完，然后就是持续的干旱。那时水的分配就可能转为一场战争。“中元”两边水渠的水就被墓地抢走，因为那些水渠下面毕竟躺着人骨。

有钱人拥有宽阔的河渠，而穷人的则很小。为此，穷人们就冒险偷偷打开闸门，让更多的水流进自己的小渠中。富人们强力谴责这种行为。这看上去像是一场阶级斗争。水成了投机倒把的商品，成了在黑市上倒卖的商品，有水集市，倒卖水的人既有景气的时候，也有不景气的时候，那些得到水的人能致富也会破产。直到革命后，才取消了这一切默认的很多不成文的习惯做法。过去妇女无权获得水配额，只有已婚男子有水配额。一个生了儿子的父亲，让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跟一个成年妇女成婚，这样还在襁褓中的男婴作为已婚男子，就有了水配额，这也就成了那些生育了很多男孩儿的家庭致富的一条途径。直到1925年土库曼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革命法令，禁止婴儿娶妻，同时，妇女也拥有水配额。

每个人都竭力住在离乌兹博伊河较近的地方。河给人以水，给人以生命。沿着河两岸曾是远征商队走过的路。成吉思汗的军队骑兵顺着乌兹博伊河的水流远征。撒马尔罕的雅库特商人曾到过这里，他们曾是贩卖奴隶的商人。

拉什德说，乌兹博伊河缓慢消失的过程，始于四百年前。就像它突然出现在沙漠那样，开始迅速消失。乌兹博伊河在沙漠正中心创造了一个文明，滋养了三个部落，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尤瑟波夫在乌兹博伊河

两岸考古发现了数十座城市和居民居住区。如今河水已经被沙漠覆盖。不知是谁最先发现河的水量在逐渐减少。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的人聚集到河两岸，眼看着河水消失、生命之泉在消逝，他们坐在那里这样看着，因为人们喜欢观察自己的不幸。水位日益在下降，深渊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围绕着开闸、关闸而展开的冒险行动和阶级斗争都失去了意义，谁拥有多大的河渠也已经毫无任何意义。人们奔向毛拉，奔向算命师，抓住遇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无济于事。田野干枯了，树木枯萎了。一只卡拉库姆的羊只能换到一小袋水。卡拉库姆沙漠原来只是在这里有一片，在那里有一点，现在它急速蔓延，好像大地患了传染病一样。集市关闭了，商人关闭了店铺。

经过考古挖掘发现了乌兹博伊绿洲的尤瑟波夫说：从那里挖掘出来的物品什么都有，说明人们丢弃了自己所有的物品，孩子们丢弃了自己的玩具，妇女们丢弃了锅碗瓢盆。那时人们一定十分惊惶、歇斯底里和束手无策。那时肯定是流言满天飞，也许占卜家和算命师都来过这里。人们感觉到沙漠将会把他们吞噬，沙粒在他们的门前呼啸。

像《出埃及记》里描写的那种大迁徙开始了。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后者也被称为“赶骆驼的部落”）向南迁移，因为当时南方有闻名遐迩的绿洲马尔和特柘木。流亡的人们走过卡拉库姆沙漠，即走过了黑沙，土库曼和整个中亚最大的沙漠，身后留下了干涸的河流，它像被打碎的陶器静静地躺在沙子中，沙子遮盖了河渠、田野和房屋。

拉什德说，来自干涸河流的部落遭遇了南方绿洲居民的抵抗，那里居住的是塔克和萨雷克部落。无论是迁移到这里的人还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属于土库曼人，都属于为水而战而被分裂的同一民族。拉什德还说，在这片绿洲里，水量和居民数一直都保持着平衡，因此，绿洲不能再接纳新来的人。绿洲可以接纳客人，可以接纳商人，但绝不能接纳整个部落的人，因为这样会迅速破坏这里的人赖以生存的平衡。因此就引

发了沙漠与绿洲之间的战争。这里的人比他们那些住在气候宜人地区的兄弟来说，处于一种等级更加分明的境遇中，为此发生战争的起因更深远，换句话说，他们是为生存而战，而不是像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为了一些琐碎的理由而发起的，譬如：冒犯君主、争夺王位或者统治者患有迫害狂躁症。在沙漠里，战争的起因常常是由于人的生存渴望，人陷于这种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悲剧。为此土库曼人从未获得过统一，因为废弃的河渠分割了他们。

乌兹博伊河之死，让死河部落流亡到南方，开启了土库曼人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先河。这种兄弟间的互相残杀持续了数个世纪，直至我们这个时代。直到革命之后还发生过战争，但已经明显政治化了。拉什德说，现在是由政府部门分配水。他还说，1954年给波萨卡地区运来了推土机，波萨卡位于土库曼的阿姆河上游，与阿富汗的交界处很近。人们开始在这个地方挖人工渠，为此河水时有时无，这次是人在沙漠上挖出了河渠。历史又在这里重现。像早前那样，水给沙漠带来鱼和小鸟。河渠两岸鲜花盛开，变成了人类居住的绿洲。这条人工开发的河渠现在长800公里，将会再延长两倍，像早先那样最终流入里海。

这渠里的水是甜的，拉什德说。他舀了一缸子水让我喝。这水的确很甜，很好喝。河岸边浮荡着一艘平底船牵拉的一个浮桥，周围一片沙漠。在这个浮桥旁有一间小木屋，在木屋的一面墙上贴着女明星和裸体女郎的照片，以雅罗斯瓦夫·施柴维伊（Yaroslav Shchaviey）为首的挖掘队住在这里，这个挖掘队里共有四位乌克兰人。我和拉什德是他们的客人，不过这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的摩托艇坏了，只好停在这里。这个挖掘队要给河渠挖出一条支流，以便水能流到集体农庄去。这些重型机械的轮子足有一人多高，把挖出的沙土从这边运送到那边，沙土堆上站着一个蓝眼睛的姑娘，记录着每个司机跑的趟数。她记录什么呢？就这样记录着，为的是让每位司机完成定额。她叫帕乌琳娜，她来自哈尔科夫某地。如果司机人很好，帕乌琳娜就给他画上很多横杠，让这位司机

成为工头。天太热的时候，帕乌琳娜就放下本子，跳进渠水里，游到岸的那一边然后再游回来，继续画她的那些横道道。施柴维伊催帕乌琳娜去炸鱼，他派其中一个重型机械的司机去集体农庄买酒。他们为我们办了一场奢华的盛宴。晚上我们离开了那里。船上的灯光倒映在渠水上。

回到马尔（Mara），这是我在土库曼的最后一天。马尔是穆尔加布河（Murgab）绿洲的首府，是继阿什哈巴德之后的第二大城市，有人口60万。土库曼的居民（不到200万）分住在五个绿洲上，沙漠占共和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马尔的市中心都是刷成蓝黄两色的老旧平房。曾有过上百间来自乌兹别克、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人开的商店，现如今这些商店要么被收归国有，要么变成了车间或者仓库。这里闷热，中午天就变得灰蒙蒙的。来自沙漠的沙尘暴狂卷而来，狂风和云尘遮盖了天与地之间的全部空间。卷起的沙尘让人看不到远处，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生命枯萎，一切机器都停了下来。现在帕乌琳娜和施柴维伊以及阿达和那些姑娘们穿得像唱戏的人那样躲藏在角落里，挤在夹缝中，头上披着床单、毯子等一切手边能拿到的东西，以免窒息，沙尘暴能填埋一切，洪水能淹没人和羊群（因为在沙漠中也会发生洪灾！），而沙尘弥漫非常呛人并会导致人窒息，抑制呼吸导致人死亡。这沙尘，这尘埃（是石头被风和水搅成粉末的东西）漂浮在空气中，被太阳晒得火热，然后变成干雾，这令沙漠上的所有人感到恐惧，干燥而又火热的雾，好像燃煤烧得火热的云粉，这就是沙漠在自己发怒之时让人们呼吸的东西。我在旅馆里，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照明，更要命的是没有水，电线可能被风刮断了，水管也被沙子堵住了，喝水的缸子里还剩了一口热水，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城市没有水，电话线断了，只有收音机还能响。我躺在床上，一切都是湿乎乎的，布满了灰尘，枕头热得像火炉，在沙尘暴袭来的时候，人们陷入水恐慌症，会突然贪婪地、不假思索地喝完自己储备的所有水，这就是一种疯狂，他们喝水不是为了别的，不是因为现在他们口渴难忍，只是因为恐惧而喝，满脑子都是不会再有水了的想法，为了不受打击而喝。街道萧条，饭店寂静，走廊里空空如也，我走下楼

去，餐厅也空空如也，餐厅服务员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有一个俄罗斯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尘土满面，连衬衫都被吹得露在了裤带外面，头上戴着保暖的毛皮帽。来200克酒，他对服务员说。然后，服务员站起身来，把酒倒在杯子里。他一口喝完这杯酒，嘴里发出“哈哈哈哈啊”的声音，这下可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肚子里的这把火走出餐厅，走向沙漠之火。服务员用目光送走了他，然后说，这才是好样的，这样的人才能挺过一切灾难。之后又关心地看看我，但带有一点讽刺的目光，一句话没说，给我递来了一杯柠檬汁。

塔吉克斯坦

我们前往一个叫“第三国际”的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离杜尚别（Duszambe）不远，负责15个村落。这是一个较大的集体农庄，但也有比这个大些的。

“第三国际”集体农庄的主任叫阿卜杜尔卡琳·沙里波夫（Abdulkarin Sharipov），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但缺少一条腿。他的腿是在保卫乌克兰的战争中被德国子弹打中而失去的。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伤愈后回到家，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后来，他从未见过一个德国人。

沙里波夫不能行走，我们就坐着他这个主任的专车到处跑。在路上，他介绍说集体农庄到底都有什么：三头奶牛、十二只羊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毛驴和马匹。好羊很贵，要150卢比，盖一座新房要十五只羊。除了畜牧业，他们还有农田，每公顷的产量是800磅小麦。产量如此之少，并不足为奇，因为所有的农田都在高山上，收获季节持续好几个月，因为农田处在不同的高度，低处的小麦成熟得早些，高处的晚一些。在塔吉克斯坦，全年都是这样，整年都要播种和收割。在瓦乎什盆地6月是收获季节，而在帕米尔的农民才刚播种。在这个月份列宁纳巴德[30]的杏子已经成熟了，而在伊斯法尔杏花才刚刚绽放。

我们走过了一个村庄，塔吉克斯坦的妇女停下身子，背对着汽车，用手蒙住脸。革命将她们的脸从面纱下解放出来，妇女们摘下了面纱，但还保留着习惯动作。在杜尚别大学，我结识了洛哈特·纳比耶娃，她是第一位获得学位的塔吉克斯坦妇女。当时是1963年，她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废除面纱的抗争的，这种抗争让许多人付出了生命，有数百位妇女因为摘掉面纱而丧生，匪徒公开处决了这些妇女。有趣的是，生长在千百年来没有变化的同一个世界的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竟然有这样不同的风俗。因为在一些文明国家中男人们希望妇女露出她们漂亮的脸蛋，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要求妇女必须遮盖脸庞。

沙里波夫带我们来到村庄的尽头，在一棵大树树荫下的开阔地，沙里波夫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宴，不仅用樱桃、杏子和苹果招待了我们，同时还有用大碗盛着的冒着热气的大肉、大盘的小麦煎饼，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热汤、全国闻名的菜肴和色拉。各种食物堆积如山，还有成箱的白酒。沙里波夫自己不喝酒，他说禁止穆斯林喝酒。不过最后还是喝了一点酒。然后起身，脱光衣服，摘下假肢，随后跳入河水中游泳。农民们看着脱光衣服的农庄主任。他在做什么？我问。他在为自己降压，有人回答说。

宴会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继续举行，很多塔吉克人聚集过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始讲故事，然后，人们哄堂大笑。我问他们，他们都讲了什么。随后一位老师给我翻译说，这是一个关于年轻塔吉克人的故事，这位年轻的塔吉克男子战后回到了“第三国际”集体农庄，但是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他跟所有人都讲俄语。可在农村很少有人懂俄语，人们只会说塔吉克语，于是他父亲对他说，讲塔吉克语吧，但是这位年轻的塔吉克男子装着听不懂父亲说的话。后来人们纷纷来到他家，每个人都想看看这位忘了说自己母语的塔吉克青年。邻居最先来到这里，后来是全村人都聚到这里，人们看着这位从战场上归来的塔吉克青年，开始是一个人笑了起来，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跟着笑了起来。全村人就这样大笑

着，全村爆发出热烈的笑声，人们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在地上打滚，最终那位塔吉克青年受不了了，冲出房门大声用塔吉克语喊道：够了！然后自己大笑起来。从这天起这位塔吉克青年就想起了自己的母语，于是村里宰了羊，狂欢了一整夜。

懂俄语真好，那位老师总结说，但塔吉克人也应该懂自己的语言，我们举杯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干杯。

清晨我乘飞机飞往吉尔吉斯。图兰送我去飞机场。四面八方的景色都不一样。北部气候温和、山峦郁郁葱葱。

南部是白雪覆盖的高山。东部是烈日炎炎的沙漠沙丘，而杜尚别则是绿意盎然。在冰雪覆盖的高山的另一面是印度，越过沙漠则是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我在天山山脉的苏塞木耳（Susamyr）盆地的卓玛尔·司马诺夫的蒙古包里过了夜，这里距伏龙泽（Frunze）200公里。卓玛尔在潘菲洛娃（Panfiłowa）集体农庄有自己的羊群，因为他工作出色，当地政府授予他“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优秀牧场主”的称号。卓玛尔共拥有600只羊，细问他之后发现，在这个集体农庄里只有一半的羊属于集体农庄，剩下的羊均属于卓玛尔，属于他的兄弟、叔叔和他的邻居。卓玛尔只上了七年学，今年41岁，有九个孩子。在这里家家都有很多孩子，都是大家庭。整个夏天，卓玛尔都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度过，到冬天才回到集体农庄。在蒙古包里住的，有他和他的妻子、其他牧民、别人的和自己的孩子。这些人的热情好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这次来到他们这里纯属偶然，卓玛尔宰了羊，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蒙古包里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接到了牧马人的通知从别的牧场赶到这儿来的。我们蹲坐在毛毡毯上，大口嚼着羊排，畅饮着伏特加。在喝酒方面吉尔吉斯人要胜过俄罗斯人，波兰人更不用提了。妇女也喝酒。一般情况下都

是在蒙古包外举办盛大宴会。男主人把酒倒在桌子上的酒杯里，然后呼叫妇女的名字，之后她进入蒙古包，蹲着并且举杯一口喝下酒杯里的酒，随后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吃，起身消失在黑暗中。

宴席中，人们把煮好的羊头放在盘子里递给客人，客人必须把羊头吃掉，然后挖出一只羊眼睛，把它吃掉。别忘了，羊的眼睛比李子还要大。另一只眼睛由主人来吃。以此方式结下兄弟情谊。这是一种非凡的经历，永志难忘。

乌兹别克斯坦

埃尔金说，他要到城里办事，然后就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布哈雷酋长的城堡里。城堡现在是个博物馆，可以在这里看到酋长的金色长袍，还可以看到刽子手用的刀，这刀已经被用得几乎看不见刀刃了。一帮美国老妇人在城堡里穿行，一会儿在酋长的卧室里，一会儿举着相机照相，一会儿去看地牢。现在请大家来看，一位老师对学生旅行团的孩子们说。这时孩子们挤挤搡搡地聚在地牢铁栅栏入口处，里面，在半明半暗中，可以看到酋长关押过的囚犯模型。一个囚犯模型被吊在屋顶上，一个身上流着血，几个囚犯模型坐在地上，他们被锁链拴在墙上。讲解员说，酋长是这里最残酷的统领，这一切，包括这个城堡、这些金袍、把人吊在屋顶上这一现象，都被称为封建主义。

正午时分，我走出城堡，来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广场，对面有一个茶屋，在这个时辰，茶屋里坐满了乌兹别克人，他们头上戴着彩色无边帽蹲坐在那里，喝着绿茶，他们就这样能喝上几个小时，甚或一整天。这种在树荫下，在地毯上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生活十分惬意。我也坐在草地上，点了一壶茶，我的一边是城堡的景致，这个城堡跟波兰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的大小一样，只不过这个城堡是用泥建造的，而我的另一边的景致更美。

这另一边矗立着一座雄伟的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是用木头建造的，这在穆斯林的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大多是用石头或者泥建造的。此外，在沙漠炎热的和短促的正午，还能听到清真寺内传来的敲击声，于是，我把茶壶放在一边，去到那里看个究竟。

台球的撞击声。

这座清真寺名叫波罗-哈乌兹（Bolo-Chauz），这是18世纪遗留下来的中亚独特的建筑古迹，也是这一时期唯一幸存的古迹。波罗-哈乌兹门上和内墙上的木雕装饰之美、之精湛旷古绝伦。每个看到的人都会赞不绝口。

我进到里面参观，那里有六张绿色的桌子，在每张桌旁都有几个满头蓬乱的金发的年轻小伙子在那里玩台球。一群旁观者则为不同的台球员加油。每张台球桌每小时租金80戈比（0.8卢布），真便宜。想玩台球的人很多，在门口排成长队，为此我也没法好好欣赏里面，只好回到茶屋。

刺眼的阳光洒在广场上，狗儿在广场上游荡，一队队旅行团走出城堡，先是美国旅游团，后面是儿童旅行团，清真寺里台球撞击声、加油声不断。堡垒变成了博物馆，清真寺变成了台球厅，而乌兹别克人仍然坐在这里喝着茶。他们安静地坐在这里，面朝清真寺，这是父辈传下来的习俗。在这些人的沉默中有着一种尊严，尽管他们身上穿的是灰色衣服，但看上去很矜重。我想过去握握他们的手，我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一下我对他们的敬重，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在这些人中，在他们的举止中，在他们明智的平和中，我内心真挚的崇敬感油然而生。他们世世代代坐在这个古老的茶屋里，或许这个茶屋要比城堡和清真寺都老。如今许多事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但只是许多，而不是全部。可以说，世

界在变，并不会完全改变，至少不会变得乌兹别克人不能在工作时间在茶屋里喝茶。

在布哈拉（Bukhara），我还去看了一些拥挤不堪而又丰富多彩的自由市场。这些都是古老的市场，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一直生气勃勃，人山人海。埃尔金带我看了阿维森纳[31]喜欢逛的市场，还带我看了伊本·巴图塔买大枣的市场。现在这里的小商店、摊位、柜台都被编上了号，因为全都国有化了。埃尔金说，乌兹别克人宁愿多花点钱也要在市场上买东西，而不愿在商店里买东西，因为市场是传统，是大家见面聊天的地方，是第二个家。我还参观了密尔-阿拉伯（Mir-i-Arab）学校的楼群，这是一所穆斯林大学。它有一个雄伟的建筑群，建于1503年，现在这里被整修一新，因为革命后该大学被关闭，现在重又开启，更名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神学院。

布哈拉的基调是褐色的，是太阳光烘焙下的泥土色。撒马尔罕的基调是湛蓝色的，这是天空和水的颜色。布哈拉是商业城，既喧嚣又独特也很物质，是商品和市场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也是一个沙漠端口城市，是亚洲的腹地。撒马尔罕是个充满灵性、抽象、崇高和美丽的城市，是个浓缩和形象美的城市，它既是音符也是图画，是个繁星照耀的城市。埃尔金对我说，应该在皓月当空或者月亮如盘如镜时去看撒马尔罕，那时大地一片黑暗，墙壁和塔尖让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城市开始发光，然后，像灯笼那样向上飘。

帕普沃思（H. Papworth）在他写的《帖木儿传奇》（1937）中对撒马尔罕奇迹是帖木儿的杰作这一事实提出质疑。有件事无法理解，作者写道，这座城市，以自己全部的美貌和大杂烩把人的思绪带入神秘与沉思，这座城市竟然是由像帖木儿这样残酷的魔王、掠夺者和暴君所建造出来的。

不可否认，建造于14和15世纪之交的撒马尔罕，就是在帖木儿统治

时期而闻名于世的。帖木儿这个人物是历史上的一个传奇现象。他的姓氏在数十年间一直令人闻风丧胆。他曾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将亚洲踏在自己的脚下，掌管如此大的地盘并没有影响他关注细节，帖木儿对很多细节都有自己的想法。帖木儿的军队以残酷而著名。帖木儿出现在哪里——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扎伊德·沃希非（Zaid Vosifi）写道："那里人体的鲜血就像从器皿中喷涌而出……而天空几乎就映现出郁金香田般的颜色。"帖木儿时常站在远征军队的队伍前，他亲自监控一切大小事务。他曾下令砍下被他捕获的人的头颅，下令用这些人的头颅建造塔、城墙和铺设道路，并且亲自监督工作进程。他还下令剖开商人的腹部，为了在那里寻找金子。他下令毒死对手和反对者，他亲自准备毒药，并亲自毒死他们，这项使命占用了他半天的时间，在另外半天，他则把精力放在对艺术的关注上，帖木儿把用于关注死亡那样的热忱同样用于关注艺术，在帖木儿的意识里，死亡与艺术之间的差别小到只有毫发之别，帕普沃思无法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帖木儿的诛戮是真的，但他并不是斩尽杀绝。他下令留下那些有创造才能的人的性命。在帖木儿帝国，最好的圣殿是才华，帖木儿把所有有才华的人吸引到了撒马尔罕，努力为每个有才华的人创造机会，不许任何人伤害这些天赐火花的人。

艺术家发挥了才华，撒马尔罕得以繁荣兴旺。这座城市是他的骄傲。在其中一座城门上他下令刻上："要是你怀疑我们的强大，那就去看看我们的建筑！"这句话比帖木儿本人多经历了数个世纪。直到今日，撒马尔罕依然以其无与伦比的美丽、精湛的形式和艺术天才让我们赞叹不已。帖木儿亲自监督每一座建筑，不成功的就毁掉，他的品位超群绝伦。他对各样装饰的优劣都会认真斟酌，他非常关心设计图案是否考虑周全，会关注线条的清晰度，然后再次投入到下一次的远征，投入屠戮，投入浴血奋战，投入火光烛天，投入呼喊惊叫。

帕普沃思不明白，帖木儿在玩着众人不敢玩的游戏。帖木儿展示了人能承受极限的可能性。帖木儿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描述的事

实："人什么都能做到。"可以通过圣埃克苏佩里[32]书中的一句话来定义帖木儿的杰作："我做到了任何动物从未做过的事情。"好坏皆有。帖木儿的剪刀是双面刃——创造之刃和毁灭之刃。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一般来说，只不过他们的这些剪刀勉强能打开，有时能彻底展开。但帖木儿的剪刀则是打开到了极致。

埃尔金带我去看了在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墓，这是用绿色软玉建造，在黄陵入口处有块碑文，碑文的作者是帖木儿本人，上面写着："快乐就是一个人在世界遗弃他之前，他就先遗弃了这个世界。"

1405年，他在远征中国的途中驾崩，享年69岁。

1989年秋，我开始踏上帝国大帝之旅，我与这个大国的接触尽管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其历史很久远。我心想，这些经历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结果我错了。最后这次帝国之旅从两方面来说给我很大的启示：首先我从未对这个国家进行过深层的探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俄罗斯、苏联问题专家，当然也不是克里姆林宫事务专家，诸如此类。更让我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彩的大陆，我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研究这些地方的问题。因此我对帝国的实际了解是微乎其微而又十分肤浅的。其次，随着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逝去，我们对这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的了解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新资料和新资讯的到来不是以年和月来统计，而是以周和天来统计！因而如果一个人仅仅从今天才开始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和作为一个事实大国的帝国所起的作用产生兴趣，那他可能就搞不清楚，现在他所能获取的百分之九十的资料，如果不是更多，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接触到的。

---

[1] "二战"前属于波兰，今属白俄罗斯，城市所在的平斯克沼泽是欧洲最大的沼泽。——译者注

[2]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

[3] 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帽上是蓝色的帽徽。——译者注

[4] 用以纪念1791年波兰议会通过的著名的《五三宪法》。——译者注

[5] Andrzej Bobola，1591—1657，波兰罗马天主教教士、耶稣会传教士，1642—1646年是平斯克教堂牧师，1657年被哥萨克人杀害。——译者注

[6] 波兰著名巧克力商标。——译者注

[7] Kopeć，1762—1833，波兰军官，在科希丘什科起义失败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译者注

[8] Tadeusz Kościuszko，1746—1817，波兰军队领导人，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的民族英雄，作为国家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领导了反抗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科希丘什科起义。在领导1794年起义之前，他作为陆军上校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

[9] Blaise Cendrars，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随笔作家。——译者注

[10] Bronisław Malinowski，1884—1942，波兰人类学家、社会和经济学家、最早的社会人类学课程的开创人，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译者注

[11] Andrei Rublev，1360—1427或1428，也译作安德烈·勃廖夫，俄国最伟大的圣像画家之一。——译者注

[12] Sweti Cchoweli，坐落在格鲁吉亚古城姆茨赫塔的大教堂，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13] 格鲁吉亚最神秘的洞穴村落。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2世纪，拥有6000间房屋，可容纳4万人——如此恢宏的建筑，即使是现代科技也很难企及。——译者注

[14] Niko Pirosmani，1862—1918，格鲁吉亚著名的原始主义画家。——译者注

[15] Nikifor Krynicki，1895—1968，著名波兰画家，原始主义画的开山鼻祖。——译者注

[16] Henri Julien Félix Rousseau，1844—1910，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译者注

[17] Paolo Veronese，1528—1588，原名保罗·卡尔亚里，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艺术大师提香有两个伟大的弟子：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他们同时被誉为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三杰。——译者注

[18] 阿拉斯河是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河流，该咖啡馆以此命名。——译者注

[19] 亚美尼亚最大的高原，该饭馆以这个高原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20] Komitas Vardapet，1869—1935，亚美尼亚祭司、作曲家、合唱队指挥，是亚美尼亚现代音乐的创始人。——译者注

[21] Matenadaran，即圣梅斯罗布古代手稿研究所，它拥有丰富的古代手稿和书籍，跨越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历史、哲学、医学、文学、艺术史和宇宙学。——译者注

[22] 土耳其文paşa，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译者注

[23] 大亚美尼亚国王，约287—330年在位。——译者注

[24] 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宣称阿胡拉·马兹达是创造一切的神，因此他后来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该教延续了2500年，至今仍有信徒。——译者注

[25]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1903—200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译者注

[26] 七旬斋是西方基督教会大斋节前的第三个星期日，复活节前的第70天。——译者注

[27] 抄写员是中世纪负责抄写经书和文件的人。他们在抄写的过程中可以加上自己写的内容，所以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书名一样，但里面的内容完全变了。抄写员那时都是由修道士担任。——译者注

[28] 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雕塑家、画家，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译者注

[29] Nizami Gandzewi，1141—1209，诗人，是当时阿塞拜疆进步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宣扬人道主义，同情和维护被压迫人民的权益，反对暴力和不公正的行为。——译者注

[30] 现在叫苦盏，1939—1992年称列宁纳巴德，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中亚著名古城。苦盏位于费尔干纳谷地谷口，临锡尔河，战略地位重要。——译者注

[31] 980—1037，塔吉克人，生于布哈拉附近。中世纪波斯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32]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飞行员，著有闻名世界的《小王子》一书。——译者注

鸟瞰（1989—1990）

第三罗马

1989年春，读着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我在想：值得去那里走一趟。其他人也劝我往这个方向转，他们说俄罗斯正在复苏，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大增，当时人人都产生了某种好奇心，并期待着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那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末，好像世界正进入一个深刻而又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避免这一切，而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苏联也不会例外。

当时有一股有利于民主和自由的气候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普遍开始蔓延。在每个大陆上的独裁政权纷纷倒台：乌干达的奥博特、菲律宾的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拉丁美洲的专制军政府失势，更加温和的平民政权掌权，而在非洲，几乎所有一党制的体制（这是荒唐和腐败的体制）逐渐瓦解，退出了政治舞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体制在这个崭新而又充满希望的大背景下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像是在做一个衰退和无力的挣扎。但是这种不合时宜依然是一股强大而又危险的力量。全世界都在焦虑地关注帝国所经历的危机——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大国有可能毁掉我们这个星球。尽管人们对这种黑暗和令人恐怖的情景感到忧心忡忡，但是因为苏共即将丧失政权，这已经成为某种不可逆转的现实，为此这让世界获得一丝安慰和松了一口气。

德国人说，这是Zeitgeist，即时代精神。这是一个迷人而又充满希

望的重要时刻，这个时代精神像是一只浑身湿透了的小鸟无精打采地站在树枝上打盹儿，突然毫无缘由地（不管怎么说都想不出合理解释的理由）出人意料地勇敢而欢快地展翅高飞。这激起了我们的想象力，给了我们力量，于是我们开始行动。

如果能行——1989年我计划着——我计划走遍整个苏联，走遍它的15个加盟共和国（我从未动过念头走遍它的总共44个共和国、行政区域和自治州，因为我的寿命不足以让我做到这一点）。最先计划要走的路线是：

> 西至——从波兰边界到布雷斯特；
>
> 东至——太平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堪察加或者马加丹］；
>
> 北至——沃尔库塔或者新地岛；
>
> 南至——阿斯塔拉（与伊朗交界地）或者特尔迈斯（与阿富汗交界处）。

这是世界上如此之大的贫穷区域。因为帝国国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而它的陆地边界线比赤道还长，绵延42000公里。考虑到技术上的可能性，因为这些边界都是用密集的带刺铁丝网拦着（我见过那些在波兰、中国和伊朗边界上的隔离带），由于恶劣的天气，这些铁丝网很快就坏掉了，因此时常要更换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的铁丝网，可以说，苏联冶金业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生产铁丝网。

当然这还不仅仅是生产用于边界线的铁丝网！不是有数千公里的铁丝网是拿去用于圈住古拉格群岛吗？那时在整个帝国的国土上遍布有数百个劳动集中营、中转站和监狱！此外还有多少绵延数千公里的铁丝网是用于炮兵、坦克和原子弹训练场的防护围栏网？还有多少用于兵营的

防护围栏网？用于各种仓库的围栏网？

如果我们将苏联政府执政多年来所用的铁丝网数量加起来，就不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斯摩棱斯克或者欧姆斯克的商店里既买不到锄头，也买不到锤子，更别提刀子或者勺子：因为缺乏生产这些工具的原料，原料全都用于生产带刺的铁丝网。但这还没完！因为这些成吨的铁丝网还必须用船只、火车、直升机和骆驼、狗拉雪橇运到帝国最边远最难以抵达的角落，然后还得把这些全都卸下来，卷开、剪断，最后固定住。不难想象，那些边防军司令、古拉格集中营的监管和监狱长们怎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发电报、写信催促要尽快运送成吨的新的带刺铁丝网，以备在中央仓库存货不足时他们仍能有足够的储备。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那就会有数千个委员会、监督小组被派到帝国的全国各地去巡视，以便检查他们的储备是否足够，检查铁丝网的高度和密度是否符合要求，甚至连这样的细节，如铁丝网缠绕和循环的密度要能保证连老鼠也钻不过来。同时也不难想象，从莫斯科打给地方上自己下属的电话，口气中也总是会带着那种关切的问题：你们所有人都能保证铁丝网加固得万无一失吗？这些人本应把精力放在为自己建造房屋和医院，去检修下水管道和电线，而他们却成年累月地忙着（幸运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在自己帝国内部和外部、地区和全国缠绕铁丝网的问题。

我要做的这次非凡旅程的想法，出自我阅读过的关于改革的那些新闻：那时几乎所有的资讯都来自莫斯科。甚至关于发生在遥远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一些事件的报道也出自莫斯科。凭着作为记者的灵感，我开始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开始关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发生的事件，我想亲自去那里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诱惑是如此强大，尽管我对帝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莫斯科非常不同于帝国的其他地方（尽管不是全部不同），同时这个超级大国的广大区域依旧是一个极度未知的领域（即使对莫斯科的居民而言也是这样）。

但同时疑问随之而来，我这样做有道理吗？那时我也正好收到了一些新消息，即在1989年初纳坦·爱伊戴尔曼（Nathan Ejdelman）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俄罗斯的高层革命》。作者视“改革与新思维”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回忆说，所有这些转折点、革命、动荡、危机全都是以沙皇、总书记和克里姆林宫（或者圣彼得堡）的意志为转移的。爱伊戴尔曼说，俄罗斯民众是不会把精力花在从事基层自治组织的创新的，因为他们得满足上层执政者的意愿。

所以我在猜想：“改革与新思维”持续的时间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允许它持续多久。

因此可能最好只去莫斯科，接近克里姆林宫，去观察安装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周围的地震仪、温度计、气压计和风向标？为此克里姆林宫学者常让我们联想起的是气象学，而不是了解边疆史和哲学知识。

1989年秋，与帝国邂逅多年后，我们首度重逢。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是在二十年前，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而在此前是彼得一世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执政者的个性特征以及他的狂热和恐怖会在一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消长盛衰中留下如此强烈的烙印？因此俄罗斯和全世界才会总是那么关注沙皇和总书记的情绪、忧虑和意愿，人们过于依赖这些了！（密茨凯维奇论尼古拉一世：沙皇一惊讶，圣彼得堡的人就惊恐万分，沙皇一生气，他的弄臣就吓得魂飞魄散；而军队出征，他们不信上帝，只信沙皇。——为了不惹沙皇生气，我们去死吧，好让沙皇开心！）

纵观整个俄罗斯历史，数个世纪以来，准确地说，沙皇就是上帝！直到19世纪沙皇才下令，把沙皇的画像从东正教教堂中摘下来。沙皇的命令！如果没有沙皇的命令，不会有任何人敢去碰沙皇的画像。甚至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家、雅各宾派利用炸药实行政变的革命

者，也管沙皇叫“俄罗斯的耶稣”。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开始了最高政权世俗化的缓慢进程。世俗化之外是逐步限制无所不能的权力。勃列日涅夫也抱怨过。他批评1968年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度进行改革，结果导致苏联坦克的入侵。勃列日涅夫抱怨说：

你们以为，你们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甚至连我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在我希望做成的事情中，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摘自穆雷纳尔的《来自东方的严寒》）

就这样我到了机场的边检窗口，窗口前是一位年轻的边防战士，他开始检查我的护照，他看来看去，看着上面写的字，但是首先是要看到照片。哦，他看到照片了！这位战士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再看了看我，再次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把眼镜摘下来！”他命令说。他再次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看看照片，又看看我。可是我看到他的表情，好像我摘下眼镜后，让他觉得更不对劲儿了。我看得出他明亮的眼睛中的专注，我觉得，他的脑子在迅速转动，同时我也觉得，我知道他此刻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在寻找敌人，因为敌人的额头上并没有打上任何标记，相反，敌人是戴着面具的。因此问题在于要摘下敌人的面具。我眼前这位军人和他的数千名同学一样，在学校就受过这种技能训练。中士对他们说：你们面前有一百张照片，其中有一位就是间谍，谁能先认出是哪一位，就能休假一周。于是小伙子们认真看着，看着，汗顺着他们的额头流下来，一个星期的假期呀！

这个？可能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看上去像是个正派的人。你想想，间谍头上有角吗？间谍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正常人，甚至还可能露出和蔼的微笑！当然他们谁也没有猜着，因为在这一百张照片中没有一个是间谍。现在已经不再有间谍了。没有吗？难道可以想象世界上没有间

谍了吗？这位战士的大脑在工作，在寻找，在思考，有件事是肯定的——间谍会不惜任何代价进到这里，钻到这里，刺探和掌握一切。问题是——在这双明亮的眼睛警惕的审视中，那些在这里耐心等待的数十人中哪个有可能是间谍呢？有的人时常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其实冷战随时都在，就在看照片和脸庞时眼睛的转动中，就在这种持续和锐利的对视中，在这种审视和狐疑的观察中，就在这种不知最后拿我们怎么办的沉思、徘徊和不确定之中。

莫斯科的景致令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着迷，这位《墓畔回忆录》一书的作者曾陪同拿破仑一起远征莫斯科。1812年9月，法国军队抵达了这座大城市：

拿破仑骑马出现在前卫的位置。还必须再翻过一个山丘，这个山丘与莫斯科交界，就像蒙马特与巴黎交界那样，这个山丘被称为“效忠之山”，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会看着圣山的景色膜拜，就像朝圣的人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那样。黄金圆顶的莫斯科——就像斯拉夫诗人们描绘的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里有295座东正教堂，1500座宫殿；房屋上有黄、绿、粉色的木刻装饰，只缺少柏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覆盖着打磨光亮的和涂色的克里姆林宫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莫斯科河流淌在用砖头和大理石建成的精美的别墅之间，一个个松树林园——这片天空的棕榈树——环绕在河水旁。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上辉煌的时代也不能与之媲美……莫斯科！莫斯科！我们的战士大叫着，并开始鼓掌。……因为俄罗斯人在这里会看着圣山的景色膜拜，就像朝圣的人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那样。

是的，莫斯科对他们来说曾是一座神圣的城市，是世界的首都，是第三罗马帝国，这个提法是普斯科夫的一位圣贤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修道士菲罗泰乌什（Philotheus）在16世纪提出的：“两个罗马帝国已经崩溃（彼得和拜占庭）——他在给当时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

说："第三罗马帝国（莫斯科）挺然屹立，不会再有第四个了。"这位大公断言：莫斯科是历史的结束，是人类在地球上漫游的终点，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俄罗斯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是狂热地相信。

拿破仑在1812年9月午后看到过的阳光照耀下的莫斯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在第二天就把它烧掉了，以便迫使法国人回头，后来莫斯科又被烧了好几回。"我们的城市，"屠格涅夫在某处写道，"每五年就被烧一次。"这是可以理解的：俄罗斯的建筑材料是木头的，因为那时木材很便宜，到处是森林。用木头可以很快建好一栋房子，此外木墙保温效果好。可是一旦失火，整个城市就会被烧个精光，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居民在大火中丧生。

只有住在那些用砖头和石头建造的东正教堂和贵族宫殿的人才能幸存下来。但是这样的建筑物在俄罗斯实在是罕见，而且代表着奢华。因此布尔什维克放火烧毁东正教堂不仅是与宗教的斗争，同时也是对过去、对历史唯一遗留的足迹的毁坏。留下的是荒原和黑洞。

斯大林竭力要最终毁掉的莫斯科，是我们现在只能从米哈尔·皮拉耶夫（Mikhail Pilayev）的画上看到的样子。

所有的独裁统治者，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全知全能。卡扎菲和齐奥塞斯库、伊迪·阿明和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思想——都具有无限深邃的智慧。斯大林精通历史、经济、诗歌和语言学，还有结果显示，他还精通建筑学。1934年——也就是在臭名昭著的令人恐怖的第一次和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第二次大清洗之间——他下令做出重建莫斯科的方案，为此他耗费了诸多精力和心血、诸多时间和注意力。新莫斯科在外观上要彰显以下几个时代特征：胜利、威力、雄伟、权势、牢固、神圣不可侵犯（摘自《哲学问题》

1988年第12期）。工程进度很快。炸药、斧头和推土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开始铲平整个街区，炸毁东正教教堂和宫殿。把住在中产阶级漂亮公寓里的数万居民赶到帐篷或者贫民区里去。老莫斯科从地球上消失了，在它的原地建起了笨重的、千篇一律的，但是高大的建筑——这是新政权的象征。幸亏，在社会主义现实中，因为管理不善和懒惰，外加工具的缺乏，城市的某些部分在毁坏之前得以幸存。

正如前述所说，某些老街区、旧房子和小楼房得以保存下来，可是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当然早已是伤痕累累、破旧不堪，但是它们毕竟还在，还矗立在那里。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把这座城市建得相对令人感到安乐舒适。可以让人随意坐在门廊下，在树荫下稍事休息，走进小客栈、小吃店或者酒吧中，放松一下，暖暖身子，喝点茶或者白兰地。可在今天的莫斯科已经享受不到这些了！我已经在这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没有什么可能让人休息的地方。寥寥无几的几个饭馆不是不营业，就是在这些饭馆门前站着克格勃的老特工，他们在那里只是等待着抓住你的衣领，然后把你扔到车水马龙的马路上。可是我脚上的袜子在靴子里扭歪了，使我没法往前走，我得正正袜子，但也找不到能坐的地方，在这秋雨绵绵外加雪花飘落的莫斯科，一个人既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饭店（住家和饭店都相距很远）我能找到什么地方坐一下呢？唯一的地方可能就是冰冻泥泞的水洼吧？

就在我漫步于莫斯科的古老街道时，我茅塞顿开，在某一时刻我开始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这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众所周知的是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我注意到，这些绵延数公里的房屋和楼房的底层——不知建于何年何月——可能曾是商店的店铺、手工作坊、饭店和咖啡店，橱窗、台阶、一扇扇的门和内部的装潢可以印证这一点。莫斯科古老、繁华、商业气息浓厚，好斗的心脏曾在这里跳动过。曾有一群群人走过这些街道。这里曾是色彩斑斓、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而如今漫步在已经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又千篇一律的街道

上，我不由自主地往那些橱窗里瞧了瞧，看到里面全是办公桌，既没有柜台也没有货架，没有任何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没有纺织布料。只有那些破烂程度不同的办公桌，而这些办公桌都堆积在那里，歪歪扭扭挤成一堆，好像是拳打脚踢把它们层层堆在那里一样，像是军营的铺位层层堆在那里。为能在什么地方多塞进一张桌子，不知讨论过多少回，也不知为此开了多少次会，为了这个事关民生的问题想了多少个办法？而在这些桌子上——透过橱窗可以看到——堆着整摞整摞的调查表、问卷和各种表格，还能看见随处乱放的茶杯。

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都得动些心计。我现在漫步的街道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苏共实施了一些小伎俩，为了驱赶和剥夺商人（依照商业法则行事的独立个体）的经营权，他们指派专人——那些绝对服从政府的御用工具——到他们的商店里去，让那些坐办公室的人去换下站柜台的人，于是他们胜利了，革命赢得了胜利。

莫斯科，即便是老莫斯科的地盘也很大，能在那里建造很多房屋、街道，甚至整个街区，尽管这样那里仍会很宽敞空阔。也正是因为这宽敞才构成了引人注目的城市特征；正如在世界的每座大城市里一样，到处都需要行走，走路，或者坐车，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得坐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出行。对那些住在建于大都市新城区中心的居民来说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但是没有人会放弃，所有人都想住在莫斯科。莫斯科就是麦加。城市人口接近1000万人，而每天还有另外1000万人来这里出差或者购物。莫斯科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称自己的邻居和亲朋好友、首都公民（事实上就是住在俄罗斯城市的一般居民）为城市农民。这些人是社会学现象。从前他们离开农村，后来却回不去了，因为村庄已不复存在，早已被破坏殆尽，被集体农庄所取代。但是这些人保留着乡愁，保留着某种习俗和习惯。但矛盾的是，俄罗斯乡村精神并没有在广大的伏尔加河流域保存下来，而是在莫斯科新区的几十层高的高层大楼里延续下来，这些街区是别拉耶夫、米德维耶德科

夫、高力雅诺夫。要到其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尤其到了夜晚，如果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话，根本就别想去要去的地方。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当中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

我能带你去冻原，

甚至到伊凡诺夫，

能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是去不了别拉耶夫（或米德维耶德科夫、高力雅诺夫等）。

在1989年年底飞往莫斯科就是走进了一个说话没有任何顾忌、有话不吐不快的现实世界。在多年沉默静默缄默和书报检查的大堤决口之后，随心所欲、无所束缚的激烈而又疯狂的语言激流如洪水般滚滚而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再度（或者说是第一次）能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在良好的环境中可以不知疲倦、情绪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进行永无休止的疯狂讨论。他们是如此酷爱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只要某人在某地引发讨论的话题，马上就有无数群众聚集过来。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当然还是偏重于对过去问题的讨论。列宁如何，托洛茨基如何，布哈林又如何。诗人与政治人物一样重要。

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在古拉格集中营死于饥饿还是传染病？谁对玛琳娜·伊凡诺夫娜·茨维塔耶娃[2]自缢身亡负有责任？对这类问题的辩论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直至天明！

更多的时间是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最高苏维埃整天开会的昼夜不停的电视直播。是多种原因同时引发了这种政治激情。首先，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政府高层的会议都是绝对保密的，几乎是神圣的秘密。政府高层决定了人们的生死命运，但人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现在可以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生气时是什么样子，看到他们挥

舞着双臂时领带都斜了，看到他们挖耳朵的样子。其次，观看俄罗斯政府高层开会时的情景，有一种身临其境参与决定某种重要事情的感觉。

最后，改革伴随着国家电视的发展。电视为改革提供了传播的机遇，这是帝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从未发生过的大事。

大教堂与宫殿

（仍在莫斯科）

无论多少次经过那里，我都不能从那里移开我的视线。我总会专注地凝视那里，好像我要透过迷雾、透过时间想看到什么一样，其实什么也看不到。

为了到达那个地方，首先得从列宁斯基夹道（我住的地方）走到市中心，过了石桥马上右转往下走，然后再右转，顺着河边那条叫纳别雷日娜雅的林荫大道一直走。再过了红绿灯，看到在一个高架转桥旁有一个栅栏围着的地方，你就到了。

冬天，空气中升腾着白色的雾气。这白色的雾气来自一个全年开放的大游泳池，因为水是经过加热的。每当气温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时，这游泳池对那些特殊类别的人来说就如天堂一般，他们在可怕的严寒中在露天公众游泳池里游泳，这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什么都挺好！他们活着！我们从他们走出泳池的动作和他们沿着泳池边走路的姿态看得出来，他们对此非常满意：他们的每个动作都充满活力，身体笔直，挺胸抬头。

1812年秋，拿破仑率领自己数万名战败的大军退离莫斯科、撤出莫斯科。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人发动了反攻，节节胜利。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感谢神的安排——“把俄罗斯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所以要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以拯救俄罗斯为名的”，即以救世主耶稣为名的大教堂。

这个大教堂应该像沙皇对神之子的感恩之情那样大——也就是说它必须规模宏伟，雄伟宏大。

但是因为沙皇忙着征服阿塞拜疆和比萨拉比亚[3]的事务，加上社会动荡，或许是因为普通的健忘，在他在世时这座大教堂一直没有建起来。直到后来，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一世掌握帝国大权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在1830年，建造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新想法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两年后，沙皇批准了由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托恩[4]提出的建筑方案。后来尼古拉一世为在哪里建造这座大教堂又斟酌了长达六年的时间，最后钦定了地址，就是今天那些特殊类别的人，为证明他们的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严寒中游泳的露天公众游泳池。这个地方有两大优势：首先，距克里姆林宫很近；其次，附近还有一条河，东正教的上帝子民可以在这条河里举行他们传统的宗教沐浴仪式。

不久之后，沙皇成立了一个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建设委员会，然后开始大兴土木。

建设大教堂的工程不间断地持续了四十五年。

尼古拉一世亲自过问有关工程的事，但是他在1855年突然离奇死亡。他的儿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继承了父业，但他在1881年3月死于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中。幸运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也一直在热心关注着这座教堂的建设。他们每个人都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才完成了自己的（好像是流芳千古的）宏伟大业。不仅仅是莫斯科，也不仅仅是俄罗斯，而是全世界都以极其钦佩和无言的敬仰心情来参拜这座大教堂。一代代沙皇登基又弃世，老一代作古，新一代又填补了世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掠夺的混战之中，或者忍受由于大饥荒和传染病造成的痛苦，但无论如何，这座非同寻常的、独具特色的教堂的建设工作都不能拖延和中断。

1883年5月26日亚历山大三世出席了大教堂盛大的竣工典礼。参加典礼的人们在进入大教堂里面时都为其内部的富丽堂皇发出了狂喜的惊

呼，尽管大教堂的外墙已经建好了多年，为他们所熟悉。建筑师们公布的数字令这种非同寻常的狂喜情绪激增。

事实就是如此。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共有30层，外墙厚达3.2米，整个建筑共用了4000万块砖。无论在它的外墙还是内墙上都镶着阿尔泰和波多利亚的大理石、芬兰的花岗岩。大教堂墙壁上的圆盘顶都是用特制的铅架固定的砖块组成的。圣坛冠上是一个巨大的穹顶，上面用铜板包着，而每块铜板都重达176吨。在穹顶顶端矗立着一个三层楼高的十字架，四座钟楼围着穹顶，每座钟楼里有14座钟，钟的总重量达65吨，其中中央大钟重量达24吨（在波兰，最大的钟是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齐格蒙特大钟”，重量是8吨）。有12座朝教堂里面开的铜雕门，这些门的总重量达140吨。

它的内部装潢令人流连忘返。3000个烛台照亮整个教堂。此外，因为信徒进入教堂时也会根据东正教的习俗点燃他们自己的蜡烛，而大教堂一次可容纳一万多人，因此从大老远就能看到倒映在教堂窗户上的火光。

那里面究竟都有什么呢？一走进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耀眼的圣像，上面镶嵌着422公斤黄金。数千只流着油脂的蜡烛摇曳的光反射在圣像上，而它强烈而坚定的光芒无形中让我们受到启发，带我们进入沉思。

在教堂墙壁的下方，铺着177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以下数据：

——俄罗斯军队参加的各种战役的日期和地点

——参与那些战斗的军团和师旅的名称和指挥官的姓名

——伤亡数字

——谁获颁何种勋章，特别是谁获颁圣乔治十字架勋章

在墙壁大理石板的上方，甚至在直达穹顶的那部分石膏壁上，有用特别的技巧画在白石膏上的壁画。在那上面画的都是圣人的画像、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生活的情景以及有关《圣经》主题的画。这些杰作的作者均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著名的画家——布鲁尼和维耶莱什查金、克拉姆斯柯依和力托夫申科、谢多夫和苏里科夫。

这座雄伟而又卓尔不群的大教堂是教堂建筑史上的杰作之一，也是俄罗斯值得为之骄傲的艺术，但它只存在了四十八年，1931年中期斯大林决定要拆除它。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做这件事，也没有公开宣布：现在让我们炸掉这座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吧！

没有！当然没有！

从没有这样的演讲和公告！只不过是在1931年7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条消息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决定要在莫斯科建造一座苏维埃宫。消息里面还包括这座宫殿要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内容。外来人对消息中给出的地址没有什么反应，可莫斯科居民马上意识到，这个宫殿要建在现在矗立着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地方。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地方？莫斯科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嘛，有很多空地，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也有很多空地，所以可以找到很多理想的位置建这座宫殿。为什么偏偏要建在基督教救世主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呢？

为什么？

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现在以无神论为主导，正在进行与宗教的斗争，所有的大小教堂都被关闭了，这自然应该是正确的决定，但还是不能真正说服所有人。其实在莫斯科有很多教堂，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有教堂，而政府的手指却指向了这个地方，正是宏伟的大教堂所在地，

这个大教堂是教皇为了感谢救世主基督迫使拿破仑撤离从而拯救了他们的帝国而建的。

斯大林下令拆除莫斯科最大的神圣建筑。让我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一会儿吧！那是1931年。我们想象一下，那时是墨索里尼统治着意大利，他会下令摧毁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吗？我们再来想象一下，保罗·杜美那时是法国总统，会下令拆除巴黎圣母院吗？我们再想象一下，毕苏斯基元帅会下令毁掉波兰琴斯托霍瓦的明山修道院[5]吗？

我们想象得出来这种事吗？

不能！

在这个巨大广场上的大教堂就在一个晚上被栅栏围了起来，黎明时分就要动工了。拆除大教堂的过程可以按照声学的标准来分类——低声阶段和高声阶段。在低声阶段，是政府掠夺大教堂的阶段。我们都知道在这座教堂里有多少宝藏。黄金至少就有半吨。还有多少吨银子、铜、珐琅、紫水晶呢！还有多少钻石、翡翠、绿松石和黄玉呢！还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圣像和装饰精美的福音书，有多少牧杖和香炉啊！还有用金银织成的礼衣，以及那些镶有宝石的皇冠、腰带和鞋子！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墙壁和圣坛上拿下来，从大小柜子里掏出来，从框子里和架子上摘下来。必须把这一切都运走并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仓库里，有的要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险柜里。最大的工程是拆掉所有的大理石板。这些大理石板都是用铅跟砖浇筑在一起贴在墙上的，很难拆下来。这样的工作持续了数个星期，我们不知道，这种工期的拖延是否让斯大林很恼火，如果是这样——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脑子里也有一大堆的心事。斯大林是一个多疑的人，他谁也不相信，亲自阅读来自乌克兰的报告，谩骂那些行动迟缓的人，签发了新的命令和指令，这肯定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作为总书记他还紧盯着扩建古拉格集中营的野心勃勃的工程——在这样一个大国里，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把严酷的气候问题、艰巨的运输问题、缺乏必要的建筑材料等问题都考虑进去的话，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不过时间紧迫，领导人已经在考虑自己的第一次大清洗的计划，即在哪里关押那数百万名罪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斯大林对炸毁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关注力有所削弱甚至很难去责怪他。而且，那时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肯定能感觉到因为多年血腥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让他骨头酥疼。

然而并不是这样！

一切都表明，斯大林在那种时刻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可以猜想，他很清楚，他和他的人面临着怎样巨大的挑战。就是说，仅仅用这种非常落后的原始技术，要在短短的四个月内（给这件可怕的工作制定了这样的期限）拆除这个用四十五年时间以非凡的努力和极大的牺牲精神建造的大教堂是何等困难的事啊！

但一切又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后，当大教堂里的所有东西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所有的一切都被从其耀眼豪华的内墙上摘下来，从珍藏室和衣帽间、从衣柜和密室、从祭坛和钟楼被拿走运走，一切能掏的地方都掏了，圣像上能摘的都摘了，墙壁上和门上能拆的全拆了，一切能敲下来的、剁下来的、拧下来的、拽下来的、砸下来的、切割下来的都弄了下来，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手脚麻利的工程队不分昼夜地工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伟大事业——于是破坏者看到了自己眼前出现的一幅凄美的景色：他们站在巨大的、沉闷的、墙上掉着灰渣的教堂内部，看着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是工人攀缘在脚手架上的身影，这些身影活像是怪异巨兽皮肤上的寄生虫。

此时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阴郁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悲剧的第二幕开始了，到目前为止主要任务是破坏和拆除里面的东西，现在是要炸掉它，把它夷为平地。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如何拆除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巨大的建筑物呢？最好是采用爆破的办法，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教堂周围有各国的大使馆，而且这个地方又距克里姆林宫很近！万一爆破手出现误差呢？

那就尝试用斧头来拆除它吧，可是斧头根本无用武之地，怎么可能用斧头拆毁三米厚、上百米长的墙体呢！当然在红军的仓库里有足够的炸药储备，用来埋在教堂下以便炸掉整个建筑物，是的，这没问题！但是如果爆破手计算当量有误，结果炸掉半座城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如果波及克里姆林宫怎么办？

最后，他们决定（非常清醒地），先做试验，有了经验再做下一步。于是他们先钻了一个洞，放进了一小块炸药，爆破声轰然响起，火光一闪，尘烟浮起，待尘埃落定，他们聚集过来，看了看并量了量炸掉了多大一块。现在又开始钻了更大一点的洞，放进了两块炸药，同样爆破声轰然响起，火光又亮了一些，尘烟又多了些。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一块一块地、一米一米地进行着。就这样先炸掉了圆顶，然后又炸掉了钟楼的塔尖，然后墙体部分开始断裂了。他们希望靠着不停的震荡让整个结构断裂，让它的结构松动和松散，最后再放上更大当量的炸药，这样就能把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变成废墟。

莫斯科居民（当时莫斯科的居住人口达到了300万）对此说了些什么？因为这些人要拆除的是他们的圣彼得大教堂、他们的圣母院或他们的明山修道院。

他们能说什么呢？

什么也不能说。

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上大人们要赶着去上班，孩子们要去上学，祖母们要出去排队买东西。家族里的人被带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会儿一位熟人被从工作的地方带走，一会儿是邻居被带走。

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如此。

只有住在大教堂附近的那些居民会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闲暇时会走到阳台上或者爬到自己楼房的楼顶上去，观看他们拆除教堂的工作，看那些爆破员和用斧头打碎圣徒雕像、门扇以及楼台的人们。

他们观看着、沉默着，他们能说什么呢？

没有人抗议，没有人游行，没有人站街示威。因为斯大林绝不能容忍这类事情发生。

1931年8月5日是大教堂的死亡之日。

强大的爆炸声一大早便震撼了整座城市。到了下午，在大教堂矗立的地方只剩下高高的一堆粗石瓦砾，烟尘弥漫。“整座城市笼罩在可怕的沉默之中。”一位目击者这样记录道。烟尘般的黑云在莫斯科上空移动，那天存下来的照片照得是如此不专业，如此老旧和泛黄，从照片上很难分辨出是不是冬天，有没有下雪。

苏维埃宫设计竞赛的公告随即就发布了，这座宫殿（如我们所记得的那样）就要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地，在那些报上来的方案中，斯大林很快从中选出了两个建筑师的作品，一个是尤峰（Yofon）的，一个是石楚科（Shchusev）的。今天已经难以判断是否斯大林提前向他们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还是尤峰和石楚科他们自己了解到（或者说他们猜想到）什么是总书记最大的野心和梦想的顶峰。斯大林最大的野心和梦想的顶峰也正是所有苏联领导人的梦想，即赶超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英国是重要的，法国和德国还有意大利也重要，但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这些都属于小国，甚至很小。只有美国很大。对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超过法国算什么荣耀？但是超过美国，对，只有这样才算得上什么！

其实斯大林心里非常清楚，他无法在诸如建设高速公路或者汽车生产方面赶超美国，但是他认为，能找到这样一些领域，并将所有的力量都集结在这些方面，那就有可能赶超美国！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是巧妙地按照尤峰和石楚科的思路，他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即以某种方式，给美国一个沉重的打击，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比美国最高的大厦还要高的大楼（那时最高的大厦是纽约的帝国大厦）——为了给美国一个彻底的打击——那还要在这个大楼的顶端装上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大的雕像。

于是在1933年6月4日他签署了执行尤峰和石楚科方案的命令，这个方案是对美国的一个大胆挑战，因此——苏维埃宫的建筑要比纽约的帝国大厦重六倍，顶上是列宁的雕像，它要比自由女神像高三倍（有100多米高），并比其重2.5倍。斯大林还接受了其他一些设计数据，这些数据也让人印象深刻并且令人感到头晕目眩：

——宫殿的总高度，加上顶端的列宁雕像，总共415米（相当于150层楼高）

——宫殿总重量150万吨

——宫殿总容积700万立方米，等于当时纽约六座最大的摩天大楼的总和。

列宁雕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食指长度6米

——足长14米

——肩宽32米

——雕像总重量达6000吨

计划还包括从西班牙进口彩陶板和从意大利佛罗伦萨进口珐琅陶器。总的来说，大部分设备和物品要靠从外国进口。

我们要记住那个日子，因为很重要，那是1933年6月。

1933年6月，有数万因饥饿而死的人的尸体纵横交叠在田野里和大路上，发生了（时至今日终于曝光）妇女们因饥饿而疯狂吃掉自己的孩子的事件，这种无意识的对自己的行为失控的事件比比皆是。当然在那个时代，也不仅仅是在乌克兰饿殍遍野，在伏尔加、西伯利亚、乌拉尔和白海地区也都有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

是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间：拆除大教堂和数百万人被饿死；建造让美国人黯然失色的宫殿和那些可怜的母亲们在吃人肉。

要建造苏维埃宫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建造如此之大的宫殿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所在之地呢？

为什么要建造如此之大的宫殿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为了赶超美国。但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地方？（我来补充一下，即大教堂所在地的土质很差，也就是位于流沙地带，也就是说地面会移动、不稳定、渗水、水土不断流失。土壤的不稳定对建筑物构成了威胁，致使每项投资都得花费双倍的成本，尽管成本很高，但其实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我绞尽脑汁想找到答案，伊尔库茨克之旅帮了我大忙。我随身带着

一本很老的导游书自己在城里转。书中有一张大广场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建于1894年的非常漂亮的东正教大教堂，我找到了那个广场，可是没找到大教堂。

——大教堂在哪儿？我问一个过路人，还给他指了指书中的这张照片。但他很不情愿地用手给我指了指那个笨重的、灰色的建筑物，上面还挂着红旗。现在这里是执政党地方委员会的办公楼。我走近前去，仔细地把眼前的这个建筑物与照片上的建筑物做了对比，对，我找对了地方，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大楼是建造在大教堂的地基上的。

沙皇具有双重身份，既像上帝，也是俄罗斯最高权威，所以他需要稳定、持久和力量。这个权威无所不能，因为这是上天赐予的。沙皇是无所不能的权威的信使和主导，更有甚者，还是上帝的化身和上帝降临在大地上的影子。只要掌握权力的人（并以某种方式得以证明），那他就具备神性和人性的权威，他就能在这里治理国家，令众人跟随其后，对他俯首帖耳、阿谀奉承。为此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冒牌沙皇、假预言家、放肆无忌的和狂热的伪君子——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统治国家的灵魂，因为上帝的手指触碰过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这个手指就是政权的通行证。

苏共试图保持这一传统，从它的生命源泉中获得传承。当然这就是另一个伪君子，但伪君子在走得太远的同时，它已经不是上帝降临在大地上的影子，他就是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创造一个新的上帝，于是就必须拆除那个老上帝的房子（破坏或者剥夺他们的神圣地位，把他们化为燃料库或者家具仓库），而在他们的地基上建造新的礼拜堂、新的敬畏和崇拜的对象——政党大楼、苏维埃宫、委员会等。在这个转化中，更确切地说——在这次革命中，进行的是一次简单的激进的符号的转变。因此在这个地方（教堂曾矗立之地）你宣誓效忠于全能之神（他在天上），而现在你将在这里（党的大楼所在地）发誓效忠于

全能之神（他在地上）。一言以蔽之，场景改变了，但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主要原则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崇拜的原则。在斯大林死后，对他统治的批评引用了神学词典中的术语“个人崇拜”，也就绝非偶然之现象了。

罗伊·梅德韦杰夫（Roj Miedwiediew）在他的《斯大林传》中写道：

20世纪前几十年，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着一股“造神”的潮流，其代表人物是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瓦季姆·巴扎罗夫（Vadim Bazarov），甚至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没有上帝的无产阶级宗教”。斯大林事实上接受了，甚至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却做了重要的改动。他促成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某种带有上帝的宗教，这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一个新型的带有全知全能而又危险的上帝的宗教。

斯大林关于建造苏维埃宫的计划，因为一系列令人不安和不利的事件而变得复杂化了。就在同一时期，在总书记认为他可以集中精力建造宫殿时，反斯大林的残余势力（小心谨慎而又被削弱的势力，但还存在）开始（完全因为别的原因）复苏了，其实在当时那个制度的条件下哪怕是最小的一股反抗势力都是危险的，斯大林必须要跟这种令他彻夜难眠、噩梦缠身的现象做斗争。在通过了尤峰和石楚科方案的几个月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Vyacheslav Rudolfovich Mienzhinsky）去世，斯大林任命了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来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是来自波兰罗兹的一个药店的药剂师，叫亨里希·亚戈达（Henryk Jagoda）。不久后，据说根据斯大林的授意，他的党内主要竞争对手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死了，对总书记来说，这个人的死亡就给斯大林实施第一次大屠杀造成了口

实，而且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术语“肃反”记录在历史上。后来就是由斯大林安排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进行的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接下来就是1937年的大屠杀，随后斯大林就开始忙于吞并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忙于和芬兰打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他又开始残害他所怀疑的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给他们扣上叛徒的帽子，同时他还亲自监督把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乌克兰人整车整车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还亲自组织新一轮的大审判和大屠杀，然后变得衰老，因脑溢血而死亡。面对如此紧张的工作，也就不可能期待他能静心地安排宫殿的建造。因为他在晚年时基本上不离开克里姆林宫，所以几乎可以确定，他根本没有亲临未来的建筑工地，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一切并不如愿。

挖开的大深坑里开始渗水，住在附近的男人们试着在那里钓鱼，是否有鱼，我不知道。时间长了，里面倒是有不少青蛙，水面上浮起了一片绿色的浮萍，夏天广场上长满了野草——有牛蒡草、灰菜和荨麻，在很多地方还长出了灌木丛，这些灌木丛成了当地那些酒鬼和妓女的藏身之地。从街上就可以看见在工地上都发生了什么，因为人们拆了围栏，偷走木材拿回家当燃料，因此这个堆积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不可名状的垃圾场无法掩盖。

最后是赫鲁晓夫下令——利用这个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地基——在上面建一个露天公众游泳池，于是给那些喜欢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自豪地昂首挺胸走在露天游泳池边的人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们时常会跳入这个在寒冬腊月水汽蒸腾的非同寻常的地方。

由斯大林提议成立的拆除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并将其夷为平地的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正是这个人在几年后与德国的里宾特洛甫签署了将波兰从

地图上抹去的协议[6]。

亲眼所见，泪流满面

我们正在往南飞，飞往高加索地区，那是我熟悉的地区，但已经很久（二十多年）没再去过的地方。最初我打算走以前的路线，即从第比利斯到埃里温再到巴库。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在埃里温和巴库之间现在已经没有直达的交通了，因此，我只好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先到埃里温，然后到第比利斯，再从那里去巴库。

飞行途中，坐在我右边的邻座列昂尼德·P.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民主主义者。莫斯科的民主主义者是苏联经济改革后的新兴产物，不属于异己分子。其实异己分子（为数不多，1968年在莫斯科红场参加抗议苏联武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异己人士只有六人）要么早已移居国外，要么就像马钦科（Marczenko）那种人一样，仍被关在监狱之中。民主主义者大多出自知识分子阶层，基本来自学术界或者文学界，他们与执政当局的权贵们观念相左。

西方民主主义者与莫斯科的民主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西方民主主义者们的头脑集中思考的是现代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如何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如何促使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并保证人们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具有精神价值的食粮。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莫斯科民主主义者们思考的范畴，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与共产主义抗争。就这一问题他们可以以饱满的热情精力充沛地讨论数个钟头，为此制定策略，提出方案和计划，与此同时完全不会意识到，就在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已经再次成为牺牲品了。第一次他们是因为反对制度而被捕入狱，而这一次，他们几乎是自愿投入其罗网中而遭到监禁。

在莫斯科民主主义者们在伦敦、多伦多、鹿特丹以及桑坦德（Santander，位于西班牙）参会的演讲中，我注意观察了一下那里听众

的反应，在那里自由的（听众的）心灵和狭隘的（演讲者的）心灵是不相容的。尽管听众们认真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与此同时他们坚信，尽管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听众们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舒适度与满意度，而演讲者在滔滔不绝的发言中阐述的则是寻找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关于我们是怎样陷入泥潭的”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我的前半程旅途中，列昂尼德试图说服我相信，如果当初托洛茨基认真听取了其顾问的建议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战胜斯大林，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过于清高，过于自信，甚至过于任性，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其实在那个时候，曾经有很多人为追随他不惜牺牲自己。试想一下，如果那时托洛茨基成了列宁的继承人，那情况会怎样？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变得活跃起来，“这可是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旅途的下半程，我左边的邻座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亚美尼亚是否会脱离帝国。如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赞成亚美尼亚脱离帝国，而如若作为一个莫斯科人，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于是他说：“如果能全面实行民主，这是最好的出路。”他狂热地思索着这一问题，但为保险起见，还是问了一下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我对他说：“实话告诉你，我根本不相信能在帝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帝国是经过了数百年不断的征服与合并，才形成了今天的疆土。当然现在没有时间回溯到久远的古罗马甚或是突厥年代的历史了，就拿我在20世纪70年代熟悉并经历过的伊朗革命为例吧，那时在伊朗兴起的反对伊朗国王的革命，首先是从反对警察专制的运动开始的。但伊朗是一个由波斯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在波斯人统治下的少数族裔里有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等。正是这些受压迫的少数族裔一旦听到了有人在德黑兰提倡民主，他们立即将这一口

号理解为是他们可以独立于伊朗的口号，并借此机会脱离伊朗，成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伊朗当时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可能失去几个重要的省份，国家处于被肢解的危险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波斯民族要求民族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霍梅尼和什叶派教士为首的人士重新掌握了政权，从此再也看不到高举'民主'口号的大旗，革命最终变成了一系列反对阿塞拜疆人、反对库尔德人的血腥斗争。独裁统治赢得了胜利。伊朗的边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此时飞机正在徐徐下降，我只好总结说："我认为，具有严苛的统治和独裁特性的帝国与具有弹性和宽容本质的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居住在帝国中的少数民族将会利用哪怕是一点点的民主之风，使自己脱离帝国、独立于帝国，成为自治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民主'的口号就意味着'自由'。自由被他们理解为就是脱离帝国。当然这是违背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意愿的，那么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统治阶级也只能随时准备以诉诸武力的方式维护独裁统治的局面。"

就在飞机的轮胎着地的一瞬间，在这架硕大笨重的AN-86飞机上的乘客们就好像触了电一般，立即从座椅上起身，大声欢呼，相互簇拥着争先恐后地冲向飞机的出口处。其实现在飞机只不过刚刚接触到跑道，仍在滑行，机身还在摇摆，飞机的轮胎还在上下跳跃，飞机的减震器还在轰鸣，空姐们以半请求半威胁的语气大声呼吁乘客坐下并试图推乘客们坐下，但一切都白费，毫无结果。这群人当中的每一个人在原始动力的驱动下，都无法掌控自己，场面混乱不堪。

飞机总算停了下来，舷梯放了下来，结果是迎来了又一轮的疯狂场面，我的这些旅伴们，他们不是走下舷梯，而是蹦着下去，好像是要直接从飞机上跳到沥青地面上去那样。他们扛着沉重的袋子，提着篮子，背着包裹疯狂地冲向航站楼，因为那里已经聚集着密密麻麻、热血沸腾的人群，他们等候在那里，此时这两拨人会合在一起，人们各自冲向自己的人，激动不已，疯狂地拥抱、拉扯、拥挤在一起。我在一旁看着这

群人在一起疯狂躁动的场面。拥抱、拉扯、握手、呼叫声交织在一起。

亚美尼亚人！他们必须在一起。亚美尼亚人在全世界都寻觅着自己的人！这是亚美尼亚人命运中的悲剧，他们的人数越多，越是散落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于是他们的思念更甚，就越加渴望在一起。当你了解了亚美尼亚人的这种特性后，你才能理解他们，外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ch）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痛苦，如芒刺在背，因为他们之间只相隔十几公里，却不能在一起！这是永恒的背离、永远的伤痛和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的这位亚美尼亚天使般的好友叫瓦莱雷·瓦尔塔尼安，他奇迹般地把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拉了出来并开车带我到了他在市区的住宅里。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家里聚满了人（因为他们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房间里有一个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有肉、面包、奶酪、葱头、辣子鸡，还有各式各样的绿叶蔬菜、点心、糖果、几瓶葡萄酒和白兰地。这里就是这样，还会有什么新鲜事吗？这里的新鲜事就是高唱着突击队军歌的孩子们激昂顽皮地涌入房间，这些年轻人就是今天的英雄，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投入到为争取卡拉巴赫的自由的斗争中去。

是的，我现在明白了，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亚美尼亚了，到了一个拥有圣战突击队的亚美尼亚了。只要是在多年之后再次来到埃里温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地方的变化，与过去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在从前，这里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屁精小镇”，而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喧嚣、热闹、极具东方色彩的大都市了，跟在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没什么区别。在城市里的市场里同样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大街上车水马龙，司机们在马路上随性开车，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交通规则的唯一规定就是，谁撞人谁赔偿。所有的司机都随意按着汽车喇叭，好像生怕无人知道他来到这里一样。到处都有新开的酒吧、烤肉串店和各种各样的餐吧。叫声、吼声、吵架声、叫卖声、还价声交

织在一起，一片混乱。所有刚刚经过政治解冻的国家都会经历这种混乱（虽然令人感到混乱，但也赋予了生活另一种味道）。很难用一句话描写这座东方城市的味道，到处可见尘土飞扬和躺在城市广场、街头的流浪狗，此时正是闷热的酷暑，不过在这里或那里、便道上或墙角下、大门小门的树下也能偶尔享受到阴凉。

其次就是带有俄国苏维埃标志的东西消失殆尽，带有俄文的路标、广告牌和海报以及书籍等全都看不见了。城市正在经历一场经过缜密安排的去俄罗斯化的进程。许多俄罗斯人离开了这里，关闭了俄罗斯学校和剧院，既看不到俄文报刊，也看不到俄文书籍。与此同时在亚美尼亚的学校里也不再教授俄语。但是由于缺乏英语、法语教师，亚美尼亚人只能封闭地学习自己繁冗的语言，越来越与世界隔绝。我也只能通过懂俄语的老年人的帮助与孩子们交流沟通。

第三，突击队。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游逛，还乘着大卡车在大街上闲游，大街小巷里布满了他们的岗哨。对那些了解帝国习俗风情的人来说，随处可见的突击队的场面不免会觉得有些离奇。过去在这里只允许红军战士携带武器，就在几年前，如果有人拥有武器，不是被关进劳改营就是被枪毙。而现在，据说在这里，甚至有37支国民军，当然用军队这个词，可能会有些夸张，不过事实上，携带武器的年轻人真的是随处可见。他们穿的制服也千奇百怪，非常随意，只要是能让人联想到他们穿的是制服或者游击队服就足矣。那么怎么才能辨别出他们属于哪个部队呢？我猜想，大约得认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大家都知道谁是谁。

但不管在哪里，人们还得生活下去。就在我住的旅馆对面，人们正在拆除埃里温的一个老居民区。他们拆掉了老房子、古老的门廊以及花园里地里种的、高处吊的、盆栽的各种各样盛开的鲜花与花坛，废弃了用花朵藤萝缠绕的篱笆和葡萄园，还拆掉了木板楼梯和墙边的长椅，拆

除了柴房和鸡舍、大门和走廊。所有这些都很快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人们看着推土机碾压过不知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地标美景（这块地方建起了火柴盒似的大水泥建筑），人们眼看着他们是如何把生机盎然的、宁静而又美丽、舒适的大街小巷和郁郁葱葱的绿地变成垃圾场的。人们站在街上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禁流泪，而我站在他们中间，看见此情此景也跟着流下了泪水。

一切都过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但是那个首先要摧毁一切的信念却留了下来，并且深入人心，继续在开花结果。

赫兰特·马泰沃斯扬（Hrant Matewosjan）是亚美尼亚的著名作家，生于1935年。身材瘦高，背微驼，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容，一直为亚美尼亚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目前世界上一共有1000万亚美尼亚人，他们能否世世代代生存下去？首先是能否在亚美尼亚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在亚美尼亚目前只有300万亚美尼亚人，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在流失，移居到国外去。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会降临在亚美尼亚人的头上？是否只能过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或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中？

与亚美尼亚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好只谈有关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因为从谈话中可以得知目前亚美尼亚人主要居住在哪个国家，在那里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姓名并能得知他们的地址，甚或还可以向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譬如：在塞内加尔有没有亚美尼亚人？他想了一下之后回答，曾经有过一个亚美尼亚人在那里生活过，她嫁给了一位法国医生，但现在已经离开了那里，现居住在法国的马赛。

亚美尼亚人不管居住在什么地方，都会试着展现自己善良的一面。曾经有位医生试图挽救被土耳其人投毒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生命，这位医生就是亚美尼亚人。这是历史事实。

但我与马泰沃斯扬的谈话既没有谈及塞内加尔，也没有谈及密茨凯维奇。我们谈了一些历史问题。关于历史上发生的问题，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吗？亚美尼亚人的过去就像是一棵投下巨大阴影的悲剧之树。要是没有过去，没有在1915年发生对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的悲剧的话，他们是否有可能与土耳其和伊斯兰教徒达成共识并和平共处呢？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也无法为任何问题找到答案。此时我想起了一位法国哲学家安东尼·库尔诺（Antoni Cournota）说过的话。“我们无法解决困难，只能将困难转移，”库尔诺说，“澄清事情的技巧，就如同协调的技艺那样，说穿了就是把困难当作一种转移技巧的艺术。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深藏在人心底不可理解的事情，是不可能单凭人类有限的智力来移除的，或者大事化小的。有时候，只能先将事情留在不明的晦暗之处；而在其他时候，当你不惜利用别人想搞清楚某些特定的事情时，却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黑暗，深不见底。”

在我跟马泰沃斯扬告别时，他对我说：“你要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时就大声跟我说，赫兰特，我要喝茶！”

在我回到旅馆的途中，看到了初秋温暖和煦的黄昏景色。大街上到处是闲逛的人群。这座城市及其街道让我感到很亲切。在一条小巷的幽暗深处，炭火在燃烧。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铁炉旁在烧烤肉串。两只大大的眼睛盯着炭火，他对火那种深情专注的凝视，仿佛看穿了时空。

亚美尼亚作曲家提格兰·曼苏里安（Tigran Mansurian），他的大提琴协奏曲曾被波士顿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过。最近他又谱写了一首《墓园曲》，是为了纪念一位年仅12岁的小提琴手，他叫西拉努斯·马托斯扬（Silanus Matuosjan），死于在斯皮塔克（Spitak）发生的地震中。

“这里吗？”他重复问着。这里是文化沙漠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这里有一位名列世界前十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叫阿拉克斯·达芙迪安（Alaks Davtian）。但是在这里却无人知道她，根本不出名，如果她在

这里举办音乐会的话，肯定只有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厅唱歌了。这里吗？这里的人只懂得怎样扣扳机，这是最简单的事嘛！每到年终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啊，一年又要过去了，太幸福了！曼苏里安是一位精力充盈、容易紧张而又神经质的作曲家，至今仍未发行过自己的唱片，可是这里也没有人在乎这样的事。

他凝视着窗外。他住在四层。他的房子是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建造的一栋简易楼房，根本不适合居住。目前这栋楼已经有些歪斜，扭曲变形，早该拆掉重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楼里的电梯竟然像是矿井里矿工们乘坐的那种铁笼，在外墙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电线，裸露的电线悬挂在外面或者吊在楼梯的边上。因为没有顶楼的晾衣间，住户们就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凉台与凉台之间、楼与楼之间和楼外院拉起的绳子和铁丝上。只有精英们才有洗衣机。每当附近的小店铺弄来肥皂销售时，才能看到家家户户把洗好的衣物晾晒在外面。每当刮风时，那些晾晒在外面的衣物就会随风飘荡、翻腾，此时亚美尼亚的城市就好像一艘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巨轮，正在驶向遥远的海岸。

在曼苏里安的楼前长着一排排高大的树木。透过他家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色的光。我和曼苏里安坐在他家狭窄的房间里，他对我说：“我的世界里只有德彪西和这些婆娑的树叶。我可以不间断地聆听这些音乐。”之后他就低着头沉默一会儿，然后用手指向窗外，微笑着问我：“你听到了吗？”在伴随着树叶发出的沙沙作响声中创作出来的丰富的乐曲中，蕴含着树叶不停地发出的声响，在这种伴随着高低交错的鸟鸣声中，奏出的是由各种散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细微的流动的旋律。

瓦莱雷带着我一路驱车从埃里温赶往30公里以外的加里（Garia）。开始我没安排很多时间待在加里，结果后来发现，去加里成了我此行义不容辞的事情。人在这里变得像个奴隶，因为必须表现得

十分谦卑、顺从并识时变通，否则你什么也不会看到，什么也不可能了解到。

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片几百万年以来被风雨侵蚀变得光秃平滑的岩石山丘，好像这些山丘来自其他星球，好像来自月球，荒无人烟，根本看不到一丝绿意，看不到树的踪影。可是突然，在这光秃秃的山顶上出现了一头奶牛，它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个地方。这里既无草也无树叶，它靠什么活呢？它一定是一头被所有奶牛遗忘了的牛，或者是被同伴们遗弃了的牛。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耐心，凭着自己的运气在那里活着。此时我们才能理解那位叶赛妮娜女士，理解她为什么身在巴黎却仍梦想着能抱着奶牛脖子时的心情。

瓦莱雷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想让我看看艾迪舍·查兰兹（Egisze Czarenc）喜欢逗留的地方。查兰兹是他们伟大的诗人，1937年被斯大林迫害致死。

当你穿过芳香的田野，
春天就在你的身旁。

从这里放眼望去，你看到的是辽阔的原野、高耸的山脉、迷雾笼罩的山峰和阳光照耀下的山顶，好一幅印象画派的景色。

加里是一座建于两千多年前的庙，当时是专门为美丽的太阳神赫利欧斯（Helios）建的神庙。我一定要去看看加里，因为我一直心存疑虑，亚美尼亚是否真的属于地中海世界，是否真的属于古老的希腊和古罗马。来吧！这就是证据。这里有一个古城堡的废墟，当初建立这座古城堡是为了抵御蒙古人和鞑靼人等一切来自亚洲的野蛮人。这就是加里统治时期开始建造的殖民地，他们在这里修路，这条路至今仍在使用，他们还在这里建造房屋，并建造了宏伟的艾奥尼亚神庙。而如今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意味着让那些赤贫如洗、忍饥挨饿、仇恨满腔的人

民拿起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步枪。

现在我又乘坐长途公共汽车从埃里温赶往格鲁吉亚，然后再从那里去第比利斯。在驶离市区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路标上写着：

距第比利斯253公里

距莫斯科1971公里

汽车沿着塞万湖（Sewan）边的公路行驶。当我们到了一处公路几乎与水相连的拐弯处时，一群小伙子拦住了我们的汽车，他们向乘客们兜售自己刚刚捕来的鱼，此时乘客们蜂拥着冲向了车门。在帝国时代，只要有货品出现的地方，就会立即形成人潮，人们就会大呼小叫、脸红脖子粗地争先恐后抢买货物。此刻也是一样，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争抢小伙子们手中的鲜鱼，因为鱼还活着，还在活蹦乱跳，鱼身湿滑，所以抢到手的鱼常常会从人们的手中滑脱溜走，于是人们就把抢夺鲜鱼的斗争变成一场恶战。有的人奋力用指甲抠住鱼身，有的把手伸进鱼鳃，但这些鲜活的鱼仍会从他们的手中滑脱，或者在两个人争抢一条鱼时，鱼会从两人手缝中溜走。

鱼和人相战的最终结局是，所有争抢过鲜鱼的人，他们的双手都是湿湿的、黏糊糊的，但手中却无鱼，而那些抢到鲜鱼的人，则想尽一切办法把还在挣扎的奄奄一息的活鱼当作战利品，把它们塞进一切能塞的地方，整个车腥臭得就像一个鱼市场。但是我们的车仍然继续前行。

旅途中，我身上带着一本亚美尼亚中世纪历史学家阿拉克尔（Arakelian）撰写的《历史》，这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出生于大不里士（Tebryz）。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里，作者把我们带进了神秘的、多姿多彩的宝石世界：

刚玉，或称刚玉石，其功效如下：如果把它含在嘴里，口渴的现象

就会消失；如果把黄金熔化，然后把一小块刚玉石放进熔化的黄金中，刚玉石不但不会溶解，反而能保持其颜色与光泽鲜亮不变。传说中还说，如果将它带在身上，此人将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并且还有防止中风的疗效。

我们的车沿着悬崖峭壁边行驶，下边是潺潺的小溪流水，头顶上是皑皑白雪。突然在一个转弯处，正在巡逻的俄国边防军叫我们的车停下，对，是俄国的边防军。他们上了我们的车，到处巡视，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他们可能是在寻找武器。突然有一位亚美尼亚人或者是格鲁吉亚人冲着边防军士兵大喊说，他们拦住了车，耽误了时间。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喊叫着。那时我心想，这些红军战士一定会掏出枪打死他们。不过这已经不是从前了，时代变了！红军战士不但说了“对不起”，还解释说这是他们例行公事检查，他们也是在执行命令。之后，他们很快就下了车。我们的车继续沿着崎岖的山路行驶。

玛瑙，具有刚玉石的所有特性，人只要佩戴上它，就不会染上麻风病、疥癣或类似的疾病。凡佩戴它的人，其财富和土地均不会减少，行为言语还会给人带来快乐。佩戴它，人的判断力会得到提高；佩戴它，无论喝多少酒，都会千杯不醉，保持清醒的头脑。人们都这么说，可我不太相信，因为终究会像狮子的奶，狂饮的人一定会失去名望、理智和财富。

我们到了格鲁吉亚，用不着看路标也能认路了，因为到处用的都是格鲁吉亚字母了。环顾一下周围就知道到哪里了。与亚美尼亚相比，格鲁吉亚显得更富有些、更好些，房屋建造得比较好。能看到大大的葡萄园、大群的羊群和牛群，还能看到大片的烟草种植园和郁郁葱葱的绿草地。

盘山路依然蜿蜒崎岖，沿着悬崖峭壁修建。到处是层林尽染的森林，一派秋天的景色。但是鱼市的腥臭味仍未在鼻前散去。

钻石，如果你问及钻石的功效，现特说明如下：如果有人皮肤上长了斑点，那么佩戴钻石就会为你除斑。佩戴钻石的人，能取悦国王，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他不会惧怕邪恶，也不会罹患胃肠疾病，当然也不会感染疥癣。钻石可以赋予你超强的记忆力，并使人长寿。如果将钻石捣碎给人服用，可以毒死人。

我们的车子越来越高，终于到达了山顶。突然间，整个城市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一览无余。

这就是第比利斯。

沥青山上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第比利斯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城市，那条街叫鲁斯塔维尔（Rustawel）大道，绵延数公里，地处蜿蜒的山脚下。第比利斯位于阳光普照、郁郁葱葱的青山之中，这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瑞士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那些恬静又十分受欢迎的温泉度假中心。在整个帝国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一瓶来自这里的矿泉水，而在当地你可以直接饮用温泉水，在第比利斯城里到处都是温泉。

在鲁斯塔维尔大道西端是散落在小山丘之间的索洛瓦卡区，在这个区随处可见清澈透亮和美丽如画的各式房子、封闭阳台、平台和花园。直到今天，在索洛瓦卡区还保有一些昔日的魅力。在鲁斯塔维尔大道东端，就在不久前，随着在那里建造了新居民区，这条大道却一直往东延伸，消失在环绕城市的森林之中。

近年来，第比利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格鲁吉亚像帝国南部的其余地区一样，成了整个第三世界发展模式的典型，即不顾一切地迅速扩建首都，不顾与其他省份拉开距离，致使其他省份进一步贫困化。首都和全国其他各地区之间在各个领域形成了严重的不平衡。

今天有四分之一的格鲁吉亚公民住在第比利斯，有三分之一的亚美尼亚公民住在埃里温，如若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在华盛顿就应该有5000万居民，在华沙就应该有800万至1000万居民。

生活在其他省份就意味着边缘化、贫穷和毫无希望。因此，大批人不顾一切蜂拥进入大城市居住，首先是涌入首都。因为在这里有更好的生存条件、发展和升迁的前景，结果，古老的第比利斯、埃里温、巴库等就变成了劣质不堪的丑陋的庞大楼群的集中地，这些楼无人维护，廉价而又粗糙。大楼里的门都关不严、螺丝也拧不紧，什么都不配套。各

地楼房的质量差距巨大。最好的建筑都在莫斯科，而在帝国其他的欧洲地区质量差很多。最差的建筑是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雅库特和布里亚特。

你们是否还记得圣埃里苏佩克写于1926年的《人类的土地》这本书？作者最早曾是飞行员，他要执行从图卢兹经西班牙到达卡尔的飞行任务，那时的航空技术很不成熟，如果飞机发生故障，飞行员就必须做好准备随时随地降落。圣埃里苏佩克正在研究自己的飞行路线图，但是这个飞行路线图非常不具体，既抽象又笼统，“毫无用处”。于是他去请教自己的老同事亨利·吉亚梅（Henry Guillamet），他能把飞行路线都记在心里。“吉亚梅给我讲的这节地理课非常奇妙……”作家回忆道，“他没有给我讲加的斯（Cádiz），而是给我讲了在加的斯附近有三棵橘子树，他对我说，小心这些树，你要把这些树标在地图上……从此后，这三棵橘子树在我的地图上占的比例比内华达山脉还大。”吉亚梅还提醒他注意流经草地之间的小溪，他说：“注意那条小溪，把它标在地图上，因为他破坏了整个田野……迂回流经那片处于福地的草地的小溪，是我要寻求出路的地方，至少离我这里有2000公里。在刚开始迫降时可能会把我变成一团火球……我也设想找出一种姿势，以防那些像斜坡上的散兵一样散布在山坡上的三十只绵羊的攻击……你觉得在草地上好像什么也没有，结果会突然“哗”的一下！机轮下出现了三十只绵羊……”

我觉得，每个格鲁吉亚人，每个住在高加索的人，都会在记忆里有一幅这样的地图。特别是他们从童年起，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村庄里、在街道上就学会了记住各个地方的地形特点。这是一幅令人警醒的地图，也是一幅构成危险的地图。只是高加索地区居民的地图上并没有标上小心橘子树、小溪或者羊群的符号，而是标有小心外来氏族、外来部落、外来民族的符号：“注意这个房子，那里住着奥塞梯人。”“这里是阿布哈兹人的住地，离这个地方远点儿……”“别走这条路，因为你不是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跟这里的人聊天时，让你深感惊讶的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精确地知道自己周围的各种情况，比如，谁住在哪儿，来自哪个部落，有多少人，他们之间在过去和今天相处得如何。但是这种对周围人情况的非同寻常的了解也只限于自己周围这个很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当然很难确切确定这个范围），就无人知晓了——更重要的是——无人对此感兴趣。高加索居民的世界相当封闭、狭窄，只局限于自己的村落和山谷。祖国的概念即一眼能望到边的地方，一天之内能走完的地方。高加索地区就是多种族聚居的组图，上面画着无数个十分微小的，有时是微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小小的部落、一个小小的姓氏，很少是一个民族（当然出于威望和敬重可以用"民族"，因为这个词在当地用得十分广，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

其次，很快你就会注意到，这里目前维持的仍是多年来的独裁暴政统治。在这里所有事情都是按照黑暗历史年代遗留下来的固有思维和程序来办事。其实谁也不可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世代相仇，冤冤相报。但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从吃母乳时就遗传了这一切。因此这种一成不变的想法加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来自上面！），当然事实上也是，整个高加索地区集中了所有非常落后的国家——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因此他们根本接触不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每个邻国之间也没有可互相效仿学习的例子。

这里居民的特点也是令人莫名其妙地情绪化，而且变幻无常，这种情绪变化是反复无常的，会突然间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但总的来说，他们很朴实，热情好客，毕竟他们多年来还是一直能够平静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突然，突然出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会去问一下，当然也不会听，只知道立即抓起匕首和刀剑（现在是机关枪和巴祖卡火箭筒），迫不及待而又暴怒地去与敌人拼杀，不见血流绝不罢休。可是就他们每个个体而言，他们每个人平时都可亲可爱，彬彬

有礼，好心善良，可以断定，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魔鬼在作祟。然后一切就又恢复平和，回到正常状态，回到日常普通的生活，即枯燥乏味无聊的外省生活。

1990年夏，有一些人坐在鲁斯塔维尔大道上的几个固定的点上，手举着大标语、海报和照片，因此有人会走到他们附近，好奇地认真看着上面写的内容。这就是他们采取的一种抗议形式，或者说是为了吸引众人关注一下他们的问题，我在伊朗和黎巴嫩也见过这种形式的抗议，人们普遍称之为“静坐”。

在那里静坐的人数从几个人到几千、几万人不等。但是也会有一个人静坐的时候，但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因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众志成城的力量。（在鲁斯塔维尔大道上坐着好几拨人。）一般情况下，静坐的组织者都是让人坐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为了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或者坐在东正教教堂门口的台阶上，或者坐在清真寺的台阶上（因为那里最安全）。

一言以蔽之，静坐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就这么简单！就是如此而已！静坐是超乎寻常的安静和温和的行动。在这里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挥舞拳头，没有人说脏话，没有人呼唤上帝来作证。那些参加静坐的人都保持沉默，试着互相之间不聊天，也不与过路人交谈。他们专心地坐在那里，时刻保持着警惕。静坐是抗议和接受、造反与克制的一种有机结合。总的来说，静坐的参加者们是接受最普遍的社会现实的，他们只是想修正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并表明自己的存在。我们试想一下，世界本是不公平的，但如果这种不公平超越了极限，那就会引起反抗。如果有人愿意谈判，那他们也是愿意接受谈判的。他们内心深处就是这样想的，他们需要社会心理分析家给他们一些温暖，真诚地探问一下他们痛苦的心灵。

静坐是极具东方特色的反抗形式。在欧洲，人们喜欢排队出去游

行，但是这种游行队伍很快就会散去，然后消失。在阿根廷游行的人是绕着圈子走，但也持续不了很长时间。但是静坐却有两点很强的方面：首先，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可以持续数周和数月。此外，这只有东方人能做到，因为他们具有铁石般的耐心、惊人的耐力和顽强的精神；其次，强制静坐的人离开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比驱赶游行人群要难得多。

但为什么要驱赶坐在市政府大楼台阶上的那些可怜的民众呢？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她们只是想让大家与她们分担悲惨的遭遇：有的人的女儿在游行队伍中被打死，有的人的儿子被红军杀死。我注意到，她们把自己受害子女的照片摆在自己面前，希望人们能驻足，拿起这些照片看看，看看他们有多么年轻，甚至看看有些人漂亮的脸庞。对我们来说也许觉得有点难堪，而在这里，在格鲁吉亚则不是这样，在这里他们可以举行这种公开的吊唁，这是一种公开的令人感到压抑的示威行动。

在这些不幸的母亲附近还有另一群静坐的人，他们要求独立，要求民族自治，希望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有10万阿布哈兹人希望脱离格鲁吉亚，成立自己的国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阿布哈兹属于世界上最美的角落之一，堪称里维耶拉第二、摩纳哥第二。为此阿布哈兹人琢磨出同样的想法，就像二十年前在加勒比群岛上有个终年阳光普照的名叫安提瓜的小岛[7]，英国人试图解散这个党并宣告租约无效。因此在这里，在高加索的阿布哈兹人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在西方找到一个连锁酒店管理公司，与他们签订一个协议，最终可以开创一种良好的生活。

可是格鲁吉亚会放弃阿布哈兹这块肥肉吗？格鲁吉亚有人口400万，而阿布哈兹人只有10万。所以很容易断定，谁胜券在握。

阿布哈兹（和它希望解放的野心）的事务给了我们最好的解释，为

什么突然在高加索（不仅仅在那里）发生了骚动，为什么高加索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就是因为，那里有两件事不期而至，致使立即引发了来势凶猛的暴乱。在那里第一次出现了“利益”这样一个概念，第一次能够在市场上轻易弄到武器。

在一个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里，那时只有一种利益存在，即集权主义的国家利益。在那里一切都要经过严格统一的管理，其他任何利益都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排除之、摧毁之。但是这个垄断国家突然以势不可当之势垮台了。立即有成百上千的各种大小买卖、私人和集团的、民族利益抬头，鉴别身份、确定并坚决要求恢复他们被剥夺的权利。在民主国家当然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有经验的公共仲裁机构和国家仲裁机构解决或者缓解。可是这里并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会很快有）！既然已经不能再采用鞭刑和驱逐出境的办法了，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些自然产生的利益冲突呢？

因此在还不具备这样的调解机构的情况下，那最简单的途径就是用武力解决。这种解决办法正好对当时的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昔日大国的瓦解和军队纪律的涣散，在黑市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甲车上包括坦克上的武器。只要活着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个个摩拳擦掌。同时在这个国家弄到手枪和手榴弹比搞到一件衬衫或者帽子还要容易些。因此在马路上到处都是军人在走动，很难分辨他们都属于哪个部队，很难确定谁是谁，他想干什么，为什么而战。凭借权势横行一方，或狂妄地以首脑自居，这是在嘈杂混乱的年代常发生的典型事情，因此今天来了什么司令、什么领袖、什么复兴者、救世主，明天又销声匿迹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隔几个月来这个国家看看，每次都能看见新面孔，听见新名字。而以前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不知道。也许都躲起来了？

或许他们开了私人公司？或许公布说，他们马上就要回来了？所以在游乐园里人们管那种差点就会折断脖子的忽上忽下的孩子们爱玩儿的过山车叫“俄罗斯山”，也不是偶然的。这过山车的车厢移动速度这么快，根本就看不清每个乘客的脸，所有的人都在什么地方飞着，消散着，这里的政治也与此毫无二致。刚选上来的某人，马上又被赶下台。没过多久，被赶下台的人又很快回来，试图把占了他位置的人赶走。在照片上看到凯旋归来的人身旁站着警卫，拿着手枪，打出胜利的手势，而就在同时重新被赶下台的人带着自己的警卫在夜幕的掩护下逃走了。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拉夫·柯克帕特里克（Olaf Kirkpatnick）爵士在论述高加索问题时这样写道：

研究世界这一部分，即研究土耳其和蒙古问题的专家，就像一个人站在阳台上，观察那群人，因为一个特殊机会突然混乱不堪地聚集在一起，但无法预计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几组人见面后合并成一组，另外一些人自行组合后又分离了。突然又出现了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于是整个人群开始朝一个方向奔去，只是为了过一会儿再四处散开。有一个演讲者暂时聚集了部分听众。而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的政治和个人冲突又引发了骚动。为此导致了大屠杀和毁灭行动，尽管在某一阶段他们会保持健康的理智和采取某些具有建设性的行动。

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是一个长满棕榈树和三角梅的城市。我1967年曾去过那里。我那时在笔记本上写道：古拉姆带我去了苏呼米的一个叫“狄奥斯库里亚”的餐馆吃炸鱼。这个地方非常美。这个餐馆建在岩石群之上，而这些岩石群一直延伸到黑海里。这个餐厅是依岩石废墟而建的，这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殖民地狄奥斯库里亚的废墟。坐在餐桌旁，看得到大海环绕的城市沉在海底，现在是一座庞大的水族馆，有一群群慵懒的肥鱼沿着那些古老的街道鱼贯而行。

令我感兴趣的是，狄奥斯库里亚是否还在海底，是否在那里坚持了

二千五百年，结果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火箭打断了我的思维。

我与我当地的主人吉雅·萨尔塔尼亚（Giya Sartania，他是年轻作家和翻译）乘车去城外，为的是去萨木塔弗罗（Santawro）的圣妮娜教堂朝圣。基督教在格鲁吉亚属于一个古老的宗教，早在4世纪就在这里深深扎根，这个教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建造的。之后我们又去了芝瓦里亚教堂。它的建造晚于圣妮娜教堂二百年。尽管两个教堂相隔二百年，但这两个教堂十分相像，因为源自同样的理念和巧思，也正如我们所见，尽管相隔二百年但没有变化。

如今我们进入这两所教堂，仿佛退回到了一千年以前。也就是说，这些教堂要么一直被关闭，要么被变成了无神论的博物馆，或者变成了燃料库或者粮库。在此之前这些教堂已经被破坏得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现在它们以此种现状回归给了信徒，因此一切仿佛回到了地下墓穴，仿佛早期的基督教徒聚集在四壁萧然的空间中。

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但月亮尚未升上来，因此他们找不到路，正如基洛预计的那样，是基督徒们给指了路。前后左右都能看到黑影，他们小心翼翼地向沙坑方向移动。有人拿着火炬，并尽量用大衣遮着，另一些人比较熟悉路，摸黑前行。

这是亨里希·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在《你往何处去》中的一段话。但我们现在跟基洛一起成了类似神秘景象的见证人。在这个空荡冰冷的芝瓦里亚教堂里，只有一个从外面拿进来的对象，那就是立在光秃秃的石头祭坛上的一个小小的金属十字架。一位神父俯身站在祭坛前，头戴神父小瓜帽。教堂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从墙壁滴下来的水声。有几位妇女手持蜡烛缓慢地走进来，烛光照亮了昏暗的教堂。一位妇女从包里掏出小麦饼，掰开分送给所有在场的人。在这个充满潮湿气息、黑咕隆咚的教堂里，在这沉默的场景中手拿分得的小麦面包，在背对着我们、连我们都不瞥一眼的神父的奇怪的举止中饱含着某种悲凉。

清晨我乘大巴从第比利斯到巴库去，这辆车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大高加索和小高加索的山谷间行驶。在这段忙碌而又滑稽可笑的史诗般的旅行中的主人公叫莱瓦兹·嘎利泽，他是我们这辆大巴的司机，身材健硕，甚至有些肥胖，大约五十多岁。我不晓得，作为大巴司机对他来说是升迁还是降格，因为他给我讲了关于他的很多事，过去他多年开的都是集装箱大运输车，去过欧洲很多国家，因此积累了一些经历和见识。在这500公里的行程中，大巴车上乘客一直爆满，尽管乘客有上有下会有变化，但只有少数几个人是通过合法途径购得车票的，那是两位俄罗斯妇女，她们要去基洛夫堡（Kirowabad）[8]，还有我。其余的乘客都是根据莱瓦兹说的价格来付钱，他把收到的卷成小团的卢布塞进所有能塞的口袋里。莱瓦兹是我们这条路线上真正的主宰，是无可置疑的君主和领袖。

那天正赶上阴雨天，那儿算得上是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一路上我们常常能看见一群群站在公路旁的人，他们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他们要么身上扛着大包小包，要么手里牵着绵羊或者山羊，他们一看到汽车到了，个个像乞丐那样伸出双手乞求。他们不是要乞讨别人给点钱或者给一把大米，而是乞求莱瓦兹对他们发善心，带他们一程。可以猜想，这些人整天站在这里，因为大巴车的班次很稀少，路上也很不安全，附近战事不断（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交战），路上还能看到很多被烧毁的汽车的残骸，因此勇敢的莱瓦兹在这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垄断者。

当然，他很会利用形势。莱瓦兹一直在进行一种十分残酷的交易，譬如，他在路上遇到一群人想上车，他就会停下车来问他们，他们想付多少钱，去哪里，如果他们能付很多钱，而且路程又不长，莱瓦兹就会把那些付钱少的乘客轰下车，尽管他们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上百公里。尽管他已经收了他们的车费。

莱瓦兹没驱赶我下车，首先我是唯一一位手持合法车票的乘客（两位俄罗斯妇女已经下车）；其次我是外国人；第三，我正高烧近40度，几乎要死了。离巴库越近，莱瓦兹就越加无情。大巴刚上路的时候还有很多他的格鲁吉亚乡亲在车上，莱瓦兹对他们还算客气。而现在整个车里全是阿塞拜疆的农民，是一帮胆小畏怯的人。这些人看上去个个愁眉苦脸，看他们一眼都令人感到伤心，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发现我发高烧，从他的篮子里掏出一瓶柠檬汁递给我，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接近巴库了。一片噩梦般的景象：焦油覆盖着成片的土地，路上到处散落着矿渣和随处是横倒竖卧的水泥板。刚开采出来的重油像小溪一样流得到处都是，流进水池、湖泊和海湾，臭气熏天。黑乎乎油腻腻的石油浮在海面上，渗进沙滩里，处处是油渍和煤烟——这哪里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金黄色的沙滩啊！

为了能抵达嵌在海湾中的巴库，汽车还得爬上环绕城市而建的蜿蜒陡峭的盘山路。在一个转弯处我看到了莱瓦兹热情的一面。在这片灰黑的沥青色和黏糊糊的令人恶心的景致中矗立着一个水泥土堆，在那里站着一个活人，可这个人缺少一条腿，他站在用装水果的木箱搭的台子上。

我见证了某种仪式，他这样做肯定是有很长时间了。因为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莱瓦兹停下车来，上前问候这位男子并将实实在在的一大卷卢布塞进他衬衣的口袋里。

逃离自我

在巴库我住在一位俄罗斯妇女的家中，在巴库城里开始发生暴乱、抢劫和纵火事件时她成功地逃离了那里。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她的，她正好住在她的父母家里。那时她给了我她在巴库的家的钥匙，并十分坚定地说：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她对在巴库发生的民兵随处肆意劫掠的行为仍感心惊肉跳，心有余悸。她说，她当时能够到达飞机场，幸亏是救护车司机答应让她搭乘他的车，否则她是不敢自己单独上街的。

我们乘坐的莱瓦兹的大巴车在黄昏时分到达了巴库的火车站。从外省开来的大巴车缓慢地穿行于拥挤的送客和接客的人群之中，这里到处都响着令人厌烦的嘈杂的各种喇叭声，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行李和袋子，到处是叫卖西红柿和黄瓜还有羊肉串的小贩，到处是一群群跑来跑去伸手要钱的孩子，随处可见目光呆滞、无精打采的手持警棍的警察。街道上散发着八角和豆蔻、烤羊肉串和炸辣椒的气味，这就是东方，真正的东方，就像是在伊斯法罕（Isfahan）或者基尔库克（Kirkuk）、伊兹密尔（Izmir）或者赫拉特（Herat）那样。这是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热闹非凡、十分独特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十分闭塞，外人很难挤进他们的领地。无论在哪儿，只要他们自己的人凑在一起，哪儿就会有一群身穿绚丽多彩衣服的人欢聚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集市、叫卖场、牛羊交易市场，然后就是叫卖声、吵架声、打骂声四起，这一切过去后（要有耐心！），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人们在便宜的小餐馆喝着加糖块的薄荷茶随意闲聊着。

我很快就发现，我在这个车站处境很尴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现在手里提着装有很多书的沉重的箱子（谁叫我有到处买书的习惯呢），外加40度的高烧，我该怎么办？麻烦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到波乌赫尼亚（Pouchnia）大街117号怎么走？只要碰到人我

就会问，甚至拽着他们的袖子或者衣襟。但是人们根本不理我，推开我的手，不耐烦地甩开我，匆忙走开。最后我才意识到，我从这些人那里什么也打听不到，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外省、外乡的人，他们都是些来自集体农庄的农民，或者是做纺织品生意或者做水果生意的商人，这些人要么来自达吉斯坦（Dagenstan）共和国，要么是来自车臣共和国，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yno-Bałkaria）共和国。这些来自高加索山区的被这座大城市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人，他们哪里还能告诉我波乌赫尼亚大街117号在哪里呢？我继续昏头昏脑地转着，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特别是觉得快被渴死了。没有任何可喝的东西，因为已经是傍晚了，只有一辆卖格瓦斯饮料的空车停在马路上。

根本见不到一辆出租车。我沮丧地站在大街上，伸出拿着兴业比克牌（BIC）自动铅笔的手。在那里没站多久。孩子们有着鹰一样的眼力。有一个孩子坐在他爸爸开的车上，发现我明显是要把手里拿着的比克牌自动铅笔拱手相送，于是让爸爸停下车。爸爸在孩子的请求下停下了车，那时我又问了一下，去波乌赫尼亚大街117号怎么走。于是他们让我上了他们的车，我们的汽车走了很久，离公共汽车站已经很远了。我们在老城区的一个汽车站旁停了下来，那里有一条又老又暗的街道。这里不是人们概念里的拥有古迹的古老街道，没有任何吸引人眼球的古迹，没有任何让人看了兴奋的老楼，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古董，有的只是破旧的老楼，也就是建了七十三年但从未经过维修的破旧的老楼。

我经过了一道黑暗的大门洞，然后走进了一个黑黢黢的院子，突然踩到一堆垃圾上。听到一个妇女的声音。她问我，你找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到一个不起眼的在暗处的门前，她惊奇地问，男子，你的手为什么这么烫？（这里已经很少有人再用同志这个词了，但是也不会用先生这样的词，因为这听上去有些资产阶级的味道，而对陌生人直接用你称呼，又让人觉得不够好，不够礼貌。因此就用妇人或者男子这样的称呼。）

我在发高烧，我回答说。在黑暗中我们摸索着走到一个用锁锁着的门旁。我们进到房间里，这位妇女打开了灯，我看见一张床。我对她说，你知道吗，美国有一种明信片，上面写着“幸福就是……”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画，说明什么是幸福。我说，现在我看见床就是幸福。

是的，你的确病得很厉害，这位妇女说，过了一会儿，她给我端来一壶热茶水，在托盘上还放着各种各样的糖块和果酱类的东西。

她问我是哪国人。

全世界的农民都是从庄稼收成开始跟人交谈，英国人则是从谈论天气变化开始，而在帝国，人和人见面得首先弄清对方是哪国人，因为很多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此。

在大部分情况下区分身份的标准是清楚明确的。这是俄罗斯人，那是哈萨克人；这是鞑靼人，那是乌兹别克人。但在这个国家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公民，确定他们的身份也有很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即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部分人。比如，我的一个熟人，他叫鲁斯望，是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工程师，他的祖父是俄罗斯人，祖母是格鲁吉亚人。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鲁斯望的父亲选择自己是格鲁吉亚人，后来他与鞑靼妇女结婚。为了表示对母亲的爱戴，鲁斯望选择自己是鞑靼人。在鄂木斯克上大学的时候，他跟一位来自乌兹别克的姑娘结了婚，现在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木塔尔，那现在木塔尔该是哪国人呢？

有时候这些家谱显得千头万绪而又错综复杂，很多人不觉得他们跟哪个民族有关联。这就是所谓的新苏维埃人的概念，这并不是由某种意识或者态度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因为那时的社会就是大家同属于一个苏维埃国家。苏联解体后，人们开始寻找今天自己的新身份（就是指那些总的来说需要对此进行思考的人）。

所谓的新苏维埃民族其实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产物，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不间断地、密集地、大规模地迁移、搬家、调动所造成的。这一大迁移运动始于19世纪，那时开始向西伯利亚大批驱赶和流放人，并大举向亚洲扩张，但是在1917年后这种运动达到了顶峰。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踏上了流亡之路。一些人从“一战”的前线归来，另一些人奔向了卫国战争的前线。1921年的苏联大饥荒又迫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为了找到一口饭活下来踏上了流浪之路。那些在战争和革命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们，那些数百万不幸的流浪街头的流浪儿忍饥挨饿，到处乞讨，奔向四面八方。随后就是大批工人为了找到工作和面包跑到了乌拉尔地区和所有能到的角落，在那里当上了建筑工人、钢厂工人、煤矿工人和大堤建筑工人。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数以千万的人历经艰苦的长途跋涉被下放到了分布在帝国各地多得不计其数的劳改营和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有大批人流随着战线的流动而流落到四面八方。与此同时，在这些战线的背后，拉夫边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Lavrenty Pavlovich Beria）在指挥着向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纵深流放波兰人、希腊人、德国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行动。结果整个民族都被流放到一个陌生的地域，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个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背井离乡，成为无根之人，成为脱离自己文化的人，脱离自己的环境和家园，使他们变得更加无助，在独裁专制面前更加俯首帖耳。

在这幅人们不断被迫大规模迁移的图画上，我们还得再加上无数共青团自愿下乡队的青年们，还要加上那些在“祖国需要钢铁”“开垦荒地”以及“开发森林”的口号煽动下被迁走的大批人。别忘了还有一个因为民族间的冲突而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大迁移浪潮。

如今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飞机场、火车站、码头、贫民窟和帐篷之间颠沛流离。游牧精神和氛围在这里依然是现实，而且十分活跃，我们常能听见的一句话是：我的地址不是我家的门牌号，也不是街道名，更

不是城市名，我的地址叫苏联。

尽管有不断进行的超出寻常的大迁移，尽管有数代人持之以恒的民族大搬迁，但是第一次接触到帝国民众的人，更多地注意到的是他们的相似之处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这些人看上去好像都一样。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穿同样的外套，当然都是很暖和的衣服，穿同样的工作服和高筒靴。他们的面部看上去也非常相似。个个看上去全神贯注，不愿意与外人交往。不知道他们是满意还是生气。甚至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有好奇心，他们都是些怪人。（《克里姆林宫之夜》，克塞维尔·普鲁申斯基著）。

住在波乌赫尼亚大街117号的那位妇女的恐惧有些过分：俄罗斯人不会来这里打仗。可能是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斯坦人互相打，布里亚特人和车臣人互相打，但是他们是不会跟俄罗斯人动手的。密茨凯维奇早就对这种现象思考了很久，他觉得，第一眼看上去，这是一种很难令人理解的现象：一个沙皇官员驱赶大批图瓦人（一个西伯利亚部落）去做劳役，可在这些不幸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起来反抗。其实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杀死这个官员，然后逃到森林里去。结果他们反倒顺从地走着，驯服地执行着他的命令，默默地承受着他的辱骂。密茨凯维奇解释说，在这些图瓦奴隶眼中，这个官员就是这个伟大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们惧怕他，他让这些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惶惶不安。举手反对这个官员，就是举手反对帝国，为此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敢这样做。突尼斯的作家阿尔贝特·梅米（Albert Memmi）在自己题为《殖民图像》一书中精确地阐述了这种复杂的沉积的仇恨感，但是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者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恐惧。阿尔贝特·梅米注意到，恐惧最终会积聚成高于仇恨的一种情绪，必将会压倒和摧毁恐惧。

只需看一下近期发生过种族冲突浪潮的这些城市——费尔干纳（Fergane）和奥什（Osz）——就可以知道。从那些被烧毁和破坏的乌

兹别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或者塔吉克人的房屋就可以看出，俄罗斯人的房子平安无事。在狂怒的土库曼人攻击卡拉卡尔帕克人时，有谁会站在贫穷的卡拉卡尔帕克人一边？最多只会是卡拉卡尔帕克人自己。而在俄罗斯人身后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坦克和核武器。

然而我这位来自巴库的俄罗斯朋友，一听到街上的骚动，听到街上第一声枪响，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对着亚美尼亚人来的，只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而她则在匆忙之中打好行李奔向了机场，庆幸自己成功脱离地狱。可地狱在哪里呢？哪里是地狱呢？

其实地狱就在她的心里，在她的意识里。

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在阿尔及尔、金沙萨和布琼布拉等地机场的一幕，后来70年代在卢旺达和洛伦索马奎斯（Lourenco-Marques）等地机场发生的同样的事情。由于疲惫不堪和恐惧而显得精神恍惚的一群群白人难民带着大包小包露宿在机场。他们是昨天的殖民者，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如今他们唯一渴望的事情就是立即逃离这里，抛下了花团锦簇的豪宅、花园、游泳池和帆船。怎么会下决心如此悲伤地迅速逃离？是什么催促他们要逃回欧洲？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迫使他们如此突然而且盲从地逃离这块阳光普照、舒适和美丽的热带地区？也许是当地人开始大规模屠杀自己的白人老板？或许是他们奢华的街区被大火烧毁？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

在殖民者的意识里出现了地狱，这就是内心的地狱。也就是说，现在殖民者的良心被唤醒了，让他们觉察到了其良心是污秽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或者并没有准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迄今为止他们以无数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者掩盖自己的错误行为。并非殖民主义者当中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良心是肮脏的，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无辜的，但他们既是这种殖民局面的始作俑者，也是这种殖民局面的牺牲者，因为殖民统治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的本质是建立在

不对等的原则基础上的。他们的悖论是，尽管我自己并不愿意这样做，甚至我反对殖民主义，事实上，只是因为我属于这个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在统治别的人民，所以我才成了殖民主义者。只有我以放弃我的祖国和人民为代价，有时候还得以改变肤色（理论假说）为代价，我才能改变这一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才能免遭指责。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选择，所以在几十年前，即1990年在卢旺达机场，而如今又在巴库机场出现了拥挤和紧张的场面。

但是你们究竟想要脱离谁呢？

你们这不是要逃离自己吗？

但是葡萄牙人和法国人逃离非洲人，与俄罗斯人必须离开阳光明媚的巴库或者必须离开美丽的具有19世纪建筑风格的里加是有区别的，因为俄罗斯人要回到阴郁而寒冷的诺里尔斯克（Norylsk）或者回到污秽不堪和烟尘弥漫的车里雅宾斯克。他们不愿意离开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为了拯救自己，他们在自己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了各种协会和党派，其口号是，留下来，不要离开一步！但是住在波乌赫尼亚大街117号的妇女情形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她在莫斯科有家有住房！

巴库

我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它很人文，不是反人文的城市（真的，有些城市的建筑是很反人文的）。可以整天漫步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巴库很有情趣，并且非常有吸引力。巴库海岸边有林荫大道，城里有好几条大街坐落着19世纪下半叶遗留下来的漂亮建筑，都是石油大王阿尔弗莱德·诺贝尔建造和使用过的楼房。因此在这里能见到各种风格的建筑，在海边的主林荫大道上矗立着几座浅色的豪华公寓大楼，那是阿塞拜疆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Geydar Aliyev）为自己的心腹们建造的。这是

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阿利耶夫最早是阿塞拜疆克格勃的头目，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了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曾是勃列日涅夫的得意门生，勃列日涅夫曾任命他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副总理。1987年戈尔巴乔夫免去了他的这一职务。正如我所说的，阿利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人，勃列日涅夫集团所属的人的特点是贪腐严重，喜欢东方式的奢华，生活腐败糜烂。他们的腐败行径并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相反，其特点是明目张胆、公开叫嚣、大吹大擂。这些在殖民区最主要的街道和在城区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建造的大型豪华建筑就是最好的例证。阿利耶夫根据自己手里的名单分配这些房子，而且还亲自给自己的这些亲信分发钥匙。分配房子的标准很简单，最好的房型先分给自己的亲属，接下来分给自己的表兄弟姐妹和心腹们。在这块土地上，与数千年前一样，部落的情结仍然高于一切。

我进过其中一座高级公寓，这个房主曾在这里的国会工作过，重要的是，他还是阿利耶夫的表兄弟。这个人的薪水很低，可是沿着墙面有一应俱全的各种电子设备，高级音响、电视机、录音机、扩音器、各种灯光等。天晓得还缺什么。这些设备需要上百万卢布，而且在那里的商店根本都买不到。他家的桌子上摆着各类食物，蜜饯、大枣、各种干货。房主最不喜欢萨哈罗夫[9]。萨哈罗夫？为什么不喜欢萨哈罗夫？因为他娶了亚美尼亚女人为妻！但是除了这个问题（就是除了萨哈罗夫之外）所有的事都很好。房主请我吃了荷兰奶酪、来自巴哈马岛的大虾，扬扬得意地坐在家人中间，四周电器上的彩色小灯向他眨着眼睛。

第二天我与阿云迪·米尔塞利诺盖尔·马梅多夫（Ayudin Mirsalinoglu Mamedov）教授聊天，这是一位不寻常的、智慧而又快乐的教授，因为自1917年之后，第一次允许成立土耳其学文化协会。教授多年来一直主编一本土耳其学杂志，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帝国，土耳其语是继俄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有6000万人说土耳其语。阿塞拜疆人不仅在安卡拉，还在塔什干和雅库茨克（Jakuck）都能用土耳其语与人沟通。说土

耳其语的朋友遍天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实就是一个斯拉夫-土耳其超级大国。索尔仁尼琴的想法是，应该去除土耳其元素，使帝国成为一个斯拉夫超级大国。

阿塞拜疆人这个词仅仅是在1937年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土耳其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既是阿塞拜疆人，也是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人。

马梅多夫说，苏共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带给人们的破坏是最大的。人们不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而是不好好工作，也不好好生活，真的是这样。

让我们来看看大学，需要四年的时间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深入研究苏联共产党史，加深对苏共理论的理解，最后全都与生活脱节。

苏共在经过七十三年之后，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思想，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才能有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在我们这里就是杀戮自由，这就是改革新思维，就是全新的思维。

苏共政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苏共政权是斯大林借助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盗贼的力量建立起来的。那时有数百万孤儿，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赤脚孩童流落在俄罗斯的街头。他们偷盗一切能偷盗的东西。斯大林把他们关进了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会了仇恨，当他们长大以后，穿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内务人民委员部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掌控着全体人民，这就是你要的苏共政权。

斯大林所谓的一盘棋是什么？他让所有的民族四处迁徙，让他们背井离乡，脱离故土，现在你们谁也不能肆意妄为，为了不伤害别人，你们也不能去触动他人。因此发生了三十六次边界冲突，甚至更多，这就是斯大林的一盘棋，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巴库市中心的小餐馆。土耳其式的？还是伊朗风味的？阿拉伯风味的？还是阿塞拜疆风味的？因为这一地区的餐馆都大同小异。一个小单间，羊肉串、米饭、西红柿和柠檬汁。我和阿塞拜疆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作家尤泽夫·萨美道格尔（Yusif Samedoglu）共进午餐。他试图协调地方领袖和宗教激进派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自由派、对中间派，对那些愿意与所有人握手言和的人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知道他会跟我谈形势问题，因此我们提起了这方面的问题，我问他正在写些什么。他坚定地摆摆手。他是那些放弃文学投身政治的人之一。不过也是，能写什么呢？他用西里尔字母写过书，现在他们正要废除西里尔字母。他们要么将使用拉丁字母，要么将使用土耳其字母，要么回到阿拉伯字母，有谁知道呢？而那些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书怎么办呢？翻译成其他字母？谁来做这些事呢？值得这样做吗？一个两鬓斑白的作家两手空空，将留给人们的是无人能读懂的作品。

我生平第一次搭乘这么拥挤的飞机，飞机里挤得就像高峰时期的城市里的公交车。在巴库机场一群气势汹汹、狂呼乱叫的人奋力冲进机舱，无人谦让。机长一边喊着，一边威胁着，一边咒骂着，都无济于事，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站在机舱通道里，根本不听对他们说的话。最后，机长只能挥挥手，关上了飞行员的座舱门，发动了引擎，上了跑道。

沃尔库塔，冻僵在火中

飞机本应在夜里降落在沃尔库塔，而我们在阳光明媚的白天降落了，肯定是降落在了一个什么别的机场。

在哪个机场呢？

我不安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但马上就发现，我是唯一一个显得焦躁不安的人，别的乘客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我大约乘飞机在这个国家已经飞行10万公里了，从我的这次旅程里我有两点发现：飞机总是满员的，在每个机场等每个航班有时需要等上好几周的时间，总是人满为患，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空位。其次，就是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机舱里一片宁静。乘客们都一动不动地默默无声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如果听到某处有说话声、笑声或者碰杯声，那就是说，有一群波兰人在飞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旅行会让他们处于无限的兴奋状态，甚至达到几近疯狂的状态。

对，这儿不是沃尔库塔，这里是瑟克特夫卡尔（Syktywkar）。

我不知道瑟克特夫卡尔位于什么地方，我忘了带地图了。我们费力地走过雪地，来到了机场大楼。里面很暖和，既闷热，人又多，根本找不到一个空闲的座位。人们东倒西歪地躺在所有的座位上，他们睡得那么深沉，那么安稳，用我的话说，就好像他们早就放弃了一切飞离这里的希望。

我决定紧盯着我这班飞机的乘客们，别让他们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我们都站在大厅中间，因为连靠墙的地方都被挤得满满的。

我们就这样站着！站着！

我们都这样站着，一直站着！

我身上穿着皮大衣（因为我要飞过北极圈），于是在这个人挤人、暖气烧得很热的、不透风的候机厅里，我开始热得浑身冒汗。脱下皮外套吗？把它放哪儿呢？我手里有提包，哪儿都没有挂衣架。我们这样站着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再这样站下去就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

不过不通风还能忍，可是汗津津是最糟糕的事。当然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在瑟克特夫卡尔机场还得站多久？再站一个小时？一昼夜？下半辈子？还有，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飞到沃尔库塔吗？我们还会往沃尔库塔飞吗？如果飞，那该是何时？是否还有机会脱去皮外套，在哪里坐一会儿，喝口茶？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了看身边站着的人们。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盯着前面。就是这样，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盯着前面。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他们有一丁点儿的不耐烦，也没有一丁点儿的烦躁不安和怨恨。重要的是，他们什么也不问，不问任何人、任何事。他们什么也不问，或许他们知道什么？

我问其中一个人，他是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起飞。在这里如果你突然向谁提问，那就得有点儿耐心等着回答。可以从被问的人的面部表情看出，在这个刺激（提问题）的影响下，他才如梦初醒，挪动了一下身体，开始起程，历尽千辛万苦从另一个星球来到地球。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随后他的脸上闪过了轻微的，甚至带有逗乐的惊讶的表情——傻瓜，你问这个干吗？

毫无疑问，被问的人把向他提问的人称为傻瓜是绝对有理由的。因为经验会告诉他，提这样的问题毫无用处，不管怎样，一个人因为提问

题跟不提问题所得知的东西是一样多的，不论他们会告诉他什么（或者他们根本什么也不说），但是提问题会适得其反，因为提问题是有危险的，提问题的人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幸。

事实上我们距斯大林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特别是那时的教训、传统和习惯仍然留存至今，刻在人们的意识里，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人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朋好友等）就是因为在开会时，甚至在私下谈话中问这问那，而被遣送到了劳改营？又有多少人为此失去了他们的乌纱帽？有多少人为此失去了工作？又有多少人为此断送了性命？

多年来，在整个官僚和警察机构中一直有一个完备的监督和私下打小报告的体制，这一体制就是为了一件事而建的，那就是：有谁提问题了？问了什么？把提问人的姓名报上来。

开会前两位亲密朋友谈话：

——你知道吗，我想在会上提个问题。

——我希望你别这样做，他们会把你关起来！

或者另外两位朋友这样谈话：

——费迪亚，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说吧。

——我发现，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想毁掉自己吗？理智点，控制点情绪，不要再提问题了！

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瓦西里·格罗斯曼[10]）有一个描写一个人从劳改营回到家的场景。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遭受了十年的煎熬。回

到家后的第一个晚上，跟妻子、孩子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餐桌旁。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也许大家都在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人会问这个人，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干了什么，都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要问呢？

《圣经·传道书》里有一句非常智慧的话：“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阐述这一痛苦思想时说（我只是凭着记忆引用），无知并非单纯和被动地缺乏知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拒绝接受知识，不愿意走进拥有知识的大门，就是对知识的拒绝。一句话：无知就是反知识。

我觉得，问题的范围是如此广泛，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这在过去不仅是禁区，而且是敌人，是谈话中遭人恨的一部分，因此，在苏联的实践中提问题的垄断权是掌握在审问的警察手中的。有一次我乘火车从敖德萨（Odessa）去基希讷乌（Kisztyniow）[11]，我和同车厢的邻座聊天。他来自德涅斯特集体农庄。我问起他的工作、家庭和收入等问题。我问的问题越多，他对我的怀疑就越大，最后他怀疑地看着我并不满意地对我说：你想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之后就不再跟我交谈了。

是啊！如果是审讯，这是正常的，审讯的人是可以这样做的，审讯是干什么，就是要问问题嘛。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想干什么？这个乘火车从敖德萨去基希讷乌的人想干什么？

“我在这里问你问题呢！”一个叫历万诺夫的审讯官厉声对惶恐的无辜被抓的埃乌盖尼亚·金斯布尔格大叫道（摘自埃乌盖尼亚·金斯布尔格的《陡墙》）。是啊，只有他——审讯官——才有权提问题。

众所周知，审讯官提的问题并不是学院式的客观问题，学院式的问

题是很难的，甚至很奇妙，为的是揭开人类生存的未知秘密。而审讯官提的问题中隐藏着致命的打击，他们提问题，是为了打垮你，把你踏在脚下，彻底摧毁你。借用词典中在战争、前线、战场、死亡才使用的“交叉火力”这个词来形容“审问”并不是偶然的。

结果在帝国中，提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能提的问题也越来越少。因为提问题时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形式是审讯者专用的形式，也就是说，是独裁机构专用的形式，连提问的句子的语气都显示出提问者想知道什么，这就是一种危险信号，也就可能预示着被提问者将要遭遇悲惨命运。

因此提问题的技巧逐渐在消泯（因为这是技巧！请看，罗曼·英加登关于“关键的提问”的科学论述），甚至对提问题本身的需求也消泯了。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原本就该如此的样子。无可置疑和无可改变的现实大胜告捷。既然是这样，那就自然没什么问题可提问了。

在这一基础上就出现了无数用于表达赞同意见的格言、口号和词语，其实这就是无动于衷、缺乏活力、点头称是、屈膝求和。

哎，就这样吧！一切都是可能的！算啦，算啦！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总不能去咒骂全世界吧！看着吧，生活会告诉你一切！头儿们比你更清楚！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可能更好！屈从才能得到你所求的东西！现实点儿吧，很多事情是无法做到的！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简直太多了！

但是一个没有问题可提的文明，一个——抛开所有问题闭口不谈——抹杀焦虑、批评和追求的文明，只能是一个止步不前的文明，是一个丧失能力的文明、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文明。这也正是克里姆林宫的意图，因为最容易统治的是一个静止不动和聋哑的世界。

在瑟克特夫卡尔机场待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飞往沃尔库塔（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停留，真是经历了一次绝望的、令人身心疲惫的等待）。晚上飞这条路线真是一次艺术之旅。当飞机飞到几千米的高度时，突然进入了一个拉着幕布的宏伟的宇宙剧院，我们看不见被淹没在黑暗大地上的舞台。我们只能看见挂在天际闪闪发光的舞台纱幕。这是绵软轻柔的纱幕，在黄绿相间的背影里，高达数百千米。

这些纱幕放射出跳跃和明晃晃的光。

飞机好像迷失在这些明亮闪光的幕帘之中，像迷了路一样，失去了方向感，开始忐忑不安地在萦绕于天空里色彩斑斓和波纹褶皱的布料中。绿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郁郁葱葱的绿地！“绿色与蓝色在半明半暗之中颜色会显得更强”——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在自己的《论绘画》一书中所说的一句话。当然，在黑色、在漆黑色、在黑洞洞的天空的背景里，绿色失去了自己天然的安宁与平衡，呈现出的反而是十分沉重、盛气凌人的色调，而其他颜色在绿色的比照下全都黯然失色，退到了一边。

当北极光的奇观突然消失，融进黑暗之中时，我们已经到了机场上空。

气温在零下35摄氏度。我顿时感到寒气逼人，立即有种冰雪刺骨透心凉的感觉，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发抖。所有人纷纷离开了这里。这个小小的候机楼前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空无一人的广场，晦暗的灯光。我该干什么？我知道，在这冰寒地冻的地方我支撑不了多久。在楼里有一个民警岗哨。裹着厚厚的皮大衣的民警对我说，马上会有一辆机场巴士来，我可以乘机场巴士进城，去饭店。这里只有一个饭店，很容易找到。

这辆机场巴士又小又旧，车里的人拥拥簇簇，拥挤不堪。人们个个

都用羊皮大衣、毛皮、围巾、毛毡把自己遮盖得、裹得、蒙罩得严严实实，每个人都像一个大大的、僵硬的、静止不动的重茧。每当汽车刹车时，这些重茧就会猛然往前倾，汽车突然开动时，这些重茧又都往后倾。每到一站就有几个重茧消失在黑暗之中，在他们的位置上又来了其他重茧（也就是说，我们猜测那是别的重茧，因为所有的重茧看上去全都一样）。有时候会有某种东西重重地踩在我们的脚上，让我们觉得，骨头都要被踩裂了，这是小小的重茧在往车门口挪。问饭店在哪里，得冲着重茧的上半身发问，也就是像对着麦克风说话那样，对着我们前面那个明显的球形物体说话。还得竖起耳朵听，因为回答声不是朝着我们，而是对着重茧发出声音的方向。这种旅行的缺陷是，你身边可能坐着一位漂亮姑娘，但你却一无所知，因为根本看不到人脸。当然也看不见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因为所有的车窗都被厚厚的浓霜和富贵荣华的白色花朵遮盖着。我在这些重茧中间逗留的时间不太长，因为在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离饭店不远的地方。当车门砰地打开之后，重茧们友好地往两边错了错身，让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可以从汽车里挤出去，下车，消失在黑暗和严寒之中。

无论是卢浮宫还是卢瓦尔（Loire）[12]城堡都无法像“沃尔库塔”旅馆阴暗和简陋的内部那样给人留下如此美好而又难忘的印象。这里实施的仍是古老的相对永恒的法则。从巴黎到卢浮宫没有那种从人间到天堂的转变，但是从马路进入沃尔库塔旅馆的大厅有这种转变。大厅能救我们的命，因为那里很暖和，而温暖则是这个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我拿到了钥匙，奔进自己的房间。我刚迈进门，就立即跑了出来，因为不仅房间的窗户大敞四开，而且窗框上还裹着又厚又大的冰块，没有任何办法关上窗户。我带着这个悲哀的消息跑到了旅馆清洁工那里，她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们这里的窗户都是这样，她安慰我说，她不想让我生气。你有什么办法，生活就是这样，“沃尔库塔”的旅馆就是这样。

过去列宁的问题是（甚至也许可以追溯到多布罗鲁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期）——怎么办？我们商量了很久，最后我发现，如果我不伸手掏出我珍贵的存货，纽约制造的古龙香水，她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的。果真她有办法了，既简单又实际。清洁工消失了一会儿，然后从黑暗的走廊里冒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斧子，仿佛印第安首领在与洋基人[13]交战后，挥舞着自己的钺刀凯旋一般。

我们开始行动。这样的工作让瑞士的钟表匠都会感到敬佩。我说的是，在敲掉窗框上巨大的厚冰块的时候，不会碰坏玻璃。如果我们打碎了玻璃，那就白费功夫了，清扫工对我说，如果玻璃坏了，只能在夏天才能安装上，也就是在半年以后，那时我早就不在这里了。那到夏天之前没有玻璃怎么办？那就只能忍受了！清洁工耸耸肩膀，叹气道。这样干了好久，我们砸出了一个长方形冰槽，冰槽的深度正好够我们把床底下的一块为了这个用途而放着的板子拿出来，勉强关上了窗户。为了安慰我，清扫工还给我拿来了一个盛着热水的锅，从锅里冒出的热气还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温暖一下房间。

我身上带着我想见的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另一头发出了一阵杂音。“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吗？”我问。又是一阵杂音，然后听见“我是”！我很高兴，他也很高兴，他知道我要来，一直在等我。他说，你坐公共汽车来我这里吧！我犹豫了一下，现在可是半夜呀，但是又突然意识到，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这里是永夜。于是我说，我这就出门。

我说，我这就出门，根本没想到我这是要走向死亡。

沃尔库塔的问题、悲剧和恐怖都与苏联开发煤矿有关。沃尔库塔是科米（Komia）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位于北极圈内。

20世纪20年代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煤矿资源，很快就建了很多矿井，

矿井主要是靠那些囚犯、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手工开采出来的。在那里共有数十个劳改营。不久沃尔库塔继马加丹之后，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即一个引起恐惧和悚惧的名字，一个阴森可怕和经常有去无回的放逐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劳改营的统治、在矿井里的非人的劳动、成批囚犯因饥饿而死亡、难以忍受的严寒都是造成这种恐怖的原因。这里的酷寒让那些毫无能力御寒的人、衣不蔽体常年忍饥挨饿的人、精疲力竭和随时都会受到令人发指的残酷凌辱的那些囚犯心惊胆战而备受煎熬。

如今沃尔库塔仍然是一座煤矿之城。这里有十三座煤矿，分布在城市四周，在每座煤矿附近都有煤矿工人居住区，有的居住区是过去的劳改营，那里还住着人。有一条环路连接着居民区和煤矿，在这条环路上有两条公共汽车线路，每条线路的公共汽车都相对行驶，因为小轿车在这里仍是稀罕物，公共汽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就这样坐上公共汽车去找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我只知道要打听共青团博西奥莱克（Komsomolskij Posiołek）大街6号。一个钟头以后，司机在共青团博西奥莱克大街停下车，开了车门，给我指了指我要去的方向，但是他指的方向是那么不清楚，好像是我要走向银河系中数百万颗星星中的一颗。不过我马上又觉得，他指的方向不清楚也无所谓，因为我一下车，就迷失了方向，不知自己在哪里。

首先我就意识到，我站在一个四周一片漆黑的地方，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当我的眼睛开始适应了黑暗之后，我看见我周围是高高的雪山，在这些高山的山顶上刮着一阵强过一阵的大风，大风卷走大片云状似的雪，看起来好像在山顶上一次又一次地喷发出白色的岩浆。到处都是雪山，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一个人影。严寒这么吓人，我都无法深呼吸，因为深呼吸会让肺部感到刺痛。

自我保护的本能应该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不要离

开汽车站，等着下辆公共汽车的到来，肯定得有下辆车到这个地方（尽管已经是午夜时分）。但是本能辜负了我，在某种可怕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可以说是欠考虑，我踏上了寻找6号房子的路。我的这种欠考虑，是因为根本没想到，在北极圈的夜晚，在冰天雪地的荒漠，冰冷刺骨、令人窒息，在简直让我无法喘气的严寒里去找路意味着什么。

我往前走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办。我选择了一座山作为我的目标，但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一脚踏进深深的白雪，马上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感到越来越虚弱，就在这时大山消失了。这里雪虐风饕，这是北极圈极险恶的暴风雪，把雪山从一个地方刮到另一个地方，改变了雪山的位置和组合，改变了整个风景。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能让我盯住看一下，也没有任何可定位的点。

突然我看见在我脚下有个低洼，下面是个木头平房。我连滚带爬地下到了那个积冰的山坡下面，但这里是个上了好几道锁的商店，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安静、很舒适，我真想留在这个地方，但此时我想起了所有极地探险家们的忠告，他们说，在白雪皑皑的荒漠上如果有这样温暖的井坑，那就等于是葬身之所。

所以我又费劲地爬了上来，继续前行。但我要去哪儿呢？去哪里呢？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因为雪打在脸上，遮住了眼睛。我的意识告诉我，我必须走，如果我倒在这里，就会丧命。恐惧，害怕被某种可怕的力量猎杀的人的那种动物本能的恐惧，这种可怕的力量既无法查考，也无法反抗，这种可怕的感觉推着人，让人越来越衰弱，越来越麻痹，直至推进白色的深渊。

我几乎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但时不时还得鼓足劲再走几步，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位顶着狂风、低头弓背的瘦弱女子的身影。我连忙走上前去，气喘吁吁地说：6号房子。我又重复说：6号房子。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仿佛我的整个性命就锁定在这个地址里。

“你方向走反了，男人，”她用压住风声的大嗓门对我说，“你现在是往矿井的方向走，你应该往那个方向……哦，就是那边。”就跟公共汽车司机那样，她用手指着由银河系组成的数百万颗星星当中的一颗。

“不过我也往那个方向走，”她说，“跟我来，我指给你在哪里。”

走进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住的房子，跟走进这个居民区的其他房子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远处看见雪山，我们便可以猜想，在雪山里、雪山下都有房屋。但必须爬到山顶去。在我们的下面，能看见一个平房的屋顶。从山顶挖出了一道通往门的冰雪台阶。我们战战兢兢地，带着极大的恐惧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在那儿，在居民们的帮助下，在与雪的搏斗中，我们终于打开了一道仅够一个人钻进去的门缝。

每一个新人来到这里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所有的住户都出来欢迎客人（这里只有几户人家）。每个人都请你去他家坐坐，哪怕进去坐一会儿也好。

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是一位矿工，今年50周岁，已经退休。在极地条件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能这么早退休是矿工享有的特权之一。这种所谓的特权也是很受质疑的，因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工能活到50岁。他的胸部因为浮肿显得很大。每当他说话时，声音很嘶哑，而且发出呼呼声——他患有严重的尘肺病。他来这里工作时，刚满16岁。是被遣送到了劳动营吗？不是。当时在他的那个库尔斯基集体农庄发生了大饥荒。有一个人对他说：你想有饭吃吗？那就去沃尔库塔吧，那里可能有吃的。果真是这样，他能买到面包，有时候还能买到一块肉，现在不如从前了，唯一能买到的就是硬邦邦像石头的驯鹿肉。可惜牙齿呀！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说着，还笑着指了指自己的牙齿。他的部分牙齿是金牙，部分是银的。在这里牙齿的颜色是很重要的，表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越高的人，金牙就越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就只有镶银牙了。社会地位最低的人镶的是塑料牙，颜色和表面看上去似天然牙

齿。我非常好奇，想问，斯大林的牙齿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谁也不知道，因为斯大林从来不笑。

我问他关于一路上看见的那些棚屋，他解释说那些都是以前的劳改营。但是我看见窗子里还有灯光呢！他说，是的，因为那里面还住着人。劳改营被关掉了，没有判决，没有岗哨，没有酷刑，很多以前劳改营里的人都走了，但是还留了一部分人，他们无处可去，因为他们没有家眷、没有熟人，这里就成了他们遮风避雨的地方，在这里有工作，有同事。沃尔库塔是他们在人世间唯一的可供藏身之处。

对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来说，劳改营与劳改营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明显。这并不是在奴隶与自由之间的界限，而是涉及不同程度的奴役问题。有人说，他是自愿来到沃尔库塔的。真的是自愿吗？他来到沃尔库塔是因为被家乡的饥荒赶出来的！或者有人会说，他可以随时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去哪儿？他去住哪儿？靠什么养活自己？盖奈迪伊·尼科瓦耶维奇非常赞同那位在1934年逃到西方的伊凡·索罗涅维奇[14]的说法：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劳改营。

他知道我是为矿工们的大罢工来这里的。他们矿的罢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别的矿井工人们的罢工还在继续。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那个矿井。我们陷入了黑暗重重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卷进冰冷的暴风雪之中。为了不让风把我们刮散，刮倒，我们所有人紧紧拉着彼此的手。

在沃尔库塔，我第一次体会到，寒冷不仅仅是寒气凛冽，寒风刺骨，而且是让你有某种浑身刺痛的感觉。这种疼痛使人感觉到头疼欲裂，手脚疼得根本不能碰一下。

在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中隐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影，这些人影模糊不清、弯腰驼背，佝偻着的身体蜷缩成一团。

这是第二班下井工人，盖纳迪伊·尼科瓦耶维奇气喘吁吁地在我耳边大声说，第二班下井工人要下班回家了。

我们身旁的这些人有数月的时间没有见过阳光了。他们天黑时下矿，而矿井下也是漆黑一团，等他们下班回家时，到处也是一片黑暗。他们就像潜艇里的船员，只有手表和不断增长的疲惫感、饥饿感和困倦感能告诉他们时间的流逝。

“共青团”矿井里四周是冷冰冰的墙壁、昏暗的灯光，脚下是黑色潮湿的泥泞。妇女们负责分配手推车、某种撬棍、用于支撑的东西和传动杆等。你想跟她们聊聊吗？盖纳迪伊·尼科瓦耶维奇问我。但是能聊什么呢？天气这么冷又这么阴暗，这么悲凉。而这些妇女个个都在忙碌着，干着笨重活儿，神情疲惫，也许有什么事让她们发愁，让她们痛苦。还是让我尊重她们一些吧，至少以此种办法让她们轻松一下吧，我也别去问她们什么了，别给她们增加什么额外负担了，尽管回答些常规问题对她们来说可能也只是蝇头小事。

在家里已经有两位矿工在等我了，一个叫叶甫盖尼伊·阿莱克谢耶维奇，一个叫米哈伊乌·米哈伊沃维奇。他们带我去“瓦尔噶索夫斯卡”（Wargaszowska）矿井，那里还在罢工，还在开会，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米哈伊乌身材瘦削，高个子，黑头发，不停地走动，激愤不已、气势汹汹的，因为他的矿井（就是刚才我去过的那个矿井）停止了罢工。之所以停止了罢工，就是因为矿长许愿说，将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供应。这个民族干不了大事，米哈伊乌沮丧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吃最重要——就知道吃！吃！吃！他发疯地叫着，吃！吃！吃！他这种暗示性的吼叫，让人开始流出口水来了。饥饿，让我们无法忍受，这就是我们愤怒的原因。

很明显，他想让我明白，是他——米哈伊乌，与众不同，是高贵材料制成的人。他自豪地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本1900年出版的、非

常漂亮的厚厚的精装书《圣经读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宝物，他看着我，看我是否会为此感到惊奇和激动。然后打开这本厚厚的书，顺手翻了翻，正好翻到一页，然后就开始大声读起来：

而你在收割小麦、大麦、蚕豆、扁豆、荞麦和野豌豆，然后你把它们放入一个器皿，开始自己制作面包……

他感到奇怪，停了下来，而且非常生气地说，连有关《圣经》的书也竟然谈什么吃的问题！

你还在读什么？后来我问他。他在读沃韦纳尔盖（Vauvenargues）侯爵的书，他拿给我一本1988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绿色封皮的书。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他说的是这位18世纪法国思想家的箴言集。“奴隶制度是如此贬损人，但它们会让你迷上它。”真是至理名言呀！他点了点头。这位法国人还在其他场合说过：“刁钻狡黠不会让我们获利更多。”我不能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在我们这里刁钻狡黠能让人收获一切。

邻居们陆陆续续都来了，米哈伊乌的房间变得十分拥挤。叶甫盖尼伊·阿莱克谢耶维奇打开放在五斗橱上面的彩色电视机，这个硕大的、深樱桃木色的大盒子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仿佛马上就会勃然大怒。现在是迪纳摩队对斯巴达队的比赛，叶甫盖尼伊·阿莱克谢耶维奇小声给我解释说，因为别的人早就知道了。

盯着电视荧屏看，看不清楚上面有什么图像，只能看见在凸起的玻璃上有上千个色彩斑斓的火花和曲线在荧屏上乱闪。电视机已经坏了，但是如果这样的机器在共青城这个地方坏了的话，就没有任何办法修理了。

我从未见到过这种事儿。几十个人紧盯着火花四射的荧屏，那火花

犹如有人往篝火里投入了干柴四处乱溅。斑斑点点的光点和弯弯曲曲的线条像幽灵和流动的海市蜃楼那样在跳跃、闪耀、闪烁。这是多么富有的囊萤之光啊，好一个不知疲倦和痴情的哑剧演员呀。所有的这些闪烁跳跃让人眼花缭乱、不合逻辑也毫无道理。其实有一个完美的程序在掌控着这种彩色光粒的游离、不停的跳跃和闪电般的变换方向。荧屏的左边突然开始闪动红色的光点，红色在那里搏动、起伏、肆虐，此时房间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哇哇哇！迪纳摩队进球了！你怎么知道进球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问叶甫盖尼伊·阿莱克谢耶维奇，更何况电视机根本没有任何声音。这还不清楚？他诧异地说，迪纳摩队穿的是红色球衣！过了一会儿，在荧屏的另一角上出现了一团浓浓的蓝色（斯巴达队的球衣），只听房间里又有人大喊，踢平局了！（跟那些迪纳摩队的粉丝一样喊着。）在中场休息时这些火花平静了下来，甚至静止不动了，均匀地平铺在整个屏幕上，伺机再次返回屏幕并继续搏动，但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必须得去开会了。

在冰天雪地的黑暗的映衬下，可以看到“瓦尔噶索夫斯卡”矿的灯光，它比沃尔库塔的“统一煤矿”更往北，离喀拉海（Kara Sea）180公里。

我套上矿工们穿的厚厚的棉工作服，把脸藏在一顶大大的用驯鹿皮做的毛皮帽里通过了岗哨，后来就没有人再问我要通行证或者身份证，甚至有人还很友善地给我指礼堂在哪里。那是一个标准的礼堂，里面有列宁的石膏像，有写着“共产主义必胜”的横幅和主席台上铺着红布的长桌。

礼堂可容纳约三百人，已经座无虚席。这里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但也有某种不安的气氛：经验告诉大家，跟政府是不能开玩笑的。可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已经宣布了新思维，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会议一开始显得混乱、骚动、无序。谁来主持这个会议呢？谁有权指定什么人发言呢？谁有权来决定先让高个子发言，然后再让矮个子发言，是让礼堂后面的人先发言，还是让那位礼堂左边的急不可耐的妇女发言？归根到底，我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我们宣布罢工是为了什么？

非常明显这里缺乏领导者。时不时有人出来试着指挥这些聚会者。科兹洛夫！就让科兹洛夫主持吧！科兹洛夫紧张地思考着，扭动着身子，结结巴巴地说着，他无法决定让谁先说，是让那个问他们什么时候能给五号仓库装上玻璃的人先说呢，还是让那个冲着全场大叫的人先说呢，因为他在那里喊着我们什么时候能出齐列宁全集呢？彼德罗夫！有些人对科兹洛夫的表现不满意而大叫着。让给彼德罗夫主持会议！但是彼德罗夫也是结结巴巴地说着。彼德罗夫也是一头大汗，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礼堂里的人称心如意。

最后还是找到了出路。当然，大家知道是怎样的出路。因为矿井领导来到了礼堂，矿工们正好拉出了两条横幅，上面写着“打倒官僚主义！”“推翻一党专制！”（就是这样，官僚主义的第一个字母b用的是小写，一党专制的第一个字母P用了大写）。罢工者感到惊惶，而不是矿领导。矿领导们面带讥笑，好像要说，你们想打倒我们！哼，打倒，打倒我们，没有我们你们寸步难行，什么也干不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理在矿领导们这一边。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这里更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至少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时代。改变的只是阶级的叫法，但是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不对称和从属身份毫无改变。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人们都认为，怎样组织和主持会议早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这毋庸置疑！矿长已进入礼堂，就站在主席台前，动作是如此自然自如，如此胸有成竹、充满信心，就像理查德·施特劳斯和阿图罗·托斯卡

尼尼那样潇洒自如地站在指挥台上。

礼堂里一片寂静。

有谁想发言？矿长问。有几只手举了起来。矿长确定了发言的顺序，如果有人想插话，就用严厉的眼光惩罚他或者让他安静。而首先发言的则是矿长自己。

“会议已经持续了五个小时，”他说，“结果怎么样？”

礼堂里众人声：毫无结果。

“是啊，”矿长假装很担心地说，“是啊，毫无结果。而我已经解决了矿井的问题。是的，已经解决了！我昨天从莫斯科回来。”（这里得强调一下，如果有人去过莫斯科，那这个人的身份立即就提升了好几级。）

他突然停下不说话，环视着寂静的礼堂，过了一会儿他又激越高亢地说：“我们，我们自己将向英国和美国直接出口我们的煤，不再需要通过莫斯科了！我们自己直接出口我们‘瓦尔噶索夫斯卡’的煤！”

礼堂里沸腾起来了，喧哗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意味着什么，出口到美国？就是说，我们要有美元了？美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切，实实在在的一切！

我看见这些冻得发僵的可怜的人们，这些人成年累月见不到阳光，可这个昨天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竟然这样愚弄他们、戏弄和欺骗他们。我觉得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也不能站起来大叫：人们啊，请不要相信他！因为我不能，也不想剥夺他们那点激情，即想让“瓦尔噶索夫斯卡”的煤出口到英国和美国的想法。

大家表决结束罢工，之后米哈伊乌开着一辆残破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但是速度非常快，送我回旅店。这段路程有30公里，马路上到处都是光滑的厚冰，可米哈伊乌却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疾驰。这条路是如此不安全，在路上如果碰到什么石块，就会发生惨重的车祸。因此在这种路上，以这样的速度，一块小石头就意味着死亡。看着前方的路，我在想，啊哈，世界最后的图像在你眼里就是这样——这片黑暗、这些车前大灯的光和在我们面前像刀刃般闪闪发光的凹凸不平的结冰道路，随时会让我们瞬间粉身碎骨。

我来到沃尔库塔，为的是了解罢工的情况，但我也是来朝圣的，因为沃尔库塔是个殉道之地，有数十万人死于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里。到底死了多少人？无人能算清楚。第一批劳改犯是在1932年被遣送到这里的，1959年最后一批劳改犯被释放。最多的人死于修建铁道的工程中，也就是今天从此地向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圣彼得堡运煤的铁路。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察在这条铁路修筑时说过：缺少枕木吗？没关系！你们就可以用来当枕木！

事实确实如此，这是一条今天肉眼已经看不到的延伸出数百公里墓地的铁路。只有那些亲身去体验北极圈苔原的人（每年也许只有两三个月这里没有雪）可以在这里或者那里发现很多已经腐烂的木桩，上面钉着一块小木板，譬如，如果小木板上写着A81，那就意味着这地方埋着一千人。这些A52、A81是劳改营管理者必不可少的统计代号：记录被杀害和已故者的数字，以减少分配面包的数量。

在这里的人不是被某种特殊武器杀害的，而全都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手制造的虐待和监控。

这里，在北极，对劳改犯来说最大的敌人（除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外）就是严寒：

可怕的、非人的奴役般的劳动。在炽烈的火焰中，在北极圈的夜晚里，有成百上千的人跟在铲雪机后面用铁锨将积雪从铁轨旁往远处抛。只要意识还清醒，还有一丝体力就要不停地动，以便能坚持下去、活下去。但是每天总有几个或者几十个身躯蜷缩在破衣烂衫里的人团在火堆旁，他们缩成一团在欢快跳跃的火花四溅的有限温暖中一动不动地待着。他们早已经是活着的尸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这些人的健康和生命。他们一方面在火焰的余烬旁烤着火，被正在燃烧着的树枝冒出的刺鼻的烟味熏着，另一方面身体又受到零下几十度严寒的侵袭。任何肌体都无法承受来自身体内部发生的这种温度的变化。脸、手、胸部和腹部的血管是热的，而心脏的血液循环却非常微弱，几乎使人体处于蛰伏中。在人体内发生着什么，但他自己却无法确定，困倦、恶心交织在身体中，身体被异乎寻常的寒冷啃噬着。因此他靠火越来越近，几乎爬到了火堆里。如此在火旁坐了几个小时后，就只能变成尸体或者是一个束手待毙的人。没有任何力量可让这些人离开火堆一步。无论是采取怎样的暴力和毒打，无论怎样试图按摩僵硬的肌肉和恢复血液循环都无济于事。等到用力把他们从火堆旁拉开时，他们就像雪中的木块纹丝不动。每天都有几具或者几十具僵硬的尸体被抬回集中营里去的。（摘自马莱克·比莱维奇的《我逃出黑暗》）。

我在漆黑的、冰雪覆盖的沃尔库塔四周转了转。只要走到主要大街的尽头就能看到伫立在地平线上的那些长方形的平顶建筑，那些就是旧劳改营的营房。而这两位在公交站等车的老妇人哪位曾被关进劳改营，哪位曾当过劳改营的监管员？如今年纪和贫穷扯平了她们，不久后冰封的大地会让她们最终永久地和解。我费力地走在雪堆中，穿过千篇一律的街道和房屋，也不大清楚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我眼前一直闪着尼古拉·费奥多罗夫（Mikołaj Fiodorow）[15]的身影。

费奥多罗夫是哲学家，也是空想家，很多俄罗斯人把他奉为圣人。他一生穷困潦倒，在俄罗斯寒冷的气候里他甚至连一件外套都没有。他

曾在莫斯科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睡在硬邦邦的箱子上，以书代枕。他生于1828年，死于1903年。他只靠步行。他死于严寒，因为他乘雪橇外出，有人告诫他，让他穿上皮大衣。结果第二天他肺部发炎去世了。费奥多罗夫认为，追求名誉和声望是厚颜无耻的表现，因此他用笔名发表作品，但时常是写了根本就没有发表。这位大师过世之后，他的两位学生收集整理了费奥多罗夫的所有作品，出版了《共因哲学》，印了480本，免费赠送给了人们。

费奥多罗夫认为，坚信生命不朽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来自复活的信念。

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他就潜心研究如何让死人复生。他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时候死的都能再生。他相信，这是可能的。他说，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人能掌握自然的力量。自然的力量只要是盲从的和不受约束的，那就是危险的、反人类的。为了不受这种因素的妨碍，人自身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的表现就是人们之间的互相敌对，就是战争、互相残杀。如果我们注重发展科学，并去治理大自然，那么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则会消失，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这样就会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友谊和博爱的王国。因此科学可以让所有的死人复生，因为人类就是一个大家庭，不能让人生死相隔。只有战胜了死亡，如果能让被死亡夺走生命的人全部复活，人类将赢得真正的胜利。

但是让沃尔库塔亡灵复活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就是满大街跑着一群群被士兵驱赶的穷人吗？到处是一群群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人吗？让瘦骨嶙峋的人们列队行军吗？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幻想着让所有人复生，但他们拥有的该是怎样的人生呢？

我注意到在某一条街上有一个木屋。一位皮肤黝黑的阿塞拜疆人在叫卖这个地方唯一可买到的一种花——红色的康乃馨。我对他说，给我

挑一束你手里最漂亮的花。他给我挑了一把康乃馨，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我想把这束花摆放在什么地方，但又不知道放在哪里。我想把它们放在某处雪堆上，但到处都是人，可我又觉得，可能不大好。我又往远处走了一点，但在那条街上也一样，到处都是人。此时手中的花开始冻冰了，开始变硬。于是我想找一个空院子，可到处是孩子们在玩耍，我担心他们发现这些康乃馨后会拿走扔掉。我就这样在大街小巷里转着，手里的花束变得像玻璃那样越来越硬，越来越脆。最后我走到城外的一个地方，这里很安静，于是我就把这束花放在了雪堆之间。

明日，巴什基尔人的反抗

我从沃尔库塔回到了莫斯科，让自己暖和一下，同时也想了解了解最高权力阶层有什么新动向。

首先是在帝国的最高权力阶层。

因为在像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叫独立国家联合体，明天呢？）这样的国家里，存在这样一个阶层的人，他们不仅考虑帝国范围的事情，同时也考虑世界范围的事情。但在这种人面前有些问题是不能提的，譬如：沃尔库塔怎样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甚至他们会感到奇怪，沃尔库塔怎么样，这问题有何意义吗？帝国不会因为那儿发生了什么而瓦解。

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既要保证帝国的稳定和发展，不管它现在的国名是什么（甚至假如它现在瓦解了，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让它重新站起来）。

在世界上的一些中小国家里，没有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与其相对应的阶层。在这些国家里的精英们都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忙于玩弄自己地区的权术和自己封闭的后院之事。但在帝国的统治阶层（常常还包括其民众在内）他们思考的范围完全不同，他们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帝国范围的事情，而是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的事情，他们要思考更大的数字、更大的空间、所有的大洲与海洋的事情，包括地理概念上的经纬线以及大气层和平流层的问题，就是说要考虑整个宇宙的问题！

西欧人对（电视里播放的）莫斯科贫穷年迈的妇女走出买面包的队列，放弃买面包而是走到大街上振臂高呼“我们坚决不归还千岛群岛”这样的现象感到吃惊。

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千岛群岛是帝国的一部分，而建造帝国是以这些妇女缺吃少穿、穿破洞的鞋子和住冰窖般住房的代价换来的，更悲哀的是，是用她们丈夫和儿子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现在要归还它们？绝对不能归还！永远不能归还！

在俄罗斯人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和鲜活的共存亡的关系，超级大国的命运是俄罗斯人非常看重的东西，他们有深厚的大国情结，今天依然如此！

世界上有两种版本的世界地图。

一种是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广为传播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美洲大陆被世界两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包围，位于地图中心。苏联则被分割为两半，慎重地分布在地图的两端，以便不让那宽阔的面积吓坏美国的孩子。但是莫斯科地理学会印制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苏联位于地图的正中间，其面积如此之大，所占的版面之大，几乎占据了人的整个视野，反而美国则被分割成两半，慎重地分布在地图的两端，以便不会让俄罗斯的孩子去想：天呀！美国居然这么大！

为此这两张地图培育了几代人不同的世界观。

在帝国各地旅行期间，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使在那些被遗弃的和破败不堪的小镇里，即使在那些书架几乎空空如也的书店里都能买到这个国家的大地图，在这样的地图上，世界其他部分几乎都处于次要部位、边缘部位，处于阴暗处。

对俄罗斯人来说，这种地图是一种视觉上的补偿，是情感升华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无法掩饰的自豪的体现。

当然，这张地图也可以为一切不足、错误、贫穷和停滞给出一些解释和一些借口。于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个国家太大了，改革起来

太难了！国家太大了，清理起来难上加难！从布雷斯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所有领导都摊开双手这样说。国家太大了，要把货物运到所有的地方也是困难的！空荡荡的商店里的女售货员也如此抱怨。

于是，地域浩瀚就成了为一切事情开脱和掩饰一切的理由。当然，如果我们的国家小得像瑞士那样的话，我们的一切都会像钟表那样走得很准！你们看，那个荷兰多小呀，管好一个在地图上几乎看不到的国家这不算是什么本事！你们来看看我们这里，想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尽管你有良好的愿望，那也比登天还难！

在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在莫斯科走走看看，还没来得及进行几个重要采访和跟一些人进行交换情况的谈话，就有消息说，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乌法（Ufa）遭到严重污染。这种污染不仅是臭气熏天，往空气里排放废气等，而且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普遍的污染，那里污染严重，十分危险，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新的切尔诺贝利！刚才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同事这样评论道。

我说，马上去那里。如果能弄到票，明天就飞到那里去。

从莫斯科乘飞机飞往乌法的所有人都带着盛满水的瓶瓶罐罐和容器。乌法受到苯酚的污染。如果有谁喝了那里的水，不是病，就是死，我的同事如是说。

乌法是巴什基尔共和国的首府，位于乌拉尔山的西麓，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部毗邻西伯利亚，西部毗邻鞑靼斯坦。那里曾经风景美丽，森林覆盖着山脉，有六百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还有千湖区。那里曾经野兽成群，鸟类繁多，还有成群的来来往往辛勤采蜜的蜜蜂。后来建立了化工业，巴什基尔是苏联的化学工业中心，从此，烟霾遮盖了天空，空气中飘浮着粉尘，苯酚在河流里流淌。根据我在大百科全书中查

到的资料：苯酚是一种褐色、毒性极强的酸，是用于制作炸药、塑料、染料和数百种物品的不可或缺的原料。因为在这里建造化工厂根本没有任何标准，安装过滤器和处理污水都被认为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于是苯酚就渗进河水，悄悄地渗进河水里，为的是缓慢让人中毒，不致使城市因为污染而突然垮掉。

但眼前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人们打开水龙头，从里面流出的是褐色混沌的物质，人们觉得他们家里到处都弥漫着可怕的气味。苯酚！苯酚！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但是，人们并未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在这里人们能承受各种不幸，面对变幻无常的、无所畏惧的大自然的肆虐给他们带来的水灾、地震或者异常的酷寒，甚至面对由于那些掌权者的无知而造成的各种不幸，他们都能逆来顺受。因为掌权者的草率和野蛮行径造成这种人为的灾难，必须理解这一点，必须顺从。

街道上、广场上、在海边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长队。这是奇怪的队伍，因为这队伍并不是排进商店或者小卖部。人们排队在等送水车来，等着送水车把水送到这里来，但是水从哪里来，何时送来，能送来多少水，无人知道。

排队的人们默默地站在那里，秩序井然。孕妇们站在队列的最前边，这其中有某种等级的分别——当然肚子鼓得很明显的妇女都站在前边，其次是带着孩子的妇女站在其后，然后是那些独自一人前来的妇女（老年妇女优先）。在这些人之后站着的才是男性，但在他们那里就看不到任何特殊的分工和优先权。

当送水车来了之后，每个人都能打到自己想要的数量的水。但是这水能够用多长时间呢？一天？两天？以后怎么办？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个国家报刊、电台、电视讲述的尽是有头无尾的故事。在费尔干纳发生了战斗，有死有伤，城市陷入火海之中。结果第二天这个费尔干纳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法再得知，那儿的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库兹巴斯举行了大罢工！这是一个大事件，因为那是一个巨大的矿井。这次罢工是在两年前举行的，后来怎样了？罢工结束了吗？抑或是还在继续？

我漫步在乌法城里，走到了一个博物馆，我知道我在巴什基尔人的土地上，但是如今作为巴什基尔人又意味着什么呢？利姆·杨古金（Rim Yanguzin）博士把他最近在附近的山区、在旧定居点和在海边找到的东西拿给我看。这是巴什基尔人用的剑，这是巴什基尔人的项链，这是盛牛奶和水的泥罐，还有巴什基尔人在17世纪用过的船，还有他们的马匹佩戴过的马饰。我还看了木犁、腐烂的蜂窝和捕猎野兽用的陷阱。

这些都是巴什基尔人制作的东西，杨古金博士满怀自豪地告诉我。然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各种巴什基尔人的织品（包括所有部落的织品，那时共有31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装饰），还有巴什基尔人的钱币和戒指、剑和镰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上站队等着打水的人，远处是工厂高耸的烟囱。我听着杨古金博士给我讲，听他满怀激情地给我讲巴什基尔人的失乐园，此时我明显地感到，在这个城市其实存在两种现实，正在进入冲突和矛盾之中。

一种现实是化学、合成物和有机物、苯酚和炸药，这一现实世界的统治者是俄罗斯人，他们从属于莫斯科某个部的领导。

另一个现实就是巴什基尔人的民族意识的崛起（准确地说是复兴）。

因为如今正在开展一场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革命，在这种浪潮中我们将进入21世纪。也正是在此时此刻这股浪潮已经波及巴什基尔，撼动

着它敏感而又雄心勃勃的心灵。

巴什基尔约有百万人口。他们在当今世界应该占有什么位置，以什么形象出现？经历了三百年俄罗斯同化的统治，他们难道应该承认自己已经不是巴什基尔人了吗？这做不到！任何恐怖、任何迫害、任何劳改营都不可能根除巴什基尔人的精神特质。俄罗斯同化本身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即越来越少的巴什基尔人愿意学习俄文。因此要突出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感吗？那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一个这样被解放了的、有思想的、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有认知感的巴什基尔人在环视自己周围时，他能看到什么，说什么呢？

他首先会说，按照他的看法，从位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之间的巴什基尔的历史来看，现在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疆界只占过去的一半。过去的巴什基尔人有一部分并入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并入了鞑靼斯坦，而还有一部分被并入了独联体（即使当前的巴什基尔共和国仍是独联体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有认知感的巴什基尔人公开表示要摆脱这种状况的话，那他马上就三面树敌：鞑靼人、哈萨克斯坦人和俄罗斯人。事实是，民族主义无法存在于毫无冲突的状态中，也不可能在毫无主张和诉求的情况下作为自由体独立存在。只要某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哪里出现，那么这个民族的敌人就会像从地底下冒出来那样立即爆发冲突和战争。

与此同时，当有民族认同感的巴什基尔人在环视周遭时，他会说，他美丽的绿色家园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那里排出的废气正在污染空气。考虑到这些问题时，他还会想起，没有人问过他，要把他的国家变成一个化工厂，他是否同意。更有甚者，巴什基尔人意识到，他们从大规模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害的化工产品生产中没有得到丝毫的益处。因为帝国是不会给自己内部的殖民地支付任何报酬的。也就是说，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巴什基尔共和国处在怎样的被殖民的地位，因此扎根

于此地的“农业化工”和“化工制造”会令他想起建在卡塔尔的“联合矿业”或者建在毛里塔尼亚的“内燃机车厂”。

但是，当他得出这些难以承受的和革命的结论之后，他就会问，巴什基尔下一步该如何走？ 就像格列佛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千条线密密麻麻地死死缠住，动弹不得。能做什么呢？要求关闭工厂吗？难道不知道整个帝国将近一半的化工厂都在这里吗！骑上马进山吗？在那里又能干什么，怎么生活？

于是巴什基尔思想家的意识分裂了，陷入了矛盾之中。独立的渴望在他心中滋长，没有别的出路，难以压制这种渴望。他相信，自己坐在装有黄金的袋子上，却是个穷鬼。甚至在帝国大地图上他那渺小的祖国，也被淹没和消失在巨大的空间中。巴什基尔人想找到它，确定它的边界，用高高的栅栏把它围起来。帝国其他小国中蔓延的气氛也感染到了巴什基尔人，首先它想从帝国中分离出来，用万里长城那样的建筑物把自己隔离起来，仿佛每个其他部落的人的呼吸都会像苯酚那样毒化空气。因为在它被唤醒的雄心中，巴什基尔人不是孤立的。今天的帝国像一座湖的表面，湖水下火山正在酝酿着爆发，在平静、光滑的水面突然出现了水泡，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泡越冒越多，在这里，在那里，水开始沸腾了，在水的深处可以听到闷闷的杂音。

利姆·阿赫迈多夫（Rim Ahmedov）送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名为《关于湖、河、青草的词汇》，这本书于1990年在乌法出版。这里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解决“制度与我”的问题。有些人支持当局，有些人成了反对派，而更多的人选择了逍遥，离政治越远越好（也许前列宁格勒的一对研究动物学的夫妇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是猴子模仿）。

表面上，只是表面上大自然是这样的主题——避难所。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6]就成了描写大自然的大师。在没有

电视、彩色照片的时代，普里什文的散文无敌手，与秋天森林中的五颜六色、溪底卵石的颜色、蘑菇伞帽的颜色和鸟的羽毛的颜色一起发光闪耀。我认为，描述露水珠和黑樱桃花就是某种逃避和某种寡欲的规避。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俄罗斯的诗人嘎丽·卡尔尼沃娃。你说得不对！她反驳道。这是一部反抗的作品！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的语言，而普里什文的语言非常丰富、华丽。他们希望一切都是中性的、灰色的，而在他的笔下，俄罗斯是那么绚丽多彩、无与伦比！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过普里什文的书，为的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真正的语言，因为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新语言取代了。

利姆·阿赫迈多夫的散文与普里什文的散文有着非常相似的东西。利姆写的并非俄罗斯当局在化学、在塑料管、在水龙头和丹宁酸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反他却站在与巴什基尔人相反的立场上，描绘那些残存的自然，包括苏托洛卡河的鱼以及努尔塔乌高山的树木和通往杨堤-图尔木石农场乡间的小路。因此他乘船或者背着帐篷、带着狗周游自己的国家。

他最喜欢的植物是青草。阿赫迈多夫是一个草药专家，他采集各种草，晒干之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再加上点别的成分，制成草药。他告诉我，如果某种药可以治百病，那就不是好药，就不可能见效。每种草药的配制都因人而异，在跟患者交谈之后，单独配制。与患者的谈话是必不可少的，以便找到对症的草给他配制草药，激起他身体内的能量与病魔做斗争。反之是不可能治愈疾病的。

阿赫迈多夫记得最清楚的是小时候看见的那种金黄色的小甲虫，学名是叶甲科圆柱形叶甲虫。他曾在一片枯萎的荨麻叶片上发现了这个小甲虫。为什么说在枯萎的荨麻叶上呢？因为枯萎的荨麻叶手碰上去不会被刺痛。

如今他已经年过花甲，在那之后从未再发现过这么美的小甲虫。

俄罗斯的神秘

乌法是我的乌拉尔-西伯利亚之旅的第一站。路线是：莫斯科——乌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ierdłowsk）——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马加丹——诺里尔斯克（Norylsk）——莫斯科。行程总共（包括临时选择的地方探险）约2万公里，还要穿越天寒地冻的大雪漠。在一年当中的这个季节（那时是4月份）甚至这里的河床仍被绵延数百公里的冰块覆盖着。只有时不时能看到的城市，这些城市类似沙漠上的绿洲，都活在自己尘封的生活里，好像与外界没有任何关联和联系。

世界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高加索在燃烧，在亚洲地区的这些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血腥暴乱，德涅斯特河（Dniest）两岸战乱频仍。所有这些争端、摩擦和战争都是苏联遥远的外围地区之间的冲突，这些似乎都属于俄罗斯之外的事件，属于其主体之外的事件。

但是巴什基尔人民族意识的觉醒让我们了解了帝国内部不断增长的新的冲突形式。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得知：巴什基尔的居民排着长队等待得到一杯饮用水、杨古金与他的古剑收藏、利姆·阿赫迈多夫用当地的草配制的草药为人们治病，可就是这样的巴什基尔恰恰在俄罗斯联邦的肌体内。为此如今巴什基尔人（与其一起的其他非俄罗斯族的民众都生活在俄罗斯国家当中）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有自己的权利，要求独立。

一句话，在苏联解体后，俄联邦解体的前景出现在人们眼前，换句话说，在去苏联殖民化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便进入了第二个去俄联邦殖民化的阶段。

目前在俄联邦的领土上居住着几十个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和部落，他们越来越明显地采取与莫斯科对立的立场，并越来越强调自身利益的独立。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势不可当的速度在巴什基尔人和布里亚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楚瓦什人和科里亚克人、鞑靼人和摩尔多瓦人、雅库特人和图瓦人中间蓬勃发展。

冲突在升级。

这一冲突有扩大规模之趋势，其意义也在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在数个世纪以来饱受迫害，被压迫和强迫他们俄罗斯化，他们的人口和部落人口都在迅速增长，而纯种俄罗斯人口在最近几年里在俄联邦却呈下降趋势——俄罗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非常低。为此也能明显感觉到俄罗斯人也在开始为这些问题感到焦虑、不安和担心。

我在伊尔库茨克看见一张招贴画，上面写着，请大家来观看话剧《俄罗斯世界》。

于是我买了票，进去看。

这个话剧在一个东正教教堂里演出，以前这个地方是无神论博物馆。

关于东正教教堂：

矛盾的是，这是一个维护和保存得最好的东正教教堂，布尔什维克人曾把这里当成与宗教——与东正教仪式、与牧师、与教堂和与所有的一切——做斗争的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无神论博物馆，那里曾举办过很多展览，大肆宣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然后还配上了很多图片，图片下面的文字是：亚当和夏娃是童话中的人物、神职人员把妇女放在干柴上烧、教皇有很多情人、教堂是同性恋活动的场所。这些展览的内容全都由最高层领导审议确认，在过去的那几十年里，有数千万人从帝国的

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看展览，因为无神论博物馆是铁打不动的必看之地。

外国人在看了这个博物馆后，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之情，怎能把崇敬上帝之地变成反抗上帝之地呢！太荒唐了！试想一下，某一个东正教教堂被指定为扮演与上帝抗争的角色，即把教堂变成无神论博物馆！那不是当地的达官显贵的夫人们可以得到工作的好地方吗，她们就会很好地保护这里，因为这里很暖和，窗户上有玻璃，门能关得很严实，烧着壁炉。因此这个地方还能保持相对的整洁和干净，时不时会把墙刷得粉白，有人会时不时擦擦地板，因此教堂看上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且还不用被指派与上帝做斗争。可是别的教堂就不一样了，很多教堂被变成了马厩、牛棚、燃料库和仓库。在利沃夫附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方济各派的教堂就被变成了一个修理摩托车的作坊。无论是这个教堂或者是那些被变成了储存汽油和化肥的教堂都无法挽救了。当然那些在五六十年前、六七十年前就遭抢劫、遭破坏、被关闭、被寒冷和风雨侵蚀、变成老鼠和鸟类的窝巢的教堂也都无法挽救了。也许德罗霍贝奇的犹太大教堂还有可能得以挽救，因为它的屋顶非常坚固，而且只是被当作家具仓库，未受到任何化学腐蚀。如今有很多教堂，包括这个被昨日当成无神论博物馆的教堂（在最近几年时常把这个教堂的名字改成圣像博物馆）都已经修葺一新。

关于圣像：

这是一个奇怪而又放纵的野蛮人，然后又变成了冷酷而又有条理的野蛮人，这个野蛮人不仅拆除了教堂，把它变成了废墟，而且还毁坏了圣像。

有多少圣像成了他手下的牺牲品？

从1917年开始到最近二十年间一共有3000万圣像被毁。

这个数字是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在1990年的《莫斯科》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公布的。库兹涅佐夫披露了圣像的去处：

在军队里——作为射击的靶子；

在矿井里——作为积水隧道里工人走路时铺设的木板；

在市场里——作为制作装土豆的箱子的板条；

在厨房里——作为切肉和蔬菜的菜板；

在住房里——作为冬天烧壁炉用的柴火。

作者还写道，更多的圣像是被堆积成堆放火烧掉，或者被扔到农村或者城市的垃圾堆里。

伊尔库茨克的这个东正教教堂（这个没有完全被毁的教堂，是为了在它的地基上建造党中央大厦而留下来的）里面高高的墙壁被刷得粉白，墙上挂着漆黑发亮的圣像。那些圣徒、福音传播者、信徒和神秘主义者从暗淡的银色有划痕的画框中露出脸庞，看着我们，过了一会儿，当灯被关掉后，他们隐退进神秘的黑暗中。

在教堂走道两边分散摆着花园式的长椅，上面坐满了人，大约有二百多人，人们都缩进自己的大衣，冷得发抖，这就是位于西伯利亚以东的伊尔库茨克。

七个年轻伟岸的男子走上布置好的舞台，他们穿着旧式俄罗斯亚麻衬衫，腰上缠着一条缎带，如气球般鼓鼓的亚麻长裤塞在长筒皮靴里，头发梳成古老斯拉夫式的发型，前面留着刘海，锅盖似短发，胡子很长。他们当中的三个人吹起像圣弗拉基米尔王公狄迪亚小号队用的那种开场小号，一人猛击着鼓，这个战斗队前面站着指挥官、旗手和思想

家，这个旗手大声诵读赞美俄罗斯的诗，一会儿又在发表大胆和崇高的历史报告，一会儿又热情地高唱圣歌，中间还穿插着一连串长长的为俄罗斯的祈祷和老俄罗斯士兵的高呼声，最后以开场小号的号声和铿锵有力的击鼓声结束。

“俄罗斯！”战士们大声吼叫，“你永远这么伟大，这么神圣！光荣属于你，俄罗斯！”（此时号声、鼓声齐响，战士们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倒在地上）。

“是的！”旗手说，“俄罗斯曾经非常强大，而俄罗斯人民引领了世界！”

“引领了全世界！”战士们高呼（号声、鼓声、呼喊声，鞠躬）。

“欧洲的国王们和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王公们来向我们的沙皇鞠躬致敬，他们带来了金银财宝和贵重的宝石向沙皇进贡！”（鞠躬，鼓声）

“但是辽阔的俄罗斯引起了他的敌手的憎恨。俄罗斯的敌人早就窥视着他的覆灭，等待着俄罗斯的灭亡！”

旗手停顿下来，环视着观众。我们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紧盯着舞台，全神贯注地听着。突然在一片寂静的教堂里，他踮起脚尖，好像要飞起来那样，挺直身体，大叫一声：

“十月革命！”

他大喊的声音，让我全身打了个冷战。

“十月革命是对抗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国际阴谋！”过了一会儿，“十月革命是想把俄罗斯从地球上彻底抹掉。”

“俄罗斯啊，他们要歼灭你！”战士们齐声大喊（号声、鼓声，鞠

躬）。

“所有人都沆瀣一气，”那位思想家说，“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拉脱维亚人、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乌克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他们都想要消灭俄罗斯人民！三股力量，他补充道，这一阴谋的主导是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些恶魔让我们在七十三年间在地狱里受煎熬！”

“滚，滚蛋，魔鬼们！俄罗斯救救自己，救救自己吧！”战士们吹着号，敲着鼓，一边振臂高呼一边挥手告别。

犹太人惹怒了思想家。

“犹太人，”他用极具挖苦和愤慨的声调说，“他们想独吞‘大屠杀’这个词。但是真正的大屠杀不是对着俄罗斯人民来的吗？”

他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战士们唱完一首赞美俄罗斯的力量和不朽大地之歌后，思想家提出了下列论点：

“1914年，”他说，“世界上曾有一亿五千万俄罗斯人，按照我们的学者的估算，如果这些俄罗斯人能正常生活和正常生育的话，那么今天俄罗斯人口就可以达到三亿人。但现在我们的实际人口是多少呢？他转向观众问，然后自己马上回答说：我们只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因此我想问你们，那么那一亿五千万的俄罗斯人在哪里？我们一亿五千万的兄弟姐妹都到哪里去了？他们都死了，都被杀害了，被枪杀了，被折磨死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们年轻的父母还没能等到他们出世，就中弹身亡了。”

“我还想多说几句。请问各位，如果有人想毁灭某一个民族，他们首先会从哪个下手？当然首先会从那个最优秀、最有智慧和最聪明的民族下手。在俄罗斯也不例外。我们有一半最优秀的人消亡了。这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大屠杀。帝国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国际压迫者和恶魔们，他们无法忍受俄罗斯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人人种！最大的！”

小号发出刺耳的声音，鼓声铮铮，震耳欲聋。

我环视四周的人们，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坐着聆听，但是他们的面部毫无表情，没有任何激情，没有任何感动。每个人都静默无声，缩在外套里，裹着围巾和头巾，一动不动。在我们周围，粉白墙上挂着的一幅幅圣像开始慢慢变暗，舞台上的七位年轻俄罗斯男演员唱起了关于自己民族被灭绝的哀歌。

歌声停止后，旗手说：“世界应该向俄罗斯道歉，并请求俄罗斯的原谅，因为让俄罗斯受到打击，以十月革命为代价像中了毒箭那样受到伤害。”

“让各国请求俄罗斯的原谅！”战士们高喊道。

“世界必须洗涤这一罪孽，洗涤对俄罗斯犯下的罪行！”

天哪！我在想，你遮蔽了他的理智。

我冷得要命，但又不想出去，等待着接下来还有什么。

“俄罗斯人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家说，“到处是起义和反抗，包括每个城镇和每个省份。我给大家读一下一个战士写的一段话，他曾经参加过坦波夫州（Tambov）反抗俄罗斯农民的斗争。这位战士写道：‘我参加过多次抗击德国人的战役，但是从未见到过这种场面。农民在机关枪的扫射下成排倒下，可他们还是往前走，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他们踏着死尸和伤者的身体，昂首阔步往前走，他们的眼神令人畏惧，母亲们把孩子抱在胸前，大喊着，圣母啊，圣人啊！救救我们吧，

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都会死在你的庇护下。他们这些人已经到了毫无畏惧的地步。'"

旗手把念完的这张卡片放进口袋里。仍然是一片寂静。

"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思想家以一种平静的口气说，"在战争的年代杀害了上千万俄罗斯农民。还有同样数字的人死于饥饿。今天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斯大林。其实那时斯大林还没有掌握政权。事实上那时是布朗斯坦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先生掌权。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俄罗斯人。"

"阴谋还在继续！"旗手大叫道，然后用手指了指教堂的大门，好像国际迫害者瞬间会冲进来，把我们大家都关进监狱。

"阴谋还在继续，"他重复着，"民族要灭绝了！"

（长时间的、悲怆的击鼓声。）

一片寂静，全场一片沉默。

思想家又开始说话了，这次他以委婉的语气说："在帝国，俄罗斯人生活最差。如果人们的平均寿命在立陶宛是72岁半的话，那么在俄罗斯，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8岁。立陶宛人！立陶宛人能比俄罗斯人多活五年。"他在乎的并不是谁比谁多活几年，他想要说的是，立陶宛人居然能比伟大的俄罗斯人活得更长！

他最关注的是，俄罗斯人，纯种俄罗斯人的人口在下降。在帝国的五个纯种俄罗斯人居住的普斯科夫州、图拉（Tula）州、特维尔（Twer）州、坦波夫州、伊凡诺沃（Iwanow）州的人口在日益减少。古老的俄罗斯人口正在骤减。特别是农村人口在骤减。最近农村人口每年在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骤减。到处可见人去地荒的农村。夏天驱车去农

村你可能在某处仅仅能见到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老年妇女。根本看不到一个壮年男子，甚至看不到老年男人。也看不到马匹、母鸡，根本看不到任何家禽和家畜。冬天就连晒太阳的老妇人你也看不到了。冬天时村落就好像被瘟疫横扫过一般。

“出路在哪里？”他两眼紧盯着观众，好像是从几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满怀希望地想从这里得到一直折磨着他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都沉默地坐在那里。有几个男人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好像有义务说点什么似的，给出一些建议，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都安静地坐在原地。

“俄罗斯是智慧的，永恒的，”旗手面对我们茫然不知所措的和无助的沉默做出了回答，“俄罗斯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俄罗斯会得到拯救的！”

他有一个纲领，正如他说的那样，要让“俄罗斯重整旗鼓”，主要人物就是让纯种俄罗斯人回到俄罗斯。他说，让这些俄罗斯人回到自己“正在荒芜的发源地”。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俄罗斯人正在试图努力离开俄罗斯，而不是回归，因为回到俄罗斯这一动作成本和规模太大：在俄联邦之外居住着两千四百万俄罗斯人。

“回来吧，回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吧！”战士们一边高呼，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不断地鞠躬。但是教堂里的观众并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响应。

在这个让俄罗斯人回归俄罗斯的伟大运动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别让那些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格鲁吉亚人趁机移居到俄罗斯。

“俄罗斯只为俄罗斯人！”旗手大叫道（号声、鼓声、喊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言，因为在当代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充满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血缘标准和土地标准之间的矛盾。这是什么意思呢？血缘标准指的是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纯粹性。但是这种俄罗斯民族的纯粹性仅仅是当今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吗？那剩下的部分呢？如果按照土地的标准，那就是维持帝国之外的地域，但是那就无法只提俄罗斯民族的纯粹性了。

矛盾啊，矛盾！

思想家理解这一点，在喊出了俄罗斯只为俄罗斯人的口号之后，他又把口号收了回去。

“俄罗斯，”他喊道，“必须保持超级大国这一伟大地位！他们希望把我们变成像美国保护区里的印第安人那样！他们想麻痹我们，想毒害我们。但是我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把我们变成印第安人！我们不会成为香蕉共和国！”（号声、鼓声）

他挥着拳头威胁我们：

“不要随着西方音乐跳舞！不要在脖子上挂可口可乐的瓶子！”（只有鼓声）

“我们的目的是要拯救民族国家，他果断、坚定地强调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国家、一片领土、一种精神、一个俄罗斯！”（众多小号声、众多鼓声）

“不久之后，”他又满怀希望地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劝说的语气，“这个民族受够了这种多元的混乱，受够了这种不修边幅的假面舞会，人民一定会知道，只有沙皇才能拯救我们！”

此时献给俄罗斯的祷文开始了。

“俄罗斯，请你原谅我们的罪孽，”旗手说，“罪孽就是不忠、罪孽就是懦弱、罪孽就是失去目标。我们现在宣誓，让你恢复价值，我们宣誓，让你恢复力量，我们宣誓，忠诚于你！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让你的太阳，俄罗斯，照亮世界！”（长久的小号声、铮铮的鼓声、喊声和呼声，鞠躬、不断地鞠躬）

我走到院子里，这是一个寒冷的、繁星满天的夜晚，非常美，无风的夜晚。我回到了旅馆，这个旅馆与贝加尔湖在同一个方向。在昨天，我和奥莱格·沃罗尼乘车去了利斯特维扬卡附近的贝加尔湖边，沃罗尼是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工作的非常友善、勇敢、年轻的科学家。

当时雨雪交加，什么也没有看到。

湖面结了冰，生锈的大型平底船的残骸穿透冰面露在外面。看不到湖的对岸，甚至也看不清利斯特维扬卡的景致。在那个地方有两个商店和一个酒吧——但都没营业。所以既没地方可去，也没任何事情可做。为了等待大巴的到来，我们整整在空荡荡的路上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这里的山、水、森林都很美，但最好是在夏天来，因为那时有阳光。

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城市，也没能亲眼看看贝加尔湖。但我在伊尔库茨克买了本书，在书里我可以读到更多关于贝加尔湖的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嘎嘎兹亚（G. I. Gagazja）。他在书中写道：贝加尔湖的湖水非常深，水量丰富。他问道：如果人类剩下的唯一水源是贝加尔湖的水，那么人类的生活能维持多久？他的回答是：四十年。

跳水洼

“你叫什么名字？”

“塔尼娅。”

“你多大了？”

“再过两个月就十岁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吗？此刻吗？我在玩。”

“那你在玩什么？”

“我在玩跳过水洼。”

“你不害怕吗？你可能被汽车撞倒。”

“这里哪有车过来呀！”

是的，塔尼娅说得对。从昨天开始有点回暖了，中午的时候气温在2摄氏度左右，满大街都是水汪汪的。雅库茨克（Jakucjak），真可称得上是西伯利亚的科威特，俄罗斯萨哈共和国一个处于黄金和钻石矿里的富饶的首都。那些在纽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珠宝商店橱窗里展示的令全世界的富家女喜爱的可以用来装饰自己的钻石饰品，有一半是来自雅库茨克（更别提那些用于地质钻孔机和金属切割机的钻石）。

塔尼娅的脸色很苍白。这里的冬天总是暗暗的，甚至当太阳露出脸时，也不能令人感到它的温暖，太阳光很强、很刺眼，但离你很远、很

冷。这个小姑娘穿着一件绿褐色大格子图案的布料缝制的大衣，大衣已经不合身，有点短了。没办法。不可能每年都买新大衣穿呀。妈妈哪儿有那么多钱呀？即使妈妈有钱，塔尼娅露出梦幻般的微笑——那谁又有工夫排大队一直等到他们把适合十岁女孩子穿的大衣送到雅库茨克呀？而且还是适合又高又瘦的女孩穿的大衣。

塔尼娅像个小大人似的思考和分析着这一切。

在玩跳水洼这个问题上，她也是想得很周到。必须跳得很准，不能有误，既不让自己跳到水里去，又不能把鞋子弄湿了，因为如果鞋子湿了的话，哪儿有另外换的鞋子呀？

“是啊，你说得对，还有鞋子湿了还可能着凉感冒呢。”

“感冒？”小姑娘一脸的迷惑，“现在冰都化了，越来越暖和了还感冒?你肯定不知道，真正的冬天是什么样。”

这位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带着明显的优越感，看着显然比她年纪大很多的一个男人，竟然没有酷寒的概念。

“酷寒，”她给我解释说，“就是在空气中挂着亮晶晶的发光的雾，人走路时，在这个雾气中就能形成一个空洞，这个空气中空洞的形状就是走过去的那个人的轮廓，你走过去了，可是空洞还留在那里，固定在雾中。”大人留下的是一个大空洞，小孩儿留下的是小空洞。塔尼娅留下的是一个细长的空洞，因为她非常瘦，但是在她这个年龄，她留下的还是一个高高的空洞，这很明显，因为这位小姑娘是班里最高的女孩儿。早上走在路上，根据这些空气中的空洞，塔尼娅能知道，是不是她的同学已经到学校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临近的邻居和朋友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空洞。

“这个又宽又矮的空洞，线条清晰明显，这说明校长科瓦威迪亚·马

特维耶夫娜已经走过去了。”

“如果早上看不到雾气中有任何符合小学生高矮身材形状的空洞，那就说明，实在太冷了，学校停课，孩子们留在了家里。”

“有时候能看见一个形状模模糊糊、歪歪曲曲的空洞，然后突然空洞没有了，这就是说，塔尼娅压低声说，走过去的是一个醉汉，被绊倒了，摔在了地上。在这种酷寒中，酒鬼常常被冻死。那样的空洞看起来像是一条死胡同。”

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来到了雅库茨克，特别是在这里认识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聪明的小姑娘，我是在路过一条叫扎沃日纳亚（Załoznaja）的街道时偶然遇到她的。因为那时塔尼娅是我在空旷的街区看见的唯一的一个生物（那时正是中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工作），此外我正好也迷了路，想找人打听一下，去克卢普斯卡亚（Krupska）大街怎么走，因为我在那里约了一个人见面。

“那我带你去，”塔尼娅自告奋勇地说，“因为你自己去可能不好找。”实际上我也得跟她一样，要玩跳水洼游戏，因为要走到那条叫克卢普斯卡亚大街只有一个方法，要大步迈过坑坑洼洼汪汪积水的地方。

这就是扎沃日纳亚街区：宽敞平直的街道。没有柏油路，甚至连石头铺就的路也没有。这里的每条街都是长长的、平坦的、泥泞的水洼群岛以及小泥坑、泥泞的洼地。没有便道，也没有像在我出生的地方平斯克为行人铺的木板桥。沿着这些街道，都是木板平房。这些都是些十分老旧的破房子，木头已经变黑、潮湿，也已经腐烂。窗户都很小，玻璃都很厚，窗框上都堵着棉花、旧毛毯和破布。这些玻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房子就好像是那些老眼昏花的老奶奶戴着镜片厚得像瓶底的眼镜在望着你。

在扎沃日纳亚街区寒冷就是救赎。

寒冷让周边环境、生态系统和土地处于严厉的纪律、铁的秩序、强大而稳定的平衡之中。房子深埋在冰冻的、坚硬如水泥的土里，平稳地立在那里，可以在街上走路和开车，车轮不会被陷进泥泞的沼泽中，鞋子也不会被黏腻腻的污泥卡住。

只要在这样的天气里，就像我遇到塔尼娅时的那种天气里来到这里，看到的就会是另一幅景象，也就是说，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儿就不一样。

一旦寒冷过后，那些房子就会变得垂软，往下陷。这些房子多年来早已低于街道的路面，因为最早这些房子是建造在永久的冻土上的，但是因为人居住在这里产生的温度致使房子下面的冻土软化了，因此年复一年这些房子就逐渐往下陷，每个房子都深陷在一个一个的窟窿里。

现在，4月的暖风吹到了扎沃日纳亚街区，因此那些可怜的歪歪扭扭的房子就更加斜斜歪歪，变得更加奇形怪状了，越来越往地里缩，濒临倒塌。整个街区都变小了、萎缩了，有些地方的房子下陷得很深，几乎只能看见房顶——仿佛大型潜艇队在慢慢沉入海底。

“你看见了吗？”塔尼娅问。

我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融化松动的污泥开始呈波浪形、如小溪和沟渠里的水一般、像决堤那样直奔那些房子里。西伯利亚的大自然是穷凶极恶的，一切在这里都是那样穷凶极恶、暴戾恣睢，因此如果在雅库茨克泥浆危及房子，这就绝不是灰了吧唧的稀溜溜的烂泥往下滴淌，而是像肆虐的雪崩爆发，突然毫无阻挡、长驱直入，冲进家家户户的门洞和大门里，堵塞过道和填满小院。仿佛整条街从道牙边崩开，冲进扎沃日纳亚街区的房子里。

人们踩在家里的污泥中，满地都是污泥，无处不是污泥。“有点难闻的气味，”塔尼娅补充说，“因为扎沃日纳亚街区地下没有铺排污管道，所以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她皱着眉头，想找出适当的词来表达，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然后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我还应该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地上到处都插着小木板，上面写着：禁止随处乱掘地。为什么？因为地下铺着电线，如果有人用铁镐刨地，就可能碰到电线被电死。因此在扎沃日纳亚街区，又湿又脏的泥不仅会弄湿你的衣裤，弄得你浑身脏兮兮的，还会让你陷进臭水里，甚至丧命。因此说，冬天是安全的，没有人会在冬天想到要刨地。

我们到了克鲁普斯卡娅大街，在一个小房子前碰见一位老奶奶正在拼命挥着笤帚，想用笤帚堵住烂泥浆灌入门洞。

“真不容易呀！”我对她说。

“谁说不是呢，”她耸耸肩说，“春天总是这么可怕，所有的东西都开始飘荡。”

我们都沉默不语。

“生活怎么样？”我提了一个又俗又傻的问题，为的是找到聊天的话题。

老奶奶直了直腰，双臂撑在扫把杆上，看着我，甚至面带微笑地重复着我的问题“生活怎么样”，说出了俄罗斯哲学的精髓：“还活着呢！”她说这话的口气里既充满了自豪与坚定，也带有心酸和愉悦。

跟拉丁美洲的贫民窟一样（如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老贫民窟、智利圣地亚哥的棚户区），雅库茨克的扎沃日纳亚街区也是一个十分封闭的街区。贫穷、肮脏和污泥把这里打造成一幅单调统一、一成不变、毫无

个性的景象，在这一景致里所有的元素都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目光所及之处，这里的一切没有任何反差，除了贫穷的景象没有一丁点儿繁荣的标记。这一封闭结构的实质表现是，在这个地方任何具体事情都难以改变，因为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别的元素和细胞就会冒出来成为阻力。比如说，不能要求人们穿干净的鞋子，因为到处流淌的淤泥让人们难以做到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是拆除扎沃日纳亚街区，让居民们住到新的房子里去。问题是那些最近盖的房子不比老房子好很多，或许还更差些。用大型水泥预制件刚刚盖起的大楼就已经倾斜、开裂、墙皮剥落了。无论热水，还是冷水，或是下水道都是用外接管子绕着房子的外墙连接的，纵横交错地盘结在院子里、广场和马路上。随处可见的这些管子的外面都用羊皮、破布裹着，用各种金属薄片和铁皮缠着，然后在最外面还用铁丝和绳子绑着。

这些管子时常破裂。如果是在冬天（一年九个月是冬天），在管子破裂的周围马上就会形成一座巨大的冰山，之后无人能有力气移除它。随处可见这样的冰山，它们坚硬、厚重，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而在马路上无序地铺设的管道、电线、各种弯头、水龙头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雅库茨克的新街区就好像是一个尚未封顶的工厂的大车间。

在这个街区其中一个大车间，排着一条长长的、耐心等待的长龙。我走到柜台前一看，那里有两位穿着白色大褂的女售货员，一是我想看看她们在卖什么，二是想看看人们蜷缩着身体、跺着脚排着长队等着买什么。她们在卖蛋糕，就只有一种蛋糕，唯一一种蛋糕，蛋糕的最上面是一层粉色的奶油，你可以用双手托住蛋糕，蛋糕不会碎掉，因为蛋糕已经冻得像块硬骨头。

我没找到钻石、黄金和科威特，找到的却是扎沃日纳亚街区和整个贫困的城市。要是雅库茨克有钻石那该多好啊！但是雅库茨克人看不

到、摸不到钻石。因为钻石一旦被从矿井里挖出来，立即就被运往莫斯科，用于支付坦克、火箭的生产费用，同时用于帝国政治的需要。

我回到奥科迪亚布尔斯卡（Oktiabrska）大街，回到我住的酒店。我的房间号是506。为了能打开房间的门锁，你必须多次来回拧锁，至少得拧八到十六遍。如果只拧了八次锁就开了，那就是最让人乐观的事了。如果来回拧了十六遍锁也能打开，也应该算是令人乐观不过的事了。最糟糕的是，从里面你锁不上门，那时门就会自动倾斜，往走廊外大敞四开。我没办法，只好去找隔壁房间的客人帮忙（他是布里亚特人，技术员），请他帮我把门关上。从此就开始了某种仪式：我先去敲隔壁客人的门，我们一起用力开他的门，放他出来，然后他再帮我把门关上。

在窄小的浴室里，洗脸池上有冷、热水龙头，但洗浴的喷头只有热水，没有凉水。但我并不知道。于是我打开洗浴的喷头，突然滚烫的热水喷涌而出，由于浴室和房间里都很冷，现在满房间里热气蒸腾，房间里变得暖和了一些，可我却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关掉喷头的水，可怎么也拧不上，我跑到窗边，想打开窗户换换气，但是又打不开窗户，窗户都被胶条贴着，而且窗户的把手坏了，被人拔出来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如果我打开门的话，水蒸气会跑到走廊里，我会招惹混乱，丢人。但为什么会丢人？我错在哪里？我在想，我得说出一个解释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是啊，在这个国家里，好像一切都是早已精心设计、安排和策划好的，一个普通人无论做了什么、无论遇到怎样的麻烦和处于怎样的困境，总是会产生某种愧疚感。正如（我所描述的）房间里很冷，水蒸气马上就附着在墙上、玻璃上、一些小镜框的玻璃表面上、裂缝的镜子上。然后我得在被水喷得浑身湿透、被烫得半死时，憋着气费尽全力把水龙头拧上，然后发誓，再也不去碰别的什么东西了。现在到处都很潮湿，到处是水，不过还算暖和。

我到了走廊里，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在我的房间里发生的这场灾难。可走廊里空空的，根本无人走动。电视在一个公共休息室里响着，可是没人看。

在他之后是个工人发言，他说尽管列宁已经不算什么了，不过他还是自豪地告诉大家，他一共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的五十五本书，但只用了几个晚上就看完了。他说：“这很简单，”他说，“我对自己很满意，列宁的每部书我只用一个小时就看完了。因为我知道，列宁最重要的话，都是用斜体字标出来的。因此，我建议大家，快速地翻看，只看斜体字。”他就是这样鼓励着雅库茨克旅馆空空荡荡的公共休息室。

后来是莫斯科坦甘卡剧院的经理尤利伊·鲁比莫夫（Yuri Lubimov）用批评和绝望的口吻说：“我们失去了理智，我们丧失了良心，我们丢掉了荣誉。环顾四周，我看到的是野蛮。”鲁比莫夫高昂的、演员似的声调在公共休息室里回荡，甚至传到了走廊和大厅里。

在饭店大厅里，报刊摊出售的外国报纸只有法国的《人道报》，我为报纸上有一张我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照片而买了这份报纸。现在，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这张在报纸上最后一版刊登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有一条又漂亮又干净的高速公路，A6号公路，路上跑着干净的高级轿车，这一切突然让我很着迷：公路上白色的隔离线、明显的路标和闪亮的路灯。一切都清洗过，一切都非常干净，一切都显得非常和谐匹配。

“复活节大周末开始了!”广告牌上写着。

人们已经在巴黎待腻了，他们想休息休息。

这离我们太遥远了，看着照片，我在想，这仿佛是远在天边的事

情。

我开始收拾到处都是水的浴室。

早上，住宿的客人可以在酒吧买早餐。早上的这个时候，人们都穿着运动装，站在那里排队，没有人说话。如果有人想跟旁边的人说话，也都是非常小声地说。这种宁静时常是一种不真实、是一种假象。因为常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爆发出喊声、叫声和争吵声！这种事情有两类特点：第一，完全是（经常是这样）出于某种非理性的原因。为什么吵架？出了什么事？为啥？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只会耸耸肩。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犹如晴天霹雳，连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引发野蛮的暴力行为。第二，紧张气氛有一触即发的态势——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不是起哄、不是生闷气、不是捣乱、不是做鬼脸，只是在宁静中突然发出仿佛跳悬崖时的嘶喊声！仿佛战争只能发生在一个频率之上，既不能低一毫米，也不能高一点点。这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气冲斗牛的、狂暴的龙争虎斗持续一会儿之后，突然会熄灭，一切重又回到宁静之中。还是那样，如果某个人想跟身旁的人说话，声音会放得非常轻。

现在轮到我们接近酒吧服务台了，场面是这样，人们不说任何废话，用的词语只是与要点的饭菜有关。服务员看着客人，什么也不说，那就意味着她在等你说出你想吃什么，没有任何寒暄和问好的话——此时，客人马上要说出想吃什么。如果客人想吃什么，就直接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白奶酪、黄瓜或者面包。也不说谢谢之类的客套话，多余的话一句也不用说。服务员递给你东西，你付钱就完事了。服务员任何话都不说，只是关上收钱的抽屉，看着下一位客人。

在这里，人们狼吞虎咽地吃饭，速度之快，好像囫囵吞枣一样不嚼就往下咽。尽管有几次，我是第一个进到酒吧的，但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那些比我晚来的人，也早就吃完走了。我不清楚，连年的大

饥荒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但是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深存恐惧，生怕明天将没有可以填肚子的东西了。

晚上，我去弗拉基米尔·菲奥多罗夫（Vladimir Fiodorov）家做客。菲奥多罗夫是当地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他也是当地双月刊《东方之星》的主编。在这份杂志里我读到了一篇介绍雅库茨克一个叫斯克迪亚克（Syktiak）村的文章，夏天到那个小村去，乘船需要六天的时间，该村位于勒拿河。村子里正在流行肺结核病，能逃离村庄的人都跑了，为了生存糊口有片面包吃，要跨越200公里没有道路的荒郊野地，跨越雪原，穿越泰加林才能到达一个小镇鸠修尔（Kiusiur）。

菲奥多罗夫家（家里四口人，菲奥多罗夫、妻子和两个女儿）房子不大，有30平方米，收拾得非常干净，摆设很有品位，很温馨。不过，今晚他妻子和女儿出门不在家，因此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菲奥多罗夫出生于勒拿河上游的雅库茨克，他对自己的共和国了如指掌，早就走遍了共和国的各个角落。他所经历的那个世界，是我无法想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和无法企及的。我从未去过那里的针叶林、河流、湖泊，我也体会不到，杀死狗熊后人的感觉是什么，或者当人在饥饿难忍时，突然抓到一条大鱼是什么感受。

我总想询问一下有关雅库特人的问题，又不好开口，在雅库茨克，雅库特人属于少数民族，人口才四十万。他们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怎样？俄罗斯人是在17世纪才来到这里的。菲奥多罗夫是否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他是否认为，这种情况是否类似殖民？存在着某种对殖民地的依赖和剥削？

不能这么说！菲奥多罗夫回答道。雅库茨克是他的祖国，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这正是南非荷兰人提出的论点：他们出生在那里，没有别的祖国！此外，俄罗斯人和雅库特人在这里受到同样的剥削，而剥削他们的正是这个伟大的帝国。是这个帝国夺走了他们

的钻石，强迫他们住在扎沃日纳亚。

随着岁月的流逝，雅库茨克仍然充满了痛苦。这里曾经建过许多劳改营，大多建在金矿附近。如果劳改犯上交的黄金超过定额，那么每超过一克黄金，他就能多得一毫升酒精，或者多得一克烟叶、面包。在那里到处都是欺骗，通常都是那些监工带头搞欺骗。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帕夫沃夫，用300克黄金换了300毫升酒精，可劳改犯们认为，酒精里没有兑水，很纯。结果这个消息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他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而这个延续到今天的不平凡的故事，仍在共和国内流传。

菲奥多罗夫也谈及了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可怕事情。那些刑事犯在逃跑时会劝说那些天真幼稚的政治犯跟他们一起逃跑。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饿死的威胁。因为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杀死政治犯，然后分享战利品。

如果有人逃跑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就会把这个情况通报当地人。只要他们能把逃犯的右手指交给当局，在确认指纹之后，也就是说打死一个人，他们就能得到一袋面粉。因此很多偶然到这里的人，很多猎人、旅行者和地质工作者都是这样被弄死的。

斯大林下令在雅库茨克和马加丹之间修建道路。这条大路全长2000公里，跨越北方针叶林和永冻土。他们从两头开始同时施工。夏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永冻土融化了，水从土下面流过，道路变成了沼泽泥塘，消失了。参加修建道路的犯人们被淹死在沼泽里。于是斯大林下令重修这条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结果他又下令重建。道路的两端从未接合上，但参加修建道路的人或许早已在天堂相遇了。

浓雾笼罩科雷马

为了等去马加丹的飞机，我在雅库茨克飞机场等了整整四天。科雷马受到暴风雪的袭击，那里的一切都被大雪覆盖，一切都被暴风刮走，因此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

在西伯利亚旅行常会碰上这样的事情。

在那里，大部分飞机场的照明都非常差，飞往那里的飞机也都是老飞机，而且时常出现故障，还时常会因为燃料问题迫降在某大陆的边缘地方，等待为飞机运来燃料。整个旅行期间，人都处于紧张、焦躁、恐惧之中，担心飞机出乎意料的停留和延误会错过转机的时间，损失已经定好的机票，那简直就是悲剧、不幸和灾难，因为在这里不允许随意改签机票，不允许更换机票，不允许改换乘机时间和路线，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得在一个偶然降落的飞机场，为等着尽快拿到下一次飞行的机票，与那些陌生和拥挤不堪的人们挤在一起毫无希望地等上好几个星期，因为（所有的机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售罄了）如果待在这里，能干什么？住哪里？吃什么呢？

我在雅库茨克就处于这种状态，进城吧，不大可能，因为如果在科雷马暴风雪突然停了呢？如果暴风雪突然停了，飞机就有可能马上飞走，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苦撑着，如果飞机飞了，离开了，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因此只有坐在这里，苦苦等待。

当然，闲着无事做是最可怕的事情，人在心智麻痹、无事可做的情况下，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简直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无聊，从另一方面来说，难道地球上成千上万的人不就是以这样被动和木然的方式在消磨

时光吗？不是这样多年，好多世纪了吗？不论宗教、文化和种族不都是如此吗？我们只需要去南美洲、安第斯，或者开车走过漫天灰尘的皮乌拉（Piura）的大街小巷，或者在奥里诺科河（Río Orinoco）航行就能看见到处是贫穷的土坯村庄、部落和小镇，随处可见许多人都一动不动地、无所事事地坐在自家门前的破椅子上，坐在石头和长椅上。让我们从南美洲再去非洲看看撒哈拉大沙漠沉寂的绿洲和几内亚湾沿岸黑人渔民住的渔村，再去看看刚果丛林中神秘的俾格米人和赞比亚的一个小镇木温州以及苏丹漂亮的丁卡（Dinka）部落人，所到之处到处可见人们坐在那里，有时可能还会跟你搭讪说句话，晚上围坐在篝火旁，但是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在那里闲来无事、静止不动地闲坐着，而且（权且让我们假设一下）都处于心智麻痹的状态。而在亚洲情况不也一样吗？沿着卡拉奇公路到拉合尔（Lahore），或者从孟买到马德拉斯（Madras），从雅加达到玛琅（Malang），我们都不难发现，在那里不也有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其他亚洲人也都无所事事、静止不动地闲坐在那里，也不知木然地看着什么？让我们乘飞机从菲律宾到萨摩亚，再看看辽阔的育空（Yukon）大地和迷人的牙买加，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致，人们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坐在长板上、坐在塑料箱子上、坐在白杨树和杧果树荫下，背靠着贫民窟的墙壁、篱笆和窗框，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阳光明媚，人们都是无精打采、浑浑噩噩地坐在那里，仿佛个个处于长期的困倦状态中，什么也不做，毫无目标和需求地活着，同时（也许可以假设）处于心智麻痹的冬眠中。

而在我身边，在这里，在雅库茨克的飞机场不也是这样吗？有什么不同吗？人们拥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不动，这群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个个瘫软在那里，静止不动，甚至连呼吸都没有了。于是我们不生气、不着急，不用各种问题去打扰空姐，因为她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的问题，于是我们以智利瓦尔迪维亚（Valdivia）附近沉睡的圣胡安村庄的兄弟姐妹、 以戈壁沙漠躲避酷暑的兄弟姐妹、以伊朗设拉

子的兄弟姐妹为榜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深地陷入心智麻痹状态。

科雷马的暴风雪终于在四天之后过去了，体形丰满的空姐跑到候机大厅里，叫醒了所有沉睡的人，并大声喊着：马加丹！谁去马加丹？我们急急忙忙、神情紧张地拿起自己的包裹、袋子、行李，裹上围巾，绕上头巾，系上羊皮大衣扣子，戴上皮帽子，挤挤攘攘地冲向已经发动起来的马上就要上跑道的飞机。我们要飞了。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妇女，她去看望在科雷马军队服役的儿子。儿子给她写信说，他无法忍受老兵虐待新兵，这让她为此很忧心。

我听过老兵欺负新兵的事吗？是的，听说过。就是士官和老兵们弄出来的一种欺负新兵的办法。这是在红军中滋长的恶瘤之一。苏维埃社会把人们分成一个个像军队的班和排一样的小单位，使人们能俯首听命。这个社会的实质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新兵是弱者，因此红军中的上等兵和老兵们就把这些新兵当奴隶来对待，想尽办法欺负他们，让他们擦皮鞋、倒痰盂。新兵不得不接受这种新的不平等的对待，不得不失去个性和尊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打骂列兵，千方百计折磨、蹂躏和摧残他们。毒打他们，甚至行酷刑。有时新兵们忍受不了他们的这种痛苦折磨和使唤，受不了这种残暴歹毒和虐待，会试图逃跑或者自杀。新兵们在服义务兵役制时强忍老兵们像对待犯人那样的残暴和凌辱，心中只有这样的念头：摆脱暴虐、要报复、要报仇雪恨。为此，当他们成了老兵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新兵们拖进污泥和粪便中，强迫他们闻下士的裹脚布，用皮靴底抽打他们的脸。但是这些昨日才来的新兵又会去报复谁呢？抢谁的包裹，暴打谁呢？当然他们会去凌辱比自己弱的人，也就是去虐待那些比自己后来的新兵了。

如今这种虐待的传统和习惯被延续下来，而且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军队中现在又出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激烈冲突。乌兹别克人

杀塔吉克人，东正教教徒组成的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组成的班（鞑靼人）发生摩擦，萨满教教徒（摩尔达维亚人）向无神论者（德国人）后背捅了一刀。

担惊受怕的母亲们开始组成各种协会和联盟，以便强迫有关当局解决这种老兵虐待新兵的问题。我们能在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中看到这些母亲们，她们走在游行队伍中，在身前捧着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儿，那是他参军前给母亲留下的纪念照，第二张照片上是同一张脸，同一个头像，但已经躺在棺木里。如果这位母亲有点积蓄，那么这张孩子的遗照会镶在有玻璃的镜框里。但是也能看到那些贫穷的妇女，她们拿着的是褶皱破损的照片。雨雪冲刷了年轻面容的轮廓。如果你们走上前去，默默地在那里停留一会儿，那些妇女会为此对你表示感谢。

我在飞机上的这位邻座妇女趴在我耳边，小声告诉我他的新兵儿子所遭受的折磨，因为她这是在泄露一个重大的军事机密。我不知道，她是否读过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那是一部很老的书，写于1882年。米哈伊洛夫斯基是俄罗斯的一位小说家、思想家。他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称他为“残忍的天才”，一边又赞扬他的真知灼见和才华。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了人性中存在的可怕的本质，即他说的毫无必要的残忍。在人性中存在着某种毫无缘由和毫无目的的让别人遭受痛苦的癖好。一个人毫无理由地去凌辱另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折磨别人会让自己有种快感，但他从来也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这种特点（毫无必要的残忍）一旦与权力、傲慢结合在一起，就会建立起一个最残忍的世界暴政。发现了这一点后，米哈伊洛夫斯基强调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一本书，题为《斯泰凡契科夫村与他的村民》，在那里他描写了一个外省小无赖符玛·奥皮斯金，他残忍、蛮横、暴虐……“如果把恐怖伊凡或者罗马尼禄的政权给符玛·奥皮斯金，那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比他们逊色，会以自己的罪行震惊世人！”

符玛残暴凌辱他的受害人，以此来满足自己施暴、残忍和野蛮凶残的需要。符玛并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需要那些不必要的残忍），他在对别人实施暴行时，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我们无法以任何理性和务实的标准去评判他。他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毫无目的地凌辱别人，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但对他来说，残暴对待别人的过程，凌辱本身就是为了残忍而残忍。对施暴者来说，对别人野蛮凶残的本身、残暴凌辱行为的本身、残忍凶暴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动。符玛说，毒打一个无辜的人，不需要任何原因。这让他享受了某种快感，享受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快感。在这种简单纯粹的毫无利益所求的施暴行为中，正如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说的“毫无必要的残忍”中，他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在心理学方面的伟大发现。

可是为什么，米哈伊洛夫斯基怀疑，为什么符玛·奥皮斯金这样的人能在俄罗斯找到让自己淋漓尽致发挥的土壤呢？他回答说，因为“融在俄罗斯民族血液中的俄罗斯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追求吃苦”。于是也只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才能刻画出符玛这样的典型人物，为了刻画出这个典型人物黑暗灵魂中蕴藏着的“难以驾驭的无意识的恶”，他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咋舌的、令人困惑的内心生活。

飞机机翼下是一片白色的静止不动的平原，还可以看到黑斑点点标出的森林，在单调空旷的空间中，起伏和缓的小山像是沉重的不对称的山丘，没有让你注目凝视的地方，也没有能吸引你注意力的地方。这就是科雷马。

从马加丹机场到市区还有50多公里的距离，幸运的是我抓到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伤痕累累满身生锈的伏尔加小轿车。我提心吊胆坐在车里，因为我没有进城通行证，我担心他们让我打道回府，我已经计划了这么久才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到这里看看世界上除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外最可怕的地方，我可不想就这样回去。我们的车在冰雪覆盖的公路

上行驶，路两边是山丘，偶尔能看见一些稀松的松树林，突然从松树林中走出两个戴墨镜、身穿典雅的西式大衣、大衣领竖着的年轻人。活像侦探片里的人物。他们让我们停下车，问我们，是否能带他们进城，司机看了我一眼，我的意思是，没什么好犹豫的，带上他们吧。他们好像是天使派来的人，再过10公里就是一个检查岗哨，我们必须停车接受检查。从很远处我看见民警，便摘下眼镜收了起来。在这里人们佩戴的是黄色或者棕色的塑料框眼镜，而我的镜框是很轻的金属镜框，如果我不收起来，马上就会被人发现我不是当地人、与别人不一样，我不想被他们发现，所以就把眼镜藏了起来。我戴的两边可以放下来的棉帽看上去好像是鄂木斯克人或者是托木斯克人。重要的是，民警们马上注意到两个年轻人的墨镜，于是他们开始争吵，争辩，然后打了起来，民警把他们从汽车里拽出来，一句话，就是把这两个年轻人扣了下来，命令我们快走。

高加索黑社会，出租汽车司机形容刚才被抓起来的人。“黑社会”这个词现在在这里是指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职业。时常还会被“民族”这个词取代。在那些过去生活在“和谐和兄弟情谊”中的数百个民族中，现在出现了数百个黑社会。民族消失了，不存在了。现在变成了三个大的黑社会——俄罗斯黑社会、高加索黑社会和亚洲黑社会。而且在这些大的黑社会里还分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黑社会。他们是车臣黑社会、格鲁吉亚黑社会、鞑靼黑社会、乌兹别克黑社会、车里雅宾斯克黑社会和敖德萨黑社会。这些小黑社会又被分成更小的黑社会，这些黑社会虽然很小，但很具威胁性，因为他们有枪支和刀子。有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黑社会，有在共和国范围内活动的黑社会，也有在城市范围内活动的黑社会，还有在城区范围内、在某个街道范围内，甚至在某个院子范围内活动的黑社会。黑社会的地域分布非常复杂，但是谁属于哪个黑社会，别的黑社会的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生活就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分清各自的派别。不过所有的黑社会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成员全都没有工作，但生活很好；第二，他们把偷来的东西或者走私来的东西用来分

赃，这就是黑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这种摆脱不了黑社会、凡事以黑社会标准来思考的思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和不幸的根源。20世纪大灾难——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然后就是内战和大饥荒——的结束让俄罗斯数百万儿童失去家长和家庭而流离失所。这数百万孤儿、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孩子们，无处安身，到处流浪，沿街乞讨寻觅食物和住所（这与那些在非洲忍饥挨饿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俄罗斯找不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就会被冻死）。这些颠沛流离的儿童靠偷盗和抢劫生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招去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变成了斯大林镇压群众的工具，另一部分人变成了职业盗窃犯，然后被送到劳改营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的监工，迫害政治犯。无论从时间和人数来说，这种病态化的规模非常庞大，影响很深。今天在俄罗斯黑社会成员中很多人的祖辈曾经都是无家可归和无姓无名的流浪者，要让一个人脱离过去的恶习并不是一件易事，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谁，任何曾经与当局发生冲突的人，都会把自己矛盾冲突的心理状态传给自己的子孙。这就是今天在苏联解体后社会的现状，在那里不仅仅存在着个别犯罪，不仅仅存在着犯罪元素，同时还存在着整个家族和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传统的犯罪阶层。每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后的大清洗、勃列日涅夫集团的腐败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都强化和扩大了这一阶层。

关于帝国的黑社会问题还可以有很多论述。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这是一个具有猎奇意义的话题。世人以愤怒和一成不变的眼光将黑社会当成一个巨大和包罗万象的组织（谁在试图将格鲁吉亚分裂出去？阿布哈兹黑社会；谁在攻击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黑社会；等等）。这个组织有两个其他根源：第一，首先是来源于多年来斯大林主义实施的历史阴谋理论扩大化（任何不好的事情背后都是有阴谋、有组织、有黑社会的）；第二，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保密传统、保密实

践和保密风气的特点（如谁要上台？戈尔巴乔夫黑社会；几年后谁执掌克里姆林宫？另一个黑社会！）

到了城里，没有人问我任何事，尽管马加丹旅馆的女服务员很严厉，尽管她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不知为何），但还是给了我一个明亮又温暖的房间，256号房间。透过窗户我看见白雪覆盖的街道和公共汽车站，远处有一道高墙，那里曾是一个旧监狱。

我在旅馆认识了来自札幌纺织公司的三位日本人，我还可以像他们那样来马加丹。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他们忙着做生意，不停地鞠躬，很干净，很有礼貌，工作效率很高。他们想卖自己的纺织品，这就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但是也可以带着完全不同的高雅的行李，即带着了解当地知识的行囊来这里，我与这几位日本人聊着这个地方，结果发现我们是站在人骨头之上，即使意识到这个问题，往后退几步或者退几百米，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因为到处是坟墓、墓地。

马加丹是西伯利亚东北地区科雷马的首府，科雷马的名字来源于流经该地区的科雷马河。这里终年积雪，冰天雪地的永久冻土整年昏天黑地，这里是一片空旷、荒芜、几乎无人烟的地方，过去只有一些小小的游牧部落——如楚科奇人、鄂温克人和雅库特人来过这里。只是在20世纪，当时传说科雷马有金矿，这才引起莫斯科的兴趣。1929年秋才在诺佳耶夫湾（Nogajewa）建立了第一个居民点。这就是马加丹的开发的起源。那时要想到马加丹来，只能乘船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或者纳霍德卡（Nachodka）在海上航行八到十天才能到达这里。1931年11月11日俄共（布）通过决议，在科雷马开办一个信托公司来开采这里的黄金、白银和其他金属，这家公司取名为达尔斯特洛伊（Dalstroj）。

三个月后在诺佳耶夫湾开来了一条名叫“萨哈林号”（Sakhalin）的船，达尔斯特洛伊公司的第一位总经理就是乘那条船来到这里的，他叫爱德华·柏日金（Edward Berzin），是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将军，当年他38岁，在这里干了五年。自从柏日金来到这里以后，灾难就开始了，从此人们就把科雷马的名字与20世纪最可怕的历史地名奥斯维辛 、特雷布尔卡、广岛和沃尔库塔连在了一起。而在俄语的口头禅里则把科雷马奇怪地改为一个让人听了高兴的句子，也就是说，每当遇到十分不好、令人毛骨悚然的和不寒而栗的事情时，俄罗斯人就会安慰自己人说：“别绝望，在科雷马更糟糕！”

科雷马冰天雪地的荒原需要劳动力，因此莫斯科在科雷马建立达尔斯特洛伊公司的同时，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东北劳改营管理局，这个东北劳改营管理局为达尔斯特洛伊公司创建的，跟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为“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担任的角色一样，负责提供奴隶。

马加丹的起步和斯大林的恐怖时代发端于同一时间，数百万人被关进了监狱，在乌克兰有数千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但还有活着的人，因此可以把这些被关在“古拉格”（Kułak）里的人和那些人民的“敌人”送到科雷马去，但是运输成了瓶颈问题，因为那时只有一条铁路线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只有几条船定期从这里的港口到马加丹去。就是这样的路线在二十五年中从不间断地穿越整个帝国，把活骷髅运到马加丹。

说是活人，其实跟死人没什么两样，瓦尔瓦姆·沙瓦姆夫给我讲述了一条“金姆号”（Kim）船的故事，那条船当时载着三千人，当这些人反抗时，押送船的人往船舱放水，那时气温是零下40摄氏度，到了马加丹这些人都冻成了冰棍。还有另外一条载着好几千流放者的船，被困在北极圈的冰河里，一年之后才靠港，船上的所有流放者无一生还。

还有一条叫“朱尔玛号”（Dżurma）的船，上面载的都是被流放的妇

女，来到了马加丹港。其中很多人因为饥饿和身体虚弱而死，其余那些勉强活着的人，这边劳改营的语言称她们为“濒死者”（dohodiag）。

这些濒死者一个个被担架抬出去，之后，又挨个被摆在海岸边，那肯定是为了方便计数，以避免登记死亡人数时出现混乱的情况。我们躺在岩石上，看着周围的同伴，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城去遭受公共蒸汽浴和消毒的折磨。（摘自埃乌盖尼亚·金斯布尔格的《陡墙》）

上了运输船的人们被几个月来的囚禁、审问、饥饿和毒打搞得精疲力竭，现在又被关进拥挤不堪和污秽不堪的牲畜车里走上数个星期，而且他们没有水喝，渴得要死，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要上哪里去，也不知道旅程终结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在这种炼狱中苟延一息的人，又被送进马加丹庞大的野蛮的劳改营。这里有一个贩卖奴隶的市场，建在矿井附近的劳改营的那些军官们来到这个市场，选出还能为他们做些体力劳动的囚犯。谁的军衔高，谁就优先选体力强的流放者跟他走。

在马加丹和科雷马，一共建了160个劳改营，换句话说就是北极圈的死亡营，几年下来，流放者在不断更换，但是在这里一直要保持着50万的流放者人数不变。他们当中三分之一死于当地，其余的人在多年的劳改后，离开这里时不是身体残疾就是精神受到严重损害。任何在马加丹和科雷马活下来的人都变得面目全非，与过去的自己完全不一样。

劳改营是残忍野蛮、精心策划的一个组织机构，其目的是让人在濒死前经历最大的羞辱、极大的痛苦和折磨，以此种方式彻底摧毁和毁灭一个人。这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铁丝网，人一旦陷了进去，就别想挣脱出来，这个庞大的网包含下列因素：

寒冷——身穿单薄的衣不蔽体的破衣烂衫的流放者们一直无奈地忍受寒冷的侵袭而被冻僵；

饥饿——由于机体的寒冷，加上每天只有一块面包和水充饥，更加饱受饥饿的折磨；

繁重的劳动——饥寒交迫的人必须干超出他们体力的重活儿，他们要挖地，用手推车把土推走，要打碎岩石，砍伐树木；

缺觉——由于寒冷、饥饿，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疾病，致使他们无法入眠。如果能睡一会儿，也是穿着每天劳动时穿的破衣烂衫睡在冰冷的劳改营房里、硬木板上；

肮脏——不让他们洗漱，也没有时间和地方供他们洗漱，因此他们身上覆盖着黏黏的尘土和劳动的汗水，身上臭烘烘的，令人难以忍受；

寄生虫——他们一直饱受寄生虫的困扰，破衣烂衫的衣缝里长满了虱子，臭虫成群结队地藏在营房里的木板床上，夏天他们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还要忍受西伯利亚可怕的大苍蝇成群地进攻；

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察的残忍迫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看守和卫兵，也就是那些监督从不间断地从体力或者心理上折磨他们。稍不满意就冲他们喊叫，用拳头打他们的脸，用脚踢他们，放狗咬他们，甚至开枪打死他们。

罪犯的残暴——罪犯常常骚扰政治犯，欺辱他们，偷他们的东西，折磨他们，因为政治犯属于那里最低级的人；

心理伤害——政治犯要忍受心理上的虐待，这是对他们最深的伤害，这些政治犯其实最无辜，没做过什么坏事；

乡愁和恐惧——他们要忍受思念自己的亲人、家人的痛苦（他们被判二十五年），完全与这个世界脱节，还要忍受未知的、一天

不如一天的痛苦，忍受明天会死去的恐惧。

二十年里大多数时间被关在科雷马劳改营里的瓦尔拉姆·沙拉姆夫（Warłam Szłamow）写道，

亲历劳改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劳改营，在那里分分秒秒经历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人在那里只有变坏，没有别的选择。在劳改营里有很多事情是人根本就不应该经历的，但是看见人性之恶的底线，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事情。最恐怖的事情是，如果那个人性之恶的底线变成了一个人的所有权时，当人的道德底线是从劳改营的经历中获取的时候，当囚犯把犯罪道德用于生活之中时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人的理智试图努力去理解那些劳动营的规则，那他自己也就自然会去这样做。

他还写道：

劳改营对一个人来说，是对人的本质、普通人的道德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无法通过这个考验，包括那些没通过考验，还有那些通过了考验试图比别人更好的那些人和那些对自己非常严苛的人，最终都一起死去……（摘自瓦尔拉姆·沙拉姆夫的《科雷马的故事》）

1937年12月1日柏日金被召回莫斯科。上级认为，这个刽子手太手软，命令抓捕他并执行枪决。就在同一天有一条名为“米克瓦伊·耶茹夫号”（Mikołaj Jeżow）的船抵达了马加丹，带来了一个接替科雷马达尔斯特洛伊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人——卡尔普·帕夫沃夫（Karp Pawłow）上校（1956年自杀），他还有一个副手斯泰凡·加拉宁（Stiepan Garanin）上校同时担任科雷马死亡集中营头目，他当年39岁，在那里干了一年。

加拉宁是科雷马邪恶的传奇人物。

伊凡·库兹米奇，你还记得加拉宁吗？

我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啦。我跟他近距离接触过，就像现在近距离看着你这样。他当时正在检阅囚犯列队式，他不是一个人，还有随行人员陪着。在他来之前，已经接到电话命令：他要来这里，并且要亲自检查劳改营。那时他还在马加丹，我们早已经立正列队站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清理过了、粉刷过了，地上撒了黄沙。指挥部如临大敌，无法控制紧张的情绪。突然有人小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劳改营的大门敞开了，他和他的一个私人护卫队坐着几辆小轿车和几辆大卡车开进了大门。他刚从第一辆车里下来，他的护卫队马上闪电般地并列分站两旁。所有人都带了毛瑟枪，身穿短羊皮大衣。而他自己却穿着熊皮大衣。他表情凶悍，眼皮沉得像铅一样重，一副酒鬼的眼神。我们劳改营的少校指挥官跑到他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向他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总指挥同志，各劳改营分部都已列队准备好接受检阅。这里有劳改犯逃避劳动吗？有！少校诚惶诚恐地回答。他们让12个人从队列里走出来，好啊，你们不想干活逃避劳动是吧？谁他妈是婊子养的？他们掏出手枪，砰！砰！砰！撂倒了所有人。个别还在扭动的人又被护卫队的人补了几枪。这里有超额干活的人吗？就是那些劳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总指挥同志。那些列队的劳模们很高兴。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加拉宁带着自己的护卫队员走到他们跟前，手里一直握着空弹匣的毛瑟枪，他没有转身，就把自己的马瑟枪往后递给他护卫队的人，并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上了子弹的枪，然后放进一个木制枪套里，但是手一直没有离开枪托。超额完成劳动是吗？超过定额是吗？是的！大家齐声回答。然后他又问他们：人民的敌人超额完成劳动是吗？哼，哼，你们，这帮可恶的人民的敌人！这样的人也要让他们完蛋！结果，又是一阵砰！砰！砰！结果又有10人躺在血泊中。这时他才露出了高兴的表情，眼神也变得安静了许多。血泊让他大饱了眼福。劳改营的指挥官给他们带路，把这些尊贵的客人带到食堂聚餐，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挨枪子。加拉宁还时常有兴致开枪打死劳改营的指挥官们。加拉宁在担任

劳改营总指挥的职务时目无法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人们在他面前会像苍蝇一样成片倒下。［摘自阿纳托利伊·日古林（Antolij Żygulin）的《黑石》］

加拉宁每天亲自开枪杀死的人有几个、十几个，有时甚至有几十个。他杀完人后要么就大笑，要么就哼唱快乐的曲调。贝利亚会突然下令让他杀人，毫无理由，说可能是日本间谍。其实这个身材魁梧的、肌肉发达的白俄罗斯农夫的儿子、铁匠、半文盲，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日本。

我随身带了三个电话号码到马加丹来。我一一给他们打电话，接第一个电话的是年轻男人的声音，他说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拨第二个电话，铃声一直响，可是无人接听。我拨了第三个电话号码：23344，接电话的人声音低沉，很亲切。我做了自我介绍，我听到了电话另一边非常真诚，甚至非常高兴的声音，好像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其实我没见过这个人）在那边等我的到来已经等了好久了。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我想办法租了一辆当地的汽车，方便我们能随处看看。

早上，一辆绿色吉普车开来，司机是位女的，她告诉我她47岁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也许她没告诉过我），只告诉我她的年龄。她只有47岁，看上去肌肉发达，是个强壮的女人，身上的一切都往前凸，都很大，特别是眼睛和胸部。她的肩膀很宽，肌肉发达，我无法想象如果一个男人站在她身旁，会让她有害羞、娇弱和渺小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我觉得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抵得过她。

坐在司机副驾驶位置的是我昨天打电话约来的人，他叫奥尔布赖特·米乌塔胡特迪诺夫（Albert Miłtachutdinow），是位作家，自己的青壮年时期都是在科雷马度过的，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年，现在除了写作，还研究西伯利亚这部分地区的地理。（因为过去只能从海上到科雷马来，习惯上人们认为科雷马是个岛，从这一点更加看出这个地方与外界的隔

绝。那时如果有人要离开科雷马，他就会说："我要去大陆。"）

"我们走吧！"47岁的妇女用既是询问也是命令的口吻说。我们刚出发没多久，她就开始夸奖罗马尼亚人。勇敢的罗马尼亚人！她大叫一声说："他们割掉了齐奥塞斯库的脑袋！（尽管这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仍在她脑海里留着印象）。什么时候能剁掉坐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人的脑袋呢？"

马上剁掉脑袋？我在想，我在科雷马，他们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是因为她说的话感到害怕，反倒是，事实上她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却在空中比画着应该怎样砍掉脑袋，而我们现在正行驶在一条到处是坑洼、坑洞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真空室里的航天员，随车走着，但不知自己的头在哪里、脚在哪里，更可怕的是，这辆车后面突然往上翘起来，好像要飞上天，掉进无底深渊似的。

但是，这位47岁的妇女根本不管路况如何，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哎呀，他们把我们骗得太惨了！"她十分气愤地说，"他们把我们骗得太惨了！"

她的这种激情、愤怒让她所有的仇恨都对准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的那些人，让她当了47年的傻子，说了一些荒谬无比的话，还命令她相信。

"但我们会让他们倒霉的！"她陶醉在自己盲目、激愤的情绪中。

我们到了诺佳耶夫湾，把车停在了水边，停在了被废弃的、生锈的渔船旁。这是一个象征的地方，这是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这里有着像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进入特雷布尔卡集中营的铁道线。这个海湾、这个大门和这条铁道线就是"通往地狱之路"这出戏的三个不同的脚本。

在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有数百万人从这里岸边的沙石岩石登陆，但有三百万人的尸骨永远埋在了这里。

这个海湾看上去像一个拥有灰褐色水面的平静的大湖，从与日本隔开的鄂霍次克海进入这个海湾的通道十分狭窄，人们说，这条通道窄得就连刮起暴风也不会掀起大浪花。从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接近黑色的深灰色和缓的山坡，这些山坡光秃秃的，没有绿色植物覆盖，就像是很久以前被弃置的大堆的煤和矿渣。这里的世界是忧郁的、单调的、死寂的。没有树木、没有小鸟。看不见任何动静，听不到任何回音，黑云低沉，沿着地表缓慢移动，好像总是往我们的方向、向我们移动过来。这种环境会引诱人采取某种极端行为，会陷入狂热，陷入疯狂，或者陷入最令人难以摆脱的压抑性的抑郁，最困难的是维持一种正常心态和信仰，相信大自然是友善的，不会抛弃我们。在科雷马这样的地方，大自然会与刽子手称兄道弟，帮助他摧毁无助和无辜的受害者，对施暴者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向刽子手提供越来越新型的折磨人的工具——刺骨的严寒、暴风雪、堆积的雪山、巨大的无人能逾越的严酷寒冷的荒原。

因此，船只载着一批批相拥在一起的、由于饥饿而半死半活的、快要窒息的劳改犯和囚犯。那些还能动弹的人走下梯板上岸，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湾，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他们看到海湾的第一印象就是：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他们被排成队，然后开始数人数。这里的很多卫兵基本都是文盲，让他们不断地做加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点名时间可以长达数小时。那些半裸着身体的流放者一动不动地站在冰天雪地里，冷风鞭打着他们的身体。押送人员终于开始宣布例行警告：不许往左或者往右多跨一步，否则按试图逃跑处理，无须警告即开枪！这个形式的警告适用于整个苏联境内的地方。两亿人口的民族只能朝命令他们的方向走，不得违抗，只要往左或者往右多迈一步就意味着死亡。

现在他们被驱赶着走在马加丹的主大街上，我现在住的饭店就在这条大街上。这曾经是这里的第一条大街。还是柏日金在的时候建的，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条街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头子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街道、城市、广场、工厂、学校，这里（甚至非常快地）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真正管辖地。1935年，柏日金在马加丹建造了一个文化公园，并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的领导亚戈达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公园。三年后，这个亚戈达和柏日金都被枪毙。柏日金大街更名为斯大林大街，亚戈达公园更名为叶若夫公园，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是新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一年后叶若夫也被枪毙，公园后来又更名为斯大林公园。1956年，斯大林大街更名为马克思大街，斯大林公园更名为列宁公园。后来市议会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去掉这些街名的政治化内容。于是这些街名变成了报刊大街、邮政大街、车库大街、海滨大街。因为报刊、邮局、车库和海滨是永存的。

精疲力尽的劳改犯队伍走过柏日金大街后，消失在劳改犯转运站的大门内，在该市区及其附近有几个这样的转运站。不久前马加丹只有几栋用砖头砌起来的楼房，而在整个城市几乎都是木头房子，木房上面是瞭望台，像是分布在劳改营上方的山丘，冬天被冰雪覆盖，夏天被淹没在泥泞中。

几天之后，囚犯们继续排着队前行，押送人员朝他们大声吼叫，用枪托和狗咬催促他们快走。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走到目的地，如果在半路上坚持不住倒下去那就彻底完了。囚犯的队伍向科雷马纵深走去，走向指定的劳改营，走向用铁铲和锄头开发出来的原始的黄金、白银、铅和铀的矿井中去。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或者每天，或者每周一批批、一拨拨地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沿着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条狭路，就是北边的那条路，走到被指定的地点，然后再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终年被浓雾和寒冷笼罩的地方。

“奥尔布赖特，”我问他，“我们是否能去看看那些破旧的劳改营？”我们沿着劳改犯们走的路往海湾上方走，到了城里。

47岁的妇女开始大骂地方官僚。马加丹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建立了合作关系，请来了一帮美国孩子到这里旅游两周。每个美国孩子分别住在俄罗斯人家里，结果城里人开始为这个打架，因为谁家都想接待美国孩子。当然这不仅仅是接待一个美国小孩子的问题，重要的是大家都想表示自己特殊的热情。此外，如果哪家被指定接待这样一个海外客人，那么马上他住的楼房就能得到修缮，墙壁被粉刷一新，给楼道里装上灯泡，装上玻璃，清扫院子，修理下水管道和水龙头，更换水管和浴缸，给门锁上油，给大门装铰链。为这事，47岁妇女住的那个楼里，有人想争取到这样一个小洋基，可是她跟我们说时，又是大叫，又是大笑，还夹杂着骂人的话，最后说，那家给的贿赂太少了，这事没成。因此她家住的那个楼道还是那么黑暗，楼里依然没有热水。

总之，生活太难了！

马加丹的一位居民伊凡涅克给报社写了一封抱怨信说：

几天前我在《农妇》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星座的文章，我正好是这个星座的人，那篇文章说，属于这个星座的人，能买到贵重而又实用的东西。于是我就在名叫“乐曲”的商店还没开门前去那儿排队，希望能买到电视机。很遗憾，我没能买到。不过这个商店旁边是鞋店，于是我就赶过去买鞋，很可惜，我又没能买到鞋。然后我就去了第三个商店，蔬菜店，但在那儿也没能买到土豆。索性我就一个商店一个商店走，想买到点儿什么，即便不是贵重的东西，也不是我需要的东西，最终什么也没有买到。最后我进了一个门牌号是13号的商店，商店名字是“三只猪”。他们那儿有啤酒卖。结果还是不能买，因为他们说，啤酒只卖给那些从家里带来大啤酒杯的人。（摘自《马加丹真理报》1990年4月27日）

我们不必再往前走了。通往留在旧城区的那些空荡荡的劳改营的路被白雪覆盖着，既没有人行便道也没有街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仓库或者寄存货物的地方。其余的一部分已经损坏了，快倒塌了。但在这里或者那里还能明显地看到那些已经倾斜了的、歪歪扭扭的霉烂瞭望哨。支离破碎的大门、篱笆、柱子横躺在雪地和烂泥里，但是已没有铁丝网，铁丝早已被偷走了。大部分棚屋已经被拆成木板当柴烧了，但还有几间立在寒风中，没有门窗，里面空空如也。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Norilsk）、马加丹满目都是劳改营世界贫穷的景象，看到它枯木朽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景象。这是一个用补丁和破布拼凑起来的世界，是用生锈的钉子和破斧头砍出来的世界，是用粗麻绳和扭曲的铁丝捆绑在一起的世界。

在这里不需要拆除任何东西，也不需要炸毁任何建筑以抹掉罪行的痕迹，因为古拉格群岛的一半已经被淹没在沼泽和污泥中。西伯利亚一半的劳改营的地上长出了森林，通往劳改营的道路早已被春天的洪水冲垮。在城区劳改营的土地上已经盖起了新居民区、新工厂和运动场所。

夏天如果有人驱车从北边的那条公路经过科雷马去卡拉姆肯（Karamken）、斯特莱尔卡（Strelka）、布尔什维克岛的话，就能看见那些被森林和山丘遮挡的地方，就是过去的劳改营所在地，在那里能看见一堆堆腐烂的柱子、一块铁栏杆残片、厨房的泥土遗迹。但是你却找不到任何人们用过的各种工具的残留物，如饭勺、盘子、斧头、砖瓦、板子等物品，这些东西早就被囚犯、押解人员或者拆除劳改营的当地居民拿走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用处。

再过几年，劳改营世界最后的遗迹就会彻底消失殆尽。

“奥尔布赖特，”我接着又问他，“在马加丹没遗留下任何当年的东西吗？没遗留任何物证吗？”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还真是的，什么也没留下来。”

达尔斯特洛伊公司总部被拆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营房也被拆除了。审讯用的监狱也被拆除了。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或者新建的街道。

但是，那边还有一座房子留了下来，那座房子比较偏远，隐在居民区的楼房中间。那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雷马劳改营的干部政治培训之家。

我们爬过一个巨大的高高的雪堆，来到了这座房子的前边。这是一座平房，很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房子也很小。在主大厅里有十几个面色苍白的女生在那里练习芭蕾舞的动作。

也就是在这个大厅里，刽子手们决定怎样处决犯人。他们在这里制定了执行死刑的规模和次数。加拉宁和帕夫沃夫、尼什科夫和叶戈罗夫来过这里，还有数百个手持发热的枪管的其他人也来过这里。

三百万人死在他们眼前，或在他们的协助下死亡，或者死于他们的手下。

我们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走着。“这里是什么？”我问奥尔布赖特，手指着那边的一扇门。

门后是刽子手们使用过的厕所。屋子的大小中等，那里没有任何马桶之类的设备。只有凹凸不平的水泥地和上面留下的椭圆形洞。灰色的墙上整面都是渗水的痕迹。还有一个坏了的水龙头。

“就留下这些吗，奥尔布莱特？”

“就这些。”他回答道。

我随身带着两本书：一本是瓦尔拉姆·沙拉姆夫的《科雷马的故事》，一本是亚历山大·魏斯贝格-齐布尔斯基（Aleksander Weissberg-Cybulski）的《大清洗》。总结一下这两位作者的观点和立场非常引人深思。稍做比较就能让我们对俄罗斯人的思想及其问题和特点有所了解。这两本书都属于纪实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于布尔什维克镇压受害者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完全相同。

两位作家都属于同时代（魏斯贝格出生于1901年，而沙拉姆夫出生于1907年）。他们两个人都于1937年被捕（沙拉姆夫是第二次在莫斯科被捕，魏斯贝格是在哈尔科夫被捕，那时他在那里当合同工程师）。他们二人都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的折磨、摧残、蹂躏和严刑拷打。他们都是无辜的、清白的、诚实的人。

但差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先提出些问题来：我们内心的平衡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看我们与生活和现实的关系？我们拥有和相信的是我们所处的文明、传统，还是信仰、意识形态？

奥地利人魏斯贝格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他是在笛卡尔理性主义精神的教育和探索与批评精神的教育中长大。

沙拉姆夫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从未离开过俄罗斯这片土地，偶尔接触过西方的思想，他从头到尾接受的都是俄罗斯思想的教育。

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魏斯贝格是一位忠诚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位俄罗斯人——沙拉姆夫，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一个“最具世界性的城市”，他完完全全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

那现在他们两个人对自己都是所谓“不必要的残忍”的野蛮压迫的受害者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是怎样看待斯大林的大清洗、囚禁、劳改营和

执行处决这个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噩梦般的世界呢？

魏斯贝格认为，自己是闯入了精神病院，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判官也都是精神错乱的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个疯狂的、偏执的和荒谬的世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写道：“毫无任何意义，是一个政权肆无忌惮恶作剧的行为，找不出任何理性的解释。”他又写道：“我抓着自己的头。我不是被关进疯人院了吧？”或者他写道：“这一切都愚蠢至极，我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切。”为此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仰：“我是德国共产主义者，他轻蔑地对审讯者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热爱苏联。”

魏斯贝格深信自己是被关在了精神病院，深信自己处在一个极其可怕的疯狂之中和荒谬绝伦的偏执狂世界之中。魏斯贝格精神没有崩溃，他的西方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在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条件下，在拥挤、肮脏、血淋淋的监狱里仍在不停地工作，为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寻找一个合理的、理性的解释。无论他被关在哪个牢房里，魏斯贝格都试图对此进行讨论、提出问题，愿意交换意见。

但是与魏斯贝格一起受难的俄罗斯同志们则真的认为他是个疯子！你争辩什么？他们说：你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还是忍着吧，安静地坐着吧！

在这两种人中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和交流。因此我不知道，魏斯贝格和沙拉姆夫是否能相互理解。

因为对沙拉姆夫来说，他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劳改营是自然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人能决定的事情。就像在严寒袭来或者发生了大洪灾时人能抗衡过大自然吗？如果发生了洪灾，有人开始挥拳对着河水咆哮，那么人们就会说，此人不正常，肯定是刚从疯人院里跑出来。如果洪灾来了，应该马上爬到树梢，并在那里耐心地等待

洪水退去。这才是合理的做法，这才是唯一的理性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被送到劳改营，也不要反抗，因为反抗就会被打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也许河水在某一时刻会退去，也许某时会被从劳改营放出去。此外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也不该去做。

在《科雷马的故事》一书里除了劳改营铁丝网的世界其实并不存在别的世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很晚才传到这里，而且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劳改营才是一个真实的和唯一的世界。劳改营是一个完整合理的组织。为什么魏斯贝格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如果劳改营是荒谬的，那它就会立即被瓦解。当然只不过劳改营的逻辑是杀人的逻辑，是与奥地利工程师-共产党员所寻找的其他合理逻辑相悖的逻辑。

在这里，沙拉姆夫的思想是合理的，并符合逻辑的，而魏斯贝格的思想是错误的，迷失在了不切实际的想法里。

“命运所带来的每一次冲撞，都是上帝的旨意，这种冲撞都不会违背劳改营里的规定或者与其相抵触。”沙拉姆夫回忆道。有谁敢说，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受过真正的痛苦生活，从未经历过在“没有英雄的世界”里九死一生，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

这就是沙拉姆夫和魏斯贝格两个人面对自己所处的“另一个世界”的压迫所持的不同的态度，按照俄罗斯大哲学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的解释是：“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在人类历史之初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如果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超自然的、不可抗拒的主从关系上的话，那么西方就恰恰相反，强调人要听从自己的发明创造，容许自己有一个广阔的自我产生的创造力。”

在马加丹街道漫步得走过从雪中挖出的一条高高的通道。这条通道很窄，窄到另一个人从对面过来时，有一个人得站在一边让道。有时候

我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与一个年长的男子面对面站着，那时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问题：你是什么人？刽子手还是受害者？

我为何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和激动？我为何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人，抛开这种鲁莽的令人讨厌的猎奇心？假如我胆敢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能开诚布公地承认，那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看见了吧，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刽子手，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

这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即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作用是分不开的。开始是某个人打了审讯官，后来他被关起来挨打，等他刑满释放出来后，报仇雪恨，等等。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那里只有一条出路——死。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游戏，所有人都会输。

我冒险走出很远，一直走到了海湾，在这个地方听不到城市的喧嚣。首先是听不到科雷马的声音。在往海湾下面走的山丘后面的某处，亡灵们在那个黑暗寂静的地方安息。我记得在某一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科雷马永冻的大地能非常好地保存尸体，埋在地下的人脸能保持完好的轮廓。正如沙拉姆夫警告的那样，那些人的脸看了人不该看的东西。

我在思考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无端受苦之事。爱情会留下自己的杰作，即下一代来到这个世界上，延续了人类的生命。但是痛苦留下的是什么呢？这么多人经历了如此的痛苦和悲惨的遭遇就这样毫无踪影地流逝了。如果把数百万人的痛苦经历收集起来发出能量，让它们转化成创造力，那就可能把我们的星球变成繁花盛开的花园。

但是留下了什么呢？

生锈船只的残骸，腐烂发霉的瞭望哨，曾经为挖掘某种矿石留下的深坑。凄凉、死气沉沉的空旷。放眼四处看不到人迹，因为精疲力竭的

劳改犯队伍已经走过去，消失在永恒冰冷的迷雾之中。

克里姆林宫：魔法山

我从马加丹经诺里尔斯克回到了莫斯科。从科雷马到诺里尔斯克需要在北西伯利亚上空飞行三个小时。那天中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非常透明和明亮，让人觉得天空和大地如此之近，就仿佛是透过一个放大镜在看地面。

在下面，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白茫茫就是白茫茫，平坦坚固的大地被风雕刻成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闪闪发光的平面。在这片令人眩目却又沉默无语的平坦大地之上，有一个孤独的、渺小的深蓝色活物在缓慢地、沉重地移动着——那就是我们飞机的影子，这个移动的征兆意味着飞机还在飞行，我们还活着。

白色与许多其他颜色一样，其本身难以形容。它本身存在，但唯有在与其他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始凸显其个性并为它给出一个定义，而这里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只有无穷无尽的白色宇宙和插入到其中的我们伊尔-62型飞机的小小的影子，在那里它就像嵌入琥珀中的小小昆虫一样。

但在某一时刻能看到，在下面清新的空气中会出现一道白线，它会在一段时间内形单影只地奔跑，后来又会看到第二条线，现在它们拉成平行的两条线一起前行，直到有一条明显和更粗的线来切断他们。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只有散开的三条线飘在平展宽广的天景中。忽然间，无垠的白色宇宙开始与越来越多的新线相重叠，这些线越来越多，排列得越来越稠密。到现在为止的那个毫无变化的、单调的平原变成了四方形、长方形、菱形和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变成扑朔迷离的、重重叠叠的、散落于不同方向的几何形结构——这就是诺里尔斯克，西伯利亚矿山冶金盆地，就如波兰的西里西亚矿区、德国的鲁尔矿区、美国的匹兹堡矿区，与那些矿区不同的是它位于北极圈的另一边。

乌拉尔山隔开了诺里尔斯克和莫斯科。在这些山脉上空飞行期间开始有季节的变化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冬天还是冬天，而现在在飞越了乌拉尔山峰之后，马上就飞入了春天。大地恢复了正常的颜色——也就是当地自然的颜色——灰褐色，流动的河水闪着银光，处处都是板块状的浅绿色。沿途还有一些城市，有伏尔加河，有森林，森林的另一边就是莫斯科。

在莫斯科我一下子就陷入了大讨论、小道传闻、辩论和争吵的旋涡之中。到处都是见面会、会议、讨论会和座谈会。在普希金雕像附近每天从早到晚都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在那里高声大喊，用手指戳着别人的眼睛，拿一沓沓传单在别人的鼻子底下晃着。这一时刻是辩论家、善于演讲的人、雄辩家和喜爱闲谈的人、演说家和牧师、言语犀利锋芒毕露的人和寻找真理的人的天堂。在这个国家，类似这种街头讨论俱乐部的地方有数十个、数百个。你能在利沃夫和鄂木斯克广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卡拉干达广场上看到面红耳赤的辩论者，看上去一切都跟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时拍下的老照片里的场景一模一样。

尽管在这些言辞激烈的讨论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甚至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还是做出决定，逃离开这些雄辩家和演讲家们，去克里姆林宫。

去克里姆林宫是我想了很久的事情。每当我走在市中心的列宁大街时（我就住在这条街上），每当我经过右手边的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建筑物和塔尖时，这个念头就会再起。每当我看见围绕着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巨石空闲地时就会浮想联翩，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盛大广场、宽广的桥梁、水泥砌的河岸、绵延数公里看不到人影的沥青马路和铺着水泥板的空阔的地方。

在这个空旷的广场周围，四处分散地停着一串串的汽车，过一会儿就有车发动起来，抄近路，匆匆忙忙地消失在起点离这里很远的马路

上。这里除了在马路上能见到零零星星的民警外，看不到任何活的生灵，尽管我们是在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特别是在周日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这种空旷凄凉的感觉就更加明显。暴风夹着雨雪从空旷的大地呼啸而过，有时我会不顾一切地闯入那片荒凉之地，下面流淌的是莫斯科河灰色的河水。周围是为精英们建起的一群群铅灰色楼房——它们是这个街区的唯一的住宅区。我被夹在一个空当地中，这个地方将难以接近的政府所在地（克里姆林宫）和活跃着城市生命的区域分隔开。这里没有车水马龙，也没有任何人们说话的噪声，反而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幽静安宁和广袤无垠的大草原。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是一个用砖墙和石墙与外界隔开的庞大建筑群，它坐落于高耸的中世纪建筑群和现代建筑群中间。克里姆林宫坚固的大墙连接着二十个大小不同的塔楼，其中最大的是斯帕斯克（Spassk）、尼古拉斯克（Nikolsk）、纳罗日娜（Narożna）、特洛伊茨克（Troick）和波罗维茨卡（Borowicka）塔楼。大墙内是政府各个部门的办公大楼、东正教教堂以及后来改建成博物馆的教堂。但首先，克里姆林宫是一个政府办公的地方，时常也是帝国最高首脑的官邸。从1918年开始，克里姆林宫成为办公之地，即从列宁将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到莫斯科（主要是从安全考虑，圣彼得堡距离大海太近，距离欧洲太近）时起，俄罗斯就开始由高高在上的克里姆林宫统治了。

从红场方向进入克里姆林宫高墙内是最近的一条路。如果天气晴朗暖和的话，这里聚集的人最多。一方面在广场上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去参观列宁墓，另一方面是排队等着参观斯帕斯克塔楼的人。黑色的政府用车极速地驶进这个塔楼下面的大门内。所有的汽车（重要的是这些汽车都没有车牌）都是一个样子，谁在车里坐着，无人能知道，因为汽车内遮着帘子。这些汽车进入克里姆林宫的频率这么高，就好像在克里姆林宫内有一座生产汽车的工厂，汽车从生产线上一辆接一辆地下线。

进克里姆林宫去看看，只不过就是想进去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和目的，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在三种情况下是可以进去的：第一，去博物馆，以工作单位组织的参观组，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荣誉和奖励；第二，参加在这里时常召开的各种重要大会，那时大会代表和特批记者可以进去；第三，受到在这里办公的权贵的召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大门后，都得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到达预定的地点，然后按原路回来。

我试着从西边的特洛伊茨基大门进去，因为我知道，这里是给步行前来的人、普通老百姓开的入口。有两个民兵部队的军官拦住了我：“通行证！”我把发给我的记者通行证拿了出来。

“这不行！进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你想去哪儿？”

“去参加西伯利亚小邦国代表大会。”

正好那时正在召开这样的大会。他们还是让我回去办通行证。那时正是下午4点，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秘书们、服务员们也正好下班从这个门出去。所有的人都背着装得鼓鼓的大包小包，里面装的是从克里姆林宫的商店购买的东西，还有各种袋子，里面是真正的宝物——熟肉、奶酪、橘子等。他们提着重重的东西往远处的公共汽车站和地铁站走去。

第二天在同一个时刻，我手持通行证又来到特洛伊茨基大门处。他们看了看，拿着照片与本人对比了一下，向我确认，我是否知道那个大会是在哪里召开，具体是在哪个楼召开。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大会在哪里召开，因为我没打算去聆听西伯利亚人的争辩，我只是想进去看看克里姆林宫。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马上就明白了。在我离开了那个半明

半暗的深墙大门入口处之后，进到里面，我看见在我前面是一片很大的铺着石头的空旷地方。眼前是平坦宽广的元老会议广场，我的右边是用大理石建造的现代化的会议大厅，而在我的左边则是黄色的长方形武器库大楼。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到处都非常干净。很显然人行道是刚刚清扫过的，灌木修剪得很平整，形状统一，路边的道牙都用石灰涂成白色。一阵风吹过来，干树叶落在广场和人行道上，但这让我感觉到树叶也是非常干净的。这种超级的极度洁净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令人陷入更深的空虚，更体会到这个地方的凄凉。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人在这里，我不会在乎任何人。但那只是一个幻象。

在我的正前方靠左一点的地方，有一座楼房，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那是18世纪的参议院宫，后来成了苏联的政府办公大楼。它矗立在一个三角平面图上，克里姆林宫就在那里。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都曾在这里执政过。过度的防卫让他们与这个城市和国家相隔甚远：首先是克里姆林宫所在地的这种宏大、空旷的殿堂及其周围宽阔开放光秃秃的广场将他们与世隔绝，然后就是堡垒内部森严壁垒的防护。他们被牢牢地围在克里姆林宫砖墙与周围其他建筑物内，使他们与世隔绝。

这还远远不够！

英国一位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7]于1920年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列宁的接见，他发现了由于对领导人的过度保护而造成他们与世隔绝的第三道屏障：

我还记得在1914年我参观克里姆林宫的时候，那时没有任何障碍，就像参观温莎城堡那样开放，随处可见少许来朝圣的和旅游的团组。如今克里姆林宫却封闭起来，很难进入到那里。在接近克里姆林宫大门之前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在我们见到列宁之前，我们要穿过五六间屋子，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我们的通行证。（摘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雾中俄罗斯》）

但这还是远远不够！

克里姆林宫四周空旷无人的广场，无论是堡垒城墙上和大门的警卫，还是堡垒内部空荡荡的空间里的警卫，抑或是大楼房间里面的检查都不能让这些领导人有安全感。他们走到地底下，躲在地下：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克里姆林宫和党中央所在的诺根广场之间，同时在与其他市中心的大楼之间挖了一个长长的地下通道，以便政府成员和军队高级将领能够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不用从外面的街道上走……伊萨科夫上将回忆道：我们和斯大林一起走在克里姆林宫长长的走廊里，在每个交叉口都设有岗哨，按照内部安全的规定，哨兵的目光必须盯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一直将他们目送至下一个岗哨为止。在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斯大林就用一种带着苦涩和憎恨的口气说：他们要执行保护任务……而他们却在那里看着，怎样从背后开枪杀人。（摘自罗伊·梅德韦杰夫的《历史的评价》）

好吧！地面受到了安全保护，大墙内所有的地方都在掌控之中，没有人去挖地下，那空气中就没有威胁了吗？但是他们想到了这一点。克里姆林宫上空受到了严密的监控。只是在新思维改革时期，出现了混乱的情况，出现了疏忽大意的情况，年轻的德国小伙子鲁斯特突然降落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此惩罚了几位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保卫工作中有疏忽的将军。

尽管1920年在保卫领导人的工作方面还比较宽松，还处在一个临时的过渡期，这样的情况还是给威尔斯带来了某种令他不安的想法：

为保护列宁的个人安全，这一切很可能都是必要的，但是也给他与俄罗斯保持直接的联系造成很多困难，似乎更重要的是，也给他与俄罗斯之间在政府行动效率方面的联系造成很多困扰。可以说，能到列宁那

里的消息，大概都是经过了某种过滤的，那么也就是说，从列宁那里出来的东西也都必须是经过了过滤的，因此在这种操作过程当中，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失误。

也许在威尔斯提出把领导人严格与外界隔离开的这种行为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不良后果的说法之后，列宁向这位恪守自己清晨散步、喝下午茶加牛奶的习惯的上流社会的英国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在英国没有爆发革命？你们为何不去准备革命呢？你们为什么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国家呢？因为我们的革命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整个西方也应该奋起革命！你们为何不奋起革命呢？

我朝参议院宫方向走去，开始没人拦住我，此外我也没有注意到周围有什么人。在这种寂静中我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尽管我放轻脚步走路，以便不制造噪声。是的，我眼前的这栋楼，斯大林住过。这是他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ieżda Alliłujewnawa）住过的地方，她后来自杀了。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越来越难与斯大林一起过日子了。1938年11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家庭的好友们相聚在一起，阿利卢耶娃也参加了聚会，不过斯大林来迟了一会儿。在斯大林进来时，阿利卢耶娃毫无顾忌地带有讽刺语调说了他，结果引起了斯大林的勃然大怒，非常粗暴地回击了她。有时候他会抽雪茄，但还是抽烟斗较多。为了向妻子发泄自己的愤怒，斯大林突然把烟斗向她的脸上扔去，结果掉到了她裙子的领口上，阿利卢耶娃拿掉烟斗，跳了起来，这时，斯大林迅速转身走出去了。阿利卢耶娃随即紧跟着他走了出去，斯大林坐车去了他的乡间别墅，阿利卢耶娃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住房里。庆典活动就这样不欢而散，几个小时之后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清晨，保姆斯维塔瓦娜（Swietłana）和斯大林的女管家卡罗琳娜·帖尔（Karolina Tiel）第一时间发现阿

利卢耶娃躺在自己床边的血泊中，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摘自罗伊·梅德韦杰夫的《历史的评价》）

从此以后，斯大林一直单身，在他身边几乎都是男人。但人总是要有些娱乐活动的，特别是在冬季漫漫长夜来临时，暴风雪肆虐，狂风呼啸于空荡荡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时候。

斯大林举杯向列宁致敬，以结束这顿吃到很晚的晚餐：“让我们为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大家的健康干杯！”

我们站了起来，默默无声地郑重地喝下酒，然后就醉醺醺地很快忘了列宁。可是，斯大林却继续绷着脸、非常严肃，甚至满脸乌云。我们纷纷离开了餐桌，就在我们要散去之前，斯大林走到一台大型自动留声机前，甚至想跳一些自己民族的舞蹈。他的节奏感还很强，过了一会儿就停下不跳了，十分无奈地解释说：“年龄不饶人啊，我已经老了。”

但是他的朋友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的大臣们，开始向他保证：“不，不，不，别瞎说。您看上去非常棒。您保养得相当好。是啊，以您的年龄……”

后来，斯大林又放了一张唱片，是一个花腔女高音娓娓动听的歌声伴随着狗的吠叫声。他夸张地狂笑起来，无法控制高兴的情绪……”（摘自米罗万·吉拉斯的《与斯大林的对话》）

斯大林又放上了舞曲，我们开始跳舞。我们当中舞跳得最好的人当属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米高扬跳完，然后是伏罗希洛夫，然后所有人也都跳了起来。我从来没跳过舞，现在跳舞就像奶牛在冰上走，但我还是跳了。卡冈诺维奇也跳了舞。他的舞姿也不比我的好多少。马林科夫也一样，布尔加宁以前曾跳过舞，肯定在年轻时跳过

舞，他随着音乐的节拍，用一只脚敲地，跳的是一种俄罗斯的舞。斯大林也在跳舞，他手舞足蹈……我们唱歌，我们唱歌就是为了随着斯大林放的唱片唱歌。后来斯维特兰娜（Swietłanka，斯大林的女儿）进来了……斯大林马上要求她跳舞。她遵照他的命令跳了舞，后来她说跳累了，我看见她很勉强，非常勉强地挪动着身子……斯大林自己脚下也开始摇摇晃晃了，但还是说：斯维特兰娜，你跳啊！她说：我不是跳过了吗？爸爸，我已经跳累了。但是斯大林就这样抓起她，拽着她的头发，整把地拽着她的头发，我的意思是说，整把地抓着她前额的头发，往前拽，也就是说，非常使劲儿地……拽着，拉着，撕扯着。（摘自尼赫鲁·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我还在往参议院宫方向走，突然有两个人出现在我的眼前。两个年轻人，体格健壮，身穿灰色西装。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眨眼的工夫，真是一眨眼的工夫，坚定而果敢地出现在我眼前。其中一个人抬起一只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不好，这一切看上去都非常严重，而且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没问我任何问题，这是一场无声的戏。我站了一会儿，考虑该怎么办，最终我转身朝弹药库（18世纪的弹药库，不过现在毫无意义了）的方向走去。

我走着，落日的余晖照在眼睛上。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晚才发现眼前的这两个人。两个年轻人，身材魁梧，穿着灰色西装。跟刚才看见的那两个人一模一样，甚至完全一样，但肯定是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抬起一只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我又站在那里，犹豫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往旁边走，他们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知道往哪儿走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从照片上、画册上认识了克里姆林宫。但是我看到了照片上熟悉的代表大会宫殿的轮廓，于是我就往那个方向走去。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代表大会是在另外一个楼里召开的，因为我刚走近这个楼，眼前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身材魁

梧，穿着灰色西装。此外，代表大会宫殿里面一片黑暗，所有的大门都关闭着，我决定往南边走，因为看见那边东正教教堂和别的教堂闪闪发光的圆屋顶。我真希望，也许在那里他们允许我能进去看点什么。

到了这一地步，我得出一个结论，要想让自己的参观有成果，我就得以一种坚定的急促的步伐直线从甲地往已经设定的目标乙地移动。

结果这种方法也没能让我避免遇到身材魁梧，穿着灰色西装串联在一起的那些成对出现的年轻人。事情是这样的，仿佛我在行走间触碰了一块秘密的石头，碰松了一个暗道弹簧，把两个长相一样的年轻人弹向我的方向。我往后一退，或者往旁边一转身，他们就像迅速现身那样，迅速消失。

四处依然是空空荡荡的。

在这片寂静之中能听到偶尔发出的沙沙声和哀号声。我经过索波洛瓦（Soborowa）教堂广场，正好路过巨大的乌斯宾斯基（Uspieński）教堂和高耸的伊凡大帝钟楼。人在这里总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觉得会被这些巨大的教堂压得粉身碎骨，人们会在这种独特的建筑面前感到神情迷离恍惚。

最终，我走到了波罗维茨卡塔楼，这里警备森严，因为最高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进入克里姆林宫大门的。我想看看这个地方，因为我正在阅读一本关于贝利亚的书，1951年6月26日，贝利亚最后一次从这里进入克里姆林宫，那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四个月，赫鲁晓夫取代了他的位置，当时赫鲁晓夫担心贝利亚会杀害他并篡夺他的权力，为此他想先发制人，宣布逮捕贝利亚。我正在看的这本书叫《贝利亚：生涯的终结》，当时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基里尔·莫斯卡连科（K. G. Moskalenko）元帅回忆说：“6月25日早上9点整，赫鲁晓夫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带几个可靠的人到在克里姆林宫的马林科夫总理办公室去，那曾是斯

大林的办公室。他还补充道，让我带上地图和雪茄。我告诉他，我戒烟了，我在‘二战’的时候已经戒烟了。赫鲁晓夫哈哈大笑说，但你必须带来一些雪茄，可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些雪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想告诉我，让我带武器来。”

赫鲁晓夫说雪茄，是因为他不能说“手枪”这个词，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被监听，事情会马上败露。

11点时，马林科夫和他的人全都乘坐布尔加宁（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元帅的大轿车来到克里姆林宫，大家都在静等。

过了几分钟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走到我们跟前，开始对我们说，贝利亚最近一段时间对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无礼，还在暗中监视他们，监听他们的电话，刺探和监督与这些政治局委员来往的人员并对他们态度极其恶劣等。他们还对我们说，马上就会召开政治局会议，那时他们会给我们信号，让我们进去并抓捕贝利亚。

后来朱可夫元帅又详尽地解释说：

我和莫斯卡连科以及他的副手们，还有米特罗凡·伊凡诺维奇·涅德林将军和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将军坐在一间屋子里，我等着两声铃响，这是我们的暗号。他还提醒我说，贝利亚体力很强，他还会柔道。

“没关系，”我回答说，“我也不弱。”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听到任何铃响。我开始变得有些不安起来，别是贝利亚智取了所有的人吧。就在此时，铃声响了。我马上起身，我们进入了政治局会议的会场。贝利亚坐在中间的桌子后面。我的将军们包围着桌子，我走到贝利亚身后，并命令他说：“起来！你被捕了！”

贝利亚还没来得及起身，我就已经把他的双手扭到了他的身后，并往上拉他，免得他挣脱我。我看着他，他脸色苍白，苍白得可怕，而且惊慌失措。

我们把他带到了等候室，然后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对他进行了搜身，对了，我还忘了，在扭贝利亚的手时，我迅速地摸了一下他的腰带，检查他是否随身带着武器。

我们一直把贝利亚在一个房间里关到晚上10点钟，然后趁着夜幕把他裹在地毯里，扔进汽车带出了克里姆林宫。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们注意到他，避免他们给贝利亚的人通风报信。

后来判了他死刑，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行，而是因为他要篡权，而且立即执行了死刑。

莫斯卡连科从离城市最近的尼克尔斯克塔楼大门把贝利亚拉出了克里姆林宫。

我现在走出相同的大门，来到了特威尔斯卡（Twerska）大街（原来叫高尔基大街）。这里的年轻人正在举行示威游行，我走向前去，想听听他们正在喊什么。他们手拉着手行走着，并且高喊："可口可乐万岁！"

而在另一边，也就是在特威尔斯卡大街上方，是一群疲惫不堪、饿着肚子的人们，他们今天为了看列宁墓而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现在他们又去排队——就是去麦当劳排队，为的是买一个加西红柿酱的汉堡包和炸薯条。

困境

那些发生在1990年的事，我不能过早地讲出来，因为我不想暴露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在我去埃里温的前一天，我曾在莫斯科跟嘉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Galina Starowojtowa，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代表，后来担任叶利钦的少数民族事务顾问）见面。我那时是第一次与她见面，她是一位又高又壮的女人，但很有气质也很热情，面带友善的笑容。我知道她隔天也要飞往埃里温，她说："那我们在那里见面。"还补充说："也许我能帮上你什么，但我也不敢肯定，到时候再说吧。"

我很理解她那种带有不确定的口吻。因为那时我想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实际上在那时这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因为你是没有可能从陆地上去那里的：那时整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在阿塞拜疆领土内的一块亚美尼亚的飞地，是被红军驻军和阿塞拜疆民警部队包围的地方。他们把守着所有通道、高速公路和大小路径，把守着所有要道、断岩层、山坳、悬崖断壁和山峰。想要突破这个戒备森严的严密封锁网比登天还难。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根本就不想去一试身手。时下只有一条空中之路，也就是从埃里温乘飞机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的航班也很不固定，时有时无。坐飞机去那里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因为除了飞机票特别难弄到以外，还有人们为了等从埃里温飞到那里的航班，要等数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么多钱）。尤为重要的是，要想买到飞机票，还必须具有苏联护照另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身份证，或者持有莫斯科军队司令部的特许。我手中所持的证件不符合上述任何条件。

我在夜里飞到了埃里温。第二天一整天都待在饭店等电话。我随身

带着亚美尼亚的编年史书。讲述千年历史的篇章非常美，但不能看太久，那里蕴含着如此多的悲哀、如此多的痛苦，令人看了泪流不止。亚美尼亚人的命运：数世纪遭受迫害、数世纪被驱逐出家园、亲人离散、流离失所、惨遭杀害。这在编年史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每一页中都详述了谁在为生存祈祷、谁在为生命的延续哀求。在每一页都记载着畏惧恐慌，每首诗中都是心惊肉跳和恐惧不安。

第二天清晨，电话声响了。我听到了嘉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的声音，“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惦记着你，”她说，“我们在考虑你的事情，帮你寻找出路。你耐心等一下，有个年轻小伙子会去找你。”

那个年轻小伙子叫古仁，中等个儿，强健壮实，精力充沛、动作灵敏利落，他看了我一下，就面带难色。“怎么啦？”我问。他打开手提箱，里面有几本苏联护照。那几本护照都是亚美尼亚人的护照，但都是亚美尼亚十几岁男孩儿的护照，最大的也只有24岁。他们全都不在世了。“这个在苏姆盖特（Sumgait）烧死了，”古仁说，“这个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掐死了。”“他呢？”“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照片上那些人长着同样的黑眼睛，用同样严肃的黑眼眸盯着我们。最终古仁挑出了一本护照，上面的照片有些模糊了（水弄的？还是汗弄的？），他说把这本拿走用吧！

然后他让我坐进一辆残破不堪的莫斯科人牌汽车里，这辆车除了发动机（希望如此）和刹车还管用以外，其他的都不管用了。我们就这样穿过了城市。立即觉得自己进入了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好像身处德黑兰、加尔各答或者拉各斯的大街小巷中，因为在那里根本无人遵守任何规则，马路上也没有交通灯和路标。但是这种混乱、嘈杂和疯狂的交通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和意义，它给人的印象是，尽管谁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每个人都以自己随意的方式开着车，有横穿马路的、倒车的、歪歪扭扭行驶的、绕圈转的，但最终所有的人（不管怎么说是大多数人）都

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我们也是，在汽车行走时冒着燃油的臭味里和老破车的叮当乱响中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到哪儿了，我一点儿概念都没有，然而经验告诉我，无论什么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怎样危险、不确定的、未知的境遇中，这时最好不要问任何问题。如果你问问题，就是说，你不信任他们，你自己感到不安和害怕。你不是说你愿意吗？你是否已经决定准备好了面对一切？此外，也没有时间了！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踯躅不前、想选择退路，一切都太晚了。

这是在市中心的一座老楼房，古仁把我带到了二楼。这是这个超级大国中的典型住房——杂乱拥挤。为了维持哪怕一点点的整洁干净和秩序都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不讲友谊的斗争，没有肥皂和洗衣粉，时常连水都没有。甚至经常断水，因为城市正在干旱化，水越来越稀有，人们无论在这里在那里都得到处找水，还必须耐心等待水。我现在来到的这个住家，把阳台做成了封闭阳台，封闭阳台的窗户伸到长满树木的庭院里，就在这个封闭阳台里，有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只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她就是嘉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其余的大都是蓄着胡子的年轻人。这些蓄着胡子的年轻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本身就说明，在此地附近的某个地方是斗争的前线，也就是为争取自由和权力的前线。在亚美尼亚甚至有两个前线，一个和帝制战斗，一个和阿塞拜疆。城里到处都是敢死队员，他们或站在街头，或开着大卡车兜风，把能武装自己的东西都带在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但人人手里都有枪。这些坐在桌子后面的敢死队员们对我的到来给予了非常热情的欢迎，一阵寒暄之后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一片沉寂。

“雷沙德，”我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你今天就飞到斯捷潘纳克特去，跟斯塔罗沃伊托娃代表乘同一架飞机，但你得佯装是飞行员，你要装得不认识嘉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明白了吗？”

“当然，明白啦！”我回答说。听上去我几乎是在举行庄严肃穆的宣

皙，我在这个住房里没待多久，因为古仁说，我们得去机场了。

我还需要描述埃里温机场（我因为各种机会曾在这里待过）吗？我还需要描述在这个机场的清晨吗？我要描写那些睡在长椅上、水磨石地板上和石阶上的成百上千的人们苏醒的状况吗？我要描写那些人们是怎样在谩骂、咒骂和婴儿的哭声中醒来起身的吗？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睡觉的？一些人是从昨天开始在这里睡下的，这是他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而那些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满脸胡茬儿、脸色灰暗的人呢？他们是一周前来到这里的，而我们不想靠近的那些浑身恶臭扑鼻的人呢？他们已经在这里一个月有余了。因此，所有的这些人就像一个人一样，一经醒来，就东张西望、挠着痒痒，哈欠连天。某个男人起身，正想把衬衣塞进裤子里，某个妇女正在试图把头发塞进头巾下面，她的头发又黑又亮，真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人物山鲁佐德妻子的头发。现在到了大家都有各种需求的时候了。人们开始四处张望，越来越紧张地左顾右盼，能到哪里弄点儿吃的？能在哪里方便一下？能在哪里上厕所？在飞机场一共有四个卫生间，如果乐观地分析一下，就算每个卫生间都开放，那也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让这里所有人能在那里方便一下。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厕所都开放，确切地说，就是根本无法使用它们。因为不知是早在什么时候，马桶就堵塞不能用了。既然马桶堵了，所有的脏水都往上涌，于是人们开始在马桶周围方便，人们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见缝插针的方式填满了地板上的每一寸地方。因为他们在厕所周围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活动的范围了，于是就开始继续往前挪，继续扩大自己的范围，谁都能理解，出于人性生理的需求还要开辟新的地段，这样开辟出的新领域就越来越广。

是啊，让我们再试想一下，成年人看到这四个厕所门口周围黏糊糊、臭味熏天的东西，会去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方便，那孩子们呢？小孩子们必须小便呀！这是刚满一周岁的小女孩儿，她得小便呀，甚至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儿也得尿尿呀，尽管他比别的孩子大一些，那也必须得

撒尿呀。因此，机场警卫有必要对孩子们随地大小便的事情大发雷霆和惩罚他们吗？

还有一些人跑来跑去，试图打听是否有飞机来了。是否有飞机会来？什么时候来？等等。不会有人去问飞机上还有没有空座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飞机上从来都不会有空座。那些像疯子一样跑来跑去到处打听事情的人，都是些新来到这里的人，是些还没有经验的人，他们大约只在这里待了一到两个晚上。来这里时间长的人早就在原地不动了，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空忙，他们宁愿待在一个地方，看好自己长椅上的座位。他们坐在那里一步也不挪开，像患了自闭症的人似的，与外界的人根本没有交流，就像被关在疯人院的人一样。

还要描写一下在接受人们提意见的小接待室里的情形吗？那里有一个值班的亚美尼亚人，看上去他当过拳击运动员、撬马蹄的大力士或摔跤手。但是也只有这样的角斗士才有可能在体力上承受得住这群推来搡去、高声抱怨和袒臂挥拳的人们，他们的拳头像能致人死命的乱石从四面飞来。在这群人当中有如此多的不幸、如此多的悲剧。这位妇女今天必须赶到乌拉尔山去，因为她要去参加在部队丧生的儿子的葬礼。我不想形容出她的喊叫、她的表情、她用十指撕扯头发的样子。这位男子突然失明了，必须赶到基辅去做手术。这好像是唯一的机会，否则他就会致残一辈子。在这个小小接待室的墙边默默地站着一队妇女，她们也需要乘飞机走，她们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能让她们着急生气。高高隆起的肚子，随时可能会生产。

我跟着古仁推开为某事（或者某人？）拥挤执拗的人群，推推搡搡地穿过人群走到了飞行员的机舱。见到我们的其中一人起身欢迎我们，这个人很瘦，比我略高一点，他叫苏仁，告诉我让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停车场，让我上了他的汽车。在汽车后备厢有一套制服、外套和裤子。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熨了一晚上这套衣裤。“我们现在还需要弄到

肩章和帽子。”他又补充说。我在他的汽车里换好衣服，把我的衣裤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我们回到了候机楼，苏仁找来了一位空姐，我看见他跟她交代了几句，然后她转身走了，我们一边等她，一边随便聊着天气等无关紧要的事情。最终她又出现了，并点了点头，意思是让我跟她走。

她拿了一把飞行员办公室的钥匙，在那里她为我找到了适合的肩章和帽子，我装作机长身份。她把我送到了走廊里，并对我说：“我留在办公室，你自己去苏仁那里。”她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接着往前走，但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刚走近候机厅，人们看见了“飞行员”，一股脑儿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我们往哪里飞，什么时候飞，我是否能带上他们。

如果只回答问题我还能行，可是我看见有两个人推开乘客，往我这里走来，很快我注意到他们是我的两个对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用非常坚定的口气对我说：“所有人只有通过我才能买到机票！”（一句话，在这里以合法手段买到机票，也只能是在这条荆棘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或者甚至只是最初的一步。一个人能否乘飞机离开，还取决于对其中某个黑社会的贿赂的数字，这两个黑社会的头子就站在我的面前。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来自西方的人会不知所措，他们倾向于把任何现实都看成是透明、清晰和符合逻辑的。于是具有这种哲学思维的西方人在被抛进苏联这个现实世界中之后，随时都有脚下失去根基的感觉，直到有人能跟他们解释清楚，即我们眼见的现实从来就不是唯一的现实，确切地说，并非是最重要的现实，在这里存在着多种大相径庭的现实，交织成一个巨大而又怪异的、难以解开的结，其实质是一种多重逻辑性，即最稀奇古怪的、杂乱的东西与逻辑系统彼此相悖，为此时常被那些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逻辑系统的人误认为这是不合逻辑或者是非逻辑的。）

我意识到，如若我稍有一点闪失，就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结果，这种情况迫使我要采取果断行为。于是我拼尽全力推开众人从一边溜到飞行员办公室。苏仁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与我同行的飞行员。他叫阿伟里克，我们立刻有种老相识的感觉。阿伟里克知道，在整个此次行动中隐含着多大的危险，但这一切又让他有某种使命感，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们当然知道，如果我被抓了，他们也会被同时投入监狱，他们也听说过劳改营的残暴。但是在我遇到他后，他一直很快乐，精神抖擞。他与苏仁完全相反，苏仁始终相当镇定，不外露，少言寡语。

飞机由苏仁和阿伟里克驾驶，这是一架小型雅克40型喷气式飞机，上面有26位乘客。在埃里温起飞时，没出现任何麻烦。机场摆渡车把我们和乘客一起拉到了离机场大楼很远的飞机停放处。我看见斯塔罗沃伊托娃和古仁（作为她的助理与她同行）都在乘客中间。其余的乘客都是那些疲惫不堪的亚美尼亚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心力交瘁，以至于无法表现出要回家了的愉悦。苏仁、阿伟里克和我进入了驾驶舱，我们关上门。苏仁开始启动发动机，驾驶舱里的气氛很好，因为我的这次旅行计划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里有苏联的高级官员，她还是苏联的知名人士，同时也是大众熟知的最高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她此行是去拜访她的选区，还带着给各个学校的礼物，同时她还想与投她选票的人们见面，自然可以理解，她会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和尊敬，而我在这种热烈和诚挚的气氛中，或许可以作为她的私人飞行员出现（如果这个方案不变的话，那我就要一直假装根本不认识斯塔罗沃伊托娃）。

我们的小型喷气式飞机从埃里温飞到斯捷潘纳克特要用三刻钟，需要飞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两座山脉——上卡拉巴赫山和卡拉巴赫山，它们构成了高加索东坡，东坡越来越和缓，仿佛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走向库拉河，然后进入阿塞拜疆，与阿拉斯河汇合，最后注入里海。如果再往东二三百公里，这条河清澈的河水就汇入被石油污染的

里海的黑水里。

苏仁和阿伟里克驾驶着飞机，我们坐在宛如悬在半空中的剧场包厢的驾驶舱内，从那里我们观看着一场非同寻常的哑剧——山脉的舞动，这个舞剧的节奏缓慢，像是在梦游中静止不动，但同时这些默默无语的岩石形成的山脉在缓慢地移动，变换着自己的位置，转动着，俯身低垂向大地鞠躬或高耸入云。这些山脉或跳着双人舞、群舞或者列队，不断更新着组合排列的方式，像是在瑞士周围，这里有吃草的羊群，有条条奔涌的河流，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场。

斯捷潘纳克特机场监控塔台的声音把我们从冥想中拉出来，我们开始降落了。已经能看到小山谷以及勉强可以看到房屋的线条，然后，没过一会儿，苏仁用手指给我指了指跑道，这条跑道看上去很不直，也很短，任何稍大一点的飞机都无法在这里降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降落在跑道的尽头，再往前就是岩石废墟了。我们缓慢地朝军营方向滑行，那边就是航空港。在我们快接近航空港时，苏仁和阿伟里克的表情变得僵硬：所有的地方都被军队包围着，到处都是国民军，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处于战时状态，这一地区由军队司令部管理，这是被从俄罗斯深处派来的克格勃的一支军队，苏仁小声说，这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军人，他刚刚把发动机关掉，我已经看见，武装突击队已经包围了飞机，有一些军官模样的人朝飞机方向走过来。苏仁对阿伟里克说了句什么，然后指给我看。阿伟里克明白地点了点头，对我说，你走在我的前面。我们走出机舱，这架飞机唯一的出口是在机身尾部，阿伟里克打开机舱门，飞机悬梯落下地面。我觉得热空气迎面而来，我看见士兵们集结在悬梯下面。“出去，马上出去，往前走。”我听见阿伟里克的声音。

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不能有一点儿犹豫，不能做任何不确定的姿势和不需要的动作。我跑下阶梯，穿过围在阶梯下面的突击队员和国民军，一直往前走。阿伟里克走在我的旁边，我希望他知道下一步该怎么

办。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叫住我们，没有人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径直走出排列在那里的装甲车队和坐在这些装甲车阴影下士兵们的队列，在这里也没有人命令我们停下来，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穿着飞行员制服，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刚驾驶完飞机。我们沿着这些车辆往前走了近一百米，一直走到一个小木屋的门口。这里是一个酒吧类的小屋，但里面只有一种饮料——热柠檬汁。阿伟里克给我买了一杯柠檬汁（我因为在慌忙中忘了带钱），并对我说："你坐在这里等着。"他没有跟我告别就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位我从未见过的留着胡子的年轻人，他在我身边绕了一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坐在这里不要动，从现在开始由我来负责保护你。"然后又消失了。

在这个酒吧里等待的时间开始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热锅上的蚂蚁。酒吧里有几张桌子，但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来这里的人流还很大，不停地有人来这里买柠檬汁。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军队的巡逻队。我们想想看：这是位于俄罗斯深处的一个共和国高山处的很小的临时机场，唯一一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小的只卖柠檬汁的酒吧，现在天气很热，人人都口渴难忍。最感到饥渴的男人是那些军队的巡逻兵，因为他们都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身上还带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巡逻。这些巡逻兵有什么可做的呢？其实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就是走来走去并作临时检查、走来走去并寻找着什么、观察、提问。在这种死寂的沉闷和绝望中天上掉下馅饼：在（唯一的）酒吧里，在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坐着一个俄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走上前去问问他。比如说，问问他从哪里来，或者去问问他到哪里去。问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吧，尤其是在军队巡逻队的执勤时间，尤其是在目前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这个地处麻烦的地方，在这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山地区。很少有人来这里，到这里来是很困难的。在这里不会放过任何人。

如果是被俄罗斯的巡逻队员抓住，这还凑合，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亚

美尼亚人，我说俄语，但带亚美尼亚口音。要是被亚美尼亚巡逻队抓住，那也还可以对付，我说俄语，但带有口音，可以说是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口音，最可怕的是被这种俄罗斯-亚美尼亚军队的混合巡逻队抓住，那就会毫无脱身之术了。

第二个麻烦是，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当然在我衬衣的口袋里揣着一个能被认可的苏维埃护照，可那是一位已在苏姆盖特被杀害的亚美尼亚年轻小伙的护照。

一个小时后那位蓄胡子的人出现了，我说："你知道吗，我不能再在这里坐着了，他们会把我抓走。"我也发现，他有些紧张。"坐下，"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坐下。"然后就不见了。尽管暑热难耐，但我还是把帽檐拉到了眉梢，假装在打盹儿。这是一顶很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帽子，周边缝着各种各样的装饰，上面还缝着橡树叶。现在我把这顶帽子当成了盾牌、屏风，藏身于其下。我还做出一种姿势，令任何前来检查的人都不想挨近我的姿势，这里带着某种野蛮、强硬、令人反感的姿势，以这种姿势向每一个前来的人表示——最好别碰我！

在这个酒吧里坐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飞机起飞的隆隆声，于是我感到更加孤独，有种深陷极端困境的感觉。幸运的是，就在此时蓄胡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他说："跟我来。"我走出酒吧时有种被从高墙之后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感觉。我们沿着机场通往城区的道路走，走了不到100米就到了那个地方，在路旁的那个地方，靠下边一点，有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在路边的一个树荫下坐着一位老年亚美尼亚人，他向我的这位蓄胡子的年轻人点头做了一个让他明白的姿势，于是我的这位向导就把我带进了一辆黄色的——金丝雀黄色的拉达（Lada）牌汽车里，对我说："你坐在这里，别动。"然后又不见了。一方面我在这里比坐在酒吧里觉得更自在一些，在那里我像是一个被支在那里当作射击用的活靶子；另一方面，坐在被晒了一天的汽车里，就像坐在火炉

里一样。我真想走出汽车，在停车场周围散散步，那位蹲在树荫下的老人说："别出来，他们就在附近！"真的，在50米开外的地方就有一个路障，旁边就是军队的岗哨。其实最简单的事就是，看见这个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阳光照射下那种辛苦的样子，请他去帐篷里喝口清凉茶，当然不这样也可以，哪怕跟他聊点什么，问问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来自哪里，干得怎么样之类的话。因为需要说话，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毕竟人得说话，尤其是在提倡开放政策的现在，甚至现在已经允许与陌生人说话了。

最糟糕的是，我依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显然我们在埃里温制订的乐观计划，现在泡汤了。本来是计划有当地的权贵们来欢迎斯塔罗沃伊托娃，这个欢迎仪式可以持续一刻钟，或许半个小时，然后我们乘车去城里用午餐，向孩子们赠送礼物，参观公园，与斯捷潘纳克特居民见面，整个过程都充满热情、好客、诗情画意的意境。可是这次在飞机旁等待的不是当地的权贵，而是被克格勃部队包围。不仅没有任何欢迎的场面，而是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我问那位老人（他一直坐在树荫下，眼睛望着机场的方向，甚至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没转过头来），斯塔罗沃伊托娃是否已经到了城里，他却用痛苦的声音回答说："没有。"这就意味着，我推测，或者她被扣在了机场，或者她被要求乘我们来的飞机又回到了埃里温。但是这位亚美尼亚人并不知道这些。

这位上了年纪的亚美尼亚人仍然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东方阴谋集团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会一动不动地像这块土地上遍布岩石景致中的那块巨石一样，拄着拐棍坐在东方城市中泥土遍地的大街小巷里。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识过。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他们，任何人都无法欺骗她们，无人能战胜他们。现在依然如此，有这个坐在树下的人在我身边，我感觉好了很多。

我试想着万一被他们抓到的一些对策。

你是从哪里弄到制服的？审讯我的人问我。

从哪里弄到的？我在华沙买的。在华沙你能从俄罗斯人手里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一种制服。尉官服、校官服，甚至将军服。你们还可以买到武器，不过你们看，我没有武器。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买的是俄罗斯航空公司飞行员制服？

因为我早就想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来，但我知道，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到这里来。我太渴望来到这个地方了，因为我担心这里人民遭受被斩尽杀绝的命运，因为他们想斩尽杀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居民。

你真是这么想的？审判官问。

是啊，这是真的。我非常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小岛，再过几年伊斯兰激进分子会像洪流般淹没这个小岛。这股洪流正在上涨，您看不见吗？

你是从哪里弄到苏姆盖特这个人的护照的？

这个护照是我在埃里温机场窗台上捡到的。没人注意到它。

是谁让你上飞机的？

谁也没管我，我就自己上了飞机。我是坐着机场摆渡车与其他乘客们一起上的飞机。如果乘客们会问飞行员，你为什么上飞机，那才是奇怪的事呢。

值班员，审判官呼叫民警，把被抓捕的人带到牢房去。

我的时间很多，所以我就想了各种各样的供认方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牵涉任何人、不能连累任何人。

从我们降落到现在为止已近四个小时过去了，这时我看见从市区方向开来了一辆黑色礼车停在了岗哨附近，但离岗哨还有一点儿距离。这种车在帝国只有高级官员才能坐，因此我想，好啊，现在他们派车来了，那就可能是放斯塔罗沃伊托娃进城。过了一会儿，蓄胡子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神情非常紧张，像在搞地下活动一样），他说："马上离开！"其实用不着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能走，就成功一半了。

我们坐上车，用力关上车门，车立即开走了。我们的车在往城市方向开，在柏油马路的沿途，每隔几公里就停着一些装甲车和小型坦克车，整个地区就像是个巨大的军营。忽然在马路上出现了一个又高又沉重的像是伫立于迷宫的水泥楼群，汽车必须减速慢行小心翼翼穿过这些楼群，那里站着士兵在检查来往的车辆。蓄胡子的年轻人见到这些障碍，马上对我说："你躺下，装成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人。"他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于是我立即倒在后座椅上，用帽子挡上了脸。我听见蓄胡子的年轻人对把头伸进车里的战士说："喝醉了，酩酊大醉，疲顿了。"

我们的车接着往市区方向开，我看见右边是山，左边是深深的沟壑，下面有一条弃置不用的废铁路线。蓄胡子的年轻人对我说，你坐起来吧，但是如果再碰到检查的人，你还得假装烂醉。但是我们后来又遇到了几个岗哨，他们没拦截我们，我们继续走。现在路两旁开始出现了绿树成荫的成直角相交叉的狭窄街道。过了一会儿车子进入了一个居民楼群中的一条街道，蓄胡子的年轻人对我说："下车吧。"我下了车，汽车带着那位年轻人立即开走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周围，就有一

位老年妇女跑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把我带进了一个单元的楼道里，急匆匆地说了一句“上三楼”，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我刚到三楼，一个房间的门就已经开了，我进了一个人家里去，那里围着一群妇女和孩童，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大叫起来，跟我握手、拥抱、对我说着什么，我看到人们脸涨得通红，带着胜利的喜悦。“混账！流氓！占领者！”女人们都十分激动，“他们到底还要折磨我们、奴役我们多久！”她们一边谩骂、咒骂着当局，一边给我热着早已经凉了好久的午饭，同时她们还在不停地用新想出来的词咒骂着，威胁着。

进来了几个男人，他们也拥抱了我，跟我握手。他们的到来让整个吵闹声平息了下来。我换上了衣服，他们给了我一套平民服装（房主人的？某位邻居的？）。

晚上我们将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跟卡拉巴赫委员会的人们见面，因为不允许他们外出，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能无声地抵抗，他们希望世界能了解亚美尼亚当地人的命运，了解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惨遭遇。这种意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传到某个地方，这是被奴役的人们的急迫需求，他们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板子那样相信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他们深信，只要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能理解他们，就可以证明他们是有道理的，就能赢得自己的胜利。

夜幕降临了。我们都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围坐在一张笨重的长桌旁。这是一个典型的亚美尼亚人的住房，桌子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是房子和家的中心。桌子上总是要摆着各种各样的吃的，家里有什么就摆上什么，因此桌子不能是空的，因为光秃秃的桌子会疏远人际关系，而且会让谈话变得冷淡。桌子上摆的吃的越多，就越证明我们对人的真诚和尊敬。

“我们的问题是，”在场的一个人说，“怎样才能继续生活下去？”这

个问题已经悬在亚美尼亚人头上数百年了。数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十七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就是我们亚美尼亚的国教。但是我们的文化有种被动性，是贫民文化，是防御性的城池文化，我们从来就没有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我们从来没有过那种使命感和统治别人的欲望。不过我们却陷进了那些打着“先知”旗号的人们的包围圈之中，这些人总是想征服我们这部分世界。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伊斯兰健康肌体中的一根毒刺。他们一直在想如何拔掉这个刺，也就是说要把我们从整个地球上彻底抹掉。”

“现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就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另外一个人说道，“我们曾经是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军队踏入了我们的土地，把居住在今天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交界的亚美尼亚人分割成了两半。因此我们的先辈们躲进了上卡拉巴赫的大山里，避免了一劫，而高加索的土耳其人，也就是阿塞拜疆人进驻了在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人迹罕至的地带。这一地带只有13公里宽，但就是因为他们移居到那里，现在既无法开车过去，也无法步行过去。为此我们就成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伊斯兰心脏地带的一个基督教孤岛。加上阿塞拜疆人属什叶派教徒，他们的精神领袖是霍梅尼，只要我们还存在一天，那他们就一天都不会善罢甘休。”

“斯大林，”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补充说，“斯大林很了解高加索，他自己就是高加索人，他知道在这片山区居住着一百个不同民族，而且他们之间的战争一直不断。这是一个被重重封锁的封闭的死胡同，同时还是被黑海和里海两大海分隔的世界，是一个被两座高耸入云的山脉分割开的世界。有谁会到这儿来？谁敢再往进深走？斯大林最会做火上浇油的事情。他知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将一直会是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争夺的一块骨头，因此他没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统一，而且把我们的这一地区留在了阿塞拜疆，由巴库统治。因此莫斯科就占据了最高决策者的位置。”

“尽管我们与巴黎和罗马相距甚远，”一位坐在桌边末端的老者说道，“我们是基督教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在很靠边缘的地方。让我们看一下地图，欧洲的西部有一条十分明显的海岸线，再往远处就是大西洋了。而在欧洲东部呢？怎样才能在这里画出边界线呢？在东部这个事情不是十分清楚，这部分欧洲在自行瓦解、在衰减、在消融。我们必须制定某种标准，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标准，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标准。欧洲地域应该包括所有那些忠实于基督教思想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亚美尼亚人就是在东南方最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民。”

“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着两条对立路线，”另一位亚美尼亚人从桌子的同一个末端发出声音，“一条线是在地中海沿线，第二条线是在高加索山脉一带。如果大家都注意到了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在欧洲，可以推论一下，我们的后辈们将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即斯捷潘纳克特将会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城市之一。”

“但愿我们撑得了那么久。”又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为了表明与刚刚说话的那几个人的论点有所不同，房子主人把我叫到窗户边上。那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排排灯光闪耀在高悬的天空上。“在那边的高山上，”房子主人说，“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小城，叫舒莎，我们被他们掌握在股掌中，他们随时都会射杀我们。”

人们在这里能呼吸到的就是困惑、恐惧、仇恨的气息。

“亚美尼亚人，”一个参加讨论的人说，“从来都没同意过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割出去。为此在亚美尼亚每隔几年就会爆发暴乱和起义，尽管斯大林的严酷镇压和勃列日涅夫的压制。1988年6月，亚美尼亚国家共和国议会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议会提出的与亚美尼亚统一的要求。但巴库说，不行！莫斯科总是会站在强者一边，因为阿塞拜疆一直比我们强很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只占国家面积的百分之

五、人口的百分之三。莫斯科利用这一事实，即巴库威胁要占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因此在这里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处于莫斯科的占领之下，如果莫斯科撤离这里，我们就会处于巴库的占领之下。”

就在我们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单元门前出现了动静，门打开了，几个人簇拥着斯塔罗沃伊托娃走了进来。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而且神情紧张，尽管她努力保持镇定，营造一种愉悦、畅快的气氛。她给我们讲了自己的遭遇。她刚走出飞机，就被几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区司令派来的军官抓捕，他们对她说，她无权回到斯捷潘纳克特，他们想方设法劝她回到埃里温去。但是斯塔罗沃伊托娃坚决反对并说，如果一定让她回去，那他们就得把她抬上飞机。这些军官很清楚，这样做肯定会有问题。首先斯塔罗沃伊托娃是个又高又胖的女人，其次，这会成为极大的丑闻。于是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请示，想办法，该怎么办？负责这件事的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博夫（Ayaz Mutalibov）（他现任阿塞拜疆总统），他从巴库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汇报如果不驱逐斯塔罗沃伊托娃，他们就要对她采取行动。而莫斯科希望能与穆塔利博夫、与伊斯兰、与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关系，谁还会在乎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于是斯塔罗沃伊托娃也立即采取行动，她尽一切努力留在这里并与人们见面，她想让大家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她的理由也很充分：飞行员看见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趁混乱之际飞走了。他们知道在斯捷潘纳克特机场没有照明设施，如果在同一天再次降落下来，时间已经太晚。

在巴库有人反对斯塔罗沃伊托娃，因为在阿塞拜疆，就如同在亚美尼亚，人们被分成两个阵营：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同盟者就是那些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的人，其他人均是敌人。

对阿塞拜疆人来说，同盟者就是那些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的人，其他人均是敌人。

这些立场的极端性和结果非同一般。因为甚至在亚美尼亚人中间你不能说：我觉得，阿塞拜疆人有道理，或者在阿塞拜疆人中间你不能说"我觉得，亚美尼亚人有道理"这样的话。这样说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他们会把说这种话的人打死。如果在错误的地方或者置身于错误的人中间你这样说了，那儿有问题（或者那儿没问题），都足以让一个人被掐死、被吊死、被乱石砸死、被烧死。

不可想象的是，在巴库或者在埃里温，你能公开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大家听着，几十年前（我们当中活着的人，还能记得那个时候吗？）有一位土耳其的帕夏和野蛮的斯大林向我们高加索的居民区投下了这个可怕的鸟蛋，为此我们世世代代受尽折磨和互相残杀，而他们在那里，在自己发霉的坟墓中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落后和污泥，因此我们真的该和解，是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了！

因此那个人的演讲永远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双方稍有一点和解之意，想说点什么，那个不幸的道德主义者和谈判者就早已经丧失了性命。

有三种瘟疫、三种传染病在威胁着这个世界。

第一种是民族主义的瘟疫；

第二种是种族主义瘟疫；

第三种是宗教激进主义瘟疫。

这三种瘟疫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进的、万能的、绝对非理

性的。任何人的思想染上其中一种瘟疫都无法自拔。在这种人的头脑中燃烧着某种神圣的火焰，只等着有献身者上门。种种冷静会谈的努力都会与其目标脱节。他不是要会谈，他是要宣言。就是让你点头称是、承认他有理、签署加入他的同盟。否则在他的眼里你毫无意义、你根本不存在，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道具、一个武器。如果你不屈从于他们，那你就什么也不是。

传染上这种病的头脑是一个封闭的头脑，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只围绕一个单一主题，也就是只能围绕一条线——自己的敌人——运转。心里总是绷着敌人这根弦，我们就激情满怀，就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敌人总是存在的，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有一次在埃里温附近，一个当地的导游指给我看一个亚美尼亚古老的大教堂之一的建筑时，在他给我解说完时，用蔑视的腔调说：那些阿塞拜疆人盖得出这样的教堂吗？后来在巴库也有一个当地的导游指给我看以新艺术装饰的联排房子时，他也用蔑视的语调说：亚美尼亚人建造得出这样的联排楼房吗？

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有值得人们羡慕的地方。他们并不会为纷繁的世界的命运，也不会为人生的无常与脆弱担忧。他们根本不去费这种心思，通常他们对诸如这样的问题也都不屑一顾，譬如：真理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平正义？他们根本不会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不会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这样做对吗？

他们的世界很小，就只有几个低谷和几座高山。他们的世界很单纯，一边是我们——好人，一边是他们——我们的敌人。他们的世界由纯粹的排他性定律所统治：要么我们，要么他们。

如果还存在别的世界，他们会让世界怎样做？他们需要世界给他们安宁。他们需要的安宁就是不要管他们的事情，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早上太阳唤醒了我，我起身下床，走到窗户边。我站在那里，简直就被惊呆了。我真的是置身于世界最美的角落里啊！好像身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罗多彼山，好像置身在安道尔、圣马力诺、科尔蒂纳丹佩佐。因为昨天的紧张气氛，我根本没注意到我周围还有这么美丽的景色。现在才看到我周围的这一切。阳光，到处都是阳光普照。温暖，但伴随着刺骨的山风。到处是蓝色，耀眼的蓝色、深蓝色、透明的蓝色和钴蓝色。空气非常新鲜、清澈透明。远处的高山被白雪覆盖，近处的山已经泛绿，草木苍翠茂盛，那里有山松、大片草地、草坪、火光。

在这片迷人恬静的风景中矗立着斯捷潘纳克特城里的一片破烂不堪、破旧的水泥预制板居民楼群，大块沉重的水泥板粗糙、杂乱地随意拼凑在一起，显得十分贫穷破败。在我住过的那个地方，是个封闭的四边形楼群，在那些高楼之间，在阳台之间，居民们拉起了铁丝线，在这些铁丝线上有一些小滑轮在移动，在每个小滑轮上夹着人们晒的衣服，适当地移动这些小滑轮，就可以让这些衣服移动，以便移动到有太阳的地方，这样衣服干得快。因为空间不是很大，因此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大家都能遵守的图表，什么时间、谁家可以晾衣服、能量晒多少件衣服。从衣物的种类、大小尺寸和外表可以了解邻居们的很多私生活的内容。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购物信息。那位住对门的邻居是从哪儿买到了这么精致的长筒袜的？这些铁丝线拉到了院子里，拉到了小树中间，她们想得是如此周到，铁丝线盘来绕去。肯定只有当地妇女才有可能很娴熟地去掌握这里的时间表，晾晒衣服，翻动衣服，往前走，往后退，往边上晾晒，完全是一个衬衣、裤子、裤衩和长袜的大阅兵。

斯塔罗沃伊托娃要回埃里温去了，一大早在这个我藏身的住房里，亚美尼亚人一直在开会讨论怎么安置我的问题。他们怎么能把我带出去？各种从机场反馈回来的消息和人们想出的各种办法都非常可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区司令（将军，我就一直也没能记住他的姓名）想缓解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和他的盟友莫斯科的怒

气，决定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即千方百计阻止斯塔罗沃伊托娃再回到这里，让她在一种恐怖和敌意的气氛中离开这里。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们检查每一辆车，飞机场遍布军人，别动队的人甚至沿着跑道站着。

我发现，我的这些亚美尼亚人非常着急，开始吵起来了。我听不明白他们吵架的内容，但是我敢肯定跟我有关，因为他们不断地中断争吵，跑到我这边来说：穿上你的制服！（我穿上制服。）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说：不行！换上平民服！（我又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又进行了一轮争吵：不行，你得穿制服回去！我认真地执行他们的互相矛盾的命令，因为我知道，情况肯定非常不妙：我陷于困境中。我肯定无法穿过这种天罗地网登上飞机。

斯塔罗沃伊托娃（她在这里非常出名）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这个城市，在我们住的这栋居民楼前聚集了一大群人。如果聚集的人多了，军队马上就会出现，如果军人来了，他们就会盘查，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等等，他们循着这条线往纵深走，就能发现我们的隐蔽所。亚美尼亚人越来越着急了，他们争吵的温度骤升。

终于有一个打探消息的人（就是昨天那个非常能干的蓄着胡子的年轻人，昨天是他把我从机场带出来的）回来了，他对亚美尼亚人说了些什么，那些亚美尼亚人全都立即安静下来，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见那辆转着顶灯的警车了吗？”在我们楼前停着的那辆车顶上有一个蓝色的顶灯在缓慢地旋转。“你下楼去，”那位亚美尼亚人说，“穿过人群，坐到那辆车里司机后面的座位上。你必须保持非常镇定。”

现在我穿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服，下楼往院子里走，看见拥挤的人群中一张张脸庞，我推开人群，径直走向警车。车上只有司机，军士军衔，亚美尼亚人。我坐到他身后的座位上等着。斯塔罗沃伊托娃出现了，人群围上前去，此时军事巡逻队来了，个个金黄色的头发，应

该是俄罗斯人：情况非常危急。斯塔罗沃伊托娃迅速从人群中脱身，坐进了停在旁边的伏尔加牌汽车里。有两位民警上了我这辆车，坐在后座上，他们都是亚美尼亚人。一个民警上尉坐到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也是亚美尼亚人。

我们的车发动了，伏尔加牌汽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巡逻兵站在路上不知所措，按道理他们要检查所有的车，而这边是带着顶灯的警车。我们好像走在水泥大楼中间的迷宫里，然后穿过了一个半开着的路障。在这个巡逻岗上都是身材高大的金发年轻人——斯拉夫人，个个都是蓝眼珠，说俄语。

太阳、炎热，临近中午了。

坐在司机旁边的尉官神情非常紧张，他清楚现在是在冒着多大的风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的车开得很快，面前的道路还是变成了心理上无尽头的各各他[18]。

机场终于到了。我看见停在那里的雅克-40型飞机。啊，飞机在这里！但我们离飞机还很远呀！因为还得通过最难的障碍——通往飞机跑道的大门。在大门旁聚集着一大群人——突击队员、军官们。我们在离那里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斯塔罗沃伊托娃乘坐的那辆车停在了我们的车的后面。有一个民警下了车，她坐在了他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到了大门旁，我们立即被军队围了起来，那时尉官拿出军官证说："城区司令部尉官萨洛维杨，我有军区司令的命令，他命令我把斯塔罗沃伊托娃送上飞机。"然后这位城区司令部尉官萨洛维杨对着这些围在我们的车玻璃旁的士兵们重复着："我有命令……"

这些军人们慢慢开始散到一边，抬起路障的护杆，我们的车朝飞机的方向开去。斯塔罗沃伊托娃让车停下，说："我要去跟那些机场突击队员们告别，你们跟雷沙德一起在车里等一下。"

苏仁和阿伟里克站在飞机悬梯旁。“快进机舱吧，”苏仁对我说（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因为周围全是军人），“你坐到方向盘后面，戴上耳机。”我进到里面，士兵们正在里面用金属探测仪检查墙壁和地板，寻找着是否藏有武器。

过了一段时间，乘客们登机了，斯塔罗沃伊托娃也上来了。还有我、苏仁和阿伟里克。

飞行员们发动了飞机引擎，开始滑行。“他们还会让我们返回吗？”我问苏仁。“有可能。”苏仁说。在飞机跑道的两边都站满了突击队员，他们的钢盔用树皮和迷迭香伪装着。

我们飞向东方、飞向高山、飞向白雪，然后飞机一转身往西方飞去，那里是埃里温和亚拉腊山。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耳机里出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苏仁打开了他的麦克风，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苏仁摘下耳机对我说：“他们不会让我们返航了，你已经自由了。”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然后递给我他自己的手绢。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我这个大檐帽下面，汗如雨下。

中亚，海的泯灭

当机翼倾斜时，飞机划出了一道弧线，那时能看见下面被风吹起褶皱的大片沙漠，这是新形成的咸海大沙漠，确切地说，就是海底被翻到了海的表面上。

看着世界地图，如果你从西往东看，我们能在欧亚南部大陆看到四片海洋串起的一条链：最先看到的是地中海，再远一点是黑海，然后在高加索山脉之后是里海，最终处于最东面的是咸海。

咸海水源主要来自两条河水：阿姆河（Amu）和锡尔河（Syr），这两条河都很长，阿姆河长2212公里，而锡尔河长1450公里，几乎穿过整个中亚地区。

中亚除了沙漠就是沙漠，有褐色的风化石土地，太阳从天空中洒下的炎热气候和沙尘暴。

但是阿姆河和锡尔河这片土地就不同。两河沿岸都是耕地、丰饶的果园；随处可见结满了核桃、苹果、无花果、石榴的果树和棕榈树。

最惬意的是坐在自家果园的树荫下，坐在微风习习的凉棚下，享受清爽夜晚的静谧。

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水及其支流抚育了著名的城市——布哈拉、希瓦（Chiwa）、浩罕（Kokandza）和撒马尔罕——的兴起与繁荣。这也是满载商品的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道，因此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尼斯和塞维利亚，它们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自己增添了光彩。

在19世纪下半叶两河流域的大地被米哈伊乌·柴尔尼亚耶夫（Mihaił

Czerniajew）将军率领的沙皇军队占领，这部分地区从此变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变成了其在南方的殖民地，该地被称为突厥之地（Turkiestan），因为当地人（除塔吉克人以外）都讲土耳其语。那里主要的宗教是伊斯兰教。

1917年，突厥反沙皇统治的起义不是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组织的，而是由殖民主俄罗斯人组织的，因此他们一直掌握着统治权，只不过现在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人的统治。1924年这里被分割成五个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在斯大林时期大批的农民、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几乎所有的（本来这个阶层的人数就不多）知识分子都成了被镇压的受迫害者。来自帝国中心的俄罗斯人和被俄罗斯人同化了（所谓的表面被同化的）的当地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等——政客和官僚主义者取代了后者。

大规模的镇压结束后，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殖民地实行了新的统治政策。一般来说他们任用表面被同化了的当地人担任正职，但是他们的副手一律是始终直接接受莫斯科指令的俄罗斯人。新政策的第二个原则是，重新搭建起当地古老部落的组织结构，并把权力交给可信赖的和被当局收买的阶层的手中。后来在新思维时期，苏联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发布了令人震惊的声明，声明说要与帝国统治下的亚洲共和国中普遍存在的可怕的腐败现象做斗争，因此地方党委员会和政府里的要员都被关进了监狱。什么，难道所有的人都偷窃了吗？对，因为所有掌权者在党的委员会和政府其他机构名义的掩护下，与大的利益集团互相串通和勾结在一起。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竞争帮派，他们就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就爆发了区域性的内战，正如1992年在塔吉克斯坦那样。在每个共和国，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是地方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根据东方的传统，这一岗位的任期是终身制。迪穆哈迈德·库纳耶夫

（Diumchammed Kunajew）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26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撤销了他的职务。沙法尔·拉什多夫（Szafar Raszidow）担任乌兹别克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24年，直到他于1983年去世。盖达尔·阿利耶夫是克格勃的头子，担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23年。他们每个人的专车只要是通过城区的街道，那就是一件令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大事。英国人不知何时在亚洲和非洲发明了一个间接统治的体制，莫斯科接受了这一体制，并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这种统治制度，描述的插曲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段史无前例的海的泯灭史，理解其发展背景和造成其泯灭的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特别是在热带、沙漠地区尤为珍贵，因为那里的水资源很少。如果我拥有的水量只够浇一块田，那我就不能浇两块田。如果我的水量只够种一棵树用，那就绝不能种两棵树。人喝的每杯水都是用损害某种植物为代价换来的，植物的干枯是因为我喝了它生命中急需的水。为了那一滴我们缺了它则难以生存的水，人和人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一直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

是斗争，但也是合作，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依赖着脆弱和摇摆不定的平衡，如果触犯了这种平衡，那就意味着死亡。如果骆驼喝了太多的水，那给牛喝的水就不够了，牛就会因为焦渴而死亡。如果牛因干渴而死，那么羊群也会因焦渴而死，因为有谁会拉着运水车去牧草地？如果羊群死了，那人们还有肉吃吗，人靠什么生活？如果人赤身裸体虚弱无力，那谁去种田？如果没有人种田，那么就会遍地沙漠，一切都会被沙漠吞并，于是生命就枯萎了。

多年来这里一直种植棉花，棉布又轻巧又结实，而且还健康，这里指体感非常舒服。数个世纪以来棉布的价格一直非常看好，因为从来没有过度种植——其中最大的障碍曾经是（现在亦如此）热带地区长期缺水。为了开垦新棉花地，那就要占用果园用水、森林用水、牲畜用水。

到那时候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吃什么？数千年来生活在印度、中国、美洲的所有的人都了解这种困惑。而莫斯科呢？其实莫斯科也清楚！

这种大灾难开端于20世纪60年代。只在二十年间就把乌兹别克半数的绿洲变成了荒漠。因此首先是从整个帝国调来了推土机，这些烧热的金属蟑螂铺天盖地地爬过整片沙漠平原，占据了整个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岸，于是这些金属“公羊”开始在沙地中往深了挖，挖出了壕沟和沟槽，然后把河水引进这些新挖出的沟渠里。他们肯定挖了无数个这样的沟渠（现在还在继续挖），别忘了，阿姆河和锡尔河这两条河总共长3662公里呀！现在沿着这些沟渠，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要种上棉花。开始他们是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垦棉田，但是这白色的纤维总是供不应求，当局决定要让耕地、果园和花园变成棉田。不难想象，农民们当时是多么绝望和惶恐，因为这些——红醋栗树、杏树，或是一小块绿荫是他们唯一拥有的财产。在农村他们把棉花一直扩种到了各家的窗户前、以前的花坛里、人们的院子里和篱笆旁。在种西红柿、洋葱头、橄榄和西瓜的地上都种上了棉花。飞机和直升机在这些棉田遍地开花的村庄上空投下了大量的化肥，形成了大片农药毒气云层，人们被呛得咳嗽窒息，无法呼吸，甚至有人被弄瞎了眼睛。

赫鲁晓夫想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开荒种地，而勃列日涅夫呢，想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拥有自己大面积耕作的棉田。他们两个人都执着地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没有人敢站出来问一下，实现这一切的代价有多大。

这片土地的模样迅速得到了改变。稻田和麦田、绿草地不见了，绿叶甘蓝和辣椒也都不见踪影，桃树园和柠檬树全都消失殆尽。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棉花田。绵延数十公里、数百公里的田野一片白花花的，到处都是棉花的海洋。棉花生长了几个月后，就到了收获的季节。

中亚地区在收获的季节一切都大变样了。学校、机关、政府机构全都关闭，不上班。工厂企业只上半天班，所有人都到棉田里摘棉花去了，他们在酷热炎炎的阳光下劳作。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哺乳的母亲和老年人、医生和教师一个不落地都要去摘棉花。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人能免除这项义务，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没有棉花，你就把自己种上去，如果你不去摘棉花，他们就把你摘了。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的话题只有棉花，所有的人都关注着完成计划的消息。报纸、电台、电视只为一位女神——棉花——服务。在中亚，有2000万人住在农村。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事跟棉花有关的职业，其实除了棉花，这里什么也没有。农民、园林工、果园工，所有人都得改变自己的工种——都得作为棉花工人工作。他们被迫而且十分恐惧地去田里工作，这种强迫和恐惧是因为挣不到钱。在采摘棉花时他们的收入非常微薄。但是劳动强度很大，而且非常单调。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至少要弯腰一万到一万两千次。40度的酷暑高温，呼吸散发着化学农药臭味的空气，干旱和令人难耐的口渴让人们备受煎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更感痛苦。不过，你摘的棉花越多，我们的国家就更富裕和幸福！真是这样的吗？现实是，人们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一小撮变态野心家的自我感觉良好和他们地位的巩固。［摘自格力高里·热兹尼琴科（Grigorij Rezniczenko）的《咸海大灾难》］

众所周知，这些变态野心家指的就是那些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人物和在塔什干的拉什多夫之流的人物，他们在私下商定好的情况下，谎报棉花收成产量。这两个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黑社会，即操控棉花生意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宣传和金钱，将谎报的数千吨虚假数量的巨额的收入揣进自己的口袋里，中饱私囊。

这些统治者肥了自己，而他们那数百万的同胞们、那些厄运当头摘棉花的人却沦为乞丐。因为摘棉花只是季节性的活儿，全年最多只干一个季度，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他们既没有果园，也没有花园，既没

有牛群，也没有羊群，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毫无任何机会找到工作。生活黯然失色，只有在秋天收获的季节才能恢复其光彩，然后再次陷入沉重、酷热、令人窒息的热带麻木之中。

典型的殖民地境遇：殖民地提供原料，大都市把原料加工成成品。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采摘下来的最多百分之十的棉花是在当地加工的，其余的全都送到帝国中部地区的纺织厂加工。如果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停止种植棉花，俄罗斯的纺织工业区就得停产。

因为莫斯科颁布的法令曾这样表述（现在仍然是这样）：需要更多的棉花，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就不断扩大耕种面积，灌溉棉田的水量就随着增大。但根本就不在引流技术、铺设管线等方面进行任何投资。就是简单地把河水放出来灌溉整个棉田。但是就在水流到快要干死的部分棉花地之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水早就流失了，白白地渗进沙地之中。

明知在每片沙漠下面离地面几米或者十几米的地方隐藏着大片的浓盐矿床，如果水流到里面，那么随着潮气，盐就会开始翻到表面上来。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隐藏在下面的、颗粒状的、深藏在地表下面的盐开始往上翻涌，开始自由地游移。乌兹别克斯坦黄金般的大地最早是被棉花的白色覆盖，而现在却被有着亮晶晶的外壳的盐遮盖。

其实根本不用在地面寻找盐，每到大风刮起的时候，嘴唇和舌头就有咸咸的感觉，眼睛也有灼热感。

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水不再能流入咸海，而是人为地白白被糟蹋在路上，沿着3000多公里长远距离消耗到棉花田里，空耗进无边无际的沙漠中。由于这个原因，这两条大河平静宽广的水流——这一地区唯一的生命之泉——本应不断上涨和扩充（如大自然的自然规律），反而水流开始变小、缩退，河床变窄、变浅。无法再流入大海，变成了既咸又含

毒的泥塘，变成了臭气熏天的、黏糊糊的臭水沟，变成了诡诈的泥潭和沼泽，最终渗到地下，从人们的眼底消失。

木伊那克（Mujnak）这个地方，几年前还是一个渔港，现在矗立于沙漠之中，离海面大约有60—80公里。在这个地方附近，也就是渔港的附近，在沙丘上立着一个生了锈的渔船残骸、拖网渔船、小艇、舢板和小船的残壳碎片。尽管它们身上的漆已经成片斑驳脱落，但还可以看清上面的一些船的名字："爱沙尼亚号""达吉斯坦号""纳霍德卡号"。四周冷冷清清，不见人影。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甚至从木伊那克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到咸海了，咸海已经失去了自己三分之一的水面面积和三分之二的水量。有些人估算了一下，咸海目前的水面面积只有它过去的一半。水位下降了30米。从昔日的海底转变成沙漠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公顷。每年，这里的风和沙尘暴能把7500万吨盐和早先进入河流里的农药释放出的毒气从这片沙漠卷进大气层。

木伊那克是个令人伤感的地方。它曾经位于美丽的赋予生命的阿姆河所在的地方，阿姆河从这里汇入位于沙漠心脏的非同寻常的咸海。如今这里既没有河流也没有海洋，这里的绿地已经消失了，狗都死了。一般的居民已搬走了，留下来的人无处可去，他们没有工作，因为他们是渔民，但鱼早已经没有了。过去这里曾有138种鱼和海鲜品种，现在只剩了38种。因为海离得太远，如何跨越沙漠到海边去？如果不刮大风，人们还可以坐在长椅上，靠在自己那些破旧的房子摇摇欲坠的墙边。无法了解他们靠什么维持生计，甚至很难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卡拉卡尔帕克人，他们的俄语不太好，孩子们根本就不懂俄语。那些坐在墙根的人，如果你对他们微笑，他们就变得更加沉闷，而妇女们的脸都被面纱遮着。当然，微笑在这里被认为是虚伪的，笑声听上去如同生锈的钉子刮在玻璃上的那种刺耳的声音。

孩子们拿着没有把手的塑料桶在沙子上玩耍。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神情忧郁。我没有去过在海的另一边离这里最近的那所医院，但在塔什干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新拍的关于这所医院的电影。在一千个新生婴儿中有一百个婴儿不能成活。而那些现在活下来的孩子呢？医生用手托起一个白白的皮包骨头的孩子，还活着，尽管很难判定是否真的活着。

这里有一半的人都患有黄疸病，如果患了黄疸病又得了痢疾，那就会很快死亡。但是在这里怎能保持最起码的干净呢？每月每人凭票配额只能买一小块肥皂——尽管不需要凭票买水——但一天一人只能有一桶水。

咸海以及它的支流能维持这300万人的生活。但是这海以及其他两条河的命运也影响着这一地区所有人的生活，而这里的人口是3200万。

苏联当局长久以来就开始考虑怎样补救灾难造成的损失和挽救咸海的泯灭、避免乌兹别克斯坦和半个中亚的毁灭。不过众所周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过度开垦种植棉花才导致了严重的缺水，这种情况使世界上很多地区遭到破坏（至今对此事仍缄口不言）。必须找到水源，必须找到有几千立方公里的水，否则乌兹别克斯坦人就会被渴死，大片棉田就会被沙子淹没，俄罗斯的纺织厂就会停产，等等。但从哪儿能弄到这么多水呢？他们最早的想法是，炸掉帕米尔和天山两座山（这是两河的源头）。爆破这两座山能产生雪崩，雪会在热带地区融化，变成水，像尼罗河、亚马逊河那样汹涌奔流到下面，流到干涸的河里，河水汇入海洋一切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好样子，“好”的意思就是正常的样子。

但是这个设计有两个弱点。首先，这两座山是如此巨大，只能使用核武器爆破才行，爆破不仅令人不寒而栗，而且还会引发地震，同时还会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那就是，炸掉这两座大山，会让大量的冰水融化，但这只能

是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而这样数量的水也可以冲垮苏联大部分地区。为此决定再寻找别的解决方案。

在塔吉克斯坦接待我的是一个叫“萨尼里亚（Saniria）联盟”的机构的总经理维克多·杜霍伟伊（Wiktor Duchowyj）。这个联盟是苏联水利部众多下属机构的一个部门，它主要负责咸海、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治理，他们治理得怎样，我们已经看到了。但必须清楚，这是帝国的水利部，就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部门里，一共有200万人在工作。每天有200万人起床，然后去上班，他们坐在办公桌前，拿出纸和铅笔，开始工作。幸运的是那些到地方去工作的人，他们拿出各种丈量用的工具，像什么放大镜、六分仪等，精确地丈量和计算着一切数据。想想吧，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东西需要丈量、需要计算，但能为200万人找到工作也并非易事，所以才想出这么好的主意，派这么多专家和官员来这里工作。

杜霍伟伊走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巨大的地图跟前，这是一张苏联和欧亚大陆的地图。杜霍伟伊是一个平易近人、精力充沛、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先生。有个解决的方案，他对我说，请你来看。然后用手指从地图上面往下指着。只不过必须……他挥动着手，做着手势，就是把西伯利亚各大河的水从北边调到南边来。那时水就可以流到我们这里。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儿离那些河有多远。到最近的那条河，也得挖一条2500公里长的人工渠。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一个叫安瓦尔的工程师打了电话，他在杜霍伟伊领导下的联盟工作。“有什么新消息？”我问。“一切正常，”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项目。”“什么项目？”我又问。“怎样把西伯利亚的河水调到我们这边来！”

波莫纳小城德罗霍贝奇

在德罗霍贝奇大街上，我看见一位妇女在卖牛蹄，德罗霍贝奇大街是该城的主大街之一，又叫大学街。这位妇女站在大街上冻得直发抖，不停地搓着双手，在她前面的摊位上，有几个去了毛的牛蹄。我走上前去问：“牛蹄怎么吃？”她回答说：“牛蹄里有不少油脂，可以煮汤喝。”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是一座百货大楼，叫“白天鹅湖”。在这个角落，也有一帮兴致勃勃、满腔热情的人，做着西方人做的那些事情，即打出各种彩色广告来吸引顾客。一群人争先恐后、蜂拥冲向一楼的柜台。鞋子到货了！

我走近前去瞧个仔细，那里限定每人只能买一双鞋，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鞋，也不管是谁，一律一人只能买一双鞋，女售货员们根本不看鞋盒里是什么样的鞋，每个人都抢着抓到鞋盒，然后挤出人群，站在一旁的某个地方，然后，那里就变成了一个聚集点，大家互相根据自己的需要换鞋。逐渐地经过一番交易、讨论和妥协后，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式样和型号。

经济学教授加林娜·高贝尔纳（Galina Gobierna）告诉我，顿涅茨克（Donetsk）工矿企业利润的分配情况：54％莫斯科先拿走，基辅拿30％，11％留给顿涅茨克，只有5％留给工矿企业自己。

我向一位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姑娘打听，去火车站怎么走。她建议说：“我带你去吧。”尽管这里是市中心，但我们还是蹚着没过脚踝的烂泥往前走，天阴下来了，起风了。

顿涅茨克是乌克兰的矿业中心，很多煤堆和煤渣就直接堆在一些街区的大马路上。黑色的粉尘落在家家户户的外墙上，这些外形相似的延

伸了好几公里的黑色建筑物形成了一道带铅灰色污渍的黑色风景线，像是一片褐色的地衣。

“你喜欢顿涅茨克吗？”这位姑娘怯生生地问我。人们对这类问题都很敏感，如果谁说一些批评的话，他们会感到不舒服。我尽力找些正面的词语来评价这个城市，但是能明显感到我的言谈话语中有些不实在的地方，因为在个别时候我沉默了一下，但是这位姑娘却以坚定的甚至带些自豪的语气对我说：“不过，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盛开的玫瑰花，有一百万朵玫瑰花同时开放，你能想象得到吗？那可是一百万朵玫瑰花啊！”

为了等火车，我在顿涅茨克火车站待了大半宿。晚上，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连那个只卖甜茶的酒吧和报亭以及售票窗口都关了。在灯光灰暗的大厅里的长椅子上，旅客横倒竖卧地簇拥着躺在那里睡觉。由于旅途的困顿和等待造成的疲倦，他们的睡姿显得个个形象丑陋，他们头上裹着围巾和头巾，蜷缩在皮帽和皮大衣里，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排排静止不动的鼓鼓囊囊的、歪歪扭扭、随随便便乱捆着的形状各异的大行囊。

这里一片死寂，闷得一点风都没有，黑黢黢的。

突然，在大厅的某个角落，在模糊不清的深处，这些“大行囊”中的一个人大叫了起来，一位妇女围着大厅乱跑，无助地大喊：“小偷！抓小偷呀！”她绝望地大喊着。肯定是她一醒来，发现自己的包没有了。她围着这些座椅跑了一阵子，然后用惊奇的语调说：“干吗非偷我的东西呀？”她乞求上帝帮帮她，但是没有人动弹一下，于是，她又在大厅里瞎转了一阵子，最后蓬头垢面一脸倦容地回到了自己先前待过的地方，安静地坐下来，蜷缩成一团，缄默不语。

又过了一会儿，从另一个地方，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同样也是惊慌

失措地大叫着：“小偷！抓小偷呀！”有一个妇女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向我们摊开两只手，说她手里什么也没有，可没人会看一眼，所有的人都弯腰驼背、蜷缩卷曲在自己的那个大行囊中。

只有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奶奶稍稍睁开眼睛对我说，也许是在对自己说：“生活太可怕了！”边说边把自己的油布袋抱得更紧，再次陷入浅浅的、警惕的睡眠中。

在我们这个卧铺包厢里，有一位要去敖德萨参加儿子婚礼的妇女。她住在西伯利亚的勒拿河附近。在一个卧铺包厢，通常是两个人、四个人或者六个人一个包厢，男女混搭。要严格遵守习俗。首先有妇女把自己的床铺铺好，换上睡衣，然后才轮到男士做这些事情，过去，大家在夜晚普遍穿的都是睡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运动服。在火车包厢里的时间过得很愉快，所有人都把自己带的食物给别人尝尝，大家分享着这些食物，有人带的是饺子，有人带的是烤鸡，有人带的是面包或者奶酪。还有一位与我们同行的妇女，她带的是汤，还专门带着盘子和勺子，为的是让别人都能尝到她做的汤。一般情况下，在每个包厢里总能看到有人带着一瓶伏特加或者白兰地，总有人觉得在路上这是必带的东西。有的时候，我没带吃的上路，别的人看到，马上就会把自己带的吃的给我。过去人们在包厢里都互相提防着对方，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沉默不语，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开放了，所有人都愿意跟别人聊天。当所有人的话匣子一打开，互相不信任的感觉减弱了，人们互相自我介绍，交换意见。

这里的人们认为西伯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沙皇把数十万自己的臣民流放到这里，布尔什维克人又把数百万无辜的人囚禁在这里。但我们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妇女科瓦威迪亚·米洛诺瓦（Kławdia Mironowa）却认为，西伯利亚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自由的绿洲。它广袤的空间、茂密的针叶林，交通不畅造成了与外界的隔绝，使它成了一

个避难所，可以使人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这里，米洛诺瓦接着说，就成了各类持不同政见者的藏身之地。他们在沙皇和布尔什维克统治期间得以存活下来，谁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她接着说，有一次曾有一个男的乘船来到他们这里，随身带着纸、颜料和粉笔，划船沿着勒拿河而行，遇见村庄和农舍就停下来，照着人们给他拿来的小时候的、学生时期的或者护照上的小照片，给这些母亲们在战争中牺牲的儿子们画像。每个人都尽量付给他一点钱。他就靠这些生活，从不依赖任何人。而米洛诺瓦自己呢？当人们被驱赶着去集体农庄时，她和她的丈夫，在夜幕的掩护下，带着自己的一头牛和两头乳猪逃到了针叶林的深处，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盖了茅舍，甚至后来盖了自己的房子，建了小农场。她自豪地说，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都没有见过一个陌生人。她说他们能存活下来的奥秘就是靠祖辈留下的炼猪油的技术和秘方。猪油里面隐含着生活的奥秘。生活的奥秘和自由的环境靠的就是猪油。如果你们缺乏猪油——这就意味着你们不具备这一基本的让生活富有的元素——就不具备自由生活的条件。米洛诺瓦就这样与我们分享着她生活中最丰富的经历。然后她解释说，怎样鉴别猪油罐和瓶子，以便很好地保存猪油，还有就是在针叶林里面可以采摘哪些草药放入猪油中。她还给大家介绍做这种草药汁的比例和方法，并详述了怎样宰杀乳猪和怎样切割乳猪的方法。

我从车窗往外看，看到与铁轨并行的一条大路上半埋着的一排排中型口径的大炮。陷在污泥中的还有十几个较新的炮筒和伪装物，其余的都沉在淤泥和水中。没过几分钟，又看见有差不多二十辆装甲车也被淹没在水中。见不到任何生灵，只见空空荡荡的乌克兰大平原。

在列车往敖德萨走的途中，我们一直享用着米洛诺瓦做的猪油，她把猪油用锋利的小刀切成小块，然后抹在面包上，又香又有营养。

这次我不在敖德萨下车停留（正好这时早春正午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敖德萨的上空），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难道还要一路寻访、寻找叫摩尔达维亚姑娘大街的足迹及其坑坑洼洼、歪歪曲曲的街道？为的是去回顾真正的犹太社会的知名人士弗洛伊木·格拉奇（Froim Gracz）或者贝尼亚·克什科（Benia Krzyk）这些人吗？为的是找到伊扎克·巴别尔（Izzak Babel）曾经喜欢待的地方？以为摘掉他的眼镜，他就看不到自己将会在刑场怎样死亡吗？

从敖德萨到基希讷乌的郊区火车像是用废铜烂铁、用钉子和铁板加上千疮百孔的木板和三合板拼造成的。到处都是破损的痕迹。每节车厢究竟被砸毁、洗劫、破坏、偷窃过多少回？车厢内坐的是一些当地典型的社会渣滓：一帮行骗者、一群流氓、一帮妓女、一帮无耻龌龊之流。这列火车、这节车厢、这个世界统统属于他们。他们在这里推搡打闹、胡吼乱叫、鬼哭狼嚎，他们的吼叫是为了寻衅生事。我们大家都紧靠在一起站着，我敢保证，我甚至已经觉察到，我迟早会被他们在肋骨上捅一刀，或者看着他们在我面前磨刀霍霍，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蒂拉斯波尔（Tiraspol），这帮混混儿下了车，车上剩下的是罗马尼亚农民，他们温顺安静，默默地望着窗外暮色的降临。

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花在详尽参观基希讷乌上。这里所有的大街小巷和建筑物上标注的文字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在街道上的各种招牌上，一会儿写的是法文、一会儿写的是波兰文或俄文或德文或亚美尼亚文。人们通常用的语言和街道的名称是摩尔达维亚文，也就是罗马尼亚文，路边摊贩们出售的商品和水果的名称标的都是罗马尼亚文，包括面包、梨子、西瓜和其他水果（都是按重量来称）。在我们下榻的一个客栈里还有一个波兰文的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曾和我们那里一样，有一个犹太中介人，雇用的马车夫是纯正的维尔诺人，房主人用的是意大利姓名。这种语言文字的混杂使用随处可见；这也难怪，基希讷乌人以此想向人们展示的是，这是比萨拉比亚（Besarabia）地区人口组成的特点，即这里是不同国籍的人的混居地。在这些东方幸存者旁边是一位身

穿从维也纳进口的高雅燕尾服的人，手上戴着闪着金色光的手套，在亚美尼亚理发店旁边有人在拉着手风琴，演奏的是多尼采蒂（Donizettie）和贝里尼（Bellinie）的咏叹调的曲子和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曲……（摘自约瑟夫·伊格纳齐·克拉舍夫斯基的《敖德萨、耶迪纳斯和南比萨拉比亚回忆录》）

基希讷乌现在还留有什么？如今那里已经被分割成两座城市。其中一座城市建于最近十年——那里有高高的居民楼群，楼的外墙贴的是浅色的石膏板。这是一个有着一排排像蚂蚁窝建筑的城市，正迅速取代并摧毁坐落在郁郁葱葱山丘上的古老的东南小城基希讷乌，在这座小城里仅剩下几条昏睡的小路、几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可以漫无边际地在这些小路上走。当太阳高照时，这些小街道就会掩映在古老的、枝叶茂密的榆树、椤树和苦栗树的绿荫中。这些道路两边盛开着紫丁香花、茉莉花、伏牛花和连翘花。漫步在这里，能看见庭院深处的花园、凉亭和阳台深处繁花盛开的温馨与平和。

傍晚，我们开车沿着弯弯曲曲陡峭的路去了公墓，天漆黑，又下了小雨。在公墓正门入口处隐隐约约能看见栅栏，旁边是公墓管理员住的小房子。在栅栏旁还有一个小房子是神父安东尼·安格洛涅太斯的，他来基希讷乌当神父已经好几年了，神父很年轻，是立陶宛人，也会说波兰语。神父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旁边一个破旧荒废的墓地小教堂，当我们看完这座小教堂后，他又打开了旁边一个很隐蔽的门，我们顺着台阶走到地下墓穴，那里还有一个宽敞的，甚至照明很好的小教堂。这个地下墓穴和小教堂是当地一些德国信徒偷偷建造的，作为一个隐蔽的祈祷场所。他们为了不让当局发现，悄悄地利用夜晚和节假日时间建造了这座小教堂。他们把挖出的新土分散倒在公墓四周山丘上的各个地方，因为如果新土堆在一个地方形成土堆会引起怀疑。

后来，这位精力充沛、动作敏捷、又瘦又高的金发神父开着一辆破

旧的莫斯科人牌汽车带我到了基希讷乌老市区的一个教堂，他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打开了灯。当局刚刚才把这个作为仓库的教堂退还给教会，但是信徒们已经布置了简单的圣坛，粉刷了墙壁。

这里明亮、安静，空空荡荡的。

我们漫步在教堂里时，教堂里回响起我们的脚步声。我们驻足在圣坛前。

“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神父说，“因为我的1500个德国信徒都离开了基希讷乌。”

人们把我带到了又暗又大的水泥地下室，莱欧尼德·涅多夫（Leonid Niedow）曾在那里工作过。涅多夫曾被关在劳改营七年，只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在罗马尼亚时代，我们有吃不完的香肠。”1964年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索尔仁尼琴从梁赞（Ryazan）给他发来电报说：“真心地祝福你被释放出来。”那时刚好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接管了克里姆林宫政权。饥寒交迫、工作无着落的涅多夫思考着他该怎样活下去。因为他有一定的艺术天分（权且说他有一些艺术方面的技艺），他决定用铅铸造党的领袖人物的塑像，然后在市场上销售给单位或者个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那个时代，有谁敢拒绝购买这种塑像，那会被判刑的，那就是苏联当局的敌人。他开始塑造列宁像，但是铅的原料不够，同时也缺乏经验。结果做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铅雕小得像玩具小锡兵，涅多夫吓坏了，因为他马上想到，他肯定会因此被再次关进劳改营。“列宁是伟大的人物，”审讯官会说，“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列宁小得像个小锡兵。”

“我吓得要命，”涅多夫继续对我说，“晚上我偷偷跑到教堂，把那些做好的列宁铅铸雕像全部扔进火炉里熔化了。好了，现在该为谁铸雕像呢？斯大林吗？不，因为他的名声不好。赫鲁晓夫吗？也不行，不受

人们欢迎，那就只有铸勃列日涅夫的雕像了。这次涅多夫十分谨慎，认定自己的铅储备够用，于是就做了一个大一点的雕像。为此，托勃列日涅夫的福，他浇铸了各种形状的勃列日涅夫像，有勃列日涅夫头像、半身胸像、半身像，就这样生活了二十年。当我下到阴暗的、几乎是黑漆漆的地下室时，在火热的熔铅炉释放出来的有毒的烟雾中隐隐约约可见涅多夫的身影，健壮而又勤快的涅多夫好像是希腊火神赫菲斯托斯。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现在涅多夫熔掉了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开始浇铸圣约瑟和当地的庇护者圣斯德望的雕像。

晚上我从基希讷乌出发去基辅。我没睡觉，等着火车在文尼察（Winnica）火车站停车。已经是凌晨3点了，外面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个老火车站只有几盏灯发着微弱的光。有几个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站台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雨水顺着车厢窗户往下流。什么也看不见，但知道文尼察，可怕的文尼察就在那里，就在车站后的楼群里、在深夜里。文尼察与卡廷齐名，是一个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地方。1937年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在这里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究竟杀了多少人无人知晓。仅在1943年德国人就挖出了9432具尸体，迄今为止就一直不允许再进行挖掘。埋葬在这些墓地里的人大多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仅在城市中的某一个地方，就是在老橡木林附近，就挖掘出十三座大型坟墓，里面埋着1383具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在掩埋了1383个从后脑开枪被打死的人后，这个墓地上立即修建了文化休闲公园。在挖掘完几个墓地后，在这里建了跳舞广场，在其中一个地方还建了大笑场所。

我在基辅租住在人民之友林荫大道附近一位叫M.Z.的老年妇女出租的房子里，我的房间很小，但很暖和，有很多书，还有西班牙文的书籍，这位妇女是位西班牙语翻译。像他们国家的其他住房一样，她的卫生间很小，但是从地板到天花板塞满了卫生卷纸和成包的洗衣粉。M.Z.对我很关心，甚至在我回来很晚的时候她都会给我热一碗汤，汤里总是

会放一块带肉的骨头，每当我喝汤的时候，M.Z.就给我讲述她是如何弄到这些骨头的奇迹，真的，这的确是奇迹，她和我都很清楚这一点。

我之所以会提起M.Z.，是因为不久前我不得不向一群人讲述什么是悲剧，悲剧的命运、悲剧的生活，而且还得给他们举出一些实例。因此我就举了M.Z.的例子，十年前她的丈夫移民到了纽约。一开始很穷，后来有一个犹太小村落的人帮了她的丈夫在那里站住了脚，现在她可以说出这件她前夫的事情。我的这位女房东唯一的亲人是她的小孙女。孙女现在十五岁，M.Z.病得很厉害，体重过重，行走困难。有一天，我回到住处，看见M.Z.手里拿着一封信，很明显她非常着急生气。这是她的丈夫，实际上是她的前夫给她的信，信上说，你让我们的孙女来我这里吧，我让她接受好的教育，让她能好好发展，我把一切都给她。M.Z.心里很清楚，她的前夫这样写很有道理，因为如果孙女在基辅，等待她的能有什么好前景？而且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但是如果孙女走了，就剩M.Z.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经受无情岁月的折磨，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难道要剥夺孙女大好的发展机会吗？她可能在那里当一名医生，当提琴家，结识富人。

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M.Z.有些绝望地问我。我看见她浑身都在发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的信（这封信的内容，她还瞒着孙女）。因此我觉得我陷入了人类的悲剧之中。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请她原谅我，我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千万不要生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目前在这里政治主导着一切，我不由自主地想借用乌克兰议会刚刚通过的又一个决议的提要开始，或者从跟一位当地政治活动家的谈话开始写我的报道，但是马上转念一想，不行，我还是从别的地方下笔好，可以赞美一下基辅这个城市，因为基辅是苏联的大城市之一，它的街道

不仅是为那些行色匆匆的往家赶的人服务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哉游哉闲庭信步的好地方。能与其媲美的可能只有圣彼得堡，但是圣彼得堡的气候远不如这里，那里很冷，风又大，时常下雨。但是基辅呢，却很暖和，很安静，阳光普照。下午能在市中心看见成群的人，但这些人完全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是参加集会的，只是成千上万很普通的过往行人，他们走出闷热的办公室、窄小的住房，为的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此外基辅还是一个保持着咖啡馆传统的城市，在那里——当然还要排很长的队——可以买一杯茶和一块甜点等东西，这种事情在莫斯科是难以想象的。

这座城市坐落在山丘上，有些街道不仅弯弯曲曲，还很陡峭。站在山坡顶上可以看见第聂伯河（Dniepr）和第聂伯河河谷，这条河宽与亚马逊河一样，但像尼罗河一样平静和缓，有着数不尽的支流、河湾与小岛。如果乌克兰人今后生活富裕了，这里就会看见帆船点点，到处都会是小游艇，现在这里还是空荡荡的。

关于基辅的建筑那还得专门写一章，在这里可以看到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风格的建筑，看到奇迹般保留下来的中世纪的教堂和东正教教堂以及斯大林时代可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而在这些建筑中间还夹杂着巴洛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里曾是多么美丽的城市呀！

城市建筑的破坏始于1917年，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一天，我买到了一本由热爱老基辅城市的一批人士新出版的特别文献——关于城市地图和专门介绍被拆毁的建筑、教堂、广场、墓地的图书，文献介绍了254处被布尔什维克夷为平地的建筑，为的是抹杀基辅文化的烙印。254处，几乎是整座城市被毁了啊！幸运的是这里无能又低效的体制帮了艺术一个大忙。极权主义者无力摧毁一切，遗留下来很多东正教教堂和建筑，我们可以在这里流连忘返，驻足赞叹。

但不要被这个城市外表的魅力所误导。在整个居民区，人们的居住

条件都很差，楼道非常脏，玻璃都被打碎，庭院里面非常黑暗，要么是灯泡被偷，要么是被打坏。在很多居民家里要么没有热水，要么没有凉水，要么就根本没有水。在这些居民住房里的那些蟑螂和其他害虫引起瘟疫流行，我在那里住过，也去拜访过朋友们，所以我了解那里的情况。也就是说，苏联人首先是精疲力竭的人，尽管他们赢得了自己的自由，但他们并没有精力为此感到高兴，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稀奇，因为他们就像长跑运动员，虽然跑到了终点，但已经累垮了，连打出胜利姿态举起双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还会叙述这些日常生活的烦恼和噩梦，因为在关于苏联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报道中，基本缺少关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情况的报道，而这千百万人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公民们到处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和遮蔽身体的衣物，而有时还要寻找可以栖身之处，因此没有很多事情能让他们高兴起来，能激起他们的欢愉和热情。

基辅的赫雷夏蒂克大街相当于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在那里曾有过几个书籍品种齐全的书店，而现在书店里空空如也：现在已经不再继续印刷和销售马列主义的经典书籍，但是新的文学书籍还没有上架。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现在过渡阶段已经成了关键词，一切以此来解释。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了，而下一步该如何呢？看看吧！每个人对未来都有自己的看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期盼、希望和梦想。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也许上百万的人不抱任何幻想，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站在各个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部的门前等着咨询（在莫斯科我还看见甚至围在刚果大使馆门前的人群。去刚果吗？就算要去刚果吧！就是要远离这个……接下来是个无礼的不爱国的字眼）。现在苏联人说他们根本不是苏联公民，只是希腊、德国、犹太、印度、英国、法国等国公民。在世界上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希望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园，回到自己祖辈们的土地上。他们想离开这里，抛弃自己努力获得的一切财产吗？什么财产？他们惊讶地问道。在这个国家任何人在任何

地方都没有过任何财产！哦，要说也有，那也许就是好几年的流亡、集体住房里一块黑暗的角落，还有每月3美元的退休金。

走到赫雷夏蒂克大街一半的地方是一个广场（以前叫十月革命广场，现如今叫独立广场），再往上坡走，也就是今天（1991年8月31日），那里还有一个列宁纪念碑。就在今天工人们从一大早开始就在这里安装大吊车，他们要拆掉这座纪念碑。现场来了众多围观的人和十几个西方电视媒体，他们在基辅觉得超级无聊，今天终于有事干了。这个石像应该被拆除了，因为在革命领袖纪念碑上写了很多不雅观的字，诸如刽子手、党卫军，最温和的字眼是路西法（Lucifer），在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有列宁纪念碑，据说有五千个。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很简单，数数有多少工厂、学校、医院、集体农庄、军营、港口、火车站、大学、村庄、城镇、城市、十字路口、稍大一点的广场、桥梁、公园等，把这些加在一起就能知道，在所有的地方都矗立着列宁纪念碑，也就跟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有五千个列宁纪念碑的数字吻合了。

但是拆除列宁纪念碑的麻烦一点儿都不小于当时立起这个纪念碑。我在乌克兰的邻国摩尔多瓦结识了一个人，他曾在劳改营里待了十年，起因就是为了把一个十分沉重的列宁半身雕像放在二楼的活动室里，因为活动室的门太窄，结果这个倒霉的人决定用绳子把这个半身雕像从阳台拽到活动室里，于是他拿来粗绳子套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者（即列宁）雕像的脖子上，结果还没等他把套在雕像上的绳子解开，就锒铛入狱了。

如果我们路过纪念碑再往上面走，就到了一个又小又安静的叫奥尔忠尼启则（Ordżonikidz）的街道，那里是发生乌克兰（具有象征性的）全面革命的地方。在小街的入口处有一栋不起眼的破旧的小宫殿，那里是乌克兰作家协会办公楼，也就是发动革命的总部。在这栋楼附近，准确地说是在它对面，是一栋巨大的、结实的、压倒一切的乌克兰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大楼，也就是共和国实行恐怖镇压的人们的办公地，这些人是卡冈诺维奇（Kaganowicz）、什切尔比茨基（Szczerbicki）、伊瓦什科（Iwaszko）。这两栋楼就像是建筑上的大卫和歌利亚（Goliat），他们之间战事不断，而这次的最终结局是大卫战胜了歌利亚。

一年前，我曾来过在奥尔忠尼启则大街上的这个小宫殿，因为他们告诉我，在这里，我可以与乌克兰民族运动重整运动的领导人、诗人伊凡·德莱奇（Iwan Dracz）见面。重整运动开展得比较晚，这个组织成立于1989年9月，参加这个运动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独立派与反对派团体，他们长期受到压制和迫害，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成员。还有一个特点是，乌克兰语言协会也属于被压迫和迫害的团体之一。就像每次革命那样，就像这次在乌克兰的革命起因是要维护自己的语言。在5200万乌克兰居民中，有一半人不会说乌克兰语，或者说得很差。这是实行了350年的俄罗斯化造成的结果。十几年来禁止用乌克兰文出版书籍，还在1876年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就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即在乌克兰学校要用俄语讲课。不久前，也就是在几个月前，我到过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市顿涅茨克。在那里人们为在普通中学开设用乌克兰语授课的课程已经斗争了两年。老师们把孩子带到公园里去用乌克兰语给孩子们上课。教乌克兰语？这可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阴谋呀！

在顿涅茨克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中，重整运动的一位年轻活动家大胆地从西服下掏出黄蓝相间的乌克兰国旗，高高地举起，人们见到这一情形感到惊讶而又十分兴奋。“让他们习惯一下吧。”这位年轻人会意地对我说。

一言以蔽之，存在着两个乌克兰：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西乌克兰（过去的加里西亚地区，包括“二战”前波兰的一部分领土）比东乌克兰更具“乌克兰”的特点。西乌克兰的居民说乌克兰语，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是乌克兰人，为此感到自豪。这个民族的精神、性格、文化得以在这里

保存。东乌克兰有别于西乌克兰，领土面积大于西乌克兰，在这里居住着1300万纯种俄罗斯人，还有至少650万人有一半俄罗斯血统，在这里实行的是野蛮的俄罗斯化政策，斯大林杀掉了这里的全部知识分子。1932—1933年，斯大林让数百万乌克兰农民活活饿死，并且下令枪杀数万名乌克兰知识分子。那些逃到国外的人才幸免于难。乌克兰文化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保存得比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要好很多。

西乌克兰（被称为乌克兰的皮埃蒙特），与东乌克兰的差别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很明显，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那几个月里，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月刊《民族之友》1990年第4期里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基辅共有300万人口，参加要求独立的游行人数为40万人，而在利沃夫（西乌克兰的首府），有100万居民，而参加要求独立的游行人数为30万人。在比利沃夫大很多的城市顿涅茨克，参加要求独立游行的人只有5000人。

我又回到奥尔忠尼启则大街，回到作家协会所在的宫殿，很难见到伊凡·德莱奇，几十个人挤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们来自乌克兰的各个地区，想要对伊凡·德莱奇倾吐他们的困难，寻求解决办法和援助。因此我觉得我不可能找到机会与他谈话。所以当天稍晚时，我从饭店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他用疲惫的声音说：“我们明天试试看能不能见一面吧。”

德莱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发表过大量的作品，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写作了。“为了拯救乌克兰，拯救乌克兰的文化，只能先把诗歌放在一边了。”他说。俄罗斯化搞得已经如此之深入，再过几年就不会再有人能看懂乌克兰的文学作品了。现在我们才刚刚要让当地的读者恢复阅读乌克兰文学作品，一般的乌克兰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的名字，譬如：尼古拉·科威罗威（Mykoły Chwylowy）和沃洛基米尔·温尼琴科（Wołodymir Eynnyczanko）。这两个人的名字是集权统治者要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的。又有多少乌克兰人能看到瓦斯尔·

司徒色（Wasyl Stus）、阿莱克瑟·替彻高（Aleks Tichego）、尤利娅·里特芬（Julia Litwin）的诗歌呢——在最近的年代里有多少乌克兰诗人被克格勃杀害？

用乌克兰文出版的书籍只占在这里出版的书籍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的主要是俄文书籍。早在1863年莫斯科就下令禁止在乌克兰出版任何用乌克兰文写作的书籍，除了文学作品。

1990年1月底，我再次来到基辅，与我交谈的人们十分激动地与我聊着一些事情，所有的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乌克兰曾在1918年1月21日宣布独立的事情，尽管那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还有数十万人在周年纪念那一天，手挽手在基辅、利沃夫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之间形成500公里的人龙来进行纪念。而今天面对这一切，在1991年的8月，面对大片世界（对很多人来说，是整个世界）的崩溃，人们手挽手形成五百公里的人龙不是什么大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对跟我谈话的那些人来说是一种震撼、一个奇迹、一次革命。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可以说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党中央下令举办的伟大活动，而是来自年轻人的倡议，来自独立组织——重整运动——组织的行动。是的，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党的领导作用”形同虚设，而起领导作用的是由社会自发产生的组织，而且整个社会都自愿听从他们的领导。第二，显然乌克兰人对自己第一次宣布独立的事件仍记忆犹新，这是70年来苏共一直致力于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因此这条人龙具有极大的心理意义。这是紧紧地遏制了苏联的梦魇，这个梦魇让苏联感觉到毫无出路、毫无希望。

从这一刻起，乌克兰历史加速了自己的进程，也是在1月份教皇保罗二世批准在乌克兰成立乌克兰基督教会（是乌克兰基督教四个教会的统一体：包括乌克兰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以及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乌克兰现代历史上又一个令人痛心

的章节）。3月在整个共和国内举行了各级议会选举，在三个选区（此时在西乌克兰）民主派反对党获胜掌权。（我最喜欢的乌克兰作家、乌克兰民主思想的创始人——温尼琴科无比兴奋！）终于等到了6月16日这一天，议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称乌克兰宪法与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和发行自己的货币。宣言宣称，乌克兰将是一个中立的无核国家（后一条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在乌克兰境内有一个巨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药库），这个宣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6月16日的宣言与其说是记载了历史事实的文献，不如说是一个声明。

但是斗争还在持续。秋天爆发了矿工罢工和学生罢课运动，学生们占领了基辅市中心，要求共和国的苏联领导人交出政权，在这一年当中，在乌克兰共成立了大约二十个政党，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乌克兰共和党，还有乌克兰绿党。（切尔诺贝利距基辅北部只有80公里！）

1991年8月19日到来了。

莫斯科发生了政变未遂事件。乌克兰十分平静，乌克兰在等待。但是几天以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基辅召开会议，8月24日发表声明“在延续数千年的国家传统的同时”，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声明补充道：“乌克兰领土是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的。”当时各种事件发展的势头之猛、力量之大犹如雪崩般迅速横扫整个世界，这一事实促使欧洲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按照我们这块大陆的标准）大政府，1991年12月《欧盟条约》通过了，但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令人震惊的印象。西方国家的想象力远远跟不上事态的发展，这需要时间来探索其意义和把握其规模。

而俄罗斯人马上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正在莫斯科列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刻，因为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卢卡诺夫（Łukanow）——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正在大会上发

言，正在指控有人诬陷他是阴谋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领袖。这个通常十分吵闹的大厅里，这时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主持会议的副手拉普金（Łaptin）突然中断了会议，用十分紧张的声音说："同志们，基辅发生了事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立即组织代表团飞往那里！"代表团团长为叶利钦的副手鲁茨科伊（Ruckoj）和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索布恰克（Sobczak）。他们两个人在击败新斯大林派的政变中扮演了主导作用，因为他们两人均是俄罗斯人，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乌克兰，"还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历史学家翁索维奇（J. Wąsowicz）就写道，"莫斯科就只能被推入北方的大森林。"

乌克兰的未来将向两个方向发展。首先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其次是乌克兰与欧洲和世界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发展顺利，那么乌克兰将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机会。因为乌克兰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天赐的温暖宜人的气候，是一个拥有5000万威猛、充满活力、雄心勃勃人口的大国。

1990年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发展前景的规划，他提出了苏联被取代后俄罗斯应该怎样发展的看法。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建议，今后的俄罗斯国家应该由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组成，其余的部分我们应该归还，因为"我们力不及八方"。

乌克兰人反对这个设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最近一位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普鲁什奇（Leonid Pluszcz）写道，"就是成立自己的国家，一个可以组织国防机构和为文化发展获取相对资源的国家。"那些曾经对苏共心有余悸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们，现在正在密切地关注俄罗斯民主人士的态度。一位杰出的乌克兰作家米科拉伊·里亚布楚克（Mikołaj Riabczuk）在描写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的纲

领时曾表达了对这些相关问题的一些担忧，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以“帝国民主主义”代替“帝国共产主义”吗？萨哈罗夫（Sacharow）的遗孀伊莲娜·波奈尔（Irena Bonner）在9月初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我担心，”她说，“深藏在俄罗斯人内心的那种扩张和统治的心态。”

乌克兰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首先在1917年之前，大部分地区是在1939年之前，乌克兰曾是一个在世界上拥有最多姿多彩的普遍多元文化、宗教、语言的国家之一，它曾经拥有色彩绚丽的丰饶的花园，这令西方人啧啧称奇，赞不绝口。尽管经过摧残蹂躏，有多少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9月我去了一个坐落于日托米日（Żytomierz）的波兰人墓地（距基辅150公里，在去利沃夫的路上）。那里有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Stanisław Moniuszko）[19]儿子的墓地、克拉舍夫斯基（Kraszeski）[20]夫人的墓地、帕戴莱夫斯基（Paderewski）[21]妹妹的墓地和康拉德（Konrad）[22]将军家族的墓园。

乌克兰的移民有很强大的力量。加拿大的阿尔伯塔（Arbert）和安大略省有相当大面积的小麦是由乌克兰农民种植的。乌克兰人在底特律、纽约和洛杉矶形成了极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强大社区，在西欧亦是如此。这些移民有着很强的乌克兰情结，乌克兰的爱国主义具有农耕民族的特点：深深扎根于自己祖辈的土地上。目前在基辅有很多从加拿大和美国回来的乌克兰人，他们计划在这里开办银行和企业，希望在这里做贸易，开办出版社。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将会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自己的海洋船队、自己的货币和军队。

当有人问及乌克兰的未来会怎样时，有一位领导人米哈伊沃·霍雷（Michaił Horyń）在基辅说：“我们想让乌克兰成为一个开明的、良好的、民主和人道的国家。”

一个开明的、良好的、民主和人道的国家。阿门！

利沃夫。有一天晚上路德维克·卡米耶罗夫斯基神父带我到他家去。他与母亲住在一起，想让我跟他母亲认识一下。

布罗尼斯瓦娃（Bronisława）夫人尽管年纪比较大，但是慈眉善目，很热情。她弯腰驼背，仿佛背着一个无形的包袱，她说话的声调非常平和，而且非常冷静，就好像她在讲述的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与这位坐在我面前的人毫无瓜葛。后来当我想起她时，就想起了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23]曾经在他年迈时说过的一句话："我看着自己以前的生活，仿佛是有一座岛在渐渐地远离我。"历史的疯狂加速前进与反复无常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本质，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同时扮演着几个人物，几乎都漠不关心，甚至彼此对立。

布罗尼斯瓦娃夫人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其中六个孩子因饥饿死于她的手中。她像是《圣经》中约伯（Hioba）的女性化身，约伯所处的时代就是大饥荒的时代。她经历了这一大灾难，仅仅证实了这一事实，大饥荒中受害最大的是孩子和男人，妇女好像相对强一些，更有耐力。"这个上帝太仁慈了，"布罗尼斯瓦娃那时说，"我被赋予了这么多的力量！"

在这间小小的房子里，我透过路德维克神父（神父是她最小的孩子）的母亲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的场景。我没有问逝者的姓名，也没有问他们的墓地是否还在，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提任何问题，只要专心听她倾诉衷肠。

首先，简短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历史：1929年年初，在苏维埃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纲领，斯大林决定，到1930年秋，他国家里的所有农民（也就是说当时社会的四分之三的人，也就是一亿多人）都要在集体农庄劳动。但是农民们并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那时斯大林采取了两种措施压制这些反抗的农民。把数十万农民送进了劳改营或者强迫他们背井离乡去西伯利亚定居，其余的人强迫他们

挨饿，直至俯首帖耳为止。

受打击最大的是乌克兰，那时布罗尼斯瓦娃与丈夫约瑟夫和孩子们住在乌克兰的舍佩蒂夫卡镇上的一个叫布尔丁的小村子里。

正式说来，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给每一个村庄规定了向政府上交谷物、土豆、肉等的比例，规定上交的比例远远大于实际收成的比例和土地产量的比例。可以理解农民们不可能完成上面强加给他们的计划。那时，通常情况下是靠武力，即军队的力量，强迫夺走他们的东西，没收他们的一切，只要是在农村能吃的东西都被夺走。农民们没有可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播种的东西。于是从1930年开始了大规模的致人丧命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持续了七年，1933年是收成最惨的一年。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至今一致认为，在这些年份里，斯大林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

饥饿的形成十分恐怖，而且多种多样。饥饿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特定人物能得到足够数量的食物，这些人是国家领导人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而这两种人都只占社会的极小部分。数百万饥饿的人们，为了能得到一块面包准备好奋不顾身去做一切事情……饥饿把人分裂了。许多人失去了同情的能力，失去了帮助别人的愿望……从这个时期的照片上看去，人们默然地从躺在排水沟里的小孩身边走过，我们能看到妇女们平静地在被抛弃在路边的死尸旁聊天，我们能看见车夫们散坐在马车上，而死人的手和脚却悬在马车外……六岁的塔尼亚·波基德克从邻居嘎乌莱瓦·图尔克的菜园子里偷了一头蒜，结果遭到一通毒打，拖着身体勉强回到家便死了。她的父亲斯泰凡曾经是红色游击队队员，带着自己的四个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孩子来到县政府门前请求帮助。当他遭到拒绝时，他对县委书记博沃尼斯基说：你最好吃了他们吧，免得我看着他们饱受折磨。然后就吊死在县政府门前的一棵树上。有位叫费道尔楚克的农妇，很可怜邻居六岁的孩子尼古拉和两岁

的小女孩奥拉，对他们说，她每天会给他们一杯牛奶。结果孩子们没有得到牛奶，因为他们的父亲对老婆说：“所有邻居们的孩子都死光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喂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前救救自己。”于是七岁的小男孩到集市上偷鱼，气急败坏的人群追上了他，抓住他并拳打脚踢，直到小男孩一动不动死在地上，人们才纷纷散去。农民瓦希乌·乌奇科与妻子奥克萨娜和十一岁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四岁）一起生活。他的妻子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妇女，跑到很远的波尔塔瓦（Połtawa）去找吃的。有一天，瓦西乌的邻居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的大儿子被吊死在门框上。

“瓦西乌，你在干什么？”

“我把儿子吊死了。”

“另一个孩子呢？”

“我把他放在衣柜里了，我昨天吊死了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奥克萨娜每次拿回来面包，都把面包分给了孩子。现在这样，等她回来时就能分给我一点吃的了……”

那时上演的就是这样可怕的悲剧，当人们到别处去寻找食物回来时，发现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死亡笼罩着整个村子。人们提前挖好能集体掩埋几十具尸体的大坑，没有人怀疑，过几天这个大坑就会被填满，到时还得再挖新的坑……搬运尸体的马车进出这个坟场成了农村常见的景象……政府官员挨家挨户地问，谁死了，如果有人死了，他们就帮忙把尸体运到集体掩埋场……那人们都吃什么呢？橡子算是不错的美食，此外麦麸、粗糠、甜菜叶、树叶、木头刨花、锯末、猫、狗、乌鸦、蚯蚓、青蛙等能吃的都吃。春天，等青草长出来，患痢疾和腹泻造

成的死亡人数比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还多。在3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变得更加可怕，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觉得自己命运还算好，至少在那里能得到一块面包吃。［摘自谢尔盖伊·马科斯多夫（Siergiej Maksudow）的《环节》］

为了粉碎农民的反抗，农村的商店、学校和诊所被关闭了。不允许农民出村，也不让农民进城。在被视为反对政府规定的村庄入口处的路边插着一个牌子：禁止在此逗留，禁止与任何人谈话！在铁路沿途的村庄，一旦火车开来了，农民们就走出家门，跪在地上，伸出双手，大声喊着：面包！面包！列车员们受命关上窗户，拉上窗帘。

先是整家人死亡，继而是整村人死亡：

看到死亡的临近，整个村子都在哀鸣。整个村子的农民都在哀鸣，这不是人们心灵和灵魂的声音，这是树叶在风中的沙沙声或是麦秆上的沙沙声。那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它们这样哀号，它们又不是人，为何这样悲哀地嚎叫。有时我会走到田野里去，去聆听他们：它们在哀号。我再走远一点，哎，好像安静了一些，但我再往前走几步，又听到哀号声，那是从邻村传来的哀鸣。我觉得，整个大地在与人一起哀。上帝没有了，有谁还能听到呢？［摘自瓦西里·格罗斯曼（Wasilij Grossman）的《万事奔流》］

布罗尼斯瓦娃夫人说，1932年的时候，情况开始变得更严重了。那时颁布了一项法令，农民们将其称为《麦穗法》。这项法令是斯大林臆想出来并亲自起草的。这项法令涉及保护集体农庄财产的问题。根据这项法令，如若有人仅仅偷了一把麦穗或者一根胡萝卜、一个红菜头，就有可能被判几年的劳改甚至被枪决。拖拉机手也会面临同样的惩罚，如果拖拉机的一个零件坏了，或者在集体农庄，如果弄丢了一把锄头或者一把铁锨都会遭到同样的惩罚。

这项法令颁布于8月初，那时还没到收谷物的时节，谷物还都长在田里。在很多地方，只要那里生长着小麦或者黑麦，就在其周围设立了岗楼。在这些岗楼上站着那些持枪的秘密警察，他们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胆敢偷走一把麦穗的人。在田边和路边都配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骑马巡逻的岗哨看护谷物。甚至还派来一些小哨兵看护农田，但是后来又把他们调走了，因为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孩子死的是最多的，不仅仅因为饥饿，还因为他们被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抓走了。

因此，人们能看见谷物、能看见麦穗。如果有人还有点力气走出茅草屋，还能看见正在生长的谷物的耕地。不过农民们必须站在离农田很远的地方。他们知道，如果有人离农田距离近一些的话，就会听到子弹的呼啸声。那年夏天非常炎热，酷暑难挨，阳光非常毒。从茅草屋的窗户一眼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的黑斑点点，那些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忍受高烧和饥肠辘辘患了伤寒病的人。这些人有的已经无力回到村子里，永远地将尸骨留在了那里。

布罗尼斯瓦娃夫人还回忆说，有时候秘密警察骑的马死了，因为他们的马匹个个也都十分瘦弱。刚刚还能看见麦穗梢上露出的秘密警察骑在马上的身影，他骑在马背上，东张西望，突然就消失不见了，那就是在他身下的马倒下去了。那时就生出难得的机会和希望，因为在秘密警察中间出现了混乱，就是在这一瞬间可以跑到谷物田里，摘点谷穗回来。这就算非常好的了，能够一两天的，不过总是能有点吃的了。

死亡有时是因为饥饿造成的，有时还是因为食物造成的。有时会从城里来一队人马要抓人去劳改营，顺便带来了面包，人们蜂拥而上，吃啊吃啊，然后大喊大叫，肚子疼得跑走了，而还有一些人，立刻就死在那里了。

最惨的事情是被抄家。他们掀开地板，挖开菜园里和田里的每一寸地，寻找着是否在哪个地方藏有食物。那时他们会拿走一切，还把房主

投入监狱。她的丈夫，我们上面曾提到过他，他叫约瑟夫，曾被抓走六次。她跑到镇政府那里跪着哭着乞求。她还算是一个幸运的妇女，不管怎样最后她的丈夫还是被释放了。说她幸运是因为她相信上帝。上帝是不会抛弃任何人的，她十分坚定地对我说。她就是最好的例子。后来他们把她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她的丈夫被抓去上了战场。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跟在乌克兰一样艰苦，甚至还不如在乌克兰。她必须顶风冒雪在冰上行走8公里去集体农庄干活儿。都说她丈夫在德国被打死了，她从未怀疑过。你们看，我的丈夫突然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以为他早死了，可他还活着！这样他们又在一起了，生下了这个儿子路德维克，他就跟我们微笑着坐在这里。

苏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有人从城里拿了份报纸回来，那里刊登着一张谷物大丰收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文字是：城里的人忍饥挨饿，人们不分日夜排队等着买面包，因为农民们偷懒不想下地收割谷物，现在大片的谷物烂在地里。城里人对农民仇恨至极，因为他们都快被饿死了！当运输车把他们拉到集体农庄时，他们在路上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村庄，窗户都被木板封着，门都大敞四开，被风吹得吱吱作响，在风中摇摆。看不见任何人，可能只有几个秘密警察。没有任何牲畜，不是被宰杀了，就是饿死了。甚至连狗都不吠叫了——因为狗早就被吃掉了。

马克苏多夫认为，像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这一种族灭绝的罪恶，是由于被官方称作的农业集体化和建设集体农庄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农业集体化的政策给农业造成的如此惨重的后果，时至今日仍无法让农耕地恢复到应有的水平。“但是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胜利者的生活看上去并没有多好，”他这样写道，“因为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谷物的生产在1923—1928年几乎增长了两倍，而在集体农庄化以后的二十五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低的产量，尽管人口数量大大增长。畜牧业生产也不会摆脱这一沉重打击的阴影，因为当年被屠杀和饿死的马匹、奶牛、公牛、绵羊和猪高达一亿多。毫无疑问的是，苏联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可以追

溯到遥远的岁月，那时候的‘胜利’如今已经变成了失败。土地和农民以他们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对那些要征服他们的人进行了报复。土地不再生长作物，农民们失去了到农田耕作的热情。这非常可怕，但这是一次正义的复仇。”

历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发生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北部）的种族灭绝现象。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为了摧毁俄罗斯的传统社会的一个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无定形的、服服帖帖的、半奴役的新苏联人种。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们，其中包括瓦兰庭·莫洛兹（Walentin Moroz），认为，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帝国，帝国本身的存在也不能没有乌克兰。但是20世纪20年代正是乌克兰民族自尊心复兴的年代，因此它的发展口号是：远离莫斯科！农耕民族精神就是乌克兰的精神支柱。为了粉碎这一精神，斯大林必须首先毁掉这里的农民和农业。那时乌克兰的农民大约有三千多万人。从技术上来讲，只要建立一个瓦斯毒气室网络，就可以消灭一大部分农民，但斯大林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建立毒气室的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承担“杀人凶手”的恶名。但斯大林是要让受害者承担骂名：你们因为饥饿而死亡，因为你们不想劳动，你们看不到集体农庄给你们带来的益处。此外，斯大林还很遗憾地认为，都是因为你们，城市的居民在挨饿，妇女们没有可喂养孩子的食粮，因为她们没有奶，孩子们不能去上学，因为他们太虚弱。

乌克兰的农民在沉默中忍受着煎熬，他们被强迫与世隔离，在啃着树皮和自己鞋子上的皮革的同时，还忍受着那些为了买到面包排着长队的城市居民的鄙视和仇恨。

我在利沃夫黎明时分起床。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到处还是一片黑暗。但是远方闪着光亮：早上第一辆有轨电车开过来了，我乘着电车去火车站，我想去买一张去德罗霍贝奇的火车票，等我到了火车站，天色已经大亮，甚至在片片云朵中太阳露出了惨白的脸庞（那时是2月），

莱舍克·嘎拉斯（Liszek Garas）和阿尔弗莱德·什莱耶尔（Alfred Szrejer）已经在站台上等我了，嘎拉斯忙着要去上班，而什莱耶尔已经退休，可以陪我一天。

人们都愿意来德罗霍贝奇朝圣，因为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24]生于此地，在这里创作，并在这里离世。而什莱耶尔还曾是舒尔茨的学生，舒尔茨不仅是作家，还是画家，他曾在伏瓦迪斯瓦夫·雅盖沃（Wadysław Jagiełło）中学教过手工课和绘画课。每当我们上课上腻了，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们就请他给我们讲童话故事，他停止讲课，于是就给我们讲故事，他特别喜欢讲故事。

舒尔茨曾住在佛罗伦萨大街12号的一个平房里，从他家到位于绿色大街的中学非常近，大约只有几百米，穿过两条小街和一条特别漂亮的林荫道就到了。在林荫大道附近有一座教堂，教堂后面，林荫大道的尽头，今天那里是一个面包房。就在这个地方，在1942年，盖世太保卡尔·甘德掏出他身上带的袖珍女式手枪打死了舒尔茨。

伟大的舒尔茨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城里度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佛罗伦萨大街和绿色大街与面包房所在的林荫大道这个三角地带的小地方度过的。如今人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走过这条线路，思考着舒尔茨非凡想象力的秘密。但是不一定能得出清晰和理智的结论。这样漂亮的小城只有一次展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神秘。布鲁诺·舒尔茨也只有一次成为这座小城清醒的、敏感的一分子，成为这座城市谨小慎微的潜行精神的代表。

因此我的问题显得特别浅薄：“什莱耶尔先生，肉桂铺子在什么地方？”

什莱耶尔停下来，他的眼神里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惊讶，又带着讽刺甚至批评。“肉桂铺子在哪儿？”他重复着，“这不过是舒尔茨

的虚构！在舒尔茨的想象里闪光！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散发着芳香！”

什莱耶尔先生想要让我看看他的资产，准确地说，就是看看那些曾经属于他的家族的东西。这个药店曾经为他祖父所有，这个房子曾经是他父亲的财产，他的父亲是在苏黎世毕业的化学博士，还曾担任亚斯沃地区石油实验室的主任。

他的家人都死于犹太人居住区，而那些住在阿根廷的亲属都幸存了下来。

什莱耶尔先生战后在基辅乐团担任了十六年的小提琴手，并在乐团担任歌唱演员，最早是在“基洛夫”电影院工作，后来还在“共青团”电影院工作，之后才去艺术学校学习。

“而在这里，”什莱耶尔先生说，“因为我们已经在小城里走了很长时间了，这里曾是犹太教堂，现在这里是家具仓库。先生您看见了那堆秸秆了吧？夏天那里长满了野草。”那个装疯卖傻的姑娘特乌雅在这个地方有过自己的床吗？也许有过。

这里一切都这样不明朗，这样令人费解。舒尔茨于1933年写下了一本书叫《肉桂铺子》。那正是在乌克兰发生最可怕的大饥荒的年代，而且离德罗霍贝奇不远。舒尔茨肯定不曾得知这一在世人面前被隐瞒的大悲剧。但是这里似乎有一股力量、有某种派别、某种我们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关联和对立，为什么他在书的开头描写的竟是人们吃饱喝足、美不胜收的美景呢？

清澈明媚的早上，阿黛拉回来了，仿佛从白昼的光焰中走出的波莫纳女神，她的篮子里流溢着色彩缤纷，闪着金色的阳光之美，红红的甜樱桃琼浆欲滴，表皮晶莹剔透，神秘的绛紫色酸樱桃散发出来的香气比

品尝时更沁人心脾；包含金色果浆的杏子宛如漫长午后的锈色；在如此诗意的水果旁，她拿出如键盘般的排骨，两侧带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的瘦肉，以及像章鱼和花枝般的海带。这荤素海陆皆备的午餐食材，口味未定的生食原料和植物配料，散发出一种旷野和乡村的清香。

归故里

这是我第一次到圣彼得堡。尽管现在还在8月里，可是已经很冷了，而且下着毛毛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多云的斯堪的纳维亚天气就是这个城市的特点：

灰蒙蒙、雾茫茫的秋天，到处泥泞，带着这样阴沉和奸邪的笑容，透过浑浊的玻璃往屋内窥探，格瓦德金先生毫不怀疑，他不是在一个有七座山的某个王国里，而是在圣彼得堡城里……（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性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暗示他书中的主人公的易怒暴躁和抑郁情绪受天气和城市的气氛所影响：

一大早，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抑郁感袭上头来。突然觉得，所有的人都抛开了我这个孤独之人，所有的人都弃我而去。当然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人都是谁？我不是已经在圣彼得堡住了八年了吗？可我不会与人打交道没跟任何人建立下友情。（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我走出火车站（我乘坐的是夜里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心里想着格瓦德金先生和他不同寻常的经历。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圣彼得堡多次出现在小说、诗歌和传说中，给人的感觉这不像是个真正的城市，而是由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靠他们的天才塑造出来的城市，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书中的主人公比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些路人更真实。

这条叫涅夫斯基（Niewski）的风景大街由东向西穿过圣彼得堡老区。越接近涅瓦河两岸，居民楼和大厦以及各种建筑就越大也越富贵。

这些建筑物越是显得威风凛凛就越表明，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具有特殊分量的、重要的、至高无上的地方。事实上也是，在涅夫斯基大街的尽头，在它的右侧，仿佛突然有人揭开了帷幕，开启了宫殿广场广阔的全景图。

真是蔚为壮观的景象！

在广场的左侧，沿着其整个长度伸展的一个绿色、白色蓝宝石色调，点缀有华丽的镂空雕刻壁柱的地方就是冬宫——沙皇的皇宫。

正对面，也就是广场的另一面矗立着一栋长长的、淡黄色的、宏伟的大厦，那就是总参谋部大厦。

而在它们之间是宽广的、平坦整齐又空旷的广场，它是如此之大，我甚至想用无边无际这个词来形容宫殿广场的空间。只见广场的某一个尽头处隐约有什么在动，在某处有汽车经过或某个人在匆匆行走，但这些都只能更加凸显这个广场的雄伟壮观、建筑的气势恢宏。

这个广场的全景，其建设理念、规划、结构本身与无数篇介绍这个国家的论文和教科书相比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广场是摄政的楷模和模式。冬宫代表其最高形式——统治者的官邸。而在其右边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建筑即非精神权威机构（一个教堂也没有），亦非司法权威机构（议会大厦也没有设在这里），而是军队、部队、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大厦）。

统治与军队——难道就是因为这个俄罗斯国徽上和国家的象征是双头鹰，而不是单头鹰？

可以在老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无尽地漫游，这里有如此多有趣的建筑，如此多的运河、如此多的林荫大道、如此多的深巷。普希金离开这里走向死亡的决斗（在涅夫斯基大道和莫伊卡大街的街角处），在这里

阿赫玛托娃（Achmatowa）[25]写下了令人震惊的《安魂曲》，安德烈·别雷（Andriej Bieły）[26]《圣彼得堡》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布莱乌霍夫乘着马车走过这条路，他说道：“过了圣彼得堡，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我在道路两旁矗立着数千座牢固的居民楼之间漫步时，心里一直想着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资本家、私营企业家和富贵人的堡垒中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取胜的呢？在这些建筑物里的人可都是些社会的中坚力量，大财团、大银行家和庞大的组织力量里的人啊！当列宁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都想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美国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27]写道：

库尔奇奥·马拉帕尔泰（Czurzio Malaparte）[28]描写了他对英国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Isreal Zangwill）[29]的不理解和诧异，因为那时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接管了政权，他却在那里访问并对满街的路障、巷战和路边横卧的尸体感到莫名其妙。赞格威尔不想相信他正在目睹一场革命。正如马拉帕尔泰描述的那样，现代革命的特点就是由训练有素的进攻部队负责操纵整个行动，以不流血的方式，甚至是悄悄地就占领了战略要点。以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手段进行行动，以至于整个社会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恰好可以与这一描写对号入座（马拉帕尔泰研究过十月革命，并认为这就是政变的模式之一）。10月，布尔什维克停止了他们根据列宁在4月和7月组织大规模群众武装游行和搞街巷战的活动，因为群众的情绪已难以控制，与此同时群众还挑衅当局要进行反攻。为此布尔什维克转而去依靠打着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从事活动的党的军队组织领导下的组织纪律严明的军人小分队和工人。这些分队占领了圣彼得堡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城市公用事业工厂以及所有现代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枢纽，即切断了政府组织的反击与总参谋部的通讯联系。整个行动做得非常缜密，行动十分迅速，就是在咖啡店和饭馆，包括剧院

和电影院都在营业的时间里，众人都还在寻欢作乐的时刻展开的。（摘自理查德·派普斯的《俄国革命》一书）

我不禁惊异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eville）[30]对法国大革命前夕人们情绪的那段描写：

这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当革命爆发时，所有生活在社会最上层和中层的居民们却感到自己处于安全之中。在1893年时，他们还在非常幼稚地讨论着民众的美德、他们的善良和情感、他们天真无邪的愉悦：这真令人感到非常滑稽和可怕。（摘引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欧洲另一端发生的类似事情，与法国大革命相隔了125年。在导致旧制度迅速崩溃的两个不同国度中，措手不及是共同的因素。

但是我这次旅程的目的地并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再往南距其150公里之外的诺夫哥罗德（Nowogród）和去采访住在那里的亚历山大·格莱科夫（Aleksander Grekov）教授。

诺夫哥罗德曾是中世纪的一座名城，差不多类似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或者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贸易和手工业的集散地、数个世纪以来各种艺术在这里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宗教建筑和教堂圣像绘画艺术的发展。这里还曾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四百年来（11—15世纪），诺夫哥罗德一直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封建共和国，在那里最高统治者是地方民众和当地自由的农民。大公们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以当地居民的名义治理国家，随时可能被罢免。无论是在哪个时代，还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有一座大钟是这个城邦自由和独立的象征，召唤居民们开群众大会。因此当莫斯科的伊凡三世在1478年吞并了诺夫哥罗德时，下令将大钟移走，这意味着该城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决定了莫斯科和俄罗斯走向的历史时刻。诺夫哥罗

德曾是世界上一座民主的、与整个欧洲保持交往的开放城市。莫斯科是受蒙古影响渗透、与欧洲为敌的对外扩张的城市。如果莫斯科沿着一条诺夫哥罗德的足迹走，莫斯科就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莫斯科的国家，但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

沃沃迪亚靠为旅游者们拍摄纪念照为生，他坐在圆凸的千年莫斯科青铜雕像下专门为那些前来诺夫哥罗德参观古建筑和绘画的旅游者们拍照，这些古建筑被誉为当地的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就是某种教会城廓，有城墙围着的教堂、修道院和王宫——这里曾是大公治理国家的官邸）。因为在这个青铜雕像的底座上雕有129个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沃沃迪亚以这些著名的英雄人物为背景为游客拍摄他们想要的照片。如果遇到军人旅行团，沃沃迪亚就为他们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aksander Newski）、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Dymitr Doński）、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ksander Suworow）、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chaił Kutuzow）、伊凡·帕斯克维奇（Iwan Paskiewicz）为背景为他们拍摄。如果是来自某个作家协会的旅游者，他就会为他们拍摄以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chaił Łomonosow）、伊凡·克雷洛夫（Iwan Kryłow）、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ksander Gribojedow）、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chaił Lermontow）为背景为他们拍照。老师们则会发现自己照片的背景是西里尔与美多德（Cyryl i Medody）、马克西莫斯（Maksym）、圣扎东斯克的吉洪（Tichon Zadoński）。如果是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旅游团，那么沃沃迪亚就会让他们站在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Michaił Romanow）和那些王朝建立者，如坐姿优雅、身材苗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沉思的彼得大帝与高傲地挺立的尼古拉一世之间为他们拍摄照片。

沃沃迪亚的这一工作肯定会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因为在他带我到他家时，我在他这个光棍公寓里看到的东西尽是些从暗色的金属盒里闪烁着的灯光，一进门房主就把那些摆放成排的各种松下、JVC和索尼设

备一一打开。他家里还有一位漂亮苗条的姑娘，在跟我一阵寒暄之后，就非常认真地请我帮她跟沃沃迪亚说一下，让他娶她为妻。“因为他不想跟我结婚！”她的口气里带些忧伤和不满。

我们又回到了当地克里姆林宫的雕像下。有个学生旅游团在等着沃沃迪亚，他答应过给他们拍照（沃沃迪亚是这里唯一一位摄影师），这个学生旅游团站在蒙蒙细雨中，弯腰看着叫安娜·安德烈耶娃的妇女摆在摊位小桌上的纪念明信片。趁孩子们去摆姿势拍照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些明信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我挑选明信片的时候，这位叫安娜·安德烈耶娃的妇女，也许四十岁，也许六十岁，从过短的大衣袖子伸出双手让我看。

“你看，”她既愤怒又绝望地对我说，“你看看，他们把我的手弄得像男人的手！”

她一边给我展示她青筋凸起的手背和粗糙厚实的手掌，一边重复说：“把我的手弄得像男人的手！”

从她的口气听出，她好像是在进行最恐怖的控诉，好像是骇人听闻的控诉和咒骂！

“当我还是年轻的姑娘时，”她一边大声解释着，一边哭着说，“我就得干锁匠的活儿。当了一辈子的锁匠。”

“你看，今天，今天弄了一双男人的手。”她用夹杂着痛苦和恐惧的声音说。

“尽管我从小就有两只手，尽管我天天看着自己的双手，但是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大手感到羞愧和恐惧。”

这位瘦小的安娜·安德烈耶娃，这位满头银发和面色苍白满带病态

脸庞的妇女，在我面前挥舞着她由于制锁而形成的钢铁般的大拳头。

但是在她命途多舛的人生中最终她还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闪光点，令人有某种欣慰，因为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他们让我的手变成了男性的手，我必须说赞同斯大林的话，但是我没有加入苏联共产党！”

之后，她慢慢地平静了下来，等我要离开时，她用平和、轻柔、温顺的语调说：“就让他们允许我们再过一点正常的生活吧！”

要到格莱科夫教授和他的夫人瓦兰蒂娜·波利索夫娜（Valentina Borisova）工作的那间地下室，得先路过索菲亚大教堂（11世纪的建筑奇迹），然后再穿过各种广场和庭院，一直走到一个巨大的老楼旁才能到达那里。这里占地面积很大，因为是把几个地下室打通连在一起的，那里摆着一排排又长又宽的桌子，上面堆着城墙上用过的碎砖瓦，灯火通明，否则就会显得昏暗，甚至会一片漆黑。在每个桌子旁都坐着两到三个人，每个人都在挑拣着这些城墙上用过的碎砖瓦片，仔细端详着。人们沉浸在潜心贯注、聚精凝神的静谧之中，这种静谧偶尔会被某种声音打断：

“我找到以利亚[31]的眼睛了！”

“我这块是天蓝色的！这可能就是帕拉斯凯夫的殉难者！”

然后就开始讨论，开会，比对。

这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在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宫附近曾经有很多小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有一座耶稣变容教堂，这个教堂在14世纪中叶建于离此地的克里姆林宫3公里的小山坡上。在1380年的时候，有一批姓名不可考的画家（很可

能是塞尔维亚人）在教堂的内墙上画了美轮美奂的壁画，这些华丽多彩的大型壁画约有350平方米，“二战”期间俄罗斯人把这个教堂当成了掩体和火炮观察点（在这片没有树木的平原上，这里是唯一的制高点），德国人持续两年不停地用大炮和迫击炮攻击这个教堂，所以到了“二战”结束时，这个教堂变成高5米的瓦砾废墟。在后来的二十年中，在这片高地上野草、杂草丛生，一直到1956年，有人开始到这里挖掘，找到了一些小小的彩色壁画碎片。几年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在300平方米的面积上挖掘，找到了10平方米的彩色碎片，把这些碎片运到了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格莱科夫教授和他的夫人现在所在的地方，这批热心人二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将这些被大炮和战火击碎的小石头、碎屑、碎片努力拼在一起，试图将古老的14世纪的壁画重新展现出来，将这些姓名不可考的画家们画出的耶稣变容形象再现给人们。

沿着整个工作室的墙面搭着木架子，上面摆放着已经找到的拼在一起的耶稣头像的一部分，还有圣厄弗冷（Jefrem）的头像的一部分，或者年轻的殉难者的拼图。

教授说，最困难的是，从未有过壁画完整的照片，缺乏相关的资料，有的时候只能依靠那些见过这些壁画的人零零星星、虚无缥缈的一些回忆。

在跟亚历山大·格莱科夫的谈话中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独特的非凡想象力的人。难道这些想象力必须靠数千个问号和困惑来填补吗？这片留有城墙上的火焰痕迹的碎片：难道是上帝要在上面彰显自己的荣光，或是相反，这只是至高无上的上帝给那些顽固的和死不改悔的千古罪人丢过去的地狱之火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城墙上的碎片是否清晰地流着泪痕？这是圣父将自己的儿子放进坟墓时流的泪，还是当某位妇女得知耶稣复活时脸上流下的幸福之泪？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

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太福音》17∶1-2）

洒在某张桌子上的一道金色的光芒哪一道属于太阳的一部分？躺在某个盒子里的白色碎片难道是宛如白雪般的袈裟的某一部分吗？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马太福音》18∶6）

在这里某人正在灯下审视的那些如波涛汹涌的碎片代表的是那危险的深海，还是耶稣光脚走向自己信徒的那片海的画面？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马太福音》18∶13）

留在这些壁画碎片上的某一块画面上的一撮羊毛是那九十九只温文尔雅的某只羊身上的羊毛呢，还是让那位不怕麻烦的牧羊人正在寻找的那只鲁莽而又放纵任性的绵羊留下的踪迹呢？

看着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用成千上万的七零八落的碎片、零七碎八的浮渣、零零星星的断片、零星破碎的物片、零散的碎块、碎裂的小石头将那些破损的圣徒、普通人和传说中人的画像拼了出来，我觉得，我仿佛成了这个寒冷的灰尘满天飞的地下室里的一个见证人，见证着天与地、所有的颜色和形状、天使和国王、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诞生。

我从诺夫哥罗德到明斯克去参加白俄罗斯民族阵线代表大会。带我去参加这一代表大会的是白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瓦西里·贝科夫（Wasyli Bykau）。贝科夫是位身材高大的男人，不善言谈，甚至可以说是诚挚而又友好的沉默之人，他的小说《沙堆》中的人物阿杰耶夫的长相和举

止都与贝科夫非常相像。阿杰耶夫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过往的踪迹：

他环顾四周。广场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但是教堂还在，正是这座教堂帮助他辨认出自己所在的方位。他现在得往一条小路走，然后继续往下走，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安的情绪。阿杰耶夫快步匆匆往市中心方向走，先走到了绿街，他对这条街非常熟悉，这里的每栋小房都是典型的带有小花园和果园的木屋，旁边就是小溪流水的深谷，老树守候在溪水旁。（摘自贝科夫的《沙堆》）

整个白俄罗斯是个平原内陆国家，平坦得宛如平静的大海，夏天矢车菊把大地装饰得郁郁葱葱和蔚蓝一片。冬天到处是雪白和一片乌鸦黑，那里这样的小城比比皆是，阿杰耶夫就是在这样的小城里漫游。白俄罗斯是一个农业国家，农耕民族的国家，白俄罗斯语在农村保存得非常完整。这种现象在大会期间和在大会休会的午餐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很多城里来的大会代表在用白俄罗斯语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表示歉意说，他得转用俄语发言，因为这对他来说更容易一些。而从农村来的代表们则没有这样的问题。白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对莫斯科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沙皇，还是苏共都在这里实行了有计划的、野蛮的、惨无人道的俄罗斯化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几乎枪杀或者流放了白俄罗斯的全部知识分子。贝利亚与其盟友格鲁金·卡纳瓦组织了对白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些被杀死的人都被扣上了“波兰间谍”的帽子。对莫斯科来说，他们就是想让那些说俄语的人居住在白俄罗斯，甚至不需要是俄罗斯族，只是会说俄语的人就行。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很多人发言谈的都是切尔诺贝利造成的后果。因为最先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波污染的是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出版的月刊《涅曼》刊登了一幅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出生的一个白俄罗斯男孩儿的照片。这个男孩儿全身的皮肤白得像瓷器，大大的黑眼睛里带着忧郁的目光，头上没有一根发丝，只是光秃秃的亮白色。

我认真地聆听一位代表的发言，他提出一个问题，对白俄罗斯而言，哪个国家，是俄罗斯还是波兰对其构成最大的威胁？

他的结论是波兰，因为波兰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国家。

我从明斯克到我的家乡平斯克，整整坐了一整天的长途公共汽车。从早到晚车窗外面的景致都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处于停滞状态之中。仅仅在某个地方能看到蜿蜒平缓流淌的涅曼河水，在某个地方能看到鸥金斯基（Ogiński）运河的线条。

平斯克，我觉得自己活像是阿杰耶夫：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安的情绪。阿杰耶夫匆匆往市中心方向走，先走到了绿街，他对这条街非常熟悉，这里的每栋小房都是典型的带有小花园和果园的木屋，旁边就是小溪流水的深谷，老树守候在溪水旁。

正午时分我去了教堂。当做完弥撒之后人们走出教堂时，我走近他们问，有谁还记得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学校教过书，同时我告诉了他们我的姓名。结果发现，那些走出教堂的人们正好曾是我父母的学生，我父母比他们大了50岁。

我回到了自己童年的家。

---

[1] 1891—1938，苏联诗人、评论家，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2] 1892—1941，俄国诗人和作家，布罗茨基称其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译者注

[3] Besarabya，是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译者注

[4] 1794—1881，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建筑师，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大克里姆林宫和克里姆林宫军械库。——译者注

[5] 波兰最著名的圣母院，该国最重要的朝圣地，亦是许多波兰人的精神首都。——译者注

[6] 这里指他们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

[7] 加勒比海诸岛之一，这个小岛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安提瓜岛的居民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民族解放党，宣布了独立，并将整个岛租给了希尔顿酒店。当时伦敦派遣了一支武装远征军（400名警察）。——译者注

[8] 苏联时代称基洛夫堡，现在叫占贾，位于阿塞拜疆西北部，是该国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9] 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也是公民自由的拥护者，支持苏联改革。他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0] 1905—1964，苏联作家和记者。——译者注

[11] 摩尔多瓦的首都，也是该国的工业与商业中心及最大城市。——译者注

[12] 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两岸有闻名世界的卢瓦尔城堡群。——译者注

[13] Yankee，最初意指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居民之后裔。其民俗意义则延伸为美国东北部地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与上五大湖区）之居民，美国内战期间与战后指美国北方人，甚至全体美国人。——译者注

[14] 1891—1953，流亡德国的俄罗斯记者、政论家和作家。——译者注

[15] 1828—1903，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哲学家，费奥多罗夫主张激进的寿命延长、身体不死，甚至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复活。——译者注

[16] 1873—1954，苏联作家，以创作描写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哲理抒情散文著称，其代表作《人参》和《林中水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普里什文对林中王国各种各样美丽多姿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细微观察和深切感受。——译者注

[17] 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译者注

[18] 又称各各他山（英文Golgotha），天主教典籍译为哥耳哥达，意译为髑髅地，为《圣经》中耶稣受难之地。——译者注

[19] 1819—1872，波兰作曲家、指挥家，被誉为波兰民族歌剧的创始人。——译者注

[20] 1812—1887，波兰作家、出版人、历史学家、记者、学者、画家。——译者注

[21] 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外交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世界级钢琴大师之一，1919年曾出任波兰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22] 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23] 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外交官，长姐卡米耶•克洛岱尔是雕塑家。1895—1909年曾到中国担任领事。——译者注

[24] 1892—1942，波兰犹太裔作家、美术家、文学评论家、美术教师。——译者注

[25] 1889—1966，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译者注

[26] 1880—1934，俄罗斯小说家、诗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译者注

[27] 1923— ，波兰裔美国籍的学者，专门从事研究俄罗斯历史。——译者注

[28] 1898—1957，意大利政治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29] 1864—1926，英国幽默作家和作家。——译者注

[30] 1805—1859，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家。——译者注

[31] 《圣经》中一个名字常出现的先知，活在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王国一个灵性衰微和反叛神的时代。——译者注

余波荡漾（1992—1993）

余波荡漾

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开启了20世纪现代历史的新篇章，并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

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座活火山，不断在持续爆发，看不出来它有趋于平稳的趋势、有想喘口气的趋势。

俄罗斯作家尤力·波列夫（Jurij Boriew）把苏联比喻成行进中的火车：

火车朝着光明的未来进发。列宁驾驭着它。突然，火车停下来了，因为前面没有轨道了。列宁召唤人来在周六加班，铺设轨道，火车又继续开动了。现在是斯大林开始驾驭火车了，斯大林下令杀死了一半的列车员和乘客，让剩余的人继续铺设新铁轨。火车又开动了。赫鲁晓夫取代了斯大林，当火车行进到铁轨的尽头时，他下令将火车走过的轨道全部拆除，摆放在火车头前面。勃列日涅夫后来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决定将火车窗蒙上，让车厢不停晃动，一边乘客感觉到，火车还在运行中。（摘自尤力·波列夫的《斯大林风格》）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三个葬礼的时代（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这段时期，乘客们甚至都丧失了感觉，不知道火车开往哪里。因此也就是在1985年4月火车继续开动了。这是它最后的旅程。这个过程总共持续了六年半。这次驾驭火车的司机是戈尔巴乔夫，而在火车头上写着的标语是：开放——新思维。

如果给俄罗斯套上一些非常抽象的名称的话，关于俄罗斯的事情就很容易夸夸其谈。“俄罗斯寻找出路”“俄罗斯说不”“俄罗斯在向右转”等。在这种高度概括的情形下谈论俄罗斯，那么很多问题都会失去意义，微不足道，冰消瓦解。意识形态国家的宏观调控就会转化成日常琐碎麻烦的微观调控。那么俄罗斯还会继续保留超级大国的地位吗？与如此重大的问题并列的，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安娜·安德烈耶娃，他们还会让她正常生活吗？目前普遍使用的政治语言已被大众媒体的手段所取代，更糟糕的是，那些能表明某个人痛苦、个人悲剧和个人困顿的词汇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有谁无家可归？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了，而这种问题变成了只是救世军和红十字会应该关注的问题了。

但是，想要避免这个抽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明明知道，这样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简单化概括的陷阱，很容易陷进不容置疑的抽象定理的陷阱，但也只有通过使用语言和一般性的综合概念，也就是抽象的概念才能反映所发生的巨大规模的事件。

也有作家赋予了“俄罗斯”神秘意义的概念，认为它是深奥的和深不可测的圣地。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Fiodor Tiutczew）这样写道：“不能以理性来了解俄罗斯……只有相信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对欧洲而言，就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斯芬克斯谜团之一。西方会很快发明永动机或生活的万灵丹，但无法探究出俄罗斯的本质、俄罗斯的精神及其特点与态度和立场。”

俄罗斯的信仰有时带有一些宗教色彩。我在莫斯科看见一次游行，游行期间大批的民众反复为俄罗斯祈祷，就像是去明山朝圣的人们在圣母马利亚面前那样虔诚地祈祷一样。

还有些俄罗斯作家强调说：俄罗斯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现象来特殊对待。彼得·察阿达耶夫

（Piotr Czaadajew）曾这样写道：“在谈及俄罗斯时，人们常常认为它是一个与其他国家相似的国家；其实他完全是另一种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Kanstanty Aksakow）也曾这样写道：“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与欧洲任何国家和城邦都毫无相似之处。”

最初我并没有想做这么一次浩大的旅行。我只是想去高加索地区，去看看我曾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去过的地方。我对那个先被俄罗斯征服、后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强行占领的那一小片地区的现实十分感兴趣，正因为此，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世界，即在高加索山那边的思想政治非殖民化进程的发展。20世纪不仅是集权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而同时是历史上非殖民化的伟大历史时期：在世界地图上出现了上百个新兴国家，整个大陆——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诞生了第三世界，世界人口开始剧增——欠发达国家人口比富裕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了三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将成为21世纪的忧患问题。

由于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促成了第三世界扩张的这一过程，令人明显感觉到也触动了世界最后一个殖民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地的内部。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该国的非俄罗斯人的人口已经接近其国家人口的一半，而在这些地区百分之九十五的统治精英都来自俄罗斯族或者来自被俄罗斯化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因此这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便成了那些少数民族迟早要参加自己解放运动的信号。

因此，我最初计划走得远一些，即从莫斯科到格鲁吉亚，然后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是他们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边界已经关闭，那里正在打仗，谁对此也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我感到非常震惊。

居然有人会说，莫斯科对发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地上的事情毫无影响力？这也就是说，帝国的统治者对某种事情爱莫能助，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我如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二十多年前，我到访阿塞拜疆，我想放弃参观基洛夫集体农庄，转而去参观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时，我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可能：这个日程是莫斯科下的指令，我们不能做任何改动。那时他们开始打电话，询问，解释。最终他们得到答复：同意，那就去斯维尔德洛夫集体农庄吧！这一切本来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情，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体制就是依靠小心翼翼处理每件琐碎的小事情、对所有事情的心理变态般的掌控、对统治一切的难以抗拒的欲望来维系的。尤力·波列夫描写了斯大林也曾做过许多琐碎的事情，他竟然下过这样的命令：“把一号裁缝店的缝纫机搬到七号工厂去，约瑟夫·斯大林。”

而在这里却发生着重大的事件：两个共和国关闭了边界，正在交战，而莫斯科却爱莫能助！

第二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我乘飞机晚一天到达了埃里温。我上街去散步，突然在街上遇到了一帮全副武装的满脸胡茬儿的人。我发现他们并不是红军士兵。街上的人们说，他们是亚美尼亚解放军的一个独立支队。对我来说，在帝国看到这样一支既不属于红军也不属于克格勃军队的部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了解这个国家过去的制度，因此我等待着，俄罗斯军队何时来进攻亚美尼亚首都，屠杀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再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然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第三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就在当天晚上，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样一个节目，那时电视正在转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实况。有一位最高苏维埃代表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激烈地争吵起来。我很担心，跟总书记争吵？以前发生这样的情况是要被枪毙的。这会毁了一生

的职业生涯。而现在，这位代表发言后走下台时，人们为他热烈鼓掌。

总而言之，我在想：苏维埃时代结束了！对我来说，帝国1989年在莫斯科-埃里温这条线上已经解体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早已倒塌的废墟上又扔上了一些浮渣。

我觉得，对那些经历了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次人生的经历，他们能认识和理解并深刻挖掘1985—1991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转变和转折的独特意义和重大意义。在路上我遇到一些年轻的记者同人。他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也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而对我来说，这一切则是非同寻常、不可思议的，我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用几句话概括一下1985年。

苏联制度的危机在这一时期发展得更加深刻、更加明显、更加尖锐：

——与莫斯科有关联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崩溃瓦解和消亡；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正在分崩离析和失去意义；

——波兰的“团结工会”尽管经历着战时状态的镇压，正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中稳固地挖掘着洞穴，而且这个洞穴越来越大；

——莫斯科在与西方的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失去了竞争力，技术越来越明显地落后，劳动生产力明显低下，在世界游戏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随着超级大国力量的丧失和走向日暮途穷，伴随着这种现象的还有

一代领导人的纷纷离世。在发生历史转折的1985年的前几年间，很多苏联领导人先后去世，他们是：库瓦科夫（Kułakow）、拉什多夫、苏斯洛夫（Suslow）、勃列日涅夫、柯西金（Kosygin）、乌斯季诺夫（Ustinow）、安德罗波夫。他们当中最后去世的是契尔年科，他于1985年3月11日去世。其他人像葛罗米柯（Gromyko）和格里申（Griszin）也都年迈无能或者像罗曼诺夫一样变成了酒鬼，而阿利耶夫陷入了贪腐的丑闻。

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在新思维改革前的那些岁月里，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与民主国家大不相同。人们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用言语。但是他们的沉默却比用言语的表达更重要。他们用眼神传达着看人和看事情的方式，表达去哪里或者不去哪里。如果要被迫去参加某种会议，他们动作迟缓地来开会，散会时他们的动作却十分迅速。尽管当局对社会表现出蔑视和傲慢，但与此同时又对社会的沉默不敢掉以轻心。在圣彼得堡我遇见过一个参加当地共青团的代表大会（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大学生，他当时负责“会议厅里的气氛”。为此俄罗斯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沃鲁钦（Stanisław Goworuchin）在80年代末拍摄的一部名叫《不能这样生活》的电影，真实地反映出了1985年时的民意。

而所有这些无论在帝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危机，都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拮据，以及市场供应匮乏和生活无望的原因造成的。必须牢记，那些被人们称为“领导阶级的特权”是建立在现存的相对贫穷的背景下的特权。富裕国家的居民时常对这种特权一笑了之。在乌克兰某处爆出了丑闻，因为某一党政机关的官员在开车时汽车的后备厢开了，人们发现他的后备厢里有香肠。我在乌法的时候也曾目睹过这种丑闻，因为那时在市场上出售的是烂苹果，而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是真正的寄生虫，拿到的却是好苹果！多少次我正要进房门之前，住户们都跟我寒暄说：“雷沙德，请原

谅我们的贫穷！”有时晚上我们聊天的内容就是关于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等我讲完了以后，俄罗斯人就会微笑着用无可奈何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1985年3月，根据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建议选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一个月后，在党的4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报告，开创了改革和开放的新时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和开放只是一个人工肺脏，连接着苏联越来越无能的、垂死挣扎的肌体。鉴于这个人工肺脏使得苏联又延续了六年半。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敌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蓬勃发展的时刻当上总书记，是他导致苏联的土崩瓦解。其实正相反，苏联早已经崩溃了，是戈尔巴乔夫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延长了它的寿命。我之所以说这些，也是因为（这是世界悖论之一）就是在苏联彻底瓦解前夕，西方研究苏联的学者，特别是美国的部分政治学家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苏联是世界最稳定和最稳固的制度的代表。这一论点的主要代表是杜克大学的詹姆斯·霍夫（Jerry F. Hough）教授。正如西奥多·德雷珀（Teodor Draper）在《纽约书评》1992年6月11日所写的那样，在美国政治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曾预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垮台。

因此，在1991年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时，听到的是世界上的一片惊讶、诧异之声。这样一个稳定的国家怎么可能瓦解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国家分裂了？如此迅速？但是这种“迅速”涉及的只是最后的一幕。实际上整个国家瓦解的过程早就开始了。

对我来说，改革重建是与帝国社会中两个伟大的进程不可分开的：

——让社会全面摆脱恐惧，以及

——向社会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

如果有人从未经历过普遍的动物性的恐惧和从未生活在信息封闭的世界里的话，那么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苏联帝国的基础就是恐怖及其一连串令人心惊胆战的衍生物——恐惧。可以这样说，因为克里姆林宫奉行的是大规模恐惧的政策，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去世，开启了帝国结束的端倪。赫鲁晓夫开始的解冻，之后的停滞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使斯大林时代的恐惧噩梦有所缓解，但并没有以最快的速度消除。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人们因为有了不该有的想法而被迫失去工作和疯狂的书报检查制度还继续存在。只是到了改革和新思维的时候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第一次开始表达自己的意愿，可以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诉求。当然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痴迷于此，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所有人都不停地说呀，说呀，说呀。或者写呀，写呀，写呀！亿万辞藻如洪水般鼓噪于各种会议厅里、电台广播里，泛滥在成百吨的纸页上。俄语本身像俄罗斯大地那样具有无穷尽的丰富和广泛的词汇，于是促成了这种高谈阔论和口无遮拦、强聒不舍。这里并不存在笛卡尔的方法论，没有格言警句的限制，因此人们不得不从某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的言辞中或者透过冗长的文章，去发现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句子。为了找到珍珠，要付出多少艰辛啊！

现在不只是可以说，而且还有话题可说。因为整个社会有了较充足的信息资源。简单概括地说，也算是提一个建议，要注意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即在我们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几年）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不同时期获得资源的渠道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在20世纪上半叶生活过的人，特别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生活过的人，与那些今天坐在电脑前一敲击键盘就可以立即获得所有信息的人相比，他们那时的生活接近原始的山顶洞人的生活。俄罗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列夫·科别列夫（Lew Kopieliew）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区别，他在自己的《我年轻时的偶像》一书中

写道："就获取信息而言，那时甚至成年人都像孩子一样，反观今天这个时代孩子们则像大人一样。那时候人们真的知道的少之又少。那时如果能有机会获得信息就算是拥有了某种特权。管理克格勃档案比看守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仓库还要严格许多。"有一位俄罗斯记者（忘记了他的姓名）回忆说，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问勃列日涅夫，关于这个国家的形势现在可以写些什么，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你什么都可以写，但是只能写一份，然后发给我。"

而这里现在突然有了大量的资料，有关于卡廷的，有关于库拉帕蒂[1]的，有关于索洛韦茨基群岛[2]的。

五年之后，在经过了巨大的努力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感到心力交瘁、不知所措、心烦气躁。看得出来，他已经失去了主动和动力，尽管他的政治见解迄今为止在俄罗斯的条件下仍具有创新精神和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但也开始变得平庸寻常、缺乏新意、优柔寡断、妥协让步。1990年12月他多年的战友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zewardnadze）公开警告他，国内的保守势力正在准备政变，并宣布辞职。但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警告未做出任何反应，而现在那些被他提拔上来的身边的人，很快背叛了他并开始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反对他。而这些人全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是新斯大林主义在抬头。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91年来到了，这一年被载入了世界现代史的史册。开始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发生了流血事件。克格勃军队的坦克镇压了维尔纽斯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十几个人丧生，数十人受伤。立陶宛人用水泥路障包围了自己的国会大厦。当我进到大厦里面时，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切与被围困的城堡联想在一起。沙袋堆在窗户上，到处都是持枪的年轻志愿者守候在那里，随时准备对付从外面发起的进攻。兰茨贝吉思（Landsbergis）总统有些紧张，但仍镇定自若地在大家中间，我感

到有一丝安慰。与维尔纽斯的形势相符，在里加和塔林也是用水泥障碍守护着国会大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塔林的路障。为了能进入国会大厦，必须穿过专门设下的像米诺斯迷宫一样的走廊才能到达那里。

谁该为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发生的流血事件承担责任呢？莫斯科的民主派人士问，他们把矛头指向克格勃的头子克留什科夫（Kriuchkov）和内务部长普戈（Pugo）。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他们剔除出政府，难道他缺乏势力吗？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吗？

夏天他携夫人去克里米亚度假。

以副总统亚纳耶夫（Janajew）为首的所有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开始发动进攻。8月19日开始了三天的政变行动。坦克包围了所谓的白宫——政府和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和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办公地。叶利钦强烈谴责政变者并组织保卫白宫的行动。

政变被镇压下去了，政变的组织者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发现被派遣去守卫争夺核超级大国领导人的坦克部队的士兵们两天未得到任何食物，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皮靴，穿的都是运动鞋。那些守卫俄罗斯领导人官邸的妇女们非常同情这些坦克部队的士兵，纷纷回到家给他们拿来了一些食物。吃饱喝足的士兵们向可怜他们的妇女们承诺决不开枪——他们坚守了承诺。几天后，莫斯科的报纸报道说，在政变开始时，政变头目亚纳耶夫的母亲正好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住院治疗。当消息传出，人们认为他的儿子可能要掌权时，住院的病人们纷纷下床，跑到这位老妇人的床前向她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当政变失败后，亚纳耶夫被投进了监狱，同样是这些患者，他们又纷纷爬下床，而这次是去院长办公室，坚决要求将那位老妇人驱逐出医院。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了。在8月25日，星期日那天，在莫斯科为在最近一次事件中丧生的三位俄罗斯人举行葬礼。百万民众聚

在了克里姆林宫，葬礼在这里举行，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我听见远处喇叭里传出某人讲话的声音，但是熙熙攘攘的众人也都在讲话，根本没人聆听。我问，是谁在讲话。一个人告诉我，是戈尔巴乔夫，然后他又在跟别人说话。根本就没有人听戈尔巴乔夫在讲什么，人们对他已经失去兴趣了。

每时每刻，每个钟头历史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在这次葬礼中我见证了新阶级的诞生。当我们站在加里宁大街等待着出殡队伍的到来时，一位身穿破旧油布大衣的高个子年轻人跑到我们这边来说：

——保卫白宫的人，站出来吧！

一片沉寂，没有人动。在他召唤了几次之后，有人走出了人群，从外表上看应该是大学生。在他之后，又有几个人走出了人群。就这样，逐渐地聚集了一大群保卫白宫的人的队伍。最后，那位身穿破旧油布大衣的人发现，那些走出人群的人们开始组成了新的队伍，为此，他停止了召唤，开始登记愿意参加他的行动的人们的姓名，并命令他们去参加将要在下周二召开的会议。他们要建立一个组织或者叫白宫保卫者运动，他们每个人会得到一个徽章和证件。过若干年之后，他们都可以成为部长、将军、驻外大使。

8月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一职。不久后，叶利钦解散和取缔了苏联共产党。那时我正好在基辅。乌克兰党中央宏伟的大厦空空荡荡。在大厦的正门口站着两位警察，对向他们的提问，不是沉默不答，就是耸耸肩不置可否。制度的支持者和党的机构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早已经迅速接任了国家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或者成了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前哨站。

戈尔巴乔夫肯定会觉得越来越孤独。在西方他仍是极受欢迎的人。西方希望能与克里姆林宫当局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

那些人彬彬有礼、面带微笑、穿着讲究、仪表自在、和蔼可亲、幽默诙谐、文质彬彬。现在，在绝望等待了六年之后，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戈尔巴乔夫！伦敦和巴黎，华盛顿和波恩——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张开双臂。真是不可思议的发现！多么令人舒缓啊！

美国的老年妇女成群结队组成旅游团去俄罗斯：

——我们去莫斯科吧！与戈尔巴乔夫共进午餐！

俄罗斯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

与美国妇女旅游团的人年龄相仿的俄罗斯妇女为买到一块面包或者一块奶酪要排数小时队，她们对总书记并没有如此高的兴致。

总书记当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感觉到人们离他越来越远。在这个制度中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电话指令”作为支柱，那就是说，上级给下级打电话，给他下达指令。开除斯米尔诺夫的公职，处死克尔萨科夫！下级只能执行命令，不得提出任何疑问。如果下级拒绝执行命令，那他的下场是要么被开除公职，要么被枪毙。鉴于这样的传达系统，电话指令下达后没留任何档案和记录文本，因此无从追究责任人。但如果是下级给上级打电话，那么执行的标准就完全相反。下级在做出任何决定前，都要先给上级打电话请求批准。因此在下级给上级打了数个电话后，从电话的数量、种类和意义来分析，上级明白了，他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担任过党的领导职务的人都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知道自己就要下台了，因为他们从这一点总结出，就是他们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越来越少了，后来就根本没有电话了。这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降级、辞职，有时甚至被杀。

1991年年末，戈尔巴乔夫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越来越稀少了，统治国家的中心已经移到别处去了：自6月12日起，鲍里斯·叶利钦担任了俄

罗斯联邦的总统，而且正在逐步地接管统治帝国大部分领土的大权。

也正是为此，叶利钦在11月份解散和取缔了苏联共产党并剥夺了其执政权（那时苏联共产党共有党员2000万名）。他采取这一举措根本没有告知戈尔巴乔夫（其实每次他做的决定都已经不再告知他了）。12月初，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以及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比亚沃维热开会，讨论成立一个新的联邦——独立国家联合体。两周之后五个中亚国家的共和国加入了独联体。帝国的新雏形显现了。

戈尔巴乔夫成了孤家寡人。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从克里姆林宫摘下了带镰刀斧头的苏联红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不复存在。

对新思维的命运和帝国衰败的过程我是同时通过两个荧屏追踪和观察的：

——电视荧屏（实际上是数十家的电视荧屏，因为我旅途中不停地在变换城市、火车站、饭店和住处），以及

——我在这个国家旅行期间每天看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现实画面。

这是两场非同一般的戏剧冲突：

——伟大的政治戏剧（电视台每天连续数小时直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各种代表大会和最高层会议的实况）

——世俗生活的戏剧，在昏暗和冰天雪地里的清晨排队购物的队伍，西伯利亚冰冷的住房里的夜晚，由于开了食堂，人们能为喝上一碗热汤而欣喜若狂）。

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存在，让我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异的鸿沟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文明（或者说是日常生活）发展期间和政治事件发生期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中世纪这两个发展时期或多或少是一个重叠的，是同步发展的，即城市的发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朝代的发展也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而今天则恰恰相反：城市继续需要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而统治者则更换频繁，几年或者甚至几个月就要有人事的更迭。政治舞台的转动要比日常生活舞台的转动快数倍。社会制度在变，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更迭，而活着的人，尽管活着，但还是没有住房或者工作，现有的房子依旧破破烂烂，马路到处是坑坑洼洼，人们依旧为生存起早贪黑，从早忙到晚。

因此很多人宁愿远离政治：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与普通人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电视对帝国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通过电视播放的领导人的画面的事实发现，他们也是普通人，人们可以近距离看到他们，看到他们互相争吵、生气，他们出错的时候，大汗淋漓，看到他们怎样赢，如何输——就是这样紧闭的帷幔打开了，让老百姓看到了最高、最隐秘的殿堂，由此开启了有益于揭开当局神秘面纱的解放过程。

认同统治者的神秘化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还在19世纪中叶，沙皇的画像——作为圣像——高悬在教堂里。布尔什维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传统。领导人的生活成了最高机密。一想到领导人就想到了法老-木乃伊。领导人走路举止僵化，面部紧绷不带微笑、目光盯着一个不确定的空间。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学者们以领导人姓氏在公报中的排名先后顺序来确定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结构。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这种具体的僵化的顺序决定了：排名的先后顺序、出现的次

数、在报纸的哪个版面和用怎样的字体刊登某位领导人的姓名都是一成不变的。党负责文字的官员一丝不苟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哎，你看！米高扬走在乌斯季诺夫前面登上了主席台，这里一定有什么问题！结果整个莫斯科就会因为这样的传言和猜测闹得沸沸扬扬。

电视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大，结果造成所有的政变者都改变了进攻的方向：以前他们是先进攻总统府、政府办公所在地和国会，而现在呢，则首先要占领电视大楼。在维尔纽斯和第比利斯、在布加勒斯特和利马都是先包围了电视台，而不是总统府。描写政变的最新的电影脚本：清晨坦克出动了，首先要去攻占的是电视台，为此总统还在安稳地睡觉，国会大厦黑灯瞎火，仍无一人；政变者冲向实际上掌握政权的地方。

每次大变革的过程、政治变革的过程和社会革命的过程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摧毁旧制度阶段

——过渡（转型）阶段

——建立新秩序阶段

现在苏维埃帝国处于过渡阶段，就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交替的阶段。如今这一过渡阶段的概念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事情没办好吗？没办法，我们处于过渡时期。供应匮乏吗？很容易理解，我们处于转型时期。还是那些老人在掌权吗？别着急，这只是过渡时期的事情。

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地域如此广阔，还有悠久深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在那里过渡期的时间需要持续好几年。

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内容和思想就是要进行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改

革，改变社会制度和创建新品质的生活。

有两位历史学家：一位是俄罗斯历史学家纳坦·爱伊戴尔曼，一位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指出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重要改革的两大特点。

爱伊戴尔曼说：俄罗斯的改革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口号来自最高层，然后逐渐往下贯彻并得以执行。因此俄罗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决定了改革的局限性。在某一时刻改革会被削弱，越陷越深、停滞不前。

派普斯说：俄罗斯的改革是受外部环境和外部力量逼迫进行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败，其在世界游戏中的过度边缘化会促成这种情况的发生。俄罗斯在世界上作用的逐渐削弱为改革阵营提供了一个借口，即他们能让保守派和其他对手相信，国家必须实现现代化并提高效率，这样才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

迄今为止情况的确如此。将来如何，时间会告诉我们！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们没有预计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瓦解。可是甚至那些相信并预言这个超级大国早晚会垮台的人们，也一直担心，苏共在交出政权垮台之前，会先烧毁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投入血海之中。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这个国家，共产党统治的垮台相对而言并没有伴随着大的流血事件，在纯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完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伟大的乌克兰宣布独立。白俄罗斯亦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观察当代世界上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的现象还在继续发

展，这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或者按照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的说法，是未完成的革命。

这些革命的特点是，尽管旧势力正在走向灭亡，但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伴随着来自斗争各方的形形色色的制约行动，其主导原则是避免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

有意思的是，今日流血冲突只发生在那些盲目地要求实现民族主义的地方，或者要求实现宗教激进主义或者极端种族主义的地方。它们将像三块乌云笼罩在21世纪的上空。而在那些要求改变社会制度，以及要求进行各种阶级斗争改革的地方，在那里转型的过程会很温和，也就是说不发生流血事件。

再回到俄罗斯看看：

在1993年的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旧制度还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

旧官僚体制，现仍旧存在于国家机关中。这就是庞大的国家、经济、军队和警察官僚机构。根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的统计，总共大概有1800万人。目前仍无人能取代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为反对派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还不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都在国外。新的政治阶级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过程一般都需要数年的时间。

> ——留下了两支庞大的军队：俄罗斯军队（过去的红军）和内务部队。还留下了边防军和工程兵部队。还有空军和海军。这总共也得有数百万人；
>
> ——留下了庞大的克格勃军队和警察；

——整个中型和重型工业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里包括发达的军事工业集团、庞大的军工生产研究企业，共有1600万人在那里就业。这一军工业的资本在国家的政治中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农业仍实行的是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管理；

——留下的还有整个旧的思维方式、旧的社会行为方式和几十年来灌输给人们的旧的世界观；

——留下的还有旧的法律制度。

除了留下的旧制度的政权机构外，还有苏联共产党留下的巨大的痛苦遗产，即自1917年以来实行了几十年具有大规模灭绝人性的恐怖镇压、迫害，这令受害者心有余悸。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之间就大规模屠杀范围的界定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人口统计学家谢尔盖伊·马克苏多夫做了一个最低估算。依据他的统计，在1918—1953年，包括“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共有5400万苏联公民丧生。库尔干诺夫（I. Kurganow）教授的统计数字最多，他说，在1918—1958年，在劳改营、监狱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应该是11070万苏联公民（摘自《旗帜报》1990年第1期）。

极权主义制度留下的另外一个遗产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贫穷和匮乏。住房匮乏、衣物匮乏、厨房贫乏和生活贫乏。

旧制度遗留下来的第三个遗产是社会群体可怕的道德败坏——社会上活跃着各种帮派团体、武装集团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犯罪集团的不法行为。此外，与最高当权机构阴谋串通的形形色色的各种黑社会组织。活跃的和猖狂的武器交易，包括火箭炮黑市交易。还有明目张胆的令人发指的偷窃行为。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酗酒、猥亵、玩世不恭和

无处不在的粗暴行为。

终于数到了留下的第四个遗产，那就是对生态的严重破坏——雾霾弥漫的城市、在城市劳动场所普遍通风不良、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和随处倾倒垃圾废物。首先还有15座设备陈旧、超负荷运载的核电站：15座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有潜在危险的核电站，尽管这样还不能关闭它们，因为它们负责向许多城市输电照明，向很多任务厂提供电能。

帝国目前所处的过渡期实际上始于1991年年末，但仍然会持续若干年。在这个正在持续的转型期内，可以明显地看到物质文明发展期间与政治事件发生期间的巨大差异。肯定后者还会不断发生，而物质的进步会极小。

政治舞台上正在上演什么呢？各种集团正在这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反叶利钦的集团企图夺取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和他的政权。很难明确地界定，这些集团分站的两边阵营，哪个属于进步派，哪个属于保守派，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其实提出这种标准有何意义，又有谁会去参照这个标准？依据正式的说法，叶利钦集团是改革派，而他的反对派（主要是在国会里的那些人）与之相反。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如今改革是必由之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时间和形势所迫，任何一个集团如果想掌握政权，就必须进行改革，改善支离破碎的经济状况，否则国家就会灭亡，而执政集团也会随着国家的灭亡而消亡。

当然，接下来就是改革的速度问题。但是这个怎么来计算，如何界定？专家们说，在1992年俄罗斯往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步伐可以大一些，应该更大一些。一句话，尽管往前迈进了一步，但实际上，还是在原地踏步。结果令整个国家感到筋疲力尽和心灰意冷。也许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叶利钦与他的多数西方专家给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过于乐观，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改革就是要改变现实，而这个现实是用七十年的鲜血和钢铁铸就的巨大的花岗岩。但要把这块巨大的花岗岩变小，这

需要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对我来说，这个国家的落后、落伍、供应短缺问题和毁坏程度如此之大，要想看到明显的进步，显然一年的时间过短。让我们等上10年、20年再看吧！

这一年已经足够令人失望，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景就更加不看好。

所有人都把重建和开放抛之脑后。积极与共产党抗争的民主派阵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了，他们正处于要么被解散，要么被遗忘的境地。总的来说，在当今的俄罗斯很少有人在谈论什么民主问题。

整个社会被一种消极等待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绪所笼罩，人们十分厌恶政治。

主张强化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的口号是要巩固政权（特别是中央政府），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和伟大的国家。这种气候有利于巩固专制手段的统治，有利于一切独裁统治的形式。

未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几乎就当代世界问题做出的所有预测都未能实现。未来学者们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丢掉了声誉。数千年来通过小小的、简单的和静止的世界而形成的人类的想象力，今天已经无法应对它所处的现实，现实在迅速膨胀（特别是由于电子产品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的迅速扩展），因此现实里面的一切都越变越多，那里有上百万个粒子、元素、单位和生命，它们在不断地运动、交锋，形成新的组合、新布局、新层面，再也无法抓住它、握住它、描写它。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将有三个进程会主导俄罗斯人生活的画面。

第一，整合民族主义与瓦解民族主义的力量之间的较量。俄罗斯人会希望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超级大国和帝国，而那些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则会越来越明显地追求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自治的目标。目前这些少数民族只占俄罗斯联邦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是俄罗斯人，俄联邦目前共有人口一亿两千万），但是非俄罗斯族的居民的人口比俄罗斯族的人口增长快五倍之多，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就像俄罗斯语言优势在锐减一样。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土地上说俄语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学习俄语。在我旅行走过的好几个地方就遇到了不能用俄语与人交谈的困难，特别是不能跟年轻人直接用俄语交谈。年长一点儿的人俄语说得还不错，年轻人懂俄语的人很少，小孩子几乎都不懂俄语。（再说几句关于俄罗斯人的话题：在俄罗斯联邦之外还居住着两千六百万俄罗斯族人。他们的未来很不确定，也很不明朗。这些俄罗斯族人主要居住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

非俄罗斯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德国人的外迁，特别是犹太人的外迁促进了俄联邦的“亚洲化”进程。犹太人担心受到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的威胁，担心再次遭受迫害和大屠杀于是纷纷外迁。在整合与瓦解的力量之间的较量也可能会发生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地区。曾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的边界问题，在当前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1920—1980年，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个共和国经历了九十几处的领土改变和边界修订。1990年在这些共和国之间发生过五十多次边界冲突，如今这些边界冲突事件发生得更加频繁。这些边界的切割，就好像在非洲一样，要穿过相同民族居住的土地（比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就是这样）。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有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层面上的冲突。伊斯兰教发展非常快，这是讲土耳其语的民众信奉的宗教，而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上的居民高达六千多万人。

第二，在整合与瓦解力量之间的较量之外，将会因为物质生活条件差距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一边是一帮有钱人（越来越富），而另一边则是穷人（越来越穷），正如在每个社会那样，都会有一些生活水平较低的人，但在俄罗斯这种反差将会加大，更加明显，更加刺眼。这将会是以最原始、最无情和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伪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

第三，自我发展阶段。我把这种发展用一个不确切词汇来形容，即“飞地经济”[3]。如果我们是在发达国家，如荷兰或者瑞士，我们会注意到，他们的整个物质发展水平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房子都粉刷得非常干净、窗户都有玻璃，道路非常平整而且车道划分明显，所有的商店都供应充足，饭馆里暖和又整洁，街灯明亮，草坪修剪得十分平整。在“飞地经济”发达的地区，景致就完全不同，在那里阔绰的银行矗立在破旧的楼群中，豪华的饭店周围是肮脏的街道和贫民窟的建筑，从亮堂堂的机场走进昏暗和阴森森的、令人不愉快的城市，在窗明几净的迪奥精品橱窗旁是肮脏的、空荡荡的、黑灯瞎火的当地人开的商店，在华丽的汽车旁停着的是又老又破的、臭气熏天的、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共汽车。因为资本（主要是外来的）是用来建设自己芳香的亮闪闪的殿堂，形成他们的飞地，但是这个国家的别的地方他们既不想也不可能去发展。

在俄罗斯人之间正在开展一场大讨论——该做什么？有的人说：回到我们的祖根老俄罗斯去。索尔仁尼琴说，沙皇的国家曾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国家，曾是一个“富裕和繁荣”的国家，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来了，他们毁坏了一切，但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描绘出的俄罗斯并没有那么美丽的田园风光：

多年后我再度漫步在你的大路上，

我再度看到你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我为你的死寂、静止不动和空疏而操心。你休耕的土地、

没有屋顶的茅草屋和发霉的墙壁，

你的贫穷、恶臭、平庸、跟以往一样的烂泥，

奴颜婢膝的眼神，厚颜无耻、历尽沧桑，

虽然你已从奴隶中获得解放，

却不知在自由中从哪里开始——老百姓

一切如故。

［摘自伊凡·屠格涅夫（Iwan Tugniew）的《梦》］

安东尼·契诃夫（Antoni Czechow）在1890年时写道：

……我们让数百万人在监狱里受煎熬，他们无端地受到野蛮的折磨，毫不反抗；我们用锁链把他们串在一起，拖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行走几千俄里[4]，让他们染上梅毒，纵容他们道德败坏，促使他们不断犯罪，并把一切罪过都推给狱卒。现在整个欧洲文明人士都知道这不是狱卒的错，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这不关我们什么事，我们置之不理。（摘自《书信》第一集）

回归古老的文化？但是俄罗斯文化曾是贵族文化或者农村文化，或者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目前已没有贵族，也没有农民了。中产阶级、市民阶层从来就为数不多，而且经常是外来的人。

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首先是面对知识分子、民主派人士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处的困境。

譬如，社会和国家。怎样才能让社会参与到共同管理国家事务问题上去？怎样才能让国家实现民主化？

俄罗斯大地及其特殊性与其资源都受国家的支配。因为俄罗斯本土的土壤是贫瘠的，气候寒冷，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天都很短。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土地收成极差，因此饥荒经常出现，农民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极端贫困状态，无法自食其力。地主或者国家一直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农民负债累累，没吃没穿，只能沦为奴隶。

与此同时，这片土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但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所获得的利润轻易被国力强大的国家官僚专制垄断集团所攫取。因此贫瘠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人民毫无益处，只是为当局服务。这就是俄罗斯巨大的矛盾之一。

但是未来为这个国家绘出了一个乐观的前景。伟大的社会有着强大的内部力量。他们拥有足够的生命力，拥有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能够从最惨重的失败中站立起来，从深重的危机中脱颖而出。

中国学会了从蒙受耻辱的谷底站立起来，摆脱了饥饿并开始独立自主顺利地发展起来。印度也一样，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亦是如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他们始终无衰的文化、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具有创造力的雄心壮志，让他们，甚至在最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个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一定同样适用于俄罗斯。

再补充一句：令俄罗斯人着迷，又令其充满恐惧的西方，时刻准备给其提供帮助，这也属于西方对其自身和平利益的考虑。西方会拒绝对其他国家的帮助，但永远不会拒绝对俄罗斯的援助。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驾着三套车跨过俄罗斯的田野和大地：

尼古拉再次停下马车环顾四周：四周依旧沐浴在月光下，在繁星点点、迷人的一马平川之中。

扎哈尔大叫一声，让我往左转；为何要往左转？尼古拉琢磨着。——我们是要往米耶鲁科夫方向去吗？

上帝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

[1] 白俄罗斯地名，苏联大清洗期间在这里枪决了数千名白俄罗斯人。——译者注

[2] 白海中著名的劳改营。——译者注

[3]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译者注

[4] 1俄里即1.0668公里。——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初遇（1939—1967）
- 平斯克1939
- 西伯利亚铁路1958
- 南方1967

鸟瞰（1989—1990）
- 第三罗马
- 大教堂与宫殿
- 亲眼所见，泪流满面
- 沥青山上的人
- 逃离自我
- 沃尔库塔，冻僵在火中
- 明日，巴什基尔人的反抗
- 俄罗斯的神秘
- 跳水洼
- 浓雾笼罩科雷马
- 克里姆林宫：魔法山
- 困境
- 中亚，海的泯灭
- 波莫纳小城德罗霍贝奇
- 归故里

余波荡漾（1992—1993）
- 余波荡漾